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革命中的中国：

〔美〕马克·赛尔登 著

魏晓明 冯崇义 译

延安道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延安道路》一书第一次对战时根据地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后来对从1920年代起的整个抗战和内战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并且（以地方和地域研究方式）直至今天。这一方法可以从最基层到地域、民族和全球的视角，又从国际体系到根据地、县、村庄和家庭的微观世界来观察社会变革。从而它使得从人类的角度研究政治和进步——它们的产生和变革、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的方式曾被国家和世界研究排除在外——成为可能。尽管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战争时期，当时有十几个在地域上孤立的根据地坚持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但这种方法还是被广泛用于其他历史时期，包括人民共和国时期。

——马克·赛尔登

ISBN 7-80149-670-1



9 787801 496706 >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49-670-1/K·093

定价： 22.00元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美]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 著

魏晓明 冯崇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ISBN 7-80149-670-1

I. 革… II. ①马… ②魏… ③冯… III. 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中国 IV. 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0669 号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著 者:[美]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

译 者:魏晓明 冯崇义

责任编辑:武英 罗琳 光知

责任校对:同文

责任印制:同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89×1194毫米 1/32开

印 张:10.25

字 数:239千字

版 次: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670-1/K·093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HINA IN REVOLUTION :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by Mark Selden

Copyright © 1995 by M.E. sharpe, Inc.

经美国 M.E.Sharpe, Inc. 许可据 1995 年英文版译出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阅读中国序

刘 东

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当代汉学，究竟最终对中国文化是福是祸？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才恰在于检讨现有的

知识缺陷，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明：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人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还把这种对话看成惟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不断漂移，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

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中国研究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领略了！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也同样需要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一样，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也有可能表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刘 东

2001年12月18日于北大草庐

阅读中国系列书目

《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式》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先哲的民主》



阅读中国系列编委

沟口雄三 贺照田 黄宗智

刘东 李强 孙歌

汪晖 杨念群 罗琳

《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式》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先哲的民主》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陕西省：革命的环境	9
第二章 西北的反叛和革命者	27
第三章 从土地革命到统一战线：1935～1936 年的 陕甘宁苏维埃	83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在 1937～1941 年的陕甘宁边区	122
第五章 危机与对新秩序的探索	173
第六章 延安道路	201
结 论	261
后 记	264
参考书目	311

前 言

这本书的初版是新一代关于革命中国的第一批学术著作：使用的关于共产党的情报档案文件来自台湾、日本和美国；提供了第一批关于单个根据地的“微观社会”研究；尝试一方面从中国政治和社会，另一方面从国际力量两方面探讨地方的革命进程；本书还从占优势的集权主义理论模式和国际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中脱离出来，转而探究革命变革中的创造性和民粹主义来源。

这本书还是 1960 年代一批大事件的产品，特别是那些发生在美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事件，它受到当时全球重组和新思维的影响。从 20 年前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直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从东南亚到全球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南北关系等在意识形态、政治及军事上的冲突，美中关系一直处在没完没了的斗争之中。那些斗争形成了美国的学术思想，以及对中国的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解。

1963 年，当我为最终完成《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进行资料研究时，美中力量和全球力量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这时分裂力量形成，不久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美国则出现了要求公民权利、反战及

新的左派运动。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支柱似乎正在瓦解。美国在越南失败后不久，其霸权力量节节下降，中苏联盟瓦解，这一切为突破美中关系研究，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

时间在向前进，甚至是迫使我们忙于研究新的问题。我想弄清一个贫穷而技术落后的农业国家是如何在 15 年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抗战的，那些殖民侵略者的神力，足以使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早期的殖民战争中取得胜利。特别吸引我的是，广大抗战力量的先锋有没有可能在贫穷而屡遭蹂躏的乡村创造性地致力于解决贫穷、不平等和落后问题，这些正是现在后殖民世界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原版前言中，我把这件事渲染为更有希望的新纪元：“这是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人民如何打碎压迫、贫穷和恐怖的枷锁，他们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变为有力的行动，如何发展人类的自由和美好前景？人类如何站立起来？”那时在另一个贫穷的农业国，革命力量正在对看起来无敌的侵略者予以致命一击，使美国，以及国际政治、文化和理性生活陷入危机之中。

到 1971 年，在美国封锁、敌对并寻求孤立中国，把她作为国际弃儿 20 年之后，两个国家开始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然后重新确定全球敌对和联盟的版图。这些过程有益于重新反思战争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特别是长期的中国革命。《延安道路》发表于 1971 年，正值美中关系向正常化大步迈进的时候，是两国相互承认的戏剧性转变的时刻。

在我着手准备为这本书增加批判内容时，美中关系已经度过了 20 个喧嚣的年头。长时间的文化革命影响了市场、个体和外国资金的流入——尽管是以隐蔽而复杂的方式，毛的遗产还是继续影响着中国的事业。从 1980 年代，邓小平的中国出

现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同样重要的是，前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已经将国际政治和美中关系问题转变为最基本的平等问题。重新思考研究动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此次出版本书，重申了初版最初研究的核心命题和观点。特别是它把革命和抗战放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来考虑；它发现了“延安道路”对中国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做出的土生土长的贡献；它确定了1941~1942年具有分水岭般的重要性，战争和革命事业都在此找到了新的综合点；它还重申了“延安道路”在日本敌后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在1937~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抗日、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中，成功地团结了广泛的社会阶层。正如第一版的结论所指出的，“共产党把土地革命的进程与战时统一战线协调在一起的能力，从而领导一个大胆的，有创建性的解决农村的压迫和解体问题的运动，这正是‘延安道路’的特点”。民族主义和改革的联合，建立在党把不同社会阶层联合在一起的能力上，获得他们的支持，才有能力最终战胜日本并打败以美国为靠山的国民党。

中国的抗战力量是先锋队，并且在许多方面对这个国家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最有影响，它预兆着这个运动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席卷亚洲和非洲，并最终改变全球政局。而这个集中于单个根据地共产主义斗争的研究，构成了广泛而彻底研究7年战争和革命的框架，在这场战争和革命中有1500万~

2000万人丧生，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①。我和许多其他学者在过去20年间的研究，使得现在大量关于根据地的更为权威的比较成为可能，这些根据地成为战时抵抗运动的焦点，也是讨论国际样板的范围所在。

本版《延安道路》在第一版之后，反映了社会科学中争论最激烈的几个问题：关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概念及其与革命关系问题的争论；关于道德—经济—理性—农民的争论；关于党—以农民为中心—以革命变革为中心的观点的争论；以及关于20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和分类观点的争论。在新的结论一章里，我就这些问题和其他观点，对抵抗时期的革命变革和农村发展进行了评论。

我在两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延安道路”这一比喻，但它们又是整体相关的。它首先特别表示在中国西北的黄土地区政治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统治下出现的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及它的综合制度，它们最终构成了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从我在这里的详细描述，可以发现陕甘宁边区战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核心特征，在那些全面战时政府的敌后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根据地，带有重要的地域性变化。简言之，陕甘宁既是可以形成抗战力量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微观要塞，又是深刻影响以后中国共

^① 易劳逸 (Lloyd Eastman): 《1937-1945年，中日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中国》，摘自黄正清 (John Fairbank) 和费维恺 (Albert Feuerwerker) 编《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547页，剑桥，1986。类似的数据引自威廉·科比 (William Kirby) 《中国战争经济》，摘自詹姆斯·孙 (James Hsiung) 和史迪文·莱文 (Steven Levine) 《中国痛苦的胜利：1937-1945与日本之战》，第185页，纽约，1992。然而，战争并不仅限于1937-1945年。最好理解为从1931-1945年的15年战争，从某个角度而言，它是从1895-1945年的50年战争。在15年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几乎肯定超过了2000万，绝大多数伤亡人员是市民。

产主义事业的地方。对于所有在封锁地区自力更生的根据地，以及对于所有与它们不同的根据地，都具有普遍的重要特征：组建抗战力量，解决广泛存在的农村脱困问题，对付经济封锁和进攻，以及重建党、小农阶级和地方精英之间必要的关系等。新的民主和群众路线从理论上为地理上分散的战时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抗日事业中，延安的观念充分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高级领导的许多特征。从十几个根据地的这个时期的经验中总结出的教训和遗产，后来在人民共和国的复杂矛盾中贯彻始终，这些我将在后记中探讨。

《延安道路》不仅关注中国革命战争，而且关注 20 世纪革命变革的理论和实际，以及后殖民时期的发展。“延安道路”强调创新特性，它分析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外国统治的瓦解问题，提出了中国以及大批后殖民农业国家面对发展的挑战适当开展战时团结的必要性，原版对西方中国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以及对 60 年代流行的对革命的理解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它打破了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看成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盲目仿效的观点；打破了把外部来源问题看成是社团组织和技术扩散的现代理论；还打破了把群众的民族主义与固有的社会问题相分离的观点。

新版《延安道路》体现了原版是在确信分析研究的核心要素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基础上，完成早期统计及增加和修改事实的严肃态度。然而在新版的前言和结论中，特别是在扩充的后记中，我批判性地重新评价了原版中的核心问题，并重新评价了我自己根据普遍的特别是中国革命的革命变革的选择前景所做的解释。我还根据过去半个世纪复杂的中国革命事业和世界格局重新排列的情况，简要考察了早期的结论，根据我自己和其他人后来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重新评价了《延安道路》以

及农村革命动力研究^①。

在后记中，我从人类自由和农村发展的观点，重新评价了抗战。最重要的是，通过回顾 1950 年代反右运动，1960～1970 年代的文化革命，以及 1980～1990 年代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我探究了如大跃进饥荒和文化革命的政治警惕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悲剧，是否可以从一般意义上追溯到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道路”。所以，后记提供了一个评说“延安道路”和后来中国曲折事业之间关系的场合。

《延安道路》一书第一次对战时根据地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后来对从 1920 年代起的整个抗战和内战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并且（以地方和地域研究方式）直至今日。这一方法可以从最基层到地域、民族和全球的视角，又从国际体系到根据地、县、村庄和家庭的微观世界来观察社会变革。从而它使得从人类的角度研究政治和进步——它们的产生和变革、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的方式曾被国家和世界研究排除在外——成为可能。尽管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战争时期，当时有十几个在地域上孤立的根据地坚持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但这种方法还是被广泛用于其他历史时期，包括人民共和国时期。对单个地域的研究，适当关注它的社会生态、人口统计、阶级、文化和其他特性，并不意味着假定每个根据地的条件都相同，更不意味着根据地代表着国家的条件。实际上，根据地占据着各省边界的多数崎岖不平的地域，远离主要城市和铁路交通，然而高度自治的民族运动的个别地区不断联系起来。

本研究追溯到持久的社会经济瓦解的起因，它是陕甘宁地

^① 爱德华·弗里德曼 (Edward Friedman)、毕克伟 (Paul Pickowicz) 和马克·赛尔登 (Mark Selden): 《中国乡村, 社会主义国家》, 新港, 1991; 马克·赛尔登: 《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纽约, 1993。

区 30 年革命冲突的前奏，其战时首府延安，象征着 1935～1947 年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这些年里，运动从中国社会周边的二次军事胜利形成一种平衡直到统治和改变中国。我希望通过考察这个农业地区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力量传达一种强烈而典型的革命变革，并理解变革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让我们从陕西社会的瓦解和极度绝望所引发的最早的隆隆革命惊雷开始，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秦朝曾在此建立第一个统一王朝。两千年过去，这个地区将孕育一个新的革命中国。

第一章 陕西省：革命的环境

据特德 (O.J. Todd) 说：“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也许陕西不利条件最多。的确，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个大财富，50 年前的回民起义 (1862~1873) 以后，她就如同其地图形状一样，像个要死的乞丐无力地躺着。”^①

关中地区将陕西省一分为二，它位于该省中部富饶的渭河平原上，两千年前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摇篮。关中易于防守，战略地位重要，是中国北部和中亚之间的天然走廊，她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从这里向外辐射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帝国^②。

有三个主要朝代是从这里兴起的。长安即现在的西安，屡屡作为帝国首都，成为中心象征而放射光彩。但是一千多年以前，关中地区开始衰落，虽然在唐朝 (618~906) 长安仍是一个傲视全世界的大都会。由于经济和政治势力转向繁荣且人口

① 特德 (O.J. Todd): 《在华二十年》 (*Two Decade in China, Comprising Technical Papers, Magazine Article, Newspaper Stories and Official-Reports Connected with Work under His Own Observation*), 北京, 1938。特德是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总规划者, 我感谢约纳丹·斯宾塞 (Jonathan Spence) 提供此段引文。

② 有关关中在中国文明中的重要性, 见 (英国) 地理手册丛书, 《中国本部》 (*China Proper*) 第 1 卷, 第 74 页, 1944, 1945。

众多的水稻生长地带——华南和华中，一个解体过程便开始并持续到 20 世纪。

黄土高原横亘中国华北和西北 6 个省份，广逾 20 万平方英里，关中就处在心脏地带^①。那是一片梦幻般的黄色世界。19 世纪德国旅行家巴隆·冯·李德芬（Baron Von Richtofen）对此有生动的描绘。穿越渭河平原时他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黄土。我们正是在黄土地带中心。一切东西都是黄色的。山丘、道路、田野、河流与小溪的水是黄色的，房子是黄土造的，植物上覆盖着黄色尘土，甚至空气也免不了黄色朦雾”^②。肥沃的黄土能够保持湿度，提供了中国农业最初发展的环境。旱地作物如小麦和谷子适于在平坦的浅黄色的土壤上生长，但是少得可怜而又不可捉摸的雨量，严重影响了财富生产能力^③。

从渭河平原北行到延安，这位旅行家进入人烟稀少、崎岖难行的黄土山地。这里，在陕北长城以南，黄土的其他特性导致了该地区的困窘状况。这里在 20 世纪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农村。由于森林和黄土本身长期遭受侵蚀或被人类破坏，它的陡峭山地使农业收成微薄且前景不稳。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这样描述道：

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陕西的

① 乔治·克莱茜（George B. Cressey）：《中国地貌及其人民》（*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第 183—184 页，纽约，1934。

② 巴隆·冯·李德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ofen）：《巴隆·李德芬书信集，1870—1872》（*Baron Richtofen's Letters, 1870—1872*），第 96—97 页。引自乔治·克莱茜（George B. Cressey）《五亿人口的国家》（*Land of the Five Hundred Millions*），第 255 页，纽约，1955。

③ 克莱茜：《中国地貌及其人民》，第 189 页。

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足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几乎没有名副其实的大山，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又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阳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皱层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①

更重要的是陕北地区地处偏远和交通不便，决定了这一带黄土高坡恶劣的生活条件。乔治·克莱茵（Gorge B. Cressey）描述的黄土地区交通困难特别切合陕北的情况：“一个人如果不顺道路走，许多黄土地区就是不可穿越的。这些道路形成此地农村特色之一。每过一辆车或一群动物，就搅起黄土。黄土如此之轻，可轻易升入云中。由于持续的水土流失，一些路或小径变成了真正的峡谷，宽度仅够一辆车通过，几乎像矗立的墙，高耸达40英尺以上”^②。由于路少，许多又经常被冲坏，这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的贸易和交通以及本地区内部的贸易和交通，是最原始和零星的。几乎无一例外，交通运输仅限于用牲口驮着物品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这些崎岖之地远离省内主要权力中心，长久以来成为武装

①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第63～64页，纽约，1961。

② 克莱茵：《中国地貌及其人民》，第187页；参见《中国本部》，第197～198页。

流寇的理想之地。李自成在这里揭竿而起，推翻了明朝（1368~1644），短暂地占领了北京后被满人打败。19世纪中叶，这里被穆斯林反叛者和满族军队反复蹂躏。特别是延安地区，惨痛地蒙受了战争和天灾双重灾难。有一个记述回顾了这一地区的情形：

一段和平和繁荣的时期被打破了。同治六年三月（1867年4月），大批回民军队来了，毁灭了路上所有城镇……延安府当时幸运地阻挡住了叛乱者……

但守住延安城的代价是周围农民被洗劫，人们大量逃亡。大批人从其他地方挤进了这座城市，当地资源被大量地消耗掉……

同年十月（1867年11月），一支太平天国叛军抵达延安府……使7个月前回民叛乱造成的村民逃亡又大大加剧了。延安府从未从战争洗劫和饥荒中恢复过来，周围农村更是如此。

这一地区从此荒无人烟，野兽横行。虽然平坦地带被重新耕作并扩展到较宽的山谷，但是较窄的沟壑成为野豹、野猪、狼等野兽的繁殖之地……因此现在整个延安府是全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①

① 阿尼斯特·波斯特·史密斯（Ernest F. Borst-Smith）：《官员与传教士在中国：延安府艰难传教12年记事》（*Mandarin and Missionary in Cathay: The Story of Twelve Years Sirenuous Missionary Work During Stirring Times Mainly Spent in Yenanfu, a Prefectural City of Shensi, North China, with a Review of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Date*），第52--57页，伦敦，1917，转引自萧公权《19世纪中华帝国对农村的控制》（*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第406页，西雅图，1960 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 1368~1953年》（*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第231-232页，剑桥，1959。

在清朝（1644～1911）最后的动乱年代里，军队、秘密会社阶层和一般人常常处在饥饿边缘，增加了转变成土匪的人数。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农民一直提心吊胆，处在“合法”的军阀军队、地主民团和高度机动快速下山抢劫的武装叛匪造成的恐怖之中。如同20世纪一位英国观察家评论的那样：“在东部省份中国人的脑子里……陕北是荒野和盗匪出没的老巢。”^① 陕北历史久远的土匪活动是灾难的标志而不是灾难的主要原因，它标志此地区100万农民竭力求生中的一个补充方式，然而它反过来促使农村经济进一步解体。

陕西农民和农村解体

20世纪陕西处在深刻的农村危机之中。自然灾害和不停的军阀、土匪争夺造成了农村的贫穷与压迫，人们的生活到了不能忍受的边缘。农民面对的最紧要的问题包括饥饿、战争和土匪的破坏、长期恶化的债务、租佃增多、离乡城居地主的出现、沉重的税收和土壤干燥。这些情况促使农村秩序破坏，满足不了人们生存的最低需要。此处我们关心的是陕西农村社会经济关系性质的变化，以便看清它对该省其后革命形态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关注渭河平原地区，特别注意北部地区，因为那里革命活动最终获得了最重大的发展。

西北饥荒是周期性的自然现象，也是半个世纪政治崩溃和战火连绵的产物。战争消耗了农村资源和储备，乃至小天灾也会带来巨大损失和死亡。陕西每一任军阀霸主不停地打仗，无

^① 海特（J.C. Keyte）：《陕西革命与赈灾远征队的故事》（*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t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第227页，伦敦，1913。

情地吮吸农民的膏脂，税收高到最大限度。这意味着当许多农民已被迫放弃家园去当土匪和士兵时，便有许多最好的土地不再种谷物，而是种鸦片。1936年斯诺由西安驱车前往延安时注意到：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罌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灾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①

军阀造成的政治动乱，也使粮食储备被搜刮去供养军队，这当然在战争和劫掠之外又带来新的灾难。再加上长期干旱，经济就完全崩溃了。

1928—1933年大灾荒期间，单单陕西省就有数百万人饿死。1929年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估计，连续两年饥荒造成250万人死亡，几乎占全陕西人口的1/3。另有50万人移到其他省份，还有数不清的人被迫卖掉了房子和土地。数千妇女和儿童卖身为奴。接下来的三年更糟。从华东紧急进口的纾解饥荒的计划全部由于交通瓶颈受阻，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可航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29页（1961）。一份传教报告说，延安周围地区的鸦片问题特别严重，据说90%的居民想种鸦片。参见波斯特—史密斯《官员与传教士在中国：延安府艰难传教12年记事》，第72—73页。

行的河流运粮到陕西。况且，救援的努力经常在竞争的军阀派系之间落空。如果饥荒的后果是几十万农民的生命的话，那么因当时的政治死亡的人则更多^①。

由于道德和宗教原因解救饥馑的行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资助都不能远离政治。美国数千教堂全体教徒收集起来的钱（因为1928年后解救西北饥荒主要是美国人的钱）去拯救中国人，却使军阀制度更加牢固。也许不够充足的善款可以缓解饥荒，却支持了政治军事制度。这种制度显然是问题的根源。不管怎样，解救西北大灾荒所遭受的苦难的努力与重大问题相比，是微小的。饥荒最明显的后果是加速了经济衰退和田租升高的过程。

与华南和华中中的情况比较，华北和西北租佃问题略显次要^②。然而，1928~1933年西北大灾荒时，国民政府进行的一次农村调查突出显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其一，陕西一些地方租佃构成严重问题；其二，饥荒的一个后果是出现土地典押和出售，主要是押给或售给居住城镇的地主。国联（League Nations）一项调查显示：“1933年饥荒时，用3天的食物就可买到20英亩土地。利用这个机会，陕西富有阶级拥有了大片

① 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年度报告，1928~1933》（*Annual Reports, 1928-1933*），特别是1929年，第44页。詹姆斯·雪利丹（James Sheridan）：《中国军阀冯玉祥生涯》（*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第248、251页，斯坦福，1966。1931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报告，仅陕西省因饥荒饿死的就有300万人。《京津时报》1931年1月21日，引自托尼（R.H.Tawney）《中国的土地与劳动者》（*Land and Labour in China*），第76页，波士顿，1966。关于卖掉的妇女和儿童，见简·迈德尔（Jan Myrdal）《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第204页，纽约，1965。

② 约翰·巴克（John Lossing Buck）：《中国的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第9页，上海，1937。

地产，自耕农数目缩减。”^①

陕南是中国中部水稻生长最北的地区，长久以来租佃问题严重。相反，在富饶的渭河平原农业区，对自耕农来说，租佃问题比起经常的饥荒、债务和军阀榨取是较次要的问题。自耕农构成了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然而，西北大灾荒迫使数千人，包括富农和小地主，卖掉或典押土地，以避免眼前的灾荒。同时数万人饿死，更多的人背井离乡^②。

自从19世纪太平天国和回民暴乱以及18世纪70年代和1901年的饥荒以来，不时的天灾和暴乱使陕西蒙受重大损失。饥荒同时使人口减少，大片土地荒芜。因此，肥沃的河谷土地是珍贵的，并且日益集中到地主手中。况且，饥荒和暴乱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驱使地主离开土地到城市去。如萧公权所观察：“甚至在灾难打击他们的家乡地区以前，绅士已准备离开农村到城镇或城市去，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更舒适更适宜的生活，或者更适宜的环境发挥他们的影响。灾难来临时，农村贵族们看来愿意抛弃祖居，不再返回。这些人蜂拥离去，肯定加重了当地人口大量消亡的形势，在某种情况下造成了许多村庄的消失”^③。简言之，地主离开土地的现象在增多，进而加速了农村生活的恶化。生存需要日益迫使农民选择租地或者当土匪，否则就挨饿。

陕西农村调查着重在绥德县，该县代表着黄土丘陵地区的情形。绥德实际上是陕北商业中心，与天津、太原有贸易往来，也是这一地区人口最多的县份之一。但是农村社会经济情

① 斯坦波 (A. Stampar)：《西北各省及其农村发展前景》，引自斯诺《西行漫记》，第229页；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省农村调查》，上海，1934，见全文各处。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省农村调查》，第3~37、136页。

③ 萧公权：《19世纪中华帝国对农村的控制》，第404~405页。

形与本地区其他地方大体上差不多^①。对有 265 户的 4 个典型村子（1928 年）的研究表明，租佃普遍且迅速增长。1928 年 197 户贫穷的农民家庭中，89 户是佃农。到 1933 年佃农家庭仅略少于半数，272 户中有 133 户。正式统计显示，5 年里租佃率上升了 40% 以上。同时期贫农占有土地由每人平均 0.29 英亩下降到 0.21 英亩。调查还说明，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在缩减，本地地主占有土地略有增加，从每人 4.46 英亩增加到 4.88 英亩。从饥荒和死亡中获利的不是住在这些村里的较富有的家庭。土地占有最显著的变化是居城镇地主拥有量的增多。到 1933 年，这些村里 57% 的人没有土地，佃农耕种土地由总数的 40% 增加到 53%。1928 年，佃农耕种总数 604 英亩中，481 英亩是居城镇地主的土地。到 1933 年，佃农耕种的土地变成了 808 英亩，其中 707 英亩属于居城镇地主所有。随着居城镇地主土地的增多，租佃成为绥德和整个陕北的严重问题且日益恶化^②。

有资料显示，陕北地主佃农关系也许异常严酷。关于佃农体力和生理上的负担，秦仲英曾给我们一个生动的描述，他回顾了少年时期一些痛苦的经历：

我是横山人。我家世代在那里。但有好几代了，我们没有足以为生的土地。我们有 10 亩地，父亲做日工，给几个地主干活。我们的土地不好，在山坡高处。我们有五

① 《解放日报》1941 年 12 月 30 日。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省农村调查》，第 79~12 页。用于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未特别说明。那些被划为佃农的农民也许拥有一些土地，当时共产党评估土地日益集中和由此产生农村革命的机会。见史田《我们怎样领导农民分粮食的斗争》，《红旗周报》第 27 卷，第 53~54 页，1931 年 12 月 17 日。

兄弟，生活艰苦，我12岁就不得不出去干活。

1920年1月，我开始为一个叫王国河（音译）的地主干活。工钱是一年两吊，也就是按照阴历从一月干到十月的收入。鸡叫地主就把我叫醒，担水挑粪，干一切事情。一个夏天，西瓜熟了，我摔了一个在地上，摔裂了。这纯是意外，但王国河大怒，拿他的锄打我的头。伤疤现在还看得见，我失去知觉，快到晚上才醒过来。我躺在血泊里，他只是把我丢在那里不管。（哭声）没人知道穷人受的罪。我12岁没有裤子穿。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经常一天被打五六次。他是个大地主，有600亩土地。谷地山地都有。

一天，王国河出去看羊时带我去。那是夏天，天很热。我们离开村子8里路。午饭时间，他叫我回去给他拿饭。他先把我的布鞋脱下来，在上面撒了尿，说：“你必须在我的尿干了以前把饭给我拿来。”天很热，我不得不光脚跑，穿过沙地，路上不能停，不能休息，我尽快地跑，但我回来时地主的尿已经干了，因为太阳很强烈。王国河吃完饭打了我一顿。（哭声）我仅仅12岁。^①

记述陕北地主的残酷，反映出两个特性。第一是农民的忍耐，或更好地说是面对生活变坏和剥削，农民的宿命态度。第二是活生生的人身侮辱之事深深嵌入农民脑海。对许多农民来说，这样的心理和身体上的虐待行为在他们年轻时是必经之事。压抑的苦难越积越深，最终会在激进的农民运动中爆发出

^① 迈德尔：《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第125～126页。

来^①。

米脂县马姓家族的例子显示出债务、商业活动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居城镇地主财富的集中，一贫如洗的佃农数目的增长和农村政治经济的解体。马姓地主在米脂全县和邻近的绥德县拥有大片土地，是陕北最有权势者。他们的财富和势力在中国最煊赫的家族之列。他们的例子是农村深入调查的目标，提供了地主剥削的详细记录。

马姓宗族的生动实例在中国西北是特别突出的。西北地区家族势力远比不上东南^②。1942年不完全的统计表明，居住在杨家沟的53户马氏家族成员共拥有6988.7英亩土地，还不包括占有的大量典押土地。一些地主拥有的土地超过500英亩。按中国农业的标准，这个数目是巨大的。19世纪中叶以前，该家族的财势已趋稳固，家族记录显示，在不时的饥荒中，其土地增加最多^③。

① 一些书评者提出了有关边德儿记述的可靠性问题。这些故事是在全国性的“诉苦”运动控诉旧社会罪恶时讲出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排除这种记录独特的重要价值。像每个人的回忆，无疑被夸大或公式化了。作为个人的回忆资料，阅读时应考虑此点，其他大量可考的关于地主剥削的记述，有力地证明了陕西农民描述的大体情况。罗义·何飞思（Roy Hofheinz）研究华南、华中的农民运动，提供许多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资料，参阅他的博士论文《1923～1927年间中国农民革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Rural Revolution: Chinese Communist in the Countryside*），第93、191页，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6。关于另外一个华北村庄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更详细的记述，见韩了（William Hinton）的名著《翻身》（*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纽约，1966。

② 萧公权：《19世纪中华帝国农村的控制》，第379页。萧指出，家庭势力在贫穷的地方最弱，那里支持不起精心策划的家族组织和活动。

③ 延安农村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2～14页。这项调查1942年完成，然而到1957年才发表。陕北有一些回民聚居区，但是米脂马姓家族不是回民。

马姓家族的账簿显示，1884年前半年，出租在大量增加，佃户地位更为下降。一户著名地主这些年里每年租率稳步增长。从1884年每亩平均毛粮0.33担增加到1932年的0.64担。不到半个世纪，佃农的负担增长一倍，而生产力则是停滞的^①。

1917年，马氏家族建立了“祖德号”，这是遵照传统的家族形式设立的慈善机构。然而，像中国其他一些地方一样，面临中心权力的衰落和走向无政府状态，这样的组织主要不是尊奉死者，而是保护家庭财运。祖德号协调活动范围有购买土地、典押和商业借贷，包括购买谷物、投机和鸦片买卖。这个组织有助于有效地集中经济势力。它还在军事政治上最大限度地向顽抗的佃农和负债人施加压力，其经济势力所及达数县。由于它拥有的土地扩张到最初经营的杨家沟以外，祖德号的政治和军事武力便增添了重要意义。然而，其直接控制通常属当地县政府的警察功能，可以证明是一剑双刃。短期里，它保证租税源源不断地流入该家庭财库。但是它也意味着，农民常常向当地官员发泄的愤怒，现在也许无情地朝向日益承担那些地方官员功能的地主。

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各地，绅士阶级主要由半官方身份的地主家庭构成——作为农民和国家中介的角色正被销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重要事件，绅士失去了正统性，地方上稳固的绅士—地方官秩序解体。同时，绅士常常离开村庄，变成拥有强烈商业利益的居住城市地主阶级。祖祠就是地主—商人对不稳定和社会革命做出反应的最成功（和最无情）的机构之一。马氏家族是代表西北过渡期地主机构最突出的例子。面对反叛农民和竞争的军阀军队，类似的活动专门用来支

^① 延安农村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71～74页。

撑地主权力，同时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地方^①。

我们有一份在马氏家族压迫下遭受苦难的一家的描述。20年之后，地主权力被打倒，共产党开始改变农村面貌，这位65岁的马镇海（音译）以朴实的方式讲了他生活的故事：

我生长在绥德县冯家巷村（音译）。这是一个小村子。我家祖辈是农民。我们有15亩土地，并从地主马家租30亩。我们必须付每亩地租34斤。马地主有一个借钱处称作“祖德”。我们不向他借钱，但我们付不出地租，他便收利息，利滚利。租税很高，年景不算坏，庄稼中等，但家里的粮食只够6个月，最后，我们欠债增加到1200斤粮食，所以那时他把我们的15亩地夺走了。那时我十二三岁。我们没法避免此事，逃不过他的魔掌。次年，我们租种了原来属于我们的土地，必须每亩付30斤租子。父亲说：“我们能做什么呢？地主是狠心的。他夺走了我们的土地，我们不得已。”父亲绝望地离开人世，母亲只是哭。她有4个孩子，丢了这15亩土地对她太无情了。她不停地说：“生活现在坏得多了”……马地主住在40里以外，所以我们不常见到他。但他的代理人即经营贷款的“祖德”经理收取租子，并管理贷款。^②

① 其他省份的情况表明，具有广泛经济功能的新型地主组织在19世纪下半期开始发展。在许多情况下也具有军事和政治作用。这看来与农村商业化和农村解体双重现象有关，从19世纪起，中国大部地区都是如此。见村松裕次《中国清末民初的地主制研究》，《东方非洲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第29卷，第3期，1966。

② 迈德尔：《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第147～148页。“祖德号”指马氏家族的祖祠。

马氏家族和其祖德号的历史说明了债务历史的特征，它长久以来就折磨着陕北农民。毁灭性的利率和周期性的饥荒常常永久地阻止付清贷款，欠债理所当然地传到下一代身上。家族记录显示，定期付款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向个别地主的借债合同早至 1845 年！一般利率是每月 15%。1917 年借贷 913 吊现金，到 1931 年几乎高峰时已增至 7 倍，达 6537 吊。从借债到变成佃农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在饥荒年里。祖德号 1917 年开始办理土地抵押贷款，有 177 英亩，其后 20 年，平均每年增加 150 英亩。被迫以财产抵押借款的小土地所有者，面对毁灭性的利率很难恢复过来^①。

看来陕西的官场和税收政策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直接负责税收的大多数区和乡官员直接从事商业活动。第二，这些官员一般拥有土地，至少家境不错。1933 年陕西省农村调查总结说：“总的说来，陕西省农村政治权力现在基本掌握在旧乡绅手里”^②。虽然晚清和民国混乱年代里当地领导有延续性，但经济和社会功能方向有变化。这是由于城镇地主出现，商业活动日增和民政权威的破坏。陕西地主的财富很少能与南方地主相比，陕北仍是中国受商业发展影响最少的地区。身为官员、高利贷者、粮食投机商和当铺主的陕西地主仍牢牢地控制着本地区原始的政治经济。

1933 年，国民政府的一项调查列出陕西基本粮食税以外的 33 种税收。这些税包括修长城和平息土匪税、汽车税（没汽车，但也收此税）、大门税等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鸦片重税，高达每英亩 300 元，它是军阀长期以来税收的主要来源。并且，税收经常预征 3~5 年。1928~1933 饥荒年里，税收继续不减，税

^① 延安农村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 52~56，97 页。

^② 《陕西省农村调查》，第 149 页。

务拖欠是典押和出售土地的主要原因。但所有的税收中，负担最重的是不定期的军事税，成为军阀时代的象征^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农民运动兴起和最终游击队向军阀权威挑战，促使军阀更多征税，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国民党一项情报指出，绥德县税收从1930年的2万元剧增至1934年的17万元，以便养活本地军队对付游击队活动^②。另外，以当地为据点并由当地供给的保安部队在饥荒年在全省各地都膨胀，以防农民动乱。大多数县保持100多人的队伍^③。最后，山里的土匪和士兵接二连三征收捐税，这种非官方的税收是苛刻的，地主和农民都要缴纳。的确，担任本地民团的“官匪”或军阀队伍、和活动时山里的一般土匪对被围困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陕北蔓延的土匪活动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苦难，还阻挡了初露曙光的经济商业化进程。当中国大部分农村日益卷入区域市场经济时，与全国的发展不相称，道路由土匪控制使得陕北大部分地区的贸易实际上停滞不前。英国领事埃立克·泰斯曼(Eric Teichman)报告他1926年之行时说：“在我们旅行陕北期间，未遇到任何一次商业载货或任何一位较有钱的旅行者，那个地区的贸易和交通被土匪破坏得如此彻底”^④。

农民情况全国各地都是无法忍受的，陕北加剧变坏，那里不利的自然条件又加上了社会制度的压迫。R.H. 托尼(R.H. Tawney)观察到，“有的县份，农村人的地位如同一个

① 《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51~156页。耕种鸦片的扩大，特别是从20年代以后，导致了1928年后的广泛饥荒。许多种粮食的肥沃土地改种鸦片。

② 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史》，第4卷，第434~436页，东京，1962，“陕甘边区与红二十六和红三十五军”，第435页。

③ 《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50页。

④ 埃立克·泰斯曼(Eric Teichman)：《领事官中国西北行记》(*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 in North - West China*)，第79页，剑桥，美国，1921。

人永远站在齐脖子水中，甚至一个涟漪都足以淹死他”^①。民国时期的整个西北，就这样涟漪屡屡变成波浪，数百万人被饥饿折磨而死，其他数百万人在无法估量的自然和政治压迫下挣扎生存。

军阀时代

陕西农民社会经济困境与军阀混战、政治分裂有关。不管经济多么不利，陕西因其地理位置成为战场要冲，防护首都北平，并且作为军事要地嵌入沿渭河、黄河、汉水的东部富裕省份。因此在晚清和军阀时代，它深深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在满清政府衰弱的年代里，曾从安徽派军入陕，以保证陕西归属清朝。清政府此举开始了强烈自主的陕西省人和安徽及其他地方军队之间的敌对关系，此一苦果在以后的军阀时期加剧。

1911年清王朝倾覆导致了新形成不久的皖省军队与忠于哥老会军队之间的争夺。辛亥革命中，武装力量组织最好的哥老会迅速从反满的革命武装手里夺得陕西省许多地方的权力。不久，省会西安以及延安和其他重要地点都落入哥老会手里。然而形势仍旧不稳，陕西军人与外省军队争权，他们内部也竞争。皖省将军和随从在革命发生后，屡屡阻挠省人自治的希望。因此1913年，一位安徽人陆建章被任命为省督军^②。

① 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者》，第77页。

② 陈志让 (Terme Ch'en)：《中国的军阀与派系》，载《东方非洲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第31卷第3部分，特别见第566～567页，1966；拉尔夫·波威尔 (Ralph Powell)：《1895～1912年军权在中国的兴起》(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普林斯顿，1955，书中各处；泰斯曼前揭书，第10～12页；海特 (Keyte)，第14～59页；波斯特-史密斯前揭书，第107～113页。

但是在军阀政治的漩涡中，陕北从1911年就掌握在小军阀井岳秀手中，直到他死于1935年。井岳秀是渭河平原北部蒲城县人。他25年的小军阀生涯以熟练的随风倒知名，在变幻莫测的军阀政治中能够忽而与这个武装阵营联盟，忽而与那个联盟。因此，井的权力先后得到皖系和陕省军队的承认^①。

在西北，有野心军阀最想占有的有战略要地渭河平原和省会西安。1916年袁世凯死后，陕西遭受派系战争的蹂躏，北洋军阀之间联盟转换造成了长期不稳。北洋军阀势力主要统治北方，源自袁世凯的近代武装。从1916年到1921年，一系列的流血冲突先是在皖系集团内部以及皖系与直系之间发生，其后是进入陕西省的皖系军队与陕西军队的冲突。1916年头一次争权，陕西督军陈树藩得到他舅舅皖系集团首领段祺瑞的明确支持，打败了省长陆建章。随后，陈的皖系军队与陕西靖国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陈到1921年5月一直控制西安并保有督军头衔。1921年5月安福集团失势，允许北京政府任命一位直隶将军阎相文代替陈^②。

阎8月自杀后，他的下属雄心勃勃的“基督将军”冯玉祥被任命为督军。冯原先是皖系一员，1920年他的舅舅陆建章被皖系军队杀死后，便转到直系一边。冯的督军职位使他控制了陕西中部西安市和狭窄但却关键的渭河平原，而当地军阀仍保有边远地区。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出发迎战张作霖，他的全面改革陕西的宏大计划胎死腹中。陈树藩的一位前下属刘镇华就任了督军职位。陕西和安徽的势力又一次争

① 在有关复杂的权力转换期方面，很感谢陈志让的帮助。许多有关井岳秀和陕西军阀政治的例子来自1967年12月29日的一次私人交往。

② 陈志让前揭文，第574页。靖国军由军人胡景翼和于右任领导。于后来升为国民党高层领袖。

夺起来。1925年3月，刘发动了对靖国军的战争，因为靖国军暂时成功地夺取了部分富裕地区^①。

陕西是军阀时代蹂躏和混乱的极好例证。陕北地处边缘，对争夺富饶的战略要地渭河平原和西安来说并非关键。但是，土地贫瘠、自然条件差的陕北是周期性的贫困和解体最突出的地方。1916年埃立克·泰斯曼做出了很有预见性的观察：“陕北在我们旅行时，是掌握在半政治性的土匪队伍手里，今天是强盗，明天是造反者，后天也许就是成功的革命者……加上土匪的洗劫和土壤贫瘠，稀疏的居民穷得处在饿死的边缘，延安看来是最边远地区的中心，是我迄今在中国考察见到的最穷的地方”^②。军阀政治和地主剥削无情地吞噬着当地民众的生活财产，加剧了已经不能忍受的农村解体和赤贫。其结果是民怨沸腾，一触即发。20年代陕西的激进运动，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① 英文最全面记述1916~1921年陕西军阀政治，见Sheridan，第101~109页，和陈志让前揭文，第574页；参见《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book*），第1130~1132页，伦敦，1925~1926；哈里·麦克内尔（Harley Farnsworth Mac Nair）：《中华民国的政治与军事主义》（*China in Revolution: An Analysis of Politics and Militarism under the Republic*），第52页，芝加哥，1931。泰斯曼前揭书，第11~12页，强调陕西省独立情绪的重要性，是此时期军事动荡的原因。

② 泰斯曼前揭书，第60、63页。

第二章 西北的反叛和革命者

陕西像中国西北其他省份一样，实际上与新思想隔绝。这些新思想酿成了辛亥革命，并在1917年新文化运动中与中国传统观念正面冲突。地理上遥远的位置，使外国的商业、传教和外交活动达不到这里，西方对东南和沿海的冲突造成的社会变动，并未出现在此一地区。由于高等教育机构缺少，西方学说仅限于少数教会中小学校中，学生和知识分子与西方学说接触产生的激进思想在这里发展缓慢。省政界和知识界注视的焦点既不是外国势力问题，也不是儒教沉沦问题，而是反对外省军阀力量，争夺本省军权问题。然而，这种隔绝在北洋军阀时代还是被打破了。

陕西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

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思潮已从北京和上海的温床向外扩散。“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抗议凡尔赛和约出卖中国利益的帝国主义行径，获得了全国城市的广泛响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站到了一起。新文化运动时期向儒教挑战的科学和民主学说迅即退居次要地位，代之的是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狂热。“五四”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赵宗

润、王佛宗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热切向民众传播革命信息。他们从北京返回陕西家乡的三原地区。约在1919年下半年，他们成立了陕西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学生中《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著作及西方激进学说，常常成为深入讨论的话题。他们激烈争论，批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①。

1919~1927年，革命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渭河平原空前传播，特别是在西安市一带。西安是中国西北文化和政治中心，与外界交往最多，最先接触新思潮新思想。但是，在陕西北部拥有中学的仅有两个地方，即绥德和榆林，革命思想也在小范围内传播。学生们从邻近地区的上层人物家庭得知新思潮并热情欢迎。1922年在榆林中学任教的魏野畴和在绥德师范学校任教的李子洲都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信徒。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曾到陕西招收学生和教师。榆林中学的学生组织不仅包括陕西军阀井岳秀的儿子井文龙，还有一些其后不久在本地创立共产党游击队的人物，包括刘志丹、高岗、谢子长和王子宜。无疑，陕西北部游击运动的领导人原先都是中学里的学生积极分子，他们受到“五四运动”后新风气的影响。这些年青人有经验有眼光，自我意识开风气之先。他们更像西方大学生，而不像是中学生。他们都是在18、19岁或20出头。陕西革命运动的中心人物刘志丹来到榆林中学时是19岁。他们从每一方面看都认为传统与旧制度行将灭亡，他们受到的教育更使他们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当他们形成价值观念时，就在西北部同时代人中崭露头角，

^① 孟伯谦：《回向人道》，第2-8页，香港，1953。孟是陕西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一位发起人，并在共产党和国民军中积极从事军事工作。1938年他背离共产党。“五四运动”英文著述最详尽的是周策纵《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剑桥，1960。

身处传统观念与西方思想冲突的前沿，向社会秩序的基础挑战。榆林远离外国影响，“五四”运动也未直接波及，在这里教书的魏野畴却向他的学生介绍《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然也有像《新青年》这样激进的中国学者杂志^①。

1922年魏野畴在榆林中学帮助发起了一个学生会，这也许西北第一个这样的组织，刘志丹成为主席，翌年即领导了两次学生运动，直接抵制军阀利益。一次运动中，戏剧性的问题是反对给井文龙特权。据称，运动成功了，井文龙转到了西安一所学校。在此之前，军队曾出动，企图恐吓学生示威者但毫无结果。此一事件显示出中学生的力量，他们可以顶住当地官僚甚至军阀的压力。如果军阀的军队可以横暴地对待农民，致使田地荒芜，灾难连绵，在陕北他们不能漠视著名的地主家庭或其子女的压力。在一个约98%的人是文盲的地区，这些受教育的青年可以聚合本地的力量以支持他们的要求。然而，政治控制在其后10年里仍然是极有力的，学生们远不能总是胜利。抵制运动一年以后，因为发动的学生运动遭到反对，魏野畴被迫离开了榆林中学^②。

① 高岗：《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第2~3页。这是研究陕西游击运动的基本资料。高岗充满激情的叙述反映了他本人深深参与了革命活动和党内斗争。这份报告是在1942年11月17日和18日延安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的，当时正是第一次整风运动高潮期间。《解放日报》1944年2月7日。李子洲是陕北绥德人，曾在北京大学随李大钊学习哲学。他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他被尊为陕西共产党的创建人和指路人。参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sner）《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源起》（*Li Ta - Chao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Marxism*），第71~104页，剑桥，1967。李立果：《渭北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红旗飘飘》第5卷，第20~27页。

② 《西北第一颗红星：刘志丹故事片断》，《红旗飘飘》第5卷，第108~110页。《刘志丹同志革命史略》收录在华应中主编《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第149页，北京，1951。

1923年孙逸仙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成协议，建立了国民党和羽翼未丰的共产党之间的第一次联合阵线。共产党仅在两年前于上海成立。1924年1月，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甚至获得一些领导职务。两党就国内政策达成一致，在苏俄帮助下，开始了合作时期^①。

“五四”时期热切寻求新思想的风气，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陕西。然而直到国共合作时，共产党才作为一种组织力量出现在西北地区。1924年春天，共产党和它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绥德建立了陕北支部，次年在榆林建立支部。党团支部的建立反映出魏野畴和李子洲的工作成绩。当时还没出现省级的党组织，因此，这些支部也许就是半正式的省级机构。支部成为组织激进学生的核心。例如刘志丹，1924年中学毕业前加入了青年团，1925年初加入共产党。那年秋天，他成为广东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里的青年共产党员之一^②。

陕西共产主义运动此时仅集中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小圈子里，与工人和农民隔绝^③。尽管1926年以前华中、华南发生大规模农民运动，波及数省，但在西北农村穷人中几乎察觉不到这样的活动，虽然一些地方曾有暴动发生。至于劳工运动以来，在沿海城市和迅速工商业化的地区迅速蔓延，但几乎没有波及陕西，甚至因外国人屠杀中国示威者引发的激烈“五卅运动”，席卷各地的罢工和抵制行动，在陕西也难见回响。共产党虽然作了努力，陕西稚嫩的无产阶级仍然弱小与零散。整个

① 本杰明·斯沃兹 (Benjamin Schwartz): 《毛泽东的出现与中国共产主义》,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第37-39页, 剑桥, 1951; 埃德曼·克拉本 (Edmund Clubb): 《20世纪的中国》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第118-135页, 1965。

② 《西北第一颗红星》, 《红旗飘飘》第5卷, 第108-110页。

③ 陈言: 《陕甘调查记》, 第1卷, 第80页, 北京, 1936。

西北处于中国工业中心和铁路网之外。除了最北部有一块小油田外，陕西没有外国人工业。我们能发现的“无产阶级成分”，仅数以千计而已。他们主要集中在西安，那里一些小型工业——称“手工业”更为确切——发展起来。这些小工业以纺织厂为主，最大的雇佣数十名工人。陕西实际未受到工业革命的触及。在西安努力发动弱小和无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努力流产了^①。然而形势很快就提供给共产党接近工人和农民的环境。

革命活动平静了一个时期，陕西仍是各派军阀争夺的战场。1926年夏天以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统一全国的军事努力北伐战争，唤醒了各种潜在力量，此时冯玉祥再次重返陕西政界，成为主导人物，预示新时期的开始，冯玉祥在国民党陕西省领导人物于右任的陪同下，刚从苏联考察旅行归来。结果冯再次成为掌管全省的军阀，这次他是在活跃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旗帜下进行统治。冯的国民军迅速打败刘镇华的军队，把皖系军永久消灭。清朝覆灭以来，皖系军阀在陕西省内为非作歹。至1926年底，国民军巩固了对陕西中部的控制，包括富饶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渭河平原和西安市。冯的军队在西安是最令人生畏的。他在西安的政府的威信和力量在北伐的每一次胜利中都得到加强，如果冯的例子说明北伐的一种合法的方式，即选择与国民党合作的军阀，而不是打垮他们的力量。陕西形势还显示出，随着军阀霸主的转变，可能出现意义重大的变化。在冯的领导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干部立即推动

^① 吉恩·塞斯诺克斯 (Jean Chesneaux): 《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第24~27, 288页, 斯坦福, 1968。

了激进的农民、工人和学生运动^①。

井岳秀仍在牢牢控制陕北时，渭河平原上共产党的影响在冯玉祥和国民党合作框架下发展很快。1926年5月，一个省级机构建立起来，由耿炳光领导，协调已有党支部的活动。人们很快看到共产党不仅领导初始的工农运动，还在国民军和省政府里占据有影响的地位。冯玉祥则希望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的干部来加强他的军队和行政领导。他们中许多人富于组织才干。国民军政治部负责人此时是一位共产党人，叫张慕陶。此时的刘志丹已按期从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北伐，任国民党第四军政治委员。渗透到国民军中的排级政治干部，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共产党高层领导的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政治部任居要职。此外，共产党还握有重要的教育职位，例如魏野畴，领导省教育部，统管所有陕西学校。也许更具意义的是，进入新创立的西安中山军政学院的，大多限于共产党和青年团成员。该学院是西北军事、劳工和农民运动干部主要训练中心，由共产党人史可轩领导。刘志丹和邓小平是其中的教员，学生包括高岗、谢子长、习仲勋和黄子文，他们后来都在陕西游击运动中声名显赫。到1926年下半年，刘志丹起重要作用的领导核心，开始在榆林、绥德中学和中山学院发展激进青年^②。

① 詹姆斯·塞立丹 (James E. Sheridan): 《军阀冯玉祥生涯》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第206~209页, 斯坦福, 1966; 《中国年鉴: 1928》, 第164页; 高岗: 《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 第3~4页; 李剑农: 《中国政治史: 1840~1928》, 第467~502页, 普林斯顿, 1956。

② 塞斯诺克斯前揭书, 第288页; 塞立丹前揭书, 第199、210~211页; 《红旗飘飘》, 第5卷, 第111页; 《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9日; 孟伯谦前揭书, 第19页。

在广东国民党农民运动训练所 16 期毕业生中，有 16 人是陕西青年，他们热心从事教学，成为毛泽东和其他农民运动领袖的助手。况且，他们还曾花两星期时间在海陆丰观察由彭湃领导的激进农民运动。许多青年干部 1926 年下半年返回陕西帮助发展农民运动，特别是在渭北地区国民军势力强盛的三原县和富平县^①。

1926 年去农村的学生组织者发现，农民暴动的紧张形势迅速蔓延，红枪会这样的农民反抗组织正在壮大。1923 年到 1927 年渭南地区，由于苛税和当地地主剥削激起了一次次农民起义。农民的愤怒冲着当地官员和地主，有时数千农民扎营与当地武装对抗。如果说学生活动分子越来越深入地参与渭河平原上农民运动的发展，那么陕南和河南红枪会则是在没有“五四”这一代学生参与下发展起来的^②。

形势出现了对共产党的极好机会。红枪会代表着大片农村地区最军事化、组织良好的农民武装力量。像农民运动本身一样，这些以及其他秘密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由于农村的苦难和社会的分化。因此，他们代表自发的力量，与共产党全然无关。可惜，共产党人未能在红枪会中发展革命力量。他

① 高岗前揭书，第 4-6 页；罗义·胡飞恩 (Roy Ho'hein)：《农民运动、农村革命和农村中的中国共产党 (1923-1927)》，(Peasant Movement and Rural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Countryside, 1923-1927)，第 32-56 页；孟伯谦前揭书，第 17 页；卫藤冲吉：《海陆丰——第一个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季刊》第 8、9 期，1961 年 10-12 月，1962 年 1-3 月，第一部分，第 182 页；斯拉姆 (Stuart R. Schram)：《毛泽东》(Mao Tse-tung)，第 91-92 页，哈曼斯瓦斯，1966；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第 100-101 页，伦敦，1965。

② 燕声：《渭南的农民和青年一年来斗争的成绩》，《中国青年》第 52 期，第 45-46 页 (1927, 1, 29)，我感谢胡飞恩建议我读这篇文章。

们从革命者要彻底粉碎“封建”的观念和习俗的观点看问题，认为红枪会代表许多旧社会阶层最坏的成分。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农民运动决议》申明了党对红枪会的立场。“因其散漫与迷信，故不耐战斗，且富破坏性而少建设性……红枪会的指挥权常常容易落在土豪手中。”^①当然，共产党领导对红枪会的担心还有其他原因。最重要的是它承诺保持与国民党的结盟，这一目标曾由于激进和失控的农民运动而受到破坏。因此，陕西省的共产党组织者大多忽略了陕南兴旺的红枪会运动。他们宁愿集中力量在渭河平原组织农民运动。这里他们是处在国民军的保护之下，秘密社会组织力量要弱得多。

尽管可能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苛责，当地农民运动的领袖们还是开始了一项战略规划，把秘密会社、土匪和其他“痞子”整合到运动中来。这些组织有与政府力量作战的丰富经验，传统上在反叛运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一方面具有吸引人的力量，和军阀的军事力量相对抗，另一方面又被社会视非法和寄生而疏远之。党的领导拒绝与这些复杂成分结盟，可是陕西刘志丹、广东彭湃和湖南毛泽东等一些最出色的农民运动领袖认识到这些组织的革命潜力。共产党领导的农村运动和其他武装力量的关系向党的领导和当地积极分子提出了持续的挑

①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体会议：《农民运动决议》，引自书慕庭（Martin Wilbur）等编《1918~1927年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俄顾问有关文件汇编》（*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1918~1927*），第298~300页，纽约，1956。与党采取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大钊热情响应红枪会运动，强调它的群众性和革命动机。参看迈斯纳前揭书，第246~256页和塞立丹前揭书，第91页。

战^①。

从1926年开始，在革命政府赞助下，集中于西安的劳工和学生运动也迅速发展。例如1926年，激烈农民运动的中心三原县，学生组织拥有200多名成员，是陕西最大的组织之一^②。

在军阀中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的冯玉祥，在许多年里向劳工运动提供实际支持。在西北，从1926年开始，冯的行政当局以实际行动改善劳工条件，颁布了积极的法令。在西安市，工作日正式限定一天9小时并管制童工。另一劳工立法规定了最低工资并规定集体讨价还价为合法。很少有迹象显示这些措施曾在几个模范工厂以外实行过，但劳工结社的环境的确改善了^③。然而，尽管共产党组织者做出努力，劳工运动仍然弱小，比不上蓬勃发展起来的农民和学生运动。农民和学生运动中，共产党起着领导作用，党的组织分别在农民和学生中扩展。

1927年陕西共产党会议上建立了陕甘区委，在两省边界地区协调日益增多的活动并出版了党的机关报《西北人民》。如果说学生和知识分子继续主导着党的事务，那么工人和农民的参加日渐多起来。然而，也许正是农民运动迅速扩展的成功，导致了陕西共产党人的厄运。虽然共产党以国民党之名正式组织起来，但是共产党干部紧密地与农民协会联系。农民协会很快就显露了激进倾向。未臻成熟的农民激进主义不但引起了冯玉祥的警觉，甚至连武汉国民党左派也感到担忧，导致共

① 胡飞恩前揭书，第158~163，175，253页。关于“痞子”阶层对传统反叛运动的推动作用，见藤村松《中国起义者思想的一些主题》，收入亚瑟·怀特（Arthur F. Wright）主编《儒家信仰》（*The Confucian Persuasion*），第241~267页，斯坦福，1960。

② 挺杰：《陕西青年运动之时况及最近联合运动》，《中国青年》第123期，第653-656页，1926年6月13日。

③ 塞斯诺克斯前揭书，第288页。

产党人和他们的工农联盟陷于孤立，缺少独立的军事支持^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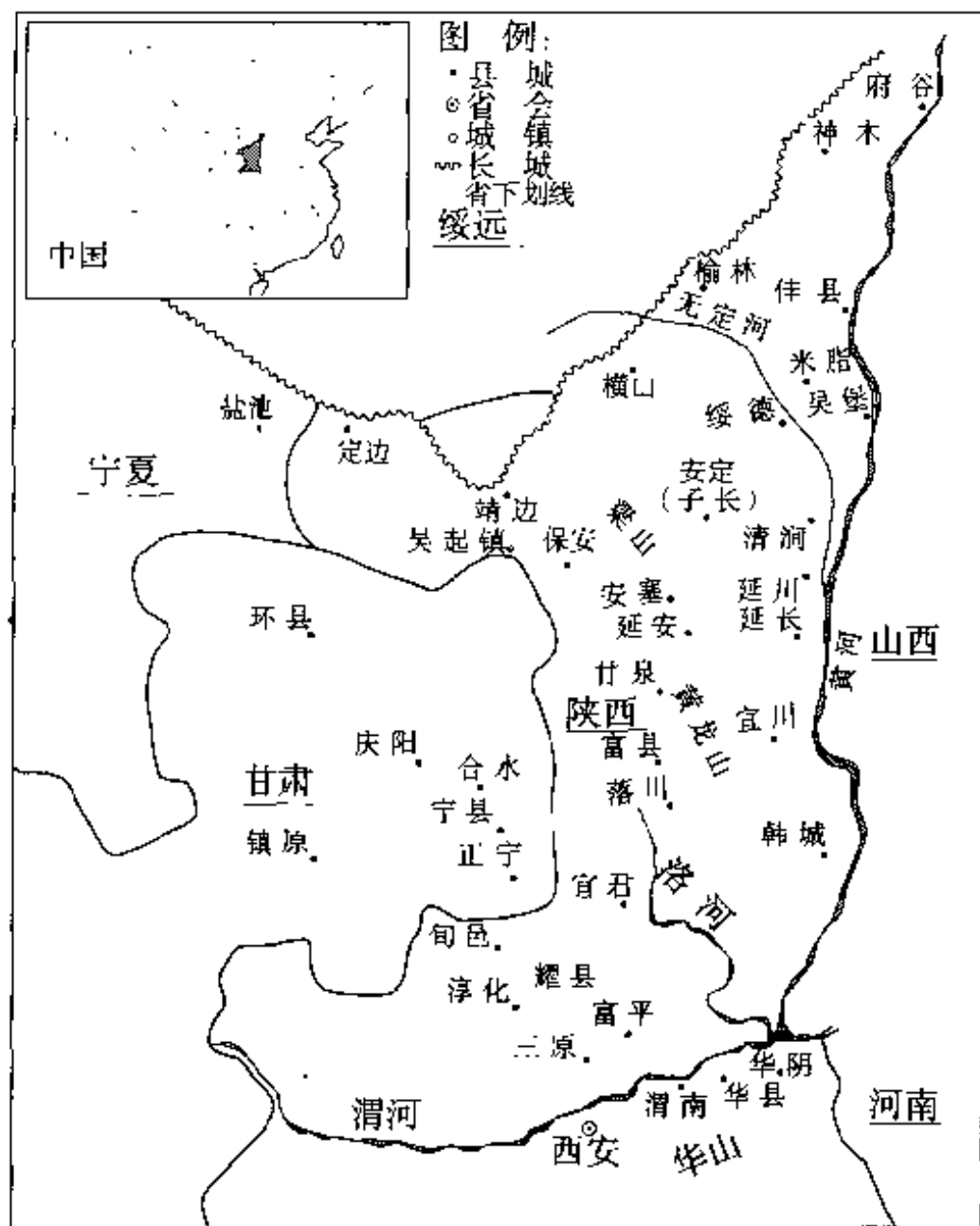
至1927年春天，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已摇摇欲坠，共产党急切地寻求替代办法。其中一项虽彻底否决，却最令人感兴趣的战略设想是“西北计划”，由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庭提出。鲍罗庭提出，共产党暂时撤出主要城市，去遥远的西北，因为在城市里国民党强有力而日益敌视共产党。鲍罗庭坚持，只有那样，共产党才会免受最危险的国民党和军阀之害，况且可以依靠当地的革命将军、共产国际拉拢多年的冯玉祥。此后不到十年，共产党完成了长征，真的撤退到这个地区，却不是在一个军阀的庇护下，而是在其自己的革命军队率领下。但在1927年，缺少独立的军事力量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去依靠某些军事联盟，而手中资本则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②。

1927年下半年，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一系列沉重打击。冯玉祥、蒋介石和武汉及南京的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了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之后，冯突然在6月间要求解除苏联顾问，将所有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然后，他迅速将著名共产党人从他的机构中清除出去，刘志丹就是其中之一。以前在冯的势力培育下的共产党以及劳工、农民和学生运动被破坏了。

陕西所有地区活动受破坏之速显示了共产党的魅力和它提倡的群众运动都很脆弱，不能与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抗衡。在陕西清洗的同时，蒋介石在其他地方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相比而言，陕西的行动是相当温和的。冯发动的反革命清洗中，显然没有人被杀，尽管在下半年和1928年采取严厉措施镇压持续的抵抗。陕西共产党人和其他省的同志们得到了一个严酷的教训，即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拉拢上层、创建党组

① 高岗前揭书，第4~6页；塞立丹前揭书，第215，226页。

② 斯拉姆：《毛泽东》，第108页。



中国西北的游击活动

织、领导工人和农民运动，因对方背信弃义而最终都化为泡影。在军阀统治的中国，军事力量支配着政治^①。

① 塞·丹前揭书，第 230-231 页；高岗前揭书，第 4-8 页；麦可内尔前揭书，第 119 页。

1927年夏，幸免于难的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了新的路程，发动了农民革命式的武装起义。8月1日，约一万名国民党军队在共产党将军率领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后流产。按照“八七紧急会议”的计划，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到处出现，类似在陕西发动的运动^①。

最初的游击活动

1927年下半年和1928年，在陕西北部和中部，共产党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没有一次超过二三百人，并且都很快被政府军队镇压下去。头一次是1927年9月在陕北清涧，由唐澍和谢子长领导，军阀军队反叛的一个旅支持。它向周围三个地区刚一蔓延就被扑灭。刘志丹在安徽和湖北边界参加了几次流产的行动，企图发动农民运动起义，之后，于1928年4月返回陕西。在陕西中部渭南和华阴两个地方，刘志丹、唐澍和谢子长发动军阀军队反叛，组织了“工农革命军”。这两个地区都有基础，过去农民运动曾高度发展。500名武装人员，包括中山军政学院的许多前学员参加了，农民和青年协会组织起来，“当地恶霸”地主的财产被没收。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渭华起义。但是不到一个半月，冯玉祥的军队便镇压了武装很差的游击队，平息了这一地区。最后一次是1928年夏陕甘边界的旬邑农民暴动，由许才升领导，草率宣布“苏维埃”政府，一经与冯玉祥的军队和陕甘民团接触即被弭平^②。

① 约翰·鲁 (John Rue)，《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1927~1935)，第40~81页，斯坦福，1966；胡飞恩前揭书，第265页。

② 高岗前揭书，第9~11页；孟伯谦前揭书，第37~44页；《红旗飘飘》第5卷，第112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63页。

渭华起义是此时期最雄心勃勃的一次，我们也许可以观察到陕西早期游击聚众起义的一些特征。它是在政府军队加入已在渭河平原周围山区叛变的反叛者时发起的。其原因和后来的反叛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这对于我们了解军阀政治和农村革命至关重要。这三个因素是个人的关系、意识形态追求和客观军事经济条件^①。

在当时的军事体系中，军队效忠于他们的直接上司并靠其谋生，直接上司又效忠一位军阀。在民团中则效忠并依赖有钱的地主而得以生存。这意味着一个反叛的旅或团的首领通常保有他的人马。在一些形势下，效忠者摇摆，高级将领不能提供整个军队适当存在的条件，或军事挫败顾不了老关系时，大批反叛就产生了。此外，其他重要关系也在军队里起分化作用，较重要的有秘密社会成员关系、亲戚关系纽带、老乡和同学等。

所有陕西军队甚至在1927年名义归属国民党或国民军控制以前，都灌输了战斗的民族主义教育。冯玉祥开始强调排外、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为普通人服务的思想，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工干部也如此做。1927年以后，陕西共产党人重申上述思想，以拉拢持异见的军事首领。同时别的军队有时发布类似信条，他们贪得无厌的行为与言辞是不一致的。其后10年，陕西的共产党人可说是在献身于这些原则的实行，为穷人利益服务方面达到了独一无二的记录。

在半个或半个多世纪里，陕西被土匪和官军不停洗劫，军队反叛如我们所见，变成了家常便饭。一个常用委婉词“归回北山”就是指现充正规军的前土匪。此情形正如1927年艾克·

^① 以下的讨论大多根据塞立丹对军阀中国时期效忠与反叛的精辟分析，第16~21, 210~215页。

泰斯曼（Eric Teichman）旅行穿过西北时观察到的：“陕北土匪大多是前士兵和哥老会，他们与省军队由同样的成分构成，并与省军队不时地转换角色。因此利用后者打他们是不可能的。况且，他们构成省军队的储备形式，不用省政府开支而保存着。是土匪是士兵全靠他们的兴趣和当地政府的需求而定。他们的哪一个角色都同样令人讨厌。”^① 两个主要反叛的原因是打仗中开小差和军阀军队不能提供必要的物资。民团常常变成赤裸裸的土匪，但在一些有名的例子里，叛逃的军队加入了游击队的武装去攻击地主和军阀霸权。国民军和国民政府的武装，较小军阀、哥老会和其他武装土匪乃至共产党领导的众徒都常常出现反叛，无一定趋向。维持这种鱼龙混杂的军队的长期忠诚，一直是对中共和游击队领导的考验。

选择渭华作主要举事地区有一些重要背景。有意思的一个插曲与历久不衰的小说《水浒传》有关，内中打家劫舍的好汉正是在这一地区。小说里，华阴地区和附近的少华山是宋代（公元960~1279年）强人出没之地，叛众超过700人。陕西游击举义的最初方式，实际上根源于打家劫舍的动人传说与国民和社会革命冲动相结合的产物。特别是早期阶段，游击运动与陕西山区其他武装土匪极为相像。甚至有关刘志丹的传奇也让人想起一些流传故事，说在王朝交替期间官员变成土匪^②。

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渭华是农民运动中心。这块富饶、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位于渭河平原国民军势力范围内，在西安东

① 泰斯曼前揭书，第74~75页。

② 我没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刘志丹和他的同事们由这些故事中得到启发，例如，像毛泽东那样。但是利用传统绿林好汉是普通常识，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施耐庵：《水浒传》，杰克逊译（J.H.Jackson），香港，1963，参看斯拉姆《毛泽东》，第21、43~44、128、159页。

边仅 80 英里。有趣的是这一地区正是外国影响最大的地区，主要表现在传教活动上。三原和渭南学生运动和农民反抗运动活跃，是陕西省基督教最流行地方。整个关中基督教都颇为盛行。例如三原，教会学校占政府小学总学生数的 20%，而全省平均则是 2%。教会活动高度集中结合其他新思潮的拨动，向传统意识和上层人物的牢固地位提出了挑战^①。

当冯玉祥转而反对在他保护下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时，游击武装自然要继续试图在渭河平原上建立农民根据地，因为以前曾大有希望。况且，虽然本地区较易遭受驻西安政府军的攻击，但附近的山区为反叛者提供了安全天堂，要撤就撤。

然而，尽管具备这些有利条件，1927 年以后游击队在此地区建立据点的反复努力还是化为泡影。游击武装以不变的方式试图重返这块曾是农民运动发达的地区。不可避免的失败最终导致他们制定新的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也许至为明了：在统一战线之下的革命势力地区其后变成了顽固的反革命堡垒。1927 年前，农民和劳工运动在渭河平原这样的地区发展到高峰，同时又为国民军所控制。也正是这一地区，1927 年后镇压最烈，包括国民党的镇压兵力。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农业地区，发达的交通和运输不仅是宝贵财富，也是国民党和军阀驻军可资利用对付反叛者的最大优势。况且也正是这里，富裕的地主阶级可以支撑强有力的民团去镇压控制不了的农民。

陕西的情形证实了中国其他地区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使

^① 密尔顿·斯多福 (Milton T. Stanffer) 编《基督教对中国的占领》，(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第 217 页 上海，1922。

我们拒绝有关农村革命两个很有魅力却最终并不能令人满意的假设。第一个是农村革命由农民的不满直接引起，特别是高租佃率和农民运动兴起高度相关。农民不满的确提供中国农村革命的主要动力，就像它在第三世界大多地方一样。但是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不满不能单一地衡量，更不能以租佃率做标准。渭河平原是陕西租佃率最低地方之一，也是全国最低者之一，可是就在这里，1924～1927年农民运动在陕省最活跃。不管怎样，最终是陕北成了革命据点，而陕北实际上未受早期农民运动触及并具有明显不同的社会经济特点。那里租佃率略高一些（但远低于陕南和华南大部地区）。租佃率只是其中之一，并非不满的直接原因。民国时农民的苦难由多方面汇集而成，租佃、债务、税收、饥荒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产生的混乱，在不同地区其各自特色也不同。探索农民不满和农村革命的关系需要综合分析地区生活质量，了解各地主和军阀统治的特别情形以及外国的经济政治影响^①。

如果说农民不满提供了革命的主要动力，那么单单不满不能造成革命形势。在陕西和全国，将不满转变为革命，要面对军阀和地主的强烈反对。回溯陕西革命的兴起，我们不仅必须注意农民和革命问题，还必须注意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军阀阵营内部武力的消长；另一个是地盘和交通因素深深影响到军事力量之间的争夺。我们已观察到，冯玉祥国民军1926年到达渭河平原，建立了革命运动高涨的基地。可是那一运动依赖一支军阀队伍。当冯军转而反对时，运动便荡然无存，此一事实再明显不过。有组织的地主武装、当地

^① 胡飞恩对广东和湖南农民运动的研究表明，把租税率作为革命潜力的排他性指标是不适当的，同时也表明分析构成当地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诸因素的必要性。重点读胡飞恩前揭书第191、219～220、246～254页。

民团、秘密会社和军阀军队之间的协调都是重要因素，影响农民运动前景。

以上所述使我们面对第二个假设，即革命和农村“现代化”高度相关。现代化通常定义是商业和交通发达或外国影响大。检讨第一次统一战线1924~1927年时期，此一观点获得有力支持。农民运动最初在广东和湖南兴盛起来，这两省的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并有长期革命传统。就陕西而言，渭河平原农民运动最发达。渭河平原在整个西北也表现出“现代化”特色。然而必须指出，广东农民运动最后在珠江三角洲彻底失败了，这里商业和西方影响都高度发达，尽管租佃率高。

现代化引起革命的假设，直到1927年在中国农村还算适用，但最后未能说明中国革命的原动力问题。此一原动力最终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1926年国民党北伐标志着一场革命的最高点，西化和沿海城市化的南方战胜落后的内陆北方。1927年国民党反革命政变使革命重心转移，从城市转到乡村，转到遥远冷僻之地。由于转入地下，农民运动其后仅能以武装游击运动的形式发展。其结果，一个新的革命地理环境形成。1927年以前，革命最轰轰烈烈的地方后来变成了国民党反革命势力、军阀和后来入侵的日本军队盘踞之地。财富、战略地位和通讯发达使这些地区至关重要，能使正规军自我防卫，反对农民和游击武装。农民运动最终不会在曾是中心的华南和华中扎根与发展，而是在北方。在陕西，曾是农民运动中心的渭河平原让位于游击活动的北部山地。简言之，从1927年开始，运动的发展朝向农业中国最落后的地区。山区经济、商业和通讯系统落后，最少接触西方影响和早期革命风潮。崎岖的山地远离国民党和军阀正规军队，为武装的农民游击初始阶段成长

提供了安全之地^①。

随着反共高潮和最初努力发展游击运动的失败，陕西共产党变弱并严重分裂。1928年春，党内一场公开的斗争出现，一方赞成立即在农村搞武装起义，另一方强调准备工作，在城市组织工会和发动工人与学生。此时杜衡是陕西共产党总书记，党的成员约800人^②。此后7年里，党内斗争发展着，以刘志丹为首的一派赞成打游击和农民起义，最终在陕北发展出一种可行的游击战略。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刘志丹和他的团体坚持反对党的领导主流，不仅是在省一级，而且在北方局一级和中央委员会一级^③。

1928年渭华起义流产后，刘志丹回到他的家乡保安县，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书记，在杨国栋手下工作。杨国栋当时是

① 最明白叙述革命—现代化假设理论的是约翰·路易斯（John W. Lewis）《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载《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第18卷，第3期，第507—512页，1966年4月。路易斯的论点部分基于错误地认为，延安地区现代化程度高于毛在江西西部创始的根据地（第512页）。Robert McColl也试图发现中国农民革命的潜在生态类型。见他的文章《中国、越南和泰国革命的政治地理》，载《解决争端》（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第11卷，第2期，第153—167页，1967年6月，和《1927—1932年的鄂豫皖苏区》，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27卷，第1期，第41—60页，1967年11月。麦克尔和路易斯都强调农民革命的地理连续性。面对大量相反的证据，他们声称，在同样地区，1927年以前农民运动兴旺的地区（并入城市网的现代化地区），在其后共产党运动兴起期间继续是革命的中心或根据地。我强调的是革命的地理不连贯性，即从相对发达地区转到遥远和落后地区。这一观点将在下文讨论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时详述。参阅胡飞恩前揭书，特别是第250页。

② 陈言前揭书，第80页。

③ 应该指出，大量当代党内争论的材料中，我们找不到有关那个时期的资料去分析刘志丹和他的下属采取的策略。我们必须依赖省级和更高层领导批评他们活动的资料，和依赖后来较同情他们游击战略的分析资料。

共产党陕北特委书记。在高岗和其他农民起义者的支持下，据报杨国栋被拉下，刘志丹继承特委书记职务^①。

刘志丹在王子宜和曹力如支持下着手军事问题，寻求在他的家乡控制民团。刘的当地人事关系，使他可以直接和县长谈话。精心策划的谈判之后，通过游说当地学生，获得大户地主人家的支持被证明是关键性的。刘志丹变成了民团司令，曹力如成为副司令。民团是军事力量的地方支持者，维护治安，亦即地主霸权。这个有趣的故事 30 年后在回忆中透露出来，凸显了特权和关系的重要性，它使刘和其他大户人家的子弟可以在当地机构内外大胆而有效地演习^②。

刘志丹当然证明不是一位普通的民团司令。埃德加·斯诺简单描述刘的民团生涯如下：“他用公文去逮捕和处决一些地主和钱商。对一位民团首领来说，这种行为奇怪得不能解释！保安县长被解职，刘逃跑到邻县，但有三个追随者。在那里，冯玉祥将军的一位官员设宴款待他们。宴会中，刘和他的朋友将主人缴械，获得 20 枝枪，跑到山里，很快聚集起 300 人。”^③

到 1930 年底，陕西共产党却发现，它的努力在每一个重要关头都受挫。尽管有一些暂时的成功，发动农村革命的初期努力证明是失败的。自 1927 年政变，党组织和成员从未得到

① 《红旗飘飘》第 5 卷，第 112 页；高岗前揭书，第 8 页。

② 《红旗飘飘》第 5 卷，第 112~114 页；《解放日报》1943 年 5 月 15 日。据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王子宜对此事件的回忆中，刘志丹将提供决定性支持的穷人组织起来。但王还指出，刘如何通过当地乡绅向县长示好。我们也许可以推断，后者证明是决定性的。胡飞恩提及一个类似的事件，表明上层青年接触一位县长的重要作用，和传统体系培养的一代官员与青年革命者之间的巨大鸿沟。在这一实例中，广东农民运动十部争取官员支持运动的努力失败了。第 102~103 页。

③ 《西行漫记》，第 220 页。

恢复。努力发展的劳工运动全都被行政当局镇压下去。西安党的成员据报总数只有 23 人。同时政治军事形势继续动荡。1930 年 2 月蒋介石与他的军阀盟友冯玉祥和阎锡山冲突，对陕西影响巨大。在 6 个月流血和耗财的战争里，冯的军队毁灭，他不再是以后西北争权夺势中的一个角色。他的下属宋哲元的陕西省长职务，于 1930 年 12 月由杨虎城取代。经历了每一次政坛风云的井岳秀继续控制陕北。他迅速加强了与国民党的关系，其军队被整编为国民政府第 86 师。作为条件，他须遣散一些部队。许多士兵立即变成了土匪。此时陕西正值 1928—1932 年西北大饥荒^①。然而，共产党人未能利用不稳定的形式，这种形式是由敌对的军事派别之间的矛盾和持久的天灾造成的。

1931 年党内危机

从 1928 年起，由于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江西苏维埃根据地的形成，党内歧见出现并扩大，上海的中央委员会强调城市劳工运动，另一派领导则努力发动农村革命运动。1930 年 7 月 28 日在一次孤注一掷的保存城市运动基础的努力中，彭德怀遵照李立三中央委员会的命令，领导红三军进攻湖南省会长沙。两个星期后，共产党人被逐出城市，损失惨重。长沙失败使李立三离开政治局，在 1931 年 1 月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受到批判。

党的新领导由留苏回国学生组成，他们毕业于莫斯科中山

^① 高岗前揭书，第 11 页；《中国年鉴，1931—1932》，第 523 页；调查局：《陕甘宁边区实况》，第 2 页；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年度报告，1928—1933》。

大学，1930年与共产国际代表、斯大林忠实信徒巴维尔·米夫一起返回中国。四中全会很快给米夫一个机会，把他的追随者安排到党的重要职位上，取代名誉扫地的李立三和其他人。然而对四中全会的抵制很快明朗化。劳工领袖清楚地知道，在有组织的劳工中共产党的影响持续缩小，他们批评党不顾一切地坚持政治罢工。他们赞成全国罢工运动改善工资待遇。另一个小集团以陕西张慕陶为首。他是冯玉祥的前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了党内斗争的重要角色。他也反对四中全会，但原因不同。他提倡广泛联合所有爱国阶层和军队，抵抗日本入侵满洲和华北。张认为，民族主义问题比社会革命更急迫。

留苏回国学生中最著名的领袖王明向前述两种主张及农村游击队领导的意见挑战。在两条路线中，王明集中力量横扫一切“右倾势力”，对认识不到中国资本主义的任何形式都是反革命的人进行特别猛烈的攻击。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概拒绝与资产阶级或其他党派、军队结盟，不管他们是否抵抗日本或国民党。王明寻求创造一场完全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运动。由此，他批评下列两种观点，一是农民阶级可以在革命中起独立或主导作用；一是寻求与富农或地主联盟的农村政策。因此，王明的观点使他与全国各地的游击队领导发生冲突，也与建立全国联盟抵抗日本的赞成者发生冲突^①。

陕西党组织内部为控制权产生了短暂而激烈的斗争。四中全会的支持者获胜，组成了新的省领导。新中央委员会路线的支持者李杰夫批评前省领导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右倾）估计，批评他们完全依赖合法活动，排除武装斗争。他指责前领导，盲目坚持华北落后阻碍了武装斗争的观点，看不到革命运动的

^① 约翰·鲁前揭书，第243~244页；史华兹前揭书第254~257页；孟伯谦前揭书，第88~89页；高岗前揭书，第10~11页。

高涨^①。

“北方落后”观念是陕西党内斗争中心，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党应该把全国有限的人力财力和武装力量都集中在革命最发展的地区，还是应该努力发动全国革命？自1911年以来，民族主义和革命活动在中国南方和中部建立了最坚强的基础，特别是在外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渗透最多的地方。然而，如果北方继续是保守势力的堡垒，在军阀争夺和国民党势力弱小情况下处于分裂状态，它就为革命展示了契机。第二，在落后地区如陕西，革命活动要集中搞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以准备将来的胜利，还是武装革命和建立北方苏区的时刻已经到来。致力攻击党内右倾主义的留俄归国学生新领导坚持，全党勇敢行动要全面出击，把全国革命推向高潮，强调无产阶级的关键作用^②。

然而，检讨陕西形势，此时看不出革命高潮。1931年党的成员不仅远低于1927年以前的水平，而且活动迟缓。许多武装的游击队与党只有脆弱的关系，排除他们，全省党的全职干部不超过20人，并且财政困难重重。况且，鼓动工人阶级证明是无效的，与发动农民斗争不同。小军阀继续保持独立，但在杨虎城省政府下，国民党势力在全省大部地区扩张并站稳脚跟^③。李杰夫的分析是当时中央委员会坚持革命高潮的鸚鵡

① 廖兴序：《陕西共产党之纠纷》全文，《真理》1931年4月12日，第1版，这份报纸是陕西共产党的机关报；高岚前揭书，第12页。

② 约翰·鲁前揭书，第242~257页。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在1928年的著作中暗示集中力量于华南和华中根据地的必要性，而不是在“民主革命未影响的地区，如四川、贵州、云南或北方省份”。《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③ 《真理》第1版；中共陕西省委：《政治意见书》稿本，1931年2月25日。

学舌，说明不懂陕西实情。

陕甘边区的游击运动

经年饥荒加剧的陕西社会经济危机使共产党可利用大量不满情绪。可是 1931 年党内争论的事情远不是农村社会解体和革命的问题。遵照全国领导的提示，省领导一直注目弱小而无援的城市无产阶级。事实显示出农民斗争有可能发展成革命高潮，但没有迹象显示党准备积极利用这一形式，刘志丹和陕甘边界游击队最近的经历都没有被谈及这一问题。可以看出，刘本人在省或党的较高层中都没有参与这些争论。然而，一年之内，游击队的胜利把党的领导的注意力引向农村。

E.J.Hobsbawn（赫布斯堡）描述匪患无穷的社会条件，对理解陕北和中国其他一些地方初期的反叛运动很有参考价值：

土匪活动的基本模式……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几乎无例外地存在。它出现在农村，不是城市。在一些农民社会里，表现出富与穷、强与弱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鲜明对比，但仍旧保持基本而牢固的传统和前资本主义结构。历来土匪盛行地区，往往是政治意识尚未觉醒或人们尚未找到更有效的动员方法……

在这样的社会里，绿林好汉盛行，但看来，当传统平衡被打破，如战争饥荒和战争时期或之后，或者现代世界的利器严重影响呆滞的社会，以便毁灭和改变现存社会的时候，便有绿林好汉祭出打抱不平的旗帜……落草为匪其实只是一种温和的反抗。它并不是反抗农民穷苦受压迫这一事实，而只是反抗过分的压迫和剥削。这当然不是革

命。人们不能指望土匪英雄造就平等世界。他们仅能申冤并证明压迫有时可以被翻转过来。^①

当刘志丹和其他年轻共产党领导人头一次进入山区时，土匪已在陕北兴盛了数十年。1927年后陕西游击运动在农村解体和军阀政治的环境下发展。这种情况是王朝倾覆的早期特征，但也有新因素影响到绿林好汉活动形态。不像上海或广东，近一个世纪的外国贸易和传教使人们对外国存在习以为常；在陕北这样的地区，外国人影响刚刚开始。这里的传统价值和制度正在被饥荒和战争侵蚀和毁灭。当地中学生里，杰出青年接触到各种思潮，两个世界的对立和传统价值观与制度破产造成的不安至为明显。这些男青年往往成为游击运动的领导。

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游击队与陕北山里众多反叛和秘密社会小团体，不仅仅在不满意军阀和地主权势上一致，特别是在较早年月，他们经常从事绿林好汉行动——劫富济贫。他们的突袭策略和撤返山区与其他反叛团体并无二致。并且，从一个反叛组织投向另一个反叛组织，以及进出省正规军编制都经常发生。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描述游击队出现的环境和觉察他们的运动，是如何缓慢地转变为全面农民革命的。

在陕北将土匪活动转变为革命的关键人物是刘志丹。他的生涯反映了当时的各种思潮激烈交锋和产生农民革命的问题。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当他还是中学学生领袖时就投入“五四”运动带来的文化革命潮流中。他参加了共产党，在黄埔受教育后，于1926年随北伐回陕西。1926～1930年他在国民

^① 赫柏斯本 (E.J.Hobsbawm):《原始的反抗》(*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第23~24页, 纽约, 1965。

军、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治和军事事务上声名显赫。在安徽—湖北边界，在渭华、在陕甘边界，他致力游击战，顺利升到准军事力量的领导地位，后来成为驻陕西西部陈圭璋国民党军队的参谋长。其间他保持着与哥老会的密切关系并且是积极成员。在甘肃国民党军队任职时，他的共产党关系被发现，因而入狱。不久，他的有影响的朋友和老师保他出狱。从此时开始，他的生涯与游击运动密不可分^①。

1931年陈圭璋等军阀军队动员起来反对国民党势力的扩张失败后，刘志丹带着陈的剩余人马在陕北黄龙山发起了游击战。秋天，200名左右陕西人逃离高桂滋的第84团，跨过黄河进入陕西，加入刘的队伍，形成红24军。1931年9月沈阳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后，红24军改组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有600个人、300条枪。刘志丹充任新队伍的副司令兼参谋长。当时的一份共产党材料指出，部队内部的土匪成分优势力量阻止了升起红军旗帜，尽管“反帝同盟军”的名称选择可能是为了引入注目争取支持，特别是获得中上层人士的支持。北伐的最成功之处就是在中上层播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②。

从1931年末开始，陕西游击运动迅速发展。1932年春，它的适度成功促使中央委员会指示号召重组游击人员为正规红军，在陕甘边界形成苏维埃政权。此时游击队的红26军成长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220-221页。埃德加·斯诺的叙述是基于1936年他对刘志丹的一位随从官员的面谈采访，突出显示了刘志丹早期活动的绿林好汉特色，并且强烈地使人感到围绕他生涯的传奇色彩。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实况》，第1-2页；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调查专报》，第1-2页。

② 关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斗争》第61期，第41页，1934年1月12日。《斗争》是中央委员会上海机关刊物。高岗前揭书，第12-14页；华应申前揭书，第149页。

为约一千人，武器大多从井岳秀的军阀军队中缴获而来^①。

中央委员会欢呼游击队为农民武装，他们的“白发起义”一劳永逸地打破了“北方落后”的神话。此一分析忽视了正规军队倒戈到反叛者一边的重要作用（尽管它号召陕西党积极活动争取倒戈）。中央委员会再一次要求从城市派遣无产阶级分子来净化和加强游击武装——考虑到陕西劳工运动极其微弱，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号召还敦促加强党对游击队的控制，通过政治委员体制提高政治觉悟。党的高层领导最终醒悟到西北农民起义的革命潜力，开始日益注视指导与控制。

此时陕西党被看做游击运动的党。北方局下令派遣可靠的李杰夫到陕甘边界任政治委员，使命是克服据说是一开始就会破坏游击运动的机会主义。1932年4月30日，一份报告指出，旬邑县的游击队逮捕了地主、分配了他们的粮食，并取消了压迫性税收。结果农民起来支持游击队。然而，缺点显露出来，许多农民仍认为游击队就是军阀队伍。主要错误是对贯彻平分土地和发展广泛苏维埃运动犹豫不决^②。

不久，党代表李杰夫本人被指责传播机会主义路线。他最严重的错误有：西北落后不具平分土地条件的论点；未能建立一个革命委员会去开创苏维埃政权；退回山里而不是巩固农村根据地；

① 高岗前揭书，第14页；《红旗飘飘》第5卷，第115页；《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陕甘宁游击队冲破白军的英勇胜利》，《斗争》第11期，第8页，（193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甘陕边区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甘陕边新区的决议》，《北方红旗》第4期，第44—46页，1932年6月12日。《北方红旗》是北方局的机关刊物。关锋前揭文，第41页估计游击队规模为1000人。《陕甘红军二十六军的新胜利》，《北方红旗》第4期，第59—60页，1932年6月12日。而后这篇文章声称陕甘宁边区游击队人数2000—3000人，也许夸大了力量。

② 《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陕甘宁游击队冲破白军的英勇胜利》，《斗争》第11期，第8—9页。

废除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分析李的错误颇为有趣，因为其后反复出现的类似指责说明长期存在的问题，对农村问题一窍不通的党领导妨碍创造有力的农民运动。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总是不断，就像以前一样，实际上每一次讨论游击活动，陕西党的领导、北方会议和中央委员会都这样指责。最全面最猛烈批评李杰夫政策的是即将接替他任政治委员的厉君（应为李良——译者注）^①。当党的领导把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贯彻于游击领域时，证明上海或西安方面的至为明显的错误难以消除。其他人在1932年夏天时只有服从。但是愚痴得像他们的前任李杰夫、李良一样，李良很快成为类似批评的牺牲品，被党的直接上司解职^②。

我们必须想想为什么游击队坚持他们的“错误”，不理睬党的右倾指控言词和不欢迎派政治委员来改造他们。游击活动的环境使人想到中国传统的侠匪。虽然一些领导人是训练有素的革命者，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和当地关系网却植根于陕北山区。这意味着他们强烈意识到本地的现实势力。这与上海和天津的党内上司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革命形势观点来自于深深了解当地的情况。1927年后，这些游击队摸索出他们独特的游击战略。在其过程中，侠匪活动最终让位于蓬勃的农村革命^③。况且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坚强干部核心。干部首先要忠实于领导

① 厉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彻底改造与两条战线》，《斗争》第15期，第10—11页，1932年6月9日。

② 关锋前揭文，第40—42页；陕西省（共产党）决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区新苏维埃以及红二十六军决议》，1932年8月25日。

③ “游击队”一词翻译成英文“guerrilla”模糊了毛泽东和其他游击战争理论家著作中游动武装徒众和游击队的根本区别。刘志丹和他的人们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是游动武装徒众，鼓动激发暴动，与数世纪来陕北山里的土匪和强盗没有什么不同。从1932年，特别是1934年开始，刘志丹游击队的行为日渐显露出革命游击队的性质，与农村革命和创造根据地相关连。

和游击同事，而不是遵命于千里之外的党的上司，也不遵循对其所需与经历距离很远的半生不熟的意识形态。党代表具有军事和政治原则，遵守现行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却缺少军事经验。他们在四个方面经常与游击领导冲突，即军事策略，社会经济政策，领导权和阶级成分。在每一个问题上，游击领袖都不像党的高层领导那样在当前革命形势和生存条件等方面唱高调。因此他们被严斥为“逃跑主义”（撤退和抛弃群众，而不是坚定战斗），富农路线（未能贯彻平分土地），不服众命令（抗拒党的特派员和指导员的领导），和阶级不纯（与当地土匪、哥老会和开小差士兵混合，未能建立无产阶级基础）^①。

在崎岖的陕甘边界一带，数百人的游击队面对压倒优势的军队，根本无法去考虑党要求的平分土地，特别是饥荒以来，苛税和债务是他们所在山区许多地方的主要问题。最重要的是，除非他们拥有力量阻止政府军返回，否则，分配土地只能让朋友和盟友处于猛烈报复之下。不难理解，在军阀或国民党很快可以征服的地区，佃农和贫农不愿贯彻甚至不接受土地分配^②。在1928年后的饥荒年月里，游击队最初努力赢得支持的行动是，试图解决最紧迫的眼前问题——干旱引起的饥饿。这个目标达到了。他们没收地主粮食，分给穷人，未使穷人处在分配土地造成的危险中。同时游击队补充了他们的给养。像较高层党代表很快观察到的那样，此一政策的主要弊端是农民也许与革命斗争保持距离，他们甚至悄悄藏起来分给他的一份粮食。实际上此一现象很普遍。这些最初的努力很少有纪录来说明，

① 关锋前揭书，第41-44页。参见约翰·鲁记述的中央委员会对毛泽东江西苏区政策的类似批评，第238-265页。

② 这种犹豫来自对游击队势力是否稳固的担心。游击队是穿过他们村庄的许多军队之一。迈德尔访问的农民反复强调此一问题，反映了陕北过去的革命情形。迈德尔前揭书，第67、79、136页。

觉醒的农民的自发力量可以达到 20 年代海陆丰农民运动和 1927 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描述的高水平^①。然而，陕甘边界的游击队继续增加力量和经验，在争取农民支持上适度进展。正是偏远、赤贫、通讯落后和游击突袭和分粮策略及延缓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等因素，支撑着游击队的生存和适度发展。

渭北农民运动和一个苏区的创建

1932 年游击队力量在陕甘边界发展的同时，三原再一次变成陕西省中部渭北地区农民运动的中心。发展前景看来足以使陕西党号召创立一个新的苏区并规划最终合并渭北和陕甘苏区，包含整个陕西省北半部^②。

的确，运动不是没有缺点的，就像同一个陕西省委“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很快指出的那样。最严肃的事实是，土地分配局限在三原的五顷塬子地区。省党委员会要求没收所有地主和富农土地，分给雇农、贫农、中农和士兵。在强调反对“富农路线”的情况下，仍然准备给富农分配土地，将小块贫地分给不属反革命的富农。为发起土地革命和指导游击队消除队伍中的地主、富农，当地土匪和罪犯，芝圃和一成被派来这一地区。

党在 6 月谨慎地肯定渭北农民运动。到秋天转变为一系列冷嘲热讽，直指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富农领导。这种攻击成了分析当时陕西农村革命实践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1932 年夏

① 卫藤津吉，全书；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1-59 页。

② 陕西省委：《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决议》，原稿，1932 年 6 月 6 日。陕甘苏区其后不久就建立起来。

游击队试图动员起三原的贫农和中农，主要是通过广泛的没收粮食和种籽再分配。

逐渐地，游击队不再是惟一通过分粮帮助三原农民的了。美国资助的“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集中在渭北地区活动，三原是重点。委员会的工作有省长杨虎城的支持得以继续。杨虎城不仅认识到它的人道潜在力量，也许还对他的军阀政治成功更为重要，它有可能减少不满而增强他的统治地位。1930年除粮食救济外，委员会还承担提供下一季作物的种籽。很快，与省政府合办的5000人大型水利工程实施起来。三原是饥荒地，位于陕西中部杨虎城的势力中心西安很近。我们可以推测，由于游击活动增多，这里被选作救济点来部分抵消反叛威胁^①。

至1932年夏，天灾和军阀主义使“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的行动变成杯水车薪。数万人饿死或背井离乡。由于干旱，幸存的本地农民面对即刻到来的灾难。并且数千人无种籽下地。五顷塬子是共产党在渭北的活动中心。陕省党代表芝圃报告，农民参与了逮捕行动，并杀死一些地主，分了他们的粮食。这标志此地农民头一次卷入武装斗争。同时，群众组织发展很快，农民协会成员据说超过了1000人。芝圃指出，农民力量成长起来，日渐广泛地要求平分土地。事实上一些地方的贫苦农民已开始耕种没收的土地。

然而；三原的富农领导地位减缓和扭曲了高涨的革命运动，芝圃被罗列许多错误。他最初描绘的生机勃勃的农民运动

^① 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年度报告，1929》，第43页；1930，第40、65页；1931，第8、30页；1932，第5~8页，61页；1933，第9页。毕仰高引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凸显了这些“好事”通常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在河北省，农民攻击2800名工人。这些工人是国际赈灾委员会由山东派来修路的，以使让救援工作在饥荒时进行得更有效。《农民与中国革命》，载《外国政治》第13卷，第2~3期，1968。

被认为问题多多。

富农不仅得到没收粮食中的一份，竟然还领导运动。分粮不是用作手段来动员和组织农民，实际上分粮常常在夜间进行，以避免当地关系复杂的积极分子，农民协会成员获得额外份额。当地领导被指责未能武装群众、组织当地农民民兵及扩大游击活动。但芝圃被指控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反对分配土地^①。

芝圃的报告严肃地反映了当时中央委员会的路线。一方面宣称广泛的革命潮流正在席卷全国，农民被发动起来，准备支持武装斗争和要求分土地。另一方面，富农领导约束革命力量，扭曲党的计划，时刻约束着群众。

有一点很清楚，尽管饥荒引起的不满迅速蔓延，全面农民反叛的爆发仍然没有产生。有迹象说明，经常接受红军一些救济品的农民，仅仅是略微投入斗争。分粮战略远未提供激进农民运动的动力，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工作一样，可能渐渐消除不满。这样就增加了建立持久的农民运动的困难。

至少在一个区即正宁五顷塬子试行了土地分配，但那里据说也是富农路线主宰着“遵循一条富农路线，全村土地按照人口平均分配（除去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富农分子）。穷富家庭同等对待，纯粹以人数为基础”。从这点看，最重要的错误是“未完成没收反革命富农分子的土地，而只是没收多余土地；这一富农路线完全保留了富农的利益”^②。

① 芝圃：《三原目前现实与党领导的检查》，《斗争与学习》（1932年10月1日），第6~13页。这是北方局的机关刊物。愚痴：《我对于分粮斗争中策略上的错误》，《斗争与学习》（1932年9月10日），第28~31页。

② 《五顷塬子分土地的意义与错误》，《斗争与学习》（1932年10月1日），第15页（此段为英文转译）。孟伯谦描述了早至1926年三原武字地区高度发展和激进的农民运动，包括分配土地。它是由一位本地地主、共产党人黄子文领导的。孟伯谦，第40、41页。

在五顷塬子土地分配中有两个原则很明显。第一，如我们所见，游击队仅没收和分配多余土地，而不是全村土地。根据家庭人口决定出每一个家庭的份额后，富农和地主家庭多出的土地就被没收。第二，平均分配意味着不歧视穷人与富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每一个人不论阶级、年龄、性别或能否下地耕作，都有权获平等一份。这两个原则可以用来减少混乱与分化，确保继续生产。但这两个原则和平均享有土地被较高层党的领导攻击为反映了富农心理。更重要的是，土地据说是红军分配给农民的，而不是农民反映了富农心理。痛苦记忆犹存，农民的担心和不安全感消除很慢。至当时为止，农民群众斗争还没有要求摧毁地主制度，并且斗争要依靠行政命令^①。

在陕西农村，渭北接触革命思潮最多，它在1927年以前是农民运动中心。但是其后的努力分配遇到了冷淡的反应，部分原因也许是自耕农人数多，尽管如前所述：1928年连年饥

^① 《五顷塬子分土地的意义与错误》，第14~17页；关锋，第41页。在一些记录的特别例子中，富农利益受到保护据称是以中农利益为代价的。一个有14口人的富农之家，拥有22英亩土地，未雇劳工耕种17英亩。然而这个家庭积累了沉重的债务，并声称缺少耕畜，以致必须租出去剩余的土地，而不是自己耕种。在这个例子里，游击队接受村民的意见，甚至每人1.7英亩也不足以维持这个家庭的生计，尽管苏维埃法宣布每个人1英亩的平均数。对这个家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收土地或财产，包括佃农耕种的土地。结果是游击队被指责为保护富农利益。

在三原县还有引述的富农路线的其他例子。据报，一个拥有适量河谷土地的中农家庭被强迫拿出部分土地交换坡地。坡地需要更多的劳动，仅出产半数的谷物。在这个例子里，决定被批评为不公正地伤害了一家之中农。还有一个6口之家拥有5英亩土地，声称不能维持生活，租出去土地，并迁入城市。尽管这片土地被没收重新分配，当地“苏维埃”继续给原主人半数租子。在所有这些例子里，富农心理被说成是占了主导。这些例子说明，当游击队力图确保农民的广泛支持时，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显示出革命公正性是多么困难。

荒大大减少了农民拥有的土地，地主常常垄断了最肥沃的土地。然而，分田失败的一个基本原因关系到军事现实。渭北在渭河中游西安西北，特别易受政府军攻击。接受土地者成为报复的主要目标。

陕西游击运动继续蔓延，尽管不时被迫撤退到北部山里，开小差的人数也不少。1932年，一些小的军事胜利仍使游击队增强到1000多人，而有一段时间，人数减低至200人。1933年春，国民党情报资料估计，陕西共产党成员是3000多一点^①。

革命力量成长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志，是1932年创立了西北革命委员会，负责筹划成立统一的西北苏区。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是李妙斋，继任者是黄子文。委员会计划把1932年正式成立的陕甘边界苏区扩大到包括富饶的渭河北边地区和陕北。这两块地方革命运动正在发展。委员会精心筹划出苏维埃政治结构，至少在纸面上分为镇、村两级。然而，一个实际运作的苏维埃政府是否存在则是让人怀疑的。新苏维埃时期积极活动者孟伯谦后来描述此时游击活动的成功如下：因为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大多是老百姓的近亲、朋友和同乡，西北苏区的老百姓就保护他们。因为共产党和游击队在饥荒年里供给他们生计，他们自然而然地保护共产党和游击队^②。孟伯谦的记述说明了游击队在努力创建机构以取代政府职能，强调家庭和其本地关系的重要性以及饥荒情形。他谈到，在这块苏区所有税收都豁免了，西北革命委员会发放粮食、布、耕畜和农具给遭受饥荒的人们。陕甘苏维埃标志着从游击突袭过渡到建立稳固根据地

^① 关锋，第41页；国民政府调查局：《两年来之中国共产党》，第100页，油印，1953。

^② 孟伯谦，第66页（此段为英文转译）。

的初期阶段。同时，绿林好汉习气逗留不去，武装的游击队把粮食给农民，免税不要利息，背后有个人亲疏、家庭关系的影响，农民很感激，却未能破坏地主制度^①。

游击运动的挫败与重兴

陕西游击和农民运动的发展到 1933 年的戛然而止，原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的消失。第二团是一支坚强的队伍，共 400 人，有 200 支长枪和 30 匹马，是陕西最好的游击武装，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任参谋长，杜衡兼军、团政治委员。第二团在渭北地区和优势的国民党军作战，这显然是敌人精心策划的一次战役，共产党人被击溃了，整个渭河流域农民运动完全被镇压下去。

中央委员会事后再一次指责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造成了失败，并特别指出了杜衡要负主要责任。然而，高岗后来的分析看来更符合实情。面对优势敌军，摈弃游击战而撤退的做法，使第二团面对面的与优势政府军作战，付出惨重代价^②。

导致渭北农民运动失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西方冲击对中国内部力量平衡产生的侧面影响显现出来。这就是西安和渭河平原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大大改善了。如前所述，陕西的“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数年来集中在渭河地区服务。美国“新政”后不久，从 1930 年至 1933 年，委员会在解救饥荒的同时，着手进行公共工程，主要的建设和改善项目是三条从西

① 孟伯谦，第 63-69 页；高岗，第 14-16 页；《中共中央关于甘陕边区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甘陕边新区的决议》。

② 国民政府调查局：《两年来之中国共产党》，第 100 页；关锋，第 42-45 页；高岗，第 15-16 页；波多野乾一，第 5 卷，第 667-701 页。

安向外伸延的公路。其中一条是东至潼关的，穿过渭华地区；另一条北通三原，第三条向西连接甘肃兰州。1930年，西安至三原的一段路刚刚修成，可通行机动车辆，30英里需时一天的艰苦旅程就缩短为两个小时，包括跨越两条河流。西安到渭华80英里的路程，以前须费时3天，现在也大为缩短。这些进步方便了救援物资快速递送。就我们的目的讲，其影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交通的改进扩大了西安附近政府驻军的有效控制范围，却降低了游击队和土匪相当的机动能力，其时他们的集结正开始严重威胁着三原地区的地主和军阀政权^①。

1933年夏，国民党破坏了陕西的中共组织。160多名党和青年团成员被监禁或者叛变了，其中包括重要领导人。渭北地区农民运动几乎消失殆尽^②。尽管第二团的残存者并入了第四团，但仍有70多名士兵在一场镇压运动中被迫失散，有400个农民被杀，另有700人被捕。在这场典型的镇压中，不是游击队员的非武装农民受到极其残酷的虐待。由于第二团的溃败和第四团于1933年夏离去，省委下令解散红二十六军，使一些分散的游击队员恢复活动^③。陕西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1933年下半年，第1、第3、第5、第7、第9、第10游

① 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年度报告，1930》，第24、28页；1931，第30页；1932，第5、8页；1933，第10、15页。特克曼（Tuchman），第6、84页。西安—潼关公路的完成没有报告；西安至渭南间的一段在1930年11月完成。

② 国民政府调查局：《两年来之中国共产党》，第98~101页；国民政府调查局：《中国共产党之透视》，油印，1935年4月1日。叛变的人里有省委员会总书记、渭北区首要党官员、西安党的书记和杜衡。杜衡当时是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和陕西党组织部首脑。孟伯谦，第120页。孟伯谦指示，1933年国民党采取自吹自擂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政策，以允诺安全和工作，加紧努力使共产党人叛变。

③ 波多野乾一，第5卷，第680~681页；高岗，第17页。

击支队在陕甘边界组成。他们得到由渭北返回的刘志丹和王世泰部队的支持。这支部队是在去年夏天的惨败中幸存下来的。各游击队分散于边界的黄土山里，试图发展农民运动。同时，酝酿已久的游击队和陕西党组织领导集团之间的不和达到紧急关头。黄子文由西安来到游击队地区讨论组织一个新的陕西省委，随即被高岗逮捕，罪名是阴谋建立右倾领导。尽管高岗也被提名进入新的委员会，他显然感到这个委员会歧视游击队，偏袒那些把武装斗争看成毫无成果、倾向于非军事活动的“失败主义”分子。按照高岗后来的说法，黄子文将高岗和刘志丹视同“希特勒”^①。游击队领导和高层党代表之间的冲突到了公开对抗的阶段。每一方都力求控制和指导游击运动。代表北方局的郭洪涛，1934年1月来到边界地区后，公开的权利之争进一步加剧。

到1934年初，独立游击队的力量增长到足以重新组建第四十二师。游击队在陕甘宁边界恢复活动，头一次在陕西站稳了脚跟^②。这并不是最早的一次在偏远的北部开展运动的尝试。1927年9月，第一次共产党暴动曾短暂波及此地。1930年12月，年轻气盛的高郎亭（被陕西青年团以违反组织纪律开除）向家里“借”了100元钱，买了武器进入山区，成了小股反叛队伍的首领。高的狂怒据说直接指向“当地恶霸”和贪官，与历史上正义反叛者的行为一样。1932年初数次失败后，90名反叛者宣布成立“中华反帝义勇军西北先锋队”，尽管高先前是被

① 高岗，第18页。高岗1942年的叙述是仅可见到的一份关于此一事件的资料。据说，黄子文建议新委员会由李杰夫、张文华、王林、蒲建牛、高岗和黄子文组成。其中仅仅高岗与游击队共同战斗。

② “陕北”一词指安定、清涧和邻近县份，这一带后来被称为陕北根据地或苏区，以便与陕甘边区区别。两个游击地区都处在陕西北部黄土山丘地带。

青年团开除的，他却独立地建立了共产党和青年陕北支部。然而为时不长，哥老会就渗透到游击队里，攫取了控制权，致使他们的活动变得与流匪没有什么两样。因一次军事失败使哥老会许多成员仓促逃跑，高的核心人员最后重建了与中共陕北特委会的关系。高本人虽然仍被指责为不服从上级领导，但他还是重新回到党内。9月（译者注：应为1932年10月1日），他的队伍改建成为第9游击支队，属陕北6个支队之一。尽管1933年夏党遭受了严重挫败，1934年初，高的队伍和陕北的第1、第2、第3游击支队结合到了一起。上述资料表明，党很难把那些以兵痞、土匪和帮会成员为主的流寇游击队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来进行农民革命，并使之服从于千里之外党的领导。在其早期活动中，高郎亭衣着褴褛的队伍与哥老会和当地其他土匪没什么区别，他们都在该地区袭击地主^①。

1934年初，游击活动迅速扩展，其声誉明显地有了改变。2月，在庆阳县，陕甘宁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作为临时苏维埃政府，新游击队根据地主要在陕甘边界庆阳、保安、合水地区，该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以土匪老巢著称。1934年整个春天，游击活动在继续发展，在与陕甘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交手中取得一些小胜利，并有200多名军阀队伍的士兵叛逃过来^②。

① 《陕北共党发展的概况》，第1~21页。这篇未署名的报告很可能是郭洪涛写的。1934年郭作为北方局的代表加入游击队。高岗在争论党史时指责，《陕北党史》一书里，郭洪涛故意歪曲了那一地区游击运动的事实。而郭洪涛也许实际上摘取暗面，强调游击队与传统土匪的共同性，以便突出他个人在其后发展上的贡献。就我们所知的陕北早期游击运动，这篇叙述似有道理。

② 波多野乾一，第5卷，第682~686页。习仲勋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志丹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些成功在于经过近 10 年众多无效的农村武装暴动后，在认识上获得了两项重要发展。第一，放弃在渭河平原上的长期努力，将游击活动集中至陕北和陕甘边界一带，那里后勤供应、政治经济条件更有利。这是不仅因为山地崎岖；并且还远离政府主要势力中心及供给交通运输线。当地军阀部队在此贫困地区待遇极差，臭名昭著。他们极易接受反叛的召唤。陕北农民未受到 20 年代国民党和国民军势力的影响，也完全未受到 1927 年以前渭河平原上农民运动和革命潮流的波及，而陕北农民受地主压迫更厉害，在土地状况变得不能容忍时，常常在他们家乡的山里铤而走险，反抗政府。比陕西中部更高的租佃率，也许使受苦农民更倾心分配土地，尽管必须强调的是，分地只是许多有效的社会经济改革之一，其中还有分粮、废除债务、取消压迫性税收等，渐渐地作为革命干部的核心加强了他们在游击队中的地位，只有他们直截了当并且有力地讲出陕西农村最迫切的问题。

第二，我相信，我们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游击战形式的演变过程，它是由盗匪式流动的绿林好汉的形式，转变为集中于地区广阔基地的农村革命。早期军事活动受到陕西为数众多的游动群体，如哥老会和当地土匪模式的强烈影响，尽管党和一些游击队领导人作了持续努力以巩固苏区，最终游击队成功地在陕北创建了根据地。

根据地思想是中国进行农村革命和游击战争的中心问题。考察陕北的环境和地理位置，确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显示了革命运动的许多特征，它最终使共产党夺取了政权。重要之点是，不管怎样，1927 年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发展起来的根据地思想到抗日时期有其关键的持续性。1937 年中日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和命运的主要转折点，并在整个抗日运动中得到完善。

根据地需要在主要商业和行政中心势力所不及的地区重新确定传统的政治及经济的渠道，创造自给自足的区域实体，抵抗敌人的进攻。一些根据地的存在和成长依靠农民的积极参与，以摧毁地主霸权，并创造新的政治军事组织的广泛基础。一个根据地的巩固，使向邻近地区扩张成为可能。通常是邻近地区更富足、人口更多，但游击队较难于防守。

毛泽东在江西和刘志丹在陕北独立地发展的游击战略中，都证实在农村增进群众运动对根据地至关重要^①。的确，当他们继续全神贯注于农村根据地时，中央委员会领导却再次敦促进攻城市，导致了反复的党内冲突。

缺少最低限度的安全，就不能消灭当地基于土地的权势利益，或建立有广大农民支持的政治军事组织机构及制度。在陕北，这一最低限度在1934年初已经呈现出来。游击队力量的成长已使农民不再担忧，分配土地在广泛地进行着^②。土地的重新分配是游击队和农民开始共生共存的关键阶段，游击武装力量吸收了大量本地农民，成为新平等社会秩序的堡垒，积极的农民支持并保证游击队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使得他们能够从

① 当然毛是独自发展的，在他的军事著作中阐述了全套和特色鲜明的游击战略。对于运动突袭和必须建立巩固根据地作为游击活动重心的深入分析，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32—145页。

② 罗伯特·麦考尔（Robert MeColl）在《中国、越南和泰国革命的政治地理》一文中分析了根据地的性质。罗伯特·麦考尔坚持根据地位置的重要性，视其对大城市的战略地位而定是不正确的（第155页）。陕北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抗日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大多数根据地也不是这样。我未见到任何证据表明此点是决定性的，甚至在江西时期，中央委员会想迅速返回城市，也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毛泽东分析因素，使他选择井冈山作为第一个根据地的地点，明显地驳倒了这些条件的优先性。见《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1—104页，特别见第101页。

当地居民中获取经济和作战援助，并增加他们的新兵人数^①。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6月26日的一份报告指出，当时已有35个农民协会分会，每一个分会平均约50人，还有8个雇农分会已组织起来，组成10支赤卫队共1000多人。报告接着指出了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就是政治组织幼稚和党的控制不力。然而，与近10年来受的挫折情况相对照，我相信这一定是陕北革命发展新水平的先兆^②。

此时游击队武装同土地革命的扩展相结合，迅速发展。当时国民党情报对此一发展的分析是有启发性的。情报注意到，1934年阎锡山发起了一场禁烟运动，不清楚他这样做是要消除毒品，抑或是为他的政府渔利。结果如报告指出，在陕西和山西之间的许多非法贩运鸦片者成了土匪，而最后被吸收到游击队中去。这是军阀政治极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个别军阀管辖范围内的一项“进步”行动——这次是对鸦片采取严厉措施——常常增加了邻近地区的非法之徒的成分，而不能将其活动消灭。尽管有此发展，游击队的成功主要还是紧紧与农民社会经济苦难相关运动的产物。实际上游击策略第一次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在这一实例中（其他也一样），国民党情报机关仅说出了部分事实，没有找出农民受苦的原因或为什么反叛者试图减少穷人的痛苦。而将游击队的成功归结为部分军人开小差或是违反军纪，特别是抢劫，就军队而言，便忙着以暴力对付暴力^③。

6月下旬，一直在陕甘边界活动的第四十二师第三团移到北部去，以安定为中心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④。郭洪涛被选为

① 《陕北共党发展概况》，第20~26页。

② 波多野乾一，第5卷，第682~687页。

③ 《陕甘宁专报》，第2页。

④ 《陕北共党发展概况》，第21~22页。

新的根据地红军政治委员，贺晋年任红军军事首脑。第三团击溃了第86师的两个连，补充了弹药。两天后在一次军政干部会上，宣布建立陕北独立师第一团。由于红二十六军返回陕甘根据地，在两个新区里活动增多，就形成了4个主要游击中心，并计划使他们互相连接起来。此时，国民党情报估计，游击队超过3000人，拥有1000支枪。在人烟稀少的陕北地区，这是一支可畏的力量^①。

第一次和第二次包围及歼灭战

游击运动迅速扩展，引发了陕北第一次围剿和歼灭战。国民党第八十六师3个团分进合击陕北。尽管至少有一支游击队9月初被包围消灭，但游击活动继续成长。1934年分配土地的规模日渐扩大。

从10月起，当地镇压力量由国民政府第四十二和第八十四师来支撑。革命运动力量成长可以从国民党第一次从外省调军队前来对付得到印证。但是，政府军尽管人数和武器占优势，因不熟悉陕北地形，行动困难，仍对付不了游击队的灵活机动。游击队是有经验的，并且日益得到当地农民的支持。反抗者力量地一步发展，政府军队处处被动挨打。第一次镇压行动于1934年冬以失败而告终^②。

^① 《陕北共党发展概况》，第23-24页。这两个新区是在横山、靖边和安塞一带和佳县、吴堡地区。

^② 高岗，第22页；《陕北共党发展概况》，第23-24页。国民党报告指出，政府军里的不良成分，在消灭游击队的借口下，从事了抢劫活动。许多贫苦农民惟有加入反叛以求得保护。这一分析轻易忽视了反叛运动积极争取民众的工作，但暗示了农民斗争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发展。《陕甘宁专报》，第2页。

游击队成功开创新局面后，于1935年1月在安定举行了陕北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大会建立了陕甘苏维埃临时政府，以及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协调4个主要游击区。这些机构的组成，使权力更集中到与刘志丹长久共事的当地游击队的领导人手里，包括高岗和马明方，代表西北方局的代表郭洪涛以及谢子长（译者注：谢非北方局代表）也保留了重要职位。此时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组织起来，立即引起了敌方军事首领高桂滋的反对，高抱怨共产党选用与他们3个师相同的番号。现在是红四十二、八十四和八十六师对国民政府的第四十二、八十四和八十六师。这是平行架构的一个极好的范例，推测起来在有意让士兵及农民分不清^①。

1935年5月的王家湾会议上，当地游击队和较高层次党的领导面对面地发生了冲突，高岗其后描述会议为一场斗争会，是反对“左倾、理论幼稚和非正统”的郭洪涛的领导。清楚的事实是，游击队中党的最高官员郭洪涛和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发生了冲突，然后8月在周家镇会议上又对击退国民党第二次进攻计划意见不一。郭去攻击国民党严密控制区以及建议以城市为活动中心的“冒险”计划，遭到拒绝。高岗宣称，游击队采用他本人和刘志丹提倡的游击战略，集中在保安周围有利地形区域活动，据称此时郭洪涛指责当地领导是在搞右倾机会主义，并设法要将高岗开除出党^②。

第二次进攻由国民党将军何应钦指挥政府军20个营进行，

① 《陕北共党发展概况》，第25~26页；高岗，第22~23页；波多野乾一，第5卷，第485页。马明芳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达成和崔田鸣任副主席。在陕北工作委员会中，崔田夫任书记，郭洪涛负责组织部，马明芳负责宣传部，谢子长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高岗和刘志丹任副主席。

② 高岗，第23~24页。高岗此文是这些会议唯一可得的资料。当然文章尖锐批评郭洪涛、赞美游击队。

游击队再一次取得重大胜利。反政府力量增加了武器弹药，正规红军和游击队都扩充了。国民党情报说，中央政府第六十一师一次试图缴械参加进攻的某些部队之后，便立即有 1000 名武装人员叛逃到游击队阵营。国民党指称这些人压迫人民。军阀时期的记录屡屡表明，陕西军队和派来平定本省的外来军队之间的摩擦极易恶化。叛逃者看来是陕西军队，而试图将他们缴械的是外来者。陕西军队倒向游击队一边由憎恨外省控制而激起，他们与游击队都有同一情结。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场升级的战争里，游击队的力量成长壮大，头一次占据了 6 个县府，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和靖边^①。此时，游击队的胜利迫使官方取消整个陕北粮食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说明反叛势力统治了此一地区的大部。考虑到 1928 年大饥荒后不足 5 年就中止粮食税，变化不可谓不大。它代表了孤注一掷的行为，以便让不满的农民站在政府一边^②。

埃德加·斯诺写道，从 1934 年后游击队的扩大，“到 1935 年中，苏维埃控制了陕西和甘肃的 22 个县，红 26 和 27 军总数有五千多人，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已能够通过无线电与南方和西边的红军主力建立联系”^③。他进一步引述了此时更为成熟的其他事例：分配土地、陕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一所干部训练学校、一家苏维埃银行和邮局以及苏维埃经济的开端。因

① 高岗，第 25 页；《陕甘宁专报》，第 2 页。后面这篇文章中没包括高岗所列各县府中之延长县。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台北，1962）第 11 卷，第 990 页。

② 《陕甘宁专报》，第 2 页。

③ 斯诺：《西行漫记》，第 222 页。在这个 22 个县的地方，游击队还没控制县府和较大城镇。参见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第 11 卷，第 990 页。《剿匪战史》估计，1935 年 7 月刘志丹指挥的军队有 2 万人。斯诺的数字看来更可信。

为长期的战争动荡和农村解体，我们也许可以觉察到，一个几乎是政府的形式出现了，它在恢复秩序，一个基于土地革命平等观念的秩序。

1934年和1935年期间，分配土地计划头一次广泛施行。由于运动迅速扩展到新区，面临官方镇压，便由游击队推动，开始予以领导，带领农民没收土地。有关1934~1935年土地革命大纲贯彻的情况，我们缺乏当时记述和工作指导的资料。然而到1942年，毛泽东和高岗一致同意，过去实行了左倾路线，王明中央委员会的跟随者特别是郭洪涛应负其责。高岗报告了最初遵循的政策：仅分配多余的土地和牲畜；允许富农有一份相等的土地；在不稳定的地区推迟分配土地。郭洪涛却谴责这些政策是右倾；坚持在各地平分土地，不顾政府军返回的危险；要求对富农采取更严厉的政策；甚至声称立即搞土地集体所有^①。高的书面分析必须谨慎看待，因为它是7年以后写出的。当地党领导已懂得策略，在不停的党内斗争中掌握武器以自卫。尽管如此，它的基本矛头所向与游击队和党代表长期发展的冲突类型一致，及两方在平分土地和“富农”路线问题上始终争论不休^②。

1934~1935年的土地革命，是陕北游击队获得农民支持的杠杆。农民长久积怨的爆发成为农民积极赞成土地革命的基础。

① 高岗，第28~29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71~218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但直到1953年才发表，收进《毛泽东选集》里。中央和地方领导之间，主要是毛和高之间的协调导致了边区早期历史上的正式协议，第5章将进一步讨论到。北方局代表郭体现的政策与中央委员会路线一致，集体化问题除外。整个1931~1935年期间，郭批评游击队的土地政策。我很熟悉一段历史，即那之后不久，李立三于1930年5月30日提出立即搞集体化。李不久便被共产国际批评为过早鼓吹集体化。

础，也是扩大和加强军事、政治组织的手段^①。最初一度是绿林好汉式的小股游击军事行动，到1935年已发展成为全面的农村革命。

1935年秋，中央委员会代表朱理治到达陕北。高岗后来指责，在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国民党围剿的前夕，朱与郭洪涛结盟，支持冒险路线。据说朱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巩固和扩大陕北和陕甘根据地，与陕南红军结为一体；建立陕西西部苏维埃政府，并与四川省苏维埃协调一致；以及提倡直接进攻日本军队。面对优势敌人的侵犯，据称他的口号是“主动出击，不让敌人踏进边区一步”^②。

高岗为本地游击队的辩解，事后颇符合正统毛主义的游击战准则。他对朱和郭的批评与毛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军事错误相并行。但是如前所述，面对上级党组织的持续反对，绿林好汉活动最终让位于可行的游击战术和土地革命，8年的挫折过程中，当地游击队发展了一套适合陕北生存和发展的军事和政治策略。当郭和朱带着党的命令与指示来克服游击队右倾主义时，他们也许对在优势敌人面前的撤退战术大感吃惊，对相对温和的土地政策吃惊，更甚者是对复杂的成分吃惊。参加运动的包括哥老会、前土匪和军阀的士兵，一些当地农民是招募来的，但不是无产阶级。但是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农村革命形态，适应陕北的特殊环境与问题。

① 一个消极的副作用后来被毛批评为“过左”。由于土地剧烈变动，造成农业生产急剧下降。

② 高岗，第28—29页。参见毛泽东批评江西苏维埃的失败，是由于奉行中央委员会冒险口号“不丧失寸土”，《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96，201—204页。

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合并

1934年9月，遵照中央委员会的一项指示，徐海东率领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开进湖北、河南、陕西交界地带，一个新苏区建立起来。在杨虎城进攻的压力下，第二十五军开始长途跋涉，最终与陕北游击队连接起来。1935年初的这一行动不属于将西北所有共产党武装协调一致计划的一部分。徐和中央委员会及主力红军失去了联系。当时主力红军已开始长达二万五千里，从江西至陕西跨越中国最困难地形的长征。徐海东从缴获的一份独立报纸《大公报》上的简报得知，红军正由四川向北进，并推测其目的地是陕北根据地。第二十五军和陕北游击队以前从来没有联系过。1935年9月，徐到达陕西苏区，碰上了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习仲勋领导的游击队。习带领徐海东加入红军主力。9月下旬，徐加入了二十六和二十七军，使游击武装增加到7000—8000人^①。

由于3支军队联合，党的最高官员朱理治召集了永坪镇会议，结果重新加强了军事、政治机构，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拥有本地党的最高权威，由朱理治、程子华和聂洪钧组成。这3个人都是最近才到达根据地的外地人^②。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组，一个陕甘晋省委员会建立起来，由朱和郭洪涛领导。红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军改组为第十

^① 徐海东：《陕北会师》，《红旗飘飘》第3卷，第181—182页。斯诺：《西行漫记》，第223页说会师日期是7月25日，有误。参见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第11卷，第990页。

^② 徐海东，第174—181页；孟伯谦，第136页。程和聂随徐海东军队到陕北。在第二十五军负责党务的程，变成了第十五军团的政治委员。

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司令，刘志丹任副司令，高岗负责政治部^①。细看这些变化，很明显，当地游击队领导被排挤出最高党组织之外和工作委员会之外，并且武装力量指挥权也大大减削。刘志丹和高岗留在第十五军团里保留了有影响的地位，但他们的上峰现在是徐海东。随着二十五军的到来，新的因素注入了内部的权利平衡。此时，党的领导层得到外来力量，即徐海东军队的支持，取得了军事最高权力。刘志丹的游击队在他们地区依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独立活动时期，由于较高层党领导和优势军事力量的到来而永久结束了。

在徐海东的指挥下，第十五军团以出击对付第三次围剿，但很快徐和刘志丹就战略总问题冲突起来。20多年后，徐海东回忆录记述，刘志丹要求进攻井岳秀和高桂滋的军队作为扩大苏区的第一步。然而他被他的上司否决。那位上司指挥了其不久后不久打击更强大东北军队的战役。徐叙述道，刘志丹认识不到，面对强大敌人去扩大苏区的时机不成熟。然而我们的推测是，刘赞成灵活的游击战术，先打击最弱之敌，即井岳秀的八十六师，而不是试图进攻令人生畏的东北军。

不管怎样，徐连续进攻劳山东北军 110 师和榆林桥 107 师的战略取得了胜利，尽管国民党采取了步步为营缩小游击区的战略曾毁灭了江西中央苏区^②。

① 高岗，第 29 页，斯诺：《西行漫记》，第 223 页；华应中，第 50 页。高声称聂洪钧此时变成西北军事委员会首脑。斯诺和华应中指出，刘志丹此时继续领导委员会。

② 高岗，第 33 页；徐海东，第 182~184 页。使用步步为营战略在国民党官方西北战役军事史中简略述及。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第 11 卷，第 991 页。

当地游击队领导的被清洗和复职

红军在劳山胜利后，随即便是有名的大清洗。当地游击队全部高层领导，包括刘志丹和高岗都被清洗掉，总数逾 100 人。有关他们的被拘情况仍不清楚，一些报道情绪化并互相冲突。如高岗描述，逮捕由聂洪钧和戴季英下令进行。这两人都是随徐海东的二十五军到陕北的。但他们是前台人物。高岗指责，“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当地苏区的最高代表朱理治和郭洪涛是清洗的真正幕后人物，尽管他们其后否认逮捕的所有责任^①。

1935 年 10 月 25 日，在长征中久经战斗的红一方面军余部的先头部队抵达吴起镇，与十五方面军汇合，使这块苏区的红军总数达 15000 人。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和其他高层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随红一方面军来到。被捕的游击队领导人很快复职，聂和戴据报因下令逮捕而受到惩罚。然而朱和郭被正式辩白无罪。他们保留了党内重要职位，高岗报告说，他们继续诋毁和阻挠当地干部的工作^②。

① 高岗，第 32 - 33 页；《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341 页做出了一致的解释，列出中央委员会代表朱理治与郭洪涛合伙进行了清洗。文中未提及聂或戴。朱和郭被称为执行“政治、军事和组织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② 国民政府调查局：《半年来陕甘宁及川康边境赤匪窜扰概况》，第 9 页。这篇公文日期是 1937 年 3 月，列出戴季英在西北苏维埃政府任政治部首脑。见《解放日报》（1941 年 12 月 10 日）、霞关会：《当代中国传记辞典》（东京，1962），第 96，256 页。朱理治 1941 年下半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任贸易委员会主任和边区银行主席。郭洪涛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直到 1938 年，这是边区党的最高职务，1938 年他调到晋察冀边区，同样任党委书记。郭调走后，高岗取代郭任陕甘宁边区党的最高职务，此后，稳步地在边区增大了权力，成为陕西共产党首要人物。

孟伯谦与高岗的看法不同。按照他的说法，被称为逮捕行动的中心人物聂洪钧因惧怕当地游击队领导中强烈的反毛势力，采取了行动。孟叙述了党内一些担心情绪，即陕西党早在1931年就采取的独立路线，反对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反对在陕西革命政策上一度起过重要作用、但不久就被打成托派分子的张慕陶^①。这一解释暗示（但无佐证），逮捕是执行毛的命令，而不是执行遵义会议前控制党的毛的前任的命令。毛的前任曾长期批评陕北游击战略。孟没有精心做这些推测。他未提供证据证明当地特别反毛或反对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领导下制定的路线。他也未提示张慕陶实际卷入了1935年此一根据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然而孟的分析暗示了持续的地方主义情绪和憎恶外界控制陕西政治、特别是在游击运动方面。况且，托洛斯基主义的含义是批评当地不愿放弃土地革命、不赞成毛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所推行的新联合阵线政策。托洛斯基分子甚至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仍然坚持反对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他们把统一战线看成是出卖工人和农民利益。

而埃德加·斯诺从另一个角度叙述了逮捕高岗和刘志丹的事件：

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

^① 陕西共产党头20年，张慕陶的作用隐隐增大。可惜，关于他的可信资料难于寻找。1926年他任国民军政治部负责人，长久与这个机构有关联。据说他与李立三关系密切，并在1931年赞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孟伯谦也指出，张国焘1936年到陕西根据地后被谣传为张慕陶的弟弟。孟伯谦，第19、88、94、136~137、164页。见《解放》，第29~30页（1938年1月2日）指称托洛茨基分子发动反对张慕陶。

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也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刘志丹不仅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利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像阿基利斯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①

由于证据有时是矛盾的，所以此一事件的主要原因就很明显了，即当地游击队的独立和战略冲突问题。如果我们把斯诺的张胖子换成高岗笔下的恶魔朱理治，那么这两个记述相吻合，都说明冲突暗示着拒绝外来领导进入本地苏区^②。但是斯诺的记述没提到军事实情。当地游击队经过将近10年艰苦的独立活动，不愿意在一位党的特派员的要求下靠边站。徐海东队伍的到来，头一次使上级党拥有军事优势。刘志丹、高岗和他们的同事只好屈从于不可争辩的军事实力。

红二十五军和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结束了激进的陕西青年领导的农村起义活动时期。这些激进陕西青年不停地反对上级党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36页，三联书店，1979；参见詹姆斯·陈（James Chen）《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第201页。

② 关于张先生是谁的谜远未解决，其后又进一步复杂化，1968年《红星照耀中国》修改扩充版，斯诺认为，张庆福也许是张慕陶。在我看来，这一解释不对，孟伯谦的记述在别的场合中反复分析了张慕陶的角色，这里却未提到。还应该指出，据高岗称，张庆福1935年刚被朱理治任命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不久，就被他逮捕。我的暂时结论是，高岗是正确的，即认为朱理治对逮捕负有责任。朱一直任边区的重要官员，一直到1941年或稍晚，高岗的权力增长到能够迫使他调到其他地方。

的领导颁布的政策，摸索能在陕北秃山里生存的游击战略。这些党内磨擦绝不会由于中央委员会和主力军队从南方来到而消除。此后10年里，地区和全国利益的冲突及社会革命的各种观点都需要协调。独立的当地领导首先重视把边界地区发展成为一块革命根据地，而南方人主导的党的机关首先想到全国，他们之间常常出现争执。不管怎样，1935年11月，党为被清洗者恢复了职务，大多数当地领导被吸收进扩大的机构。刘志丹本人成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及北路军和红二十八军司令，直到1936年春他在一次行动中遇害。随后他被党奉为烈士。1936年夏，刘志丹出生的保安镇命名为志丹，后来这一县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发起运动，称赞刘为青年楷模，1949年后全国也这样赞美他。他的英雄事迹出现在许多回忆录和传奇故事里。刘死后，他的部下高岗升至边区党和军事要职，最后在中国西北部举足轻重。不仅许多当地游击队员在战时党内、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高层内出色地服务，而且在1949年后他们也服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怎样，1935年秋以后，所有人都被直接置于在此设立大本营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并投身于不久后成为党的政策核心的统一战线。游击队独立时期终止了^①。

^① 孟伯谦，第151~163页。孟伯谦描述了当地一些领导人的沮丧，毛到达陕北时，他们的权力被消减。《陕甘宁时况》第5页还指出，长征部队到达之后，继续发生磨擦和当地共产党军队的叛离。当地游击领袖和南方来的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其后10年里始终是关注的问题。虽然高岗最终在1949年以后与毛泽东的领导冲突起来，但毛泽东显然是1935年11月为当地干部平反，并使高岗其后成为全国性人物的中心人物。1954年与高一起被清洗的人中，没有一位参加了早期游击活动，虽然有一些在抗日战争中与他工作关系密切。

农村革命和游击战争

在根据地的军阀、土匪、秘密会社环境和强烈抵制外来控制方面，陕西游击队的经历与1927年和1928年井冈山毛泽东式的游击经历极为相似。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坦率道出他的军队的复杂成分。包括：

（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能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若无此项补充，则后兵员大居问题。^①

在边远山区奋斗求存，毛最初发现农民响应不积极。类似于陕西游击队，井冈山共产党人把他们的军队变成了大杂烩，主要成分是军阀和国民党军的被俘士兵或开小差者，从前的土匪等等。这些人是熟练的作战者，许多是被迫离开土地的不满农民，但是要把他们转变为献身的革命者证明是艰难的。如毛所写，开小差很普遍，特别是军事失利时。进一步，报告还提出建立农村革命运动的一个问题。土地革命远不是军事上动员农民的关键，解决不满农民最关键的问题也许会削弱活力。接受土地的农民和士兵都不愿继续抵抗敌人或争取全国性胜利，

^① 毛泽东：《早期红军的成分和训练》，这是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引自Stuart R. Schram《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1963），第195~196页。

也许会离开运动，把他们所有的精力放在耕种新分到的土地上^①。

同一份报告还直接谈及井冈山游击队为一方，湖南省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为另一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②

① 詹姆斯·彼特斯 (James Petras) 精确地描述了哥伦比亚“红色共和”例子中的形势。“丛林围绕和政府军实际上进不来，使他们有了自己的行政系统。‘红色共和’不会被外来者打败，但是努力工作的农民和共产党人在农业上变得如此成功，以致他们完全失去了把‘好事’推广到其他地区的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讲，打倒了他们自己原先寻求土地革命的目标。”《拉丁美洲的革命和政治运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秘鲁》詹姆斯·彼特斯和莫瑞斯·塞特林 (James Petras & Maurice Zeitlin)：《拉丁美洲，改革或革命：一名读者》，第 335 页，纽约，1968。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2 页。这是 1928 年 11 月 25 日的报告，修改后收进《毛选》。《毛选》中它的题目是《井冈山的斗争》。参见陈志让在《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一书中对此事件的深刻描述，第 142~143 页。由于毛的文章在许多情况下已精心修改以收入《毛选》，所以尽可能引用原文。在那些例子里，我找不到原文，包括《毛选》中头几篇文章，此点特告知读者。

毛还表述了对省党委员会财政支持不足和极左政策的不满，对中央委员会土地政策及批评游击队活动的不满^①。由于在远离上级党的情况下活动，拥有控制游击武装的独立力量，毛经常不理睬或违抗外来指示。这些指示与他自己发展的实用灵活游击战略相冲突。毛的战略与他的根据地的具体情况紧密协调一致。取得共识的问题最终解决了，那仅仅是由于党中央迁到这块江西根据地、就像同样的问题最后要在陕西解决一样。

在本质上，毛和朱德的游击队在井冈山面对的问题与陕北游击队面对的问题相似。两者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进入崎岖的山地，通过革命活动动员当地农民以赢得广泛的支持。与彭湃早时在广东海陆丰苏区不同，他们不能依靠高度组织起来的农民长期进行反地主斗争^②。在井冈山和陕西，毛和刘志丹各自领导武装的反叛者在山区活动。在这些地方，农民还没有被革命道理所醒悟，并且对盘踞于此的武装力量（政府军和土匪）之蹂躏习以为常。当然也有不同之处，不像井冈山的许多上兵，陕北刘志丹和他的人员是本地人，受益于熟悉本地情况和人情。毛的井冈山区虽然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是个偏僻角落，但比起陕北山区来，经受了多得多的经济和政治变化的影响。然而；两地都处在经济和通讯交通落后之区，并且两地在1919~1927年间都远离中央政府军事和行政力量所及。两地的游击队最初都发现，农民对农村革命冷漠，虽然陕西农民更冷漠一些。

中央苏区当时的土地政策，就像陕西游击队那些政策一样，在井冈山刚一尝试推行，就受到留苏学生控制的中央委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0~100页。

② 卫藤沛吉，全文。

会的批评，朱（德）、毛（泽东）1930年初时农村政策的两个原则是：不分阶级，所有人均分土地和仅分配多余土地，而不是所有土地。这两个原则与陕西游击队1932年和其后在三原推行的一样。1930年2月7日长汀县南阳会议上，毛的土地政策获得批准，两个原则归结为两个口号“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①。朱毛土地政策的平等原则用来扩大支持游击队的基础，与占大多数的贫农联盟，保护中农的利益，约束富农的权力，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人们还认清了这样的事实：重新分配“剩余”土地，将使生产破坏减到最小，从而保证游击队供给和除大地主以外所有阶层的利益。

朱毛的土地政策，就像陕西的游击政策一样，一致成为王明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在富农问题上批评的目标。自从1931年两条路线公开之后，王坚持对地主、富农以及城市资产阶级采取敌视和不妥协斗争的政策。毛的更为灵活的政策成为在根据地极端严峻条件下解决生存问题的关键。这种政策使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团结各个阶层和阶级的力量，包括持不同政见的军队、秘密社团成员甚至当时的富农，集中对付主要的敌人^②。中央委员会反对在江西和陕西等分土地的政策，毫无疑问是正确意识到了由于在重新分配土地时没有清晰地区分富农和贫农，该政策抹杀了尖锐的阶级斗争。但在两地的地方领导都全神贯注于团结农村人口中广泛的社会阶层，包括中农甚至一些更高的阶层，以便增加光明前景，避免被强大敌人打败。

① 1930年2月7日。土地法由Rue译成英文，第300~304页。（Rue）（第196页）指出，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反对，这些口号在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法中未再出现。如我们下面要讨论的，1937年以后进行的运动中，他们的思想反复出现，特别是1942年整风运动及以后。

② 王明和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不同在约翰·鲁（John Rue）的书中有深入的分析，特别见第254~257页。

游击队的基本问题在于将农村革命和军事胜利协调起来。扩展的军事胜利是建立并保持一个稳固根据地的先决条件，缺少它就不可能动员农民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和苏区军事政治事务。条件不成熟而试图分配土地只会招致严厉报复。然而，如果农民支持军事斗争，甚或区别游击队与当地土匪和军阀部队，游击队的实质受益也很大。面对压倒优势的敌军武器和人数，毛和刘最初都采用突袭战略，类似游动土匪的求生之法，同时学习利用撤退进山，远离敌人势力中心。最后他们开始组建稳固的根据地，区内民众献身土地革命，参与广泛的各个军事政治组织的活动，农村革命新秩序形成并深化。

1934年陕北游击队的力量已达到可以确保稳固根据地和进行规模日益扩大的重分土地。已能体察到，从高度关注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转到群众运动的初始阶段。到1935年秋，中央委员会和红军从南方来到时，土地革命正迅速展开。然而，巩固政权，即建立新的革命秩序却几乎没有开始。

长征并没有把忠实信徒们带到一块许诺的光明之地。确实，许多人长久地回头眷顾江西更光明的岁月。如同徐特立告诉斯诺的那样，“文化上看，这里是地球上最暗淡无光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民众与江西民众相比的确非常落后……工作节奏慢得多。我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①。但陕西的旷野为党的远大目标提供了一片天堂，并成为革命发展到全国的一块跳板。党领导和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们的到来，开始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时期。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253～254页；参见斯诺《红色中国随笔》，第49、60～61页，剑桥，1957。

第三章 从土地革命到统一战线： 1935~1936 年的陕甘宁苏维埃

1935 年 10 月，先头部队由南方到来，陕北小而孤立的游击根据地便全国闻名，成为仅存的苏维埃堡垒，最高党领导的新的根据地，和国民党围剿的中心。随后两年，共产运动不仅确保存在，还因为正式通过了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后予以引人注目的阐述，这打下了大发展的基础。在毛泽东新领导下，共产党成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爱国情绪的最有效发言人。

转向统一战线政策是复杂而具挑战性的。整个 1936 年，苏区同时存在着互相冲突的政治路线。最后是党的统一战线立场缓和了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直接威胁，促成了中学生和大学生的重要支持，数千人涌向延安。共产党的呼吁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要求结束内战，并且导致了西安事变和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在陕西根据地，不是面向全国的宣传辞藻，而是农村革命最早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使农村人口日益有效地参与军事政治活动。1935 年广泛开展农村革命，并在 1936 年间形成较温和的路线。本章我们将探讨土地革命中陕西农民的作用、重分土地的社会经济后果和转向统一战线政策对巩固一块根据地重大意义。

土地革命：社会经济方面的冲击

土地革命激烈地改变了这一苏区大部分乡村的生活形态，成为平等社会的先决条件。村庄土地革命过程中经济与政治转变的当时档案难以找到，我们很幸运拥有一份1939年对延长县一个乡的调查。它的比照革命前后所有阶级的经济生活综合数据，提供了土地革命影响农村的珍贵指数，使我们能够勾画出边区的经济面貌^①。

第三乡位于去延安的路上，是延川最繁荣的贸易乡，而延川是陕北较发达的县份之一。1934年冬，第三乡是第一批进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之一。1935年1月，一个党支部形成，随后，乡政府成立并进行土地重新分配。虽然1936年面对封锁，但一个政府市集和四所新小学建立起来，第三乡变成禹居区党和政府所在地。

第三乡土地革命的主要经济后果是打破了财富大量集中，通过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穷人，大大增加了中农。所有雇农和贫农占全乡人口321户的3/4，是革命的直接受益者，他们获得土地。50户原中农家庭地位的变化较模糊，大多数财产略有减少。然而，1939年有22户被划为富农，10户由中农升上来，8户原先是贫农。

表3-1对比该乡土地革命以前及4年后1939年的阶级构成。所有贫农和雇农家庭的1/3以上变成了中农，地主阶级全

^① 杨英杰：《延川县禹居区三乡的阶级关系及人民生活》，《共产党人》第3期（1939年12月），《共产党人》在党的干部高层内部发行。可惜，确定阶级的标准并没特别指明；但是经济资料展示了阶级结构相当清晰的画面。迈德尔（Jam Myrdal）：《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

部消灭。中农增至2.5倍，贫农和雇农分别减少了1/3和1/2。贫农和所余不多的雇农仍然构成人口的近半数，但他们的经济命运根本改善了。

表 3-1 第三乡 321 户阶级成分

阶 级	革命前(1935年1月)		土地革命后(1939年12月)	
	数 目	百 分 比	数 目	百 分 比
雇农	31	9.6	15	4.9
贫农 ^②	204	63.7	136	42.6
中农	50	15.6	123	38.2
富农	16	4.9	22	7.0
地主	12	3.8	0	0
工人	3	0.9	7	2.0
小商人	1	0.3	7	2.0
游民	4	1.2	3	0.9
巫师	0	0	3	0.9
知识分子 ^③	0	0	5	1.5

资料来源：杨英杰《延川县禹居区三乡的阶级关系及人民生活》，《共产党人》第3期（1939年12月）。

注释：② 贫农分类包括佃农，但不包括“农村无产阶级”雇农。

③ “知识分子”是小学老师。

对一个离延安不远但较穷且人口较少的地方的记述，印证了土地革命的经济影响。以家庭人口为基础，住在小村柳林的10户家庭分了土地，每家有一份，包括地主。一个9口之家据报得到17英亩土地；另一家有4亩肥沃谷地和17亩山地；第三家获得谷里最好的3英亩土地^①。大多数家庭有达到或接

① 迈德尔 (Jam Myrdal)：《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第80、87-88、130页。

近中农地位的倾向。这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经济成就，尽管生活仍然贫困，却免除了租佃、债务和当前挨饿。所有阶级的天平转向中间，消除极富和极贫以及明显的剥削形式。4年以后，土地革命期间建立的经济平等形态仅在小的方面有改动，土地所有权很少有变动。

第三乡一个行政村上层12户地主和富农在土地革命前的详细资料表明，他们支配着村里的基本经济，这也表明他们没人能与陕北大地主家庭的财富相比^①。这12家拥有的土地从60亩到135英亩不等。土地所有权资料间接说明土地革命高潮中政治因素和人际关系在决定阶级上的重要性。划分为一名地主可以带来死亡，最少也造成土地和财产没收。划为地主的两家，从可得的统计看，是12家里拥有土地最少的，分别有63和65英亩。也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比划为富农者有更多土地或剥削更多。此外，1939年其中4户被划为富农者，土地革命前是地主或富农。土地变动中，他们能够保留一些财产，但不是全部。

土地革命前，这些地主、富农家庭大部分拥有一头牛、一头驴或一匹马，但最富的不超过3头牲畜。在第三乡，羊是富裕的主要指标，几乎这些家庭都有100只以上，最多的有212只。每一家有一名长工，两家富农例外，分别雇了两人和3人。他们在本地都有相当多的放贷，从400元到1100元。土地革命前，第三乡有钱人除了大量的土地利益外，就是从事养羊、经商和放贷。

土地革命期间，有几个地主因反革命活动被杀，大多数逃跑了。富农多留下来，同意革命者的条件，一些离开的，1937年回来了，那时统一战线已确定不移，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体

^① 参考第一章讨论米脂县有权有势的马氏家族地主。

会农民起来反对地主利益的过程，这里有一个记述，描写了1935年没收靠近延安一个大户财产的情况：

当我们注意张培义时，他庄园上的600人来参加开会，告诉我们他如何压榨他们。会很长。我们发现他有30万斤粮食，400只羊，6头驴和21头牛。他告诉我们他仅拥有1万亩土地，而实际上他拥有更多。有20多个村子从属于他，一年收租6万多斤。我们分片分配了他的土地，分配了他的玉米、牲畜和大小农具。我们留下部分作为公共财产供红军用，其他的我们都分配了。张培义本人逃到延安，因为他知道如果佃农抓住他会怎样处置。但我们1936年解放延安时，已有了抗日统一战线，所以他可以继续住在那里。^①

在一场生气勃勃的土地革命中，少数地主、商人的经济统治结束了。这并不是完全消灭了阶级区别，而是消灭了旧制度最明显的不平等和剥削，改善了大多数贫苦居民的条件。如果以前最重要的阶级区别是经济贵族与穷人的不同，那么土地革命后的1939年，最重要的区别则是贫农和中农，二者都努力确保糊口生计。

表3-2的资料表明了第三乡分配土地和财产造成的平等趋向。1939年，47%的居民仍划为雇农和贫农，但他们许多最沉重的经济负担消除了——长期债务、毁灭性税收和缺少好土地。虽然他们仍然局促于贫困和经济呆滞之中，但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障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原始的生产方法，而不是地主、军队或国家的剥削。

^① 迈德尔前揭书，第50~51页。

表 3-2 1939 年 12 月第三乡土地所有权、生产力和阶级^④

阶级	户数	全部 劳力	每户 劳力	全部土地 (英亩)	土地 百分比	人均 土地	每户 土地	全部 耕牛	每户 耕牛
雇农	15	17	1.1	58	1.5	0.97	3.6	0	0
贫农	136	138.5	1.0	1488	37.7	2.14	10.9	44	0.32
中农	123	156	1.3	1813	46.8	2.44	14.8	119	0.97
富农	22	38	1.7	465	12.0	2.77	21.2	18	0.82
其他 ^⑤	25	1.5	0	78	2.0	1.79	3.0	3	0.12
总数或 平均数		351	1.1	3871	100.0	2.22	12.1	184	0.60

资料来源：杨英杰《延川县禹居区三乡的阶级关系及人民生活》，《共产党人》第 3 期（1939 年 12 月）。

注释：④ 数字统计参差都直接来自原资料，这可能是印刷的错误。例如，土地总数加起来是 3801，而不是 3871，原文如此，本处照引。百分比统计也有几处很小的错误。

⑤ “其他”包括工人、小商人、知识分子（小学教师）、游民或匪徒及巫师。

土地革命前，最富的 11 户拥有第三乡所有可耕地的 1/4。虽然该乡其他 17 户富农和地主的统计未列出，但很清楚土地高度集中在这些阶级手中，也许占了 50%，当然包括最肥沃的土地。

然而在 1939 年，随着地主的消失，贫农每人拥有土地（2.1 英亩）仅比中农（2.4 英亩）和富农（2.8 英亩）略少。况且，土地上中下等均分，各阶级拥有的土地质量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明显的事实是，仍旧是贫农的人，的确由于耕畜或雇工等其他生产力的缺乏，生计是否由于土地增加而获实质性的改善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土地所有权大部分已经平均，债务多已消除，那么耕

畜拥有就成了财富和阶级区分的主要标志（见表3-3）。革命中牲畜也重分，但由于数量不足，或因为共同所有并不实行，牲畜仍旧是少部分家庭的珍贵专有财产。确实，许多人，也许是最穷的人因为有了1头牛，会被划为中农。中农和富农每家平均接近1头，而每3户贫农不到1头，雇农则无。牛用于耕地和开荒，拥有2头牛意味着两倍或3倍于一个人可耕作的面积。一个人可以耕作7至10亩，但加上1头牛，他可以耕作18至43英亩。富农平均每家拥有21亩地，通常拥有1头牛，因此可应付大量农活，不用雇工。贫农和中农每家平均分别拥有11~15英亩，其数量接近他们的人力、畜力的极限。贫农改善生计的主要希望已不再梦想拥有土地或免除债务税收重负，而是存钱买1头牛。

表3-3 1939年12月第三乡牲畜、家畜和阶级

阶级	驴	每户 驴数	猪	每户 猪数	羊	每户 羊数	马	每户 马数
雇农	—	—	2	0.1	—	—	—	—
贫农	54.7	0.4	141	1.0	140	1.0	—	—
中农	101.2	0.8	199	1.6	774	6.3	2	0
富农	31	1.4	52	2.4	581	26.4	—	—
其他	2.5	0.1	—	—	—	—	—	—

资料来源：杨英杰《延川县禹居区第三乡的阶级关系及人民生活》，《共产党人》第3期（1939年12月）。

富农和中农有能力另外雇工而显示出来生产力的不平等。第三乡富农家庭平均每年雇一个工5.5个月，中农1.6个月。虽然这些数字看来不多，但雇工在耕种和收获季节极为重要。

至1939年，虽然中农和富农比他们的穷邻居有了更多的

驴和羊，但土地革命消除了拥有这些家畜的巨大不平。贫农家庭中40%拥有1头驴，而中农是82%，富农平均每户1.4头。羊群大小是体现中农和富农财富的主要区别之一。富农每家27只羊，拥有了重要的补充收入来源，尽管数量比革命前地主富农拥有的数百只相差不少。中农和贫农家庭各自仅拥有6只和1只羊，即使如此，也比革命前的状况有了实质变化。革命中重分家畜形式的财富，消除了高度集中，帮助了穷人。然而，牛、驴缺少，羊群适度集中在中农和富农手里，意味着家畜，而不是土地，提供了衡量财富的明确界限。

富农是土地革命后最富有的阶级。1939年，富农每家拥有21英亩或每人2.8英亩土地、0.8头牛、1.4头驴、2.4头猪和26.4只羊，平均每年雇用0.45个雇工，而自己有1.7个劳动力。甚至按中国标准，这样的生活水平也很难被认为富有，当然不会有舒适的生活。三乡和其他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大大减少，但未消除。新富农是最富裕的，经济上受到新秩序保护，但与同村人一样，现在也下地耕作。最有意义的是，新富农不像前地主富农，不再构成支配社会经济的阶层，去控制穷人的命运和垄断军政力量。

在消除财富高度集中上，在大大减少阶级区别上，特别是在物质帮助雇农和贫农上，三乡是个典型，代表了陕北1934~1936年土地革命广泛的社会经济拉平效应。在苏区其他不缺少土地的地方，革命的平等努力主要表现为没收财产和家畜，取消明显债务。土地革命成功使大量农民走进革命阵营，可仍遗留了未解决的基本问题。长期蹂躏下落后的经济问题摆在深谋远虑的当地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面前。特别是未做出有计划的努力，调整个体家庭农业以达到合理化和提高生产力或者阻止贫富分化的再现。可是土地革命的影响还是大大超出了财富分配的影响。它改变了农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土地革命与群众动员

陕甘宁农村革命的政治重要性是巨大的。地主富农权势被打倒。在进行土地革命的地方，拔除了富人经济根基，从而打破其政治垄断，并产生新的领导和机构。土地革命不仅赢得了农民的信心和积极支持，而且贫农在奋斗过程中也形成了新的村中领导，树立了权威。如同共产党理论家博古1936年告诉埃德加·斯诺的那样，“一旦土地重新分配实际出现，他们就开始相信我们是搞……，但此前他们什么都不信”^①。

共产党人迅速行动，疏导大变化中解放的力量，发展党员、征兵并建立了当地政府机构。1935年和1936年着眼平等繁荣并以实际步骤破坏旧制度的激烈革命，迅速促进党和军队队伍的壮大。土地革命中最积极的贫农青年不仅为本地游击队和准军事力量提供了人力，还开始走进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机构、党支部和当地政府的领导岗位。在陕甘宁，土地大变动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只有在土地革命中农民积极活动、热心组织起来之后，才会更深刻地认识一些较抽象的概念，如统一战线、反对远处的日寇等。

埃德加·斯诺生动描述了1936年夏他与一群农民的谈话，恰到好处地抓住了由革命产生的激动的解放情绪。善意抱怨被封锁的苏区一些东西难买之后（用苏维埃钱的能买什么呢？我们甚至不能买鸦片！），谈话转到了红军和敌人。一位有小辫的老人最爱发牢骚，他激烈地发问：

“白军来了会发生什么呢？……他们要粮食，一字不

^① 斯诺：《红色中国随笔》，第19页。

提付钱。如果拒绝，我们就被当作共产党被逮捕。如果给他们，我们就付不了税。不管怎样，我们付不出税！然后怎样？他们拉走我们的家畜去卖。去年红军不在时，白军返回，他们拉走了我两头骡子和四头猪。骡子每头值30元，猪已完全长大，每头值2元。他们给了我什么呢？”

“哎呀，哎呀！他们说欠80元的税和租子，他们把我的家畜算40元，还要我再交40元。我能有吗？我没东西可卖来满足他们的偷抢。他们想要我卖女儿，这是真的。这里有些人不得不那么做。那些没有牲畜及没有女儿的人被送进保安的监狱，许多人死于寒冷……”

我问这位老人他有多少土地。

“土地！”他嘶哑地说：“那儿是我的土地。”他指了指小山头上一小片一小片的玉米、谷子和蔬菜……

“这里土地不值钱，除非是谷地。”他说：“像那样一座山可以花25元买下来。费钱的是骡子、山羊、猪、鸡、房子和农具。”

噢，比如说吧，你的农地值多少钱？

他仍拒绝算他的土地值多少。“你花一百块钱可以拥有这房子、我的家畜和农具，再把这山也给你。”他最后估计道。

土地是富裕和稳定的尺度。给了土地和免受军队横征暴敛的税收是革命的主要成果。但革命也带来另一信息，特别是对年青人，燃起了仍不甘于无望与赤贫生活的希望。

但是，现在有一位十几岁的光脚青年站出来，在讨论会上旁若无人地讲开了，忘记了我这个洋鬼子在这里。“爷爷，你管这些事情叫犯罪吗？（加入贫农团，选举地方

苏维埃，让孩子加入红军或红色学校，等等。)这些是爱国行为！我们周家。从前有免费学校吗？红军给我们带来无线电之前我们知道过世界新闻吗？你说互助组没有布，我们以前有过合作组吗？再说你的农田，有没有典押给王地主？我姐姐三年前饿死了，但自从红军来后，我们没有足够吃的吗？你说生活苦，但对我们青年人来说，只要我们能读书就不苦！我们青年民兵能学习使用来福枪去打卖国贼和日本就不苦。”^①

周家山村在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它是陕北最穷的地方之一，早在1928年游击活动时期就大量接受了革命思潮的影响。1934年土地革命席卷全县，保安成为苏区首先实行者之一。的确，土地重分后，白军曾短暂返回，但他们的贪得无厌显然更使觉醒的农民投身革命。况且，土地革命铲除了传统权势阶层；国民党和军阀力量越来越难以在周家山村这样的村子树立忠于他们的组织核心。

那位老人和激动的年青人的对立观点对我颇有启发。前者实际上是周家村贫农团主席，他对旧制度深为不满，并且是土地革命的受益者。他不多的土地在革命前典押出去，他的经济前景当然严酷。土地革命后白军通过他的村庄时，他已拥有至少两头骡子和4口猪，这些可能是被白军没收的。这些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看来是在最近的分配土地和财产中得到的。1936年夏他再次拥有了牲畜和农具。从他的简述，他至少要被划分为新中农或富农。如前所述，革命后的划分标准在延川三乡已制定出来。保安则是个穷得多的县，但那位老人的叙述仍是有意思的，它使人想到旧政权的恐怖，特别是军队掠夺，比新政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261~264页。

权的成就与希望更令人印象深刻。他代表一个特殊例子，一位年长农民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上升到领导地位。总的来说，是年轻人最积极热心响应土地革命的号召并渴望建立一个新世界。

像那位老人一样，那位光脚的十几岁青年人详细叙述了村中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他也谈到新的不为人熟知的教育观念，看到村子以外的世界，并且为一项事业奋斗，不惜作出个人牺牲。这些新东西特别激动在陕北山区长大的农民青年。此时响应号召的青年男女更献身土地革命直接物质利益以外的事情。突然间，他们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决定他们未来的孤立的乡村、家庭关系网和地主束缚。那位周家青年人3年前看到他姐姐在西北大饥荒中与许多人一起饿死了，我们或许可以推测，革命前他的想法包括活一天算一天，躲避债主或者去当土匪。现在教育和革命运动给青年人展现极开阔的视野。

陕北的偏僻落后最初给希望发动农民的革命以难以想像的困难，乡村孤立分散，农民对革命淡泊，未接触新思想，对自己的前途实际不抱一点希望。但这些相同的条件也许有完全不同的后果。一旦农民，特别是穷人青年可以发动起来，他们献身于将他们解放的运动时将是全心全意的，在陕西1935年和1936年的土地革命中，此情形确实发生了。

在分析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努力动员农民方面，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战争开始时，共产党实际上对华北农民不感兴趣。此时共产党人主要是一群老战士，他们从事反国民政府的战争已10年。”^①然而前面分析的陕北情形以及多纳尔德·吉麟（Donald Gillin）研究山西的成果显示出共

① 约翰逊（Chalmers A. Johnson）：《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第72页，斯坦福，1962。

产党人作为土地革命者在抗日战争前就直接并全力满足农民的需要与愿望^①。

这一观点从日本当局的文件中获得有力的支持。日本当局1931年开始企图消灭东北游击队，1937年后又企图消灭整个华北的游击队。一个生动证明共产党热心农村活动的是板垣子任子仁提供的。他是满洲一个地区的副总督，深深涉入日本的绥靖计划。板垣子任子仁指出：

农民是无知的，但没有无知到认识不到他们陷入的贫困境地。共产党强调这一事实，争取群众。农民决不会因为与实际生活脱节的激动诉求而跟着共产党走，但诉求集中到有关他们生计的实际问题时，持续的集体反抗就可出现……

即使建设共产社会或保卫工农的母国——即指苏联——的理论宣传不能打动农民的话，也不能保证现实生活被触及时他们仍无动于衷。我们不怕共产党宣传；但我们担心宣传材料里出现有关农民的生活。我们不怎么害怕点火，而更害怕漏油。^②

江西时期革命运动未能席卷全国，与其解释为由于地主、军阀、国民党反革命力量强大，运动内部的冲突和不能巩固分

① 参见多纳尔德·吉麟分析，1936年初陕西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农民民族主义》，《亚洲研究》第23卷，第2期，第271~277页。

② 板垣定次：《个人反省》，（满洲国）国务院行政部公文，《绥靖月报》第4卷，第4期。引自李宗植《日本在满洲镇压人民起义的经过》（*Counterinsurgency in Manchuria: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931~1940*），第34页，兰德公司备忘录，1967。

配土地成果，毋宁说是缺少根本上的土地革命诉求。

实际上，每一位观察江西和延安时期共产党运动的人都注意到，青年人控制着从低层到高层的领导，陕西游击队从1927年就由青年男子领导，大多数20岁出头，完成长征的战士们到达时，他们刚刚30岁。共产党最高领导当时是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对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已领导十年之久，也仅仅35岁左右或40出头。埃德加·斯诺报道说，1936年红军普通士兵平均年龄是19岁，而军官是24岁^①。

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青年人和青年运动的分析看来至少部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北共产党的诉求与成功：“忠诚在完全成熟时，就是有组织的贡献力量。忠诚来自青年的参与，他们的经历反映了时代的基本特点。在这个时代里他们是传统的受惠者，是技术的实践者与发明者，是动乱下幸存的反叛者，是伦理力量的延续者，是有异常献身精神的异常者。这至少是社会心理演进状态下青年的潜力。”^②埃里克森强调青年的极大能量，努力形成他们自己的特征，献身不断发展的传统，或者现行制度如果看来过时，就献身一种激进的新观念。在总体上，青年远没有变成限制严格的社会制度的俘虏，享受着自由观察事物的可能性，如果呈现可选择的事业，就关注风向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在陕北革命形势中，许多人最初加入绿林好汉式的刘志丹队伍，最后发展为农民起义，反对地主制度。陕北一代革命青年参加土地革命是决定性的行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279～280，362～370页；参见尼姆·威尔斯：《红色中国秘闻》（*Inside Red China*），第33～34，97～109页，纽约，1939；克莱尔（Claire）等：《与中共相处两年》（*Two Year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第321～322页，纽哈文，1948。

② 埃立克·埃立克森（Erik H. Erikson）：《青年忠诚与歧见》，载埃立克森编《青年的挑战》，第22～23页，纽约，1965。

动，打破了束缚他们的枷锁和压迫制度，献身新社会并起领导作用。

敬老和偏好稳定的传统使中国青年地位低下。官僚政治和当地名流的领导人中，年龄是威信和权利的重要因素。然而至少在一个方面，一些职责职位（如果不是高声望的话）传统上青年人是可以就任的，这就是在军队里，特别是地方武装中。其结果，在朝代交替期间，军队成为社会动乱时期的管制机构，军队和准军事组织里青年人上升为领导角色的机会就倍增。特别是反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时期很多，展现给青年人行动、权力和机动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在这样的时代，包括军阀时代，反对现状，上山落草，或者通过参加地主武装以求自保，为青年人打开了新的军事职务机会。最后，恰是在如此混乱和纷争的时代，青年的力量和大胆行动是非常珍贵的。相反，传统领导艺术是在儒教系统的刻意栽培下慢慢成熟的，它在稳定时期或者居乱求安时期发挥重要作用。1935年和1936年，贫农青年成为苏区数千村庄土地革命的生力军，并成为保卫新制度的农民武装和正规红军的骨干^①。然而在西北，即使苏维埃根据地已经创立，领导权问题也经历着一个痛苦的重新评估过程。

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的缓和

江西苏区被彻底毁灭和华中、华南根据地的丧失迫使中共

① 罗伯特·马斯 (Robert M. Marsh): 《天朝百官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流动》(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 1600~1900), 第164~174页, 哥伦比亚, 1961; 弗朗兹·舒尔曼 (Franz Schuyermann): 《共产主义中国的组织与意识形态》(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第409页, 柏克莱, 1966。

全面退却。长征期间，因为日益感到日本的威胁和学生及士兵中强烈的民族反应，使毛泽东作为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首要倡导者而显现。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党内最高领袖地位开始，他便在党内仍有相当势力的留苏学生支持下，主导着一项进程，最终建立了与国民党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和放弃土地革命的农村战略。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毛儿盖联合宣言是统一战线政策起步的重大转折点，在尖锐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同时，宣言呼吁所有阶级与共产党一道，在包括所有爱国力量的“联合国防政府”领导下反抗日本。宣言表示愿意与所有军队合作，包括准备抗日停止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①。由此，共产党举着一枝橄榄枝向国民党和军阀阵营摇晃，后者中的一些人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日益怠慢。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争论对陕西的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从1934年开始，共产党在南方的根据地正被消灭，陕北游击队却获得最大的军事胜利，并成功地发动土地革命。长征中饱经战斗、开小差和疾病减员，而首批部队来到和陕北基地被选作新中央苏区的事实，必然使陕西游击队强烈意识到他们的成就，并坚信他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党的领导抵达陕北后，陕西游击队在形成统一战线方面扮演的角色。最初决定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述及，但未涉及当地游击队领导人的作用。他们充其量在导致统一战线的政策商议上只是从属角色。的确，当地游击队领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和他们重

^① 范力沛 (Lyman P. Van Slyke): 《敌与友: 中共历史上的统一战线》(Enemy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第55-59页, 斯坦福, 1967。

新合作投入运动，与他们接受新路线也许是部分巧合。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争论是共产党历史上最激烈的争论之一，1935年12月下旬在瓦窑堡的政治局会议上摊牌了。与国民党生死搏斗之后，一些党员尽管知道党的力量弱小，并且他们本人有民族主义情操，可还是反对或至少不愿与以前的敌人为伍。反对被平息了。随着12月25日《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的通过，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也许可以说是代替了土地革命，成为共产党的策略路线。范力沛（Lyman Van Slyke）评价新路线的重要意义如下：“这意味着阶级斗争让位于抗日；决定与反日和不进攻共产党的资产阶级联合；肯定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最高目标，同时也坦率承认眼前弱小；坚持保有红军和根据地以保证独立性；战术灵活，战略上联合最多力量反对孤立之敌人。”^①

瓦窑堡宣言前10天，共产党采取了第一个实际步骤使苏维埃内部政策与统一战线立场更加协调。12月15日，毛泽东作为在西北重新建立的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发布了土地革命温和化的指导方针。通过此举，共产党直接寻求苏区富农和中农更广泛的支持，但他们更明确地向全中国表示，在行动上愿意妥协，以此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基础。毛泽东总结说：“富农已经改变了他们对苏维埃革命的敌视，并开始同情反帝和土地革命斗争。”^② 虽然毛的命令同时肯定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但它强调了缓和与富农关系的步骤，作为党的爱国事业的具体

① 范力沛：《敌与友》，第59页。中共中央政治局：《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手稿，1936年12月25日。此决议经重要修改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8~330页。参见毛1935年12月27日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3~174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手稿，毛泽东签署，1935年12月15日（哈佛—燕京图书馆）。

标志。

12月25日政治局宣言体现了毛早些时候关于土地革命的指示和观点，单方面的爱国承诺步骤，逐步降级的国内冲突，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一步是缓和土地革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将改变它对富农的政策；富农财产将不会被没收，富农土地除去封建剥削的部分，不管自种还是雇工耕种都不没收。一个村庄土地平均分配时，富农将有权获得和贫农中农同样的一份。”^① 宣言因而强调，土地革命的敌人是封建剥削，富农作为个人和阶级都不是敌人，因而他们可以也必须被联合起来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共产党在缓和农民革命方面是言行一致的。

整个1936年，土地革命在陕甘宁边区继续扩展。但当领导日益多地要求限制，以逐渐形成第二次统一战线，当地干部越来越多地被批评为左倾偏激。这些批评说明关心统一战线者和努力唤起农民革命力量活动人上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央领导优先考虑全国性的问题和陕西游击队领导的地方取向发生了矛盾。1936年全年将1935年12月决议的参考指示反复发出，这是用来矫正当地干部在政策执行上的偏差。

1936年4月4日，由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联合发布了《对各级共产党和苏维埃执行修改的富农政策的指示》，清楚表明农村政策的转变，指出在贯彻土地革命中已断定为错误的详尽说明。党号召重申以前的决定，特别强调划分中农富农应宽松一些，甚至于退还不公正没收的财产。没有原主要求从新持有者手里收回土地的事例。如果有错误，在党支部会议、村委会、全村群众大会、乡土地部精心审查之后，作出决定予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

以赔偿^①。

4月指示指责陕甘边区对待富农过于严厉，甚至在12月宣言后，“左倾”偏向仍在继续。同时对那些暗中寻求推翻土地革命成果，允许地主富农重获被没收的土地的右倾分子发出警告，“过去一切都错”或“中央一来一切都改变”的观点被严厉指正。游击队不积极土地革命近十年后，现在批评集中到土地政策的极端激进分子身上。这种变化主要原因当然是党的领导越来越优先考虑统一战线。批“左”部分标志着领导本身转向更温和的阶级路线^②。但它也说明，党的领导努力形成统一战线和放弃土地革命时，遇到了持续的抵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了解1936年至1938年间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猛烈攻击，因为中国的托派仍旧把统一战线视作通过无原则的妥协而抛弃革命^③。

最后，应该记住，1935年以来处在最高党领导地位的毛泽东长期以来赞成温和土地政策，强调保存中农利益，他本人在江西时期被批评为右倾。毛对江西的失败记忆犹新，寻求一项土地政策可以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并且对原始的农村经济做最小的变动。红军供给和农民生活都仰赖这一落后的经济。

①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关于改变富农策略及各级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指示》，手稿，1936年4月4日。

② 参见一位当地军事指挥员对此时战略转变的简短回忆：“毛主席出现了，说到形成统一战线的必要。中央委员会现在停止了我们对地主的活动。他们坚持认为，我们偏离了正确的革命路线，是有错误的。所以我们重新调查了每一家庭的真实阶级状况。我们得知，我们过去太过严厉。我们现在甚至与地主并肩作战。”迈德尔前揭书，第56页。

③ 尼姆·威尔斯：《我的延安笔记》（*My Yanan Notebooks*）麦迪逊，私下散发，第97页，1961。这一叙述反映了1936和1937年共产党内外统一战线派和“托洛茨基”反对派之间的高度紧张关系。1937年夏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这些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决不是消除。

江西苏维埃运动失败的教训更增加了统一战线的迫切性，需要产生一个更温和的农村政策。

1936年全年，不断有决议进一步限制土地革命。7月22日中央委员会毫不含糊地声明“一切抗日军人及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由此，甚至大地主也可以符合这一条件，简单地让一个儿子参加红军就行。特别禁止没收属于熟练艺人、教师和小商人的土地。这些人的生计主要不是来自种地。小地主和其他出租土地获得一些收入的人也许可保有土地。商业地主土地仍在没收之列，却可以自由经营贸易。虽然党完全停止追求土地革命的目标，却大大削弱了其冲击力，在根据地范围内伸开双臂拥抱各界抗日人士^①。

进而，党的指示现在头一次明确承认，在某些地区土地不是贫农最急切的需要了。例如，1936年夏一份党内报告称，在定边、盐池、环县，租佃已是次要问题。农民要求谷物和牲畜成为首要问题^②。文章日期是8月20日。饥谨和战争减少人口的地方甚至有过剩的土地，尽管这种情况不多。埃德加·斯诺指出，在土地充足、人口特别稀少的地方，不再试图没收本村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尽管重新分配荒地和居住城镇地主的土地还常常进行，并且在一些情况下，将最肥沃的土地重行分配^③。

自1934年以来，在陕西，土地革命是共产党的关键所在。到1937年1月停止时，10至12个县已完成土地革命，另有12个或更多县的相当部分也实行了，这些地方构成了陕北和

① 《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愚痴编《时论选集》，上海，1937。

② 芝圃：《关于新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党的工作》第12卷，第24-40页。

③ 斯诺：《西行漫记》，第239页。

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①。少数内战后期开始由苏维埃控制的县份和另一些在统一战线形成后仍争夺的县份，地主所有制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仍未解决。然而，最终包括在边区23个县的大多数地方，土地革命是形成新平等制度关键的第一步，其特征为广大农民参加成长中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网。

西北苏区内统一战线和新政治制度

温和土地革命是1935年后苏区一系列措施中最具意义的事情。它支撑着共产党领导全国的主张。扩大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项有远见的行动是，工农苏维埃政府改为代表性更广泛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称：愿意在苏区内使小资产阶级与广大群众联合。所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② 随着1937年后期第二次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将近两年之后，富农和地主的政治权力才得以恢复。共产党便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坚定地前进。

1936年伊始，军事形势严峻。蒋介石的军队与一些军阀

①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5日）一篇文章列出了下列完成土地分配的15个县：延安、甘泉、安塞、保安、延长、延川、环县、安定、靖边、靖洞、曲子、固临、神府、吴堡、华池。另外10个县划为部分完成土地分配：富县、绥德、兴脂、佳县、定边、盐池、新正、新宁、赤水、淳耀。这25个县里，有7个是由现存县划分和合并而成。据称完成土地分配的15个县中的11个1936年就存在，4个是后来设立的。国民政府调查局一份国民党情报《中共的经济政策》第20页称，苏维埃声称的那些县里有7个完成了土地分配，列出另外12县部分地区出现土地分配，包括共产党未列出的6个县。国民党报告的差别部分是因为包括了最后未属于边区的县份，并且因为它按照老的边界划分，而不是按照其后新行政机构采用的划分法。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

部队使苏区大大缩小，冬天快结束时，苏区供应严重短缺。为了冲破严密封锁，争取全国支持统一战线的呼吁，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最具戏剧性的一项是1936年2月20日，34000名红军战士东进，越过冰封的黄河进入山西。他们立即呼吁当地军阀阎锡山共同抗击华北和东北的日军，同时进行农村革命，唤醒山西农民。阎锡山发现，贫苦农民积极响应和激烈要求改变社会经济现状的呼声威胁了他的统治，便号召全面动员，驱逐入侵者。然而共产党的影响继续迅速扩大，直到国民党大批增援部队来到才改变了形势。4月，红军撤回陕北苏区，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受重伤，用担架抬回。当然，在山西，小股军队未进攻日本人，但共产党完成了他们统一战线的目的，一下子让全国知道了他们的抗日要求。同时，东征还使红军在山西农村募集了8000新兵，打破了围剿^①。

从1936年夏天开始，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的压力在国民党的军阀盟友中升高。6月，广东和广西反叛的军阀要求统一战线抗日，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反共活动的的能力，同时在西北从事反共的军阀队伍也对日本蚕食日益不安^②。

7月，毛泽东代表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出了著名的呼吁，要求哥老会和穆斯林加入爱国联盟共同抗日。这两者均是西北主要力量，与国民党和军阀当局时常龃龉。毛热烈称赞哥老会为正义反叛者，陕北游击运动和他在南方游击运动的英勇传统，都是从其中发展起来。这里，毛泽东作为全国的领袖，盛赞汉族的辉煌，号召联合所有爱国者来挽救中国是颇有说服力的：

① 吉麟：《山西军阀阎锡山》，第128～129页，普林斯顿，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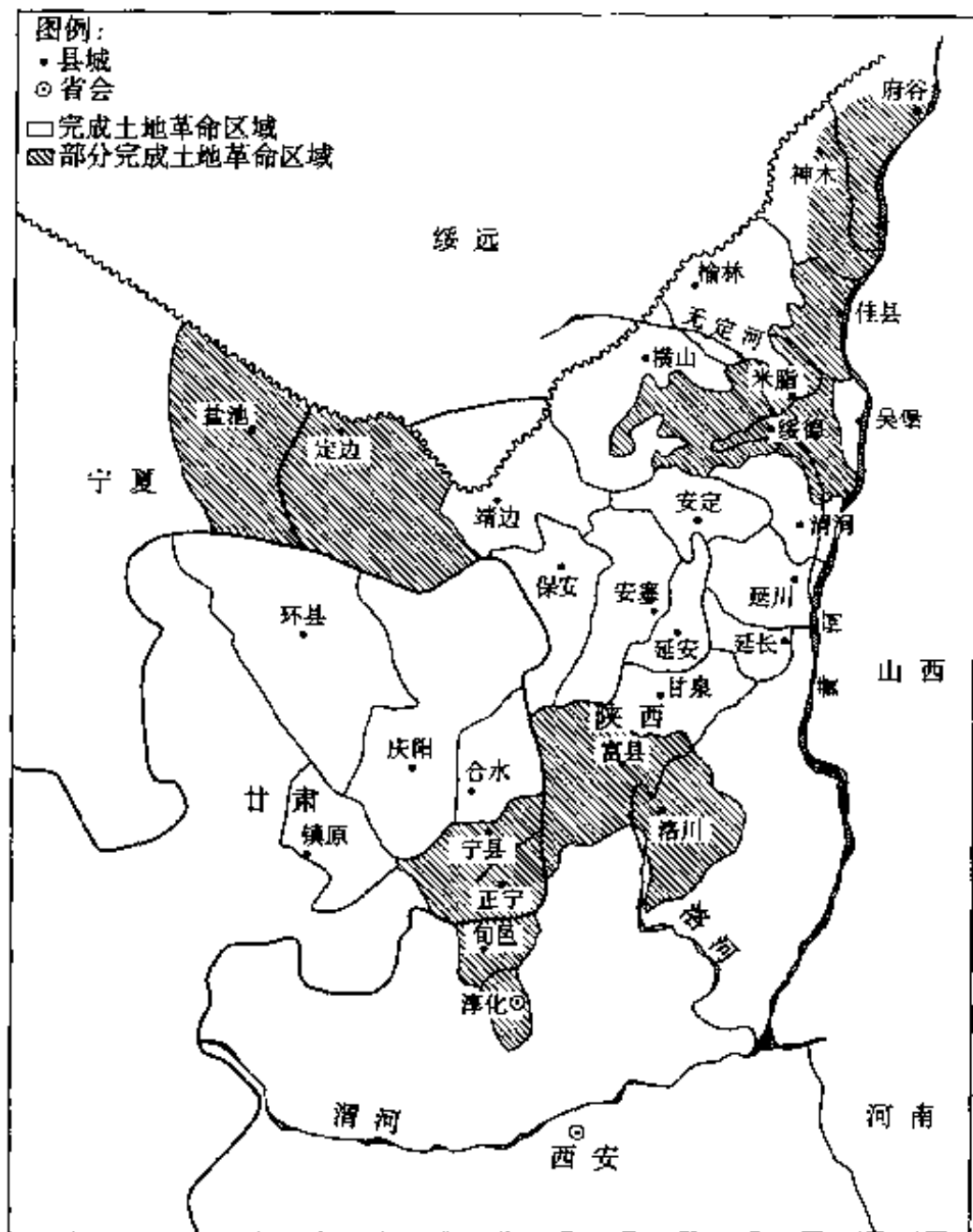
② 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第995～996页；范力沛：《敌与友》，第64页；克拉本：《20世纪的中国》，第204～205页。

从前，哥老会遵循，“反清复汉”，劫富济贫的原则，积极参加了反满辛亥革命运动。陕北革命，哥老会的同志也给了很大的帮助、支持和积极参与。象谢子长和刘志丹同志，不仅是红军领导人，也是哥老会优秀成员，这一革命精神，这些光辉业绩在今天英勇斗争救国救己时，必须更鲜明地肯定！

哥老会一直是我国坚定勇敢组织的代表，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劳动者的代表，一直受到军阀和政客的压迫……。过去，你们支持兴汉灭满；今天我们支持抗日救国。你们支持打富济贫；我们支持打击当地恶霸，分配土地。你们鄙视财富捍卫公正，你们集结了世界上所有英雄豪杰；我们不惜生命挽救中国和世界，我们团结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人民和社会各阶层……。让我们结成亲密无间的兄弟联盟，让我们一起捍卫正义，在我们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这是你们的神圣职责，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①

井冈山斗争时期和其后，毛认识到革命者和秘密会社及其他非法武装组织之间的普通纽带。他不顾上级党的批评不断地寻求这些组织的支持。这些部分反映了他认同侠盗的古传统，部分反映了他感觉到他们的革命潜力。也许最重要的是，毛有一个坚定信念，认为他们都能在革命过程中得到根本改造，变成忠诚的革命者。农民、工人甚至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教育和革命活动，超越他们的阶级背景。1936年他呼吁支持穆斯林

^① 《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毛泽东1936年7月6日以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签署。英译文见斯拉姆（Stuart Schram）的文章，《毛泽东和秘密会社》，载《中国季刊》第27卷，第12期，1966年7—9月。



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革命

和秘密结社成员，已不仅仅是一位宣传大师的手法。他们代表的民族主义和献身精神，也是陕北游击运动领袖同样具备的。这些品质不仅在其后 10 年建立共产党领导全国的抵抗中证明是决定性的，在 1949 年以后建立新中国的长期斗争中也继续

引起共鸣。

所有迹象都表明，到1936年夏，镇压共产党的运动走进一条死胡同。2月东征山西标志着转折点。4月，共产党撤回苏区不久，他们和军阀部队之间的战斗停止，尽管没有正式协议宣布。1936年春，张学良与共产党秘密达成条款，共同抵抗日本的蚕食。张的军队渴望返回日本占领的东北老家。埃德加·斯诺6月至10月在苏区，花了很多时间在前线，报告说没有战斗。相反他注意到红军和主要军阀“敌人”之间的同志般情绪。最后，红军队伍1936年10月由于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到来而加强。张国焘、贺龙和朱德领导的队伍，在1935年8月毛儿盖会议决定陕北为新中央苏区后分开了。在四川——西康边界一带一年之后，他们完成了长征，现在加入了早到的队伍。因此，早在共产党以“西安事变”为契机，迫使国民党达成重估立场，进而与国民党达成满意的协议之前，对共产党的围剿活动已遭挫败。不管国民党和其他人怎么声称，“西安事变”后，全国要求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压力，将共产党挽救于被歼灭的边缘，都是没有根据的^①。

西北苏维埃组织

1936年春天生效的停火使共产党领导有可能有更多精力，注意建立苏区党和政府机构的工作。共产党到达西北不久，把江西的中央各机构和部门全套移植过来，但精简了。此时，陕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370—378页。苏区军事僵局清楚地反映在国民党有关1936年7—9月间的情况报告里，《陕甘宁及川康概况》，第5—10页。参见其后国民党官方对此一时期的解释，见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第995—1002页。

甘宁是中国惟一运转的苏维埃政权。结果，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作为此一苏区最高行政机关，实际是前中央政府全部行政机构的再现。

苏维埃政府的人员反映了江西苏区的继续。1935年下半年在瓦窑堡建立的西北局中，江西苏区高级官员被正式任命了相同职位。不管长征中或到陕北后最高层党领导真正权力有什么变化，苏维埃政府职位配置没有变化，其人员情况如下：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西北办事处
(1935年12月~1937年9月)^①

1. 毛泽东：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2. 项英和张国焘：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
3. 谢觉哉：苏维埃中央政府书记
4. 博古：西北办事处主席（1935.12~1937.夏）、外交部部长
5. 王观澜：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
6. 徐特立：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
7. 毛泽民：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
8. 林伯渠：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1937年夏起任西北办事处主席
9. 蔡树藩：西北办事处内政部部长
10. 刘少奇：西北办事处劳工部部长

这份边区苏维埃政府花名册是基于1934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职位。它包括了长征后在陕甘宁苏区不起什么作用的三个人：项英、张国焘和刘少奇。项英留在南方指挥军队；张

① 威尔士 (Wales)：《红色中国秘闻》(Inside Red China)，第342~343页。

国焘 1936 年才抵达，稍早他拒绝了毛在陕西汇合的计划；刘少奇未参加长征，当时正在白区做组织工作。可以见到的党史资料、官方命令、西北办事处指示和埃德加·斯诺及尼姆·威尔斯（Nym Wales）1936 年和 1937 年的报道中显示，表中其他高层官员各据其位。西北办事处负责边区行政，但共产党最高机关是政治局，掌握制定全国政策方针。它由下列成员组成：

政治局（1935—1937）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朱德、张国焘、洛甫《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政治局在长征中于 1935 年 1 月在遵义选出，机构的组成反映了毛泽东（朱德）长期游击伙伴和留俄归国生（博古、王稼祥、洛甫）之间的平衡^①。周恩来、张国焘与哪一个团体都没有密切关系。类似的平衡在苏维埃政府中也可看到。毛泽民、刘少奇、徐特立、林伯渠和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同事，许多人的关系可以上溯到农民运动时期或更早。博古握有西北局最高职位，王观澜和蔡树藩是留俄归国生。

最近发掘出来关于组成苏维埃政府、党和红军的资料片断说明，毛在长征过程中是在党内激烈的批评、政策争论、权势争夺中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影响的人物的。在遵义，他担任了新产生的政治局主席和党的军事委员会首脑两项职务。这两个职务和他早些时候在江西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使他说的话成为党、军队和政府里最重要的声音。他的权威和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提出，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活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3 页。正式宣称是在遵义“由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委员会新领导建立起来，取代早先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

的产物，而非来自莫斯科的决定^①。但是，如果毛在最近变成党的最重要领袖，那么他的权力就是基于他有能力影响最高层内的共识，而在最高层里，强劲的竞争对手保有职位。重要的是毛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获胜的。由于长征开始前王明启程去莫斯科，博古成为留俄归国生中最重要的领导人。然而博古的继任人是洛甫（张闻天），他是那个团体里另一位有影响的成员。总书记是党的最高官员，但遵义会议以后，总书记的重要性已被政治局主席所代替。所有见到的资料都说明，尽管长征中共产党组合发生变化，留俄归国生仍保有关键的职位和重要权力。所见的记录没有发现，毛和他的支持者在1935年和1936年间，在统一战线政策和苏维埃内部事务上与留俄生有所冲突。相反，有资料表明，两团体此时工作关系平稳，并肩面对“托洛茨基”分子反对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挑战和张国焘的挑战。张国焘曾拒绝选择陕西为新基地。

苏维埃政府西北局是边区最高政治机构，取代原先完全由当地游击队控制的机构。特别在1935年下半年和1936年上半年战斗仍很激烈时，不可能产生一个统一的苏维埃网络听命于建在临时首都保安的政府机关。西北局不得不严重依赖于当地军事单位的劝告、意愿和权利来制定政策，后者在许多地区担负着指示的落实。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从江西照搬来的一些雄心计划不得不放弃。例如，1936年1月，西北局建立数星期内，任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29岁精力充沛的留俄生王观澜发布命令，发起劳动互助社活动，以便在春耕生产中增强生产力。然而这一最初努力组织的互助劳动流产了。在战时条件

^① 范力沛：《敌与我》，第49～74页；约翰·鲁：《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第266～270页；何卜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268～270页，北京，1960。

下，边区孤立的村庄里没有成长起来干部核心，刺激合作的努力很快并且悄悄地放弃了。7年过后，共产党才在边区认真地发起第二次土地革命，其目的是沿着合作路线形成更宏伟地重建农村经济^①。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是经济部负责人。他试图恢复和发展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把关键部门置于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下，如盐田和煤矿。1936年4月他详细指出经济的原始和分裂程度。报告也建议新政府加紧努力刺激经济，尽管战争和土地革命摆在优先地位。这些早期充满活力的措施勾画出一个事实，即江西来的党和军队代表了先进、有经验的干部和行政人员核心，最终证明他们在重建边区经济上做得最出色。另外，如埃德加·斯诺报告的，他们六千英里的长征，一些是世界上最困难的路线，随身带了许多车床、镗床、冲压机、模具，等等。他们带了数十台胜家缝纫机，现在装备他们的服装工厂；他们从四川红矿带来了银和金；他们带来了石印版和轻型油印机^②。他们到来后的几个月内，面对持续战斗和严密封锁，把珍贵的财政资源投在扩建延长的小型钻探石油设施，开办边区第一个纸工厂和一个小纺织厂以及生产初级军火方面。此外，也试图复兴商业和刺激农业。尽管这些努力是不深入的和小规模的，但他们无疑在包围封锁下帮助了求生，并且形成了其后经济发展的支柱^③。

整个1936年，党和政府最高层的政策仍集中在转变到统一战线上来和建立稳固的机构，并行的发展也出现在村庄一

①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土地部训令》，手稿，1936年1月28日（胡佛研究所）。农业合作运动在第六章里讨论。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267--268页。

③ 毛泽东：《陕甘苏维埃区域的经济建设》，《斗争》，第96页，1936年4月24日。经济发展在第六章里讨论。

级。延川三乡再次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当地资料，显示土地革命和投身政治的关系。1936年，随着土地剧变，三乡大规模发展了党员。三乡1939年时134名党员中的大多数，据报道是在此时入的党，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致力分配土地、改善生活水平和废除压迫。已发现有许多农民相信共产党，仅仅是在旧权力结构破坏，“坏分子”被杀掉之后。农民参与土地分配，甚者在肉体上攻击地主：以具体行动（在国民党和地主看来）把自己交托给革命，在一些情况下，暴力把他们从害怕地主压迫的制度中解放出来。报告中有一点是明确的。迟至1939年，即重申统一战线为基本原则之后3年，最初入党的134人中只有1人上前线抗日，那是1937年共产党控制和土地革命取得巩固之后。在陕甘宁，不是统一战线，而是土地革命和其他社会经济计划把农民发动起来的^①。

1935年5月土地分配以前，三乡党的工作和党员身份是秘密的，含有很大的个人危险。此时入党的一些人都具有献身精神，成功地做过分派的工作，有时是危险的任务。以后几年，他们被当作最可靠的党员。但1935年4月以后，土地革命进行，共产党军事上取得控制，党便公开化并广泛吸收党员。1935年4月至1936年底党员迅速增加，入党很容易，和这个地区的人口相比，党员比例很高，很明显，党在巩固革命成果中希望有大量的支持者。此时的重点是迅速吸收大量党员，而不是发展成一个中坚的党，凡参加激进的活动，有愿望的便立即接受，而不是依据杰出的领导能力、阶级和思想意识条件来发展党。

^① 杨英杰等：《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共产党人》第4卷，第50~68页（1940年1月）。迈德尔的采访记录证实了土地革命对产生入党热情的重要性，第48~49、67~68、80页。

到1937年入党变得较严时，仅仅321户人家就有了126位党员，不到3户就有一名党员^①，妇女占1/4（34人）。妇女在某些方面形成最受压迫最落后的社会阶层，甚于年青人和穷人。也许这些数字代表了不寻常的党员高比例，反映出三乡是革命活动中心。8%的党员比例超过了通常的2-3%，并且妇女中党员数在边区许多地方是很少的^②。

到1939年入党的总共134人中有72%是雇工、贫农或革命前的“工人”，将近1/4是中农。到1939年12月，由于土地革命，半数多一点的党员被划为中农，10%是富农。没有雇工。党员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受益者，他们主要来自三乡革命前的下层。1939年他们的人数包括了比例不相称的大量新中农和富农，和少得多的贫农和雇工。如果说党员形成新的政治上层，他们在三乡也是富裕的，尽管他们未支配本地经济，不能与原上层相提并论。

苏区党员大多由以前的贫农和雇工组成，他们中许多人受益于革命，富裕起来，正变成中农。他们有强烈愿望，保持重分土地的成果和共产党统治。恰恰是因为革命的平等观点被广泛接受，一些地方领导分子的相对富裕对新制度构成了威胁。

① 1927~1939年三乡新党员：

1927~1934	3
1935.1~1935.3	11
1935.4-1935.12	47
1936	41
1937	24
1938	7
1939	1
共计	134

② 2~3%的数字是从舒尔曼对1950年代全国计算中推测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组织与意识形态》，第135~136页。

磨擦也许在土地分配时出现或在其后很久郁积。麦德尔叙述村里对革命烈士的态度说明了这一点：

人们谈到董杨臣：他家的窑洞是柳岭最大最好的。窑洞原属于李秀堂的父亲李玉泽。董杨臣得到了它，是因为董杨臣的父亲董志辉是英雄和烈士。每个人都喜欢董志辉，他做了很多好事。他是穷苦人的领导之一，因为他被砍了头，红军返回取得胜利时，村里最大的窑洞便分给了他家……。

董杨臣不那么受人喜爱。他家在分土地后拥有了最好的土地，他家有最大的窑洞，三个大窑洞。^①

在董志辉的村子里，他的革命同志照顾被害领导人的家，慷慨地提供经济利益，使这个家成了村里最富有（最招恨）的家庭之一。

尽管有平分革命成果带来的冲突，包括许多前贫农积极分子在内的“新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巩固革命和建立稳固根据地的财富。然而，如果党进一步推行革命的话，革命带来的利益就成了潜在的障碍。共产党最终要面对的问题是：新领导能在边区孤立的小村庄里负起领导责任并支持变化中的党的政策吗？他们会因新经济地位转向保守或向旧上层人物的挑战投降吗？新领导是青年人和穷人积极分子，过去他们参加了游击队，领导土地革命并受益。而旧上层分子也许证明，一旦秩序恢复，他们更有潜力和持续性。

三乡党员包括了最初被划为富农的2人、地主4人和一位1939年被开除的“流氓”。从前的地主富农少数几个人也许在

^① 迈德尔，第95页。

土地革命中被迫入党，但大多数也许是1937年第二次统一战线生效以后加入的。1939年，一名前地主成为党支部9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共产党人对以前的上层分子极其小心，但党的注意力从土地革命转到巩固经济和社会秩序时，便重视他们的文化和领导技巧，并寻求他们合作参加新的组织活动。

土地革命中和革命之后入党人数的激增还有值得注意的一面。白军如返回，党员有受报复的相当大的危险，但只要红军力量占优势，军事政治的压力以及个人的利益就会使很多人入党。这是苏区党的积极分子从反叛者变成统治者、摧毁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一转变时期不可避免的后果。当危机时，党奋斗求存，力图确保一块广受欢迎的基地，入党就对所有愿意分担危险的人开放。战时环境鼓励贫农青年勇敢的活力和才能及献身精神，但大多数人是由土地革命的激发去参加活动的。当地积极分子的党员身份意味着不断接触革命思想和实践。战斗中的运动会提供给农民积极分子重要的教育和思想训练。

本地农民革命新领导者致力于促使土地关系的大变动。这种大变动反过来又成为一场政治的洗礼。在本村扩展农民运动和为本地游击队服务的过程中，许多人表现了出色的勇敢和领导能力。然而，在创建稳固政治机构和巩固新秩序方面，他们的弱点是突出的。包括文盲率高，完全没有行政训练或经验，不适当地运用革命理论。这些问题是严重的，特别是当共产党依靠连接孤立而偏远的村庄扩大军事政治网，需要下面贯彻上面的政策指示时。

1936年全年，在相对稳固地区建设政府和联结各村的群众组织相互关系的网络方面出现实质进展，可是每一地，这样的网络仍很原始。片断资料说明，在大地区，实质性的无政府状态仍存在，尽管做出了努力来发展行政机构以代替军队的权威。组织和巩固村级行政的斗争，最清楚的画面出现在鲜为人

知的党内期刊《党的工作》上，1936年秋，埃德加·斯诺带回了这样一些油印期刊。

在9月14日的期刊里，芝圃明确写道，江西式的村苏维埃，理论上虽然是当地的政府机构，但甚至在政治上最先进的地方，权力仍集中在革命委员会手中。革命委员会被看做是政府的过渡型，介于驻在一个地区军事单位纯粹的特别统治和苏维埃的组成或选出的当地自治政府之间。后者代表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军事不稳固，反革命武装随时返回的威胁，阻止了苏维埃选举结果的持久性。结果，主要由当地积极分子以及少数非军事人员或干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构成了当地的过渡组织。

在激烈的土地革命过程中，当地的积极分子上升为领导，然后组成革命委员会的核心。芝圃强调了这一临时机构的重要性，和从上面（由军队单独）贯彻土地革命的危险性，或在群众斗争发动之前组织革命委员会的危险性。群众斗争的过程就是当地出现领导的过程。每一次冲击当地地主，人们就割断一层旧权力结构的束缚，减少了对根深蒂固的地主势力的依赖。倾心新制度，倾心共产党的主张有一个关键，即由人们起来夺权，是受压迫农民释放的狂怒而非红军有组织的力量提供了土地革命的动力。军队在提供保障，不使地主势力复活，把土地革命带进村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土地剧烈变动方面，它的作用仅是支持并配合觉悟的当地民众^①。

革命委员会提供村级领导和最低限度的秩序，保护土地革命成果，确保从前的有钱人或反革命分子不恢复权力。这项工作是与当地的军队协调进行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党和群众的

^① 芝圃：《关于新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党的工作》第12卷，第24—40页。

军事及政治组织在村里同时建立起来。最重要最广泛的新群众组织是农民协会。党的组织部门在1936年9月的指示中强调，不仅“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而且中农也应该组织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联合贫农和中农大多数的农民协会与革命委员会紧密地结成一体，成为随时可以发动的机器。农民协会自身内部由“工人组织”的成员组成核心，发挥积极领导作用^①。工人组织也许是共产党的“委婉”之辞。

此时也努力发展其他群众组织，如妇女联合会和一个新的统一战线组织，称做抗日救国联合会。但同一份报告清楚地表明，妇女运动没取得什么成果。此时女权运动的发展被敦促谨慎行事，这是考虑到可能会分散精力。妇女解放问题暂时搁置。优先的问题不是建立救国联合会，而是领导群众运动，以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其目的是协调苏区运动，团结从前的阶级敌人，减少农民对恢复以前状态的恐惧。然而，救国联合会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国民党控制区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在邻近苏区的地方。

由于共产党的目标从土地革命转到统一战线，1936年秋天便发布命令，在乡一级停止使用共产党的名称，代之以抗日救国联合会。武装的赤卫组织在当地组织起来，由工人、农民和其他苏区公民组成（不包括富农和地主），以抗日自卫军的形式出现。确实，从1936年后期开始，阶级斗争的言辞让位于统一战线，发表的材料里提到共产党之处越来越少，尽管党的组织继续发展^②。

① 《中央组织部关于苏区群众组织的几个决定》，《党的工作》第12卷，1936年9月4日。“工人组织”也许是共产党的委婉之辞。

② 《中央组织部关于苏区群众组织的几个决定》，《党的工作》第12卷，1936年9月4日。“工人组织”也许是共产党的委婉之辞。

到 1936 年后期，共产党在大约 12 个县巩固了土地革命，另有 10 个县部分地区处于摇摆状态。在巩固的地区，表现出机构上和行政上正转向新政治制度。党、政府和群众组织网日益扩大，在最巩固和政治最安全的地区，开始取代军阀霸权下数 10 年形成的无政府状态的机构。这些发展于 1936 年最后几周，在西安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吃惊的事件中突然被人注意到。

西安事变和第二次统一战线

从 1935 年下半年起，停止反共军事行动和建立全国联盟抗日的压力就稳步增长，特别是在军队，学生和资产阶级之中。1935 年 12 月，广大学生示威，要求对内和平、抵抗日本蚕食之后，1936 年春全国救亡运动发动起来，成为统一战线活动的焦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镇压，逮捕了 7 名最著名的领导人（“七君子”），使运动在秋天声名大涨。由于统一战线的广泛要求继续增长，事情变得极为明显，已不存在迅速镇压共产运动的可能性。

尽管日本压力增长，蒋介石本人的军事政治营垒内部不满，但 1936 年秋季，他仍坚持要粉碎共产党。当蒋介石准备宣布发动一场新围剿运动时，1936 年 12 月 12 日在西安，他突然被属下将军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许多人把“西安事变”看成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标志着国民党势力的高峰在抗日中跌到低点，并为共产党运动创造了极好机会，以推动全民群众运动。此一观点虽然偏于夸大了 1936 年秋共产党的力量，并且忽视了形成统一战线呼声强烈的事实。但西安事变确是停止内战的关键，而这一内战在第一次统一战线破裂后已激烈地打了近 10 年。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蒋介石被扣西安，拘捕他的人、

国民党的代表和共产党之间展开了谈判，中心是停止内战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这正是不同政见将军们的主要目的，这也是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代表团和国民党代表之间第一次长时间的讨论。国民党代表里包括宋子文和端纳（W. H. Donald）。1936年12月25日协议达成，允许蒋介石返回南京^①。

蒋介石从拘押中再现，他的威信不仅未受损失，头上还闪耀着民族英雄的光环。他很快发现自己成为一个民族运动的首领，抵抗日本的蚕食，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去永远铲除中国共产主义。不管私下做什么保证，蒋未做公开的文字或口头承诺去结束内战和支持统一战线。然而，他被释放之后，立即于1937年1月向和好迈出了一大步，口头同意结束战争并保持陕甘宁边区现有地位。此后双方在言辞和行动上谨慎地向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挪动。半年多曲折的谈判之后，最终在夏末达成了双方可接受的条款。即使在那时，也是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的危机气氛，和军事上威胁到国民党在华北的地位才产生最后协议的。然而，协议最终实际反映在共产党2月10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电报里：

(1) 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2)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① 详细评价“西安事变”和大量参考资料见范力沛的《敌与友》，第85~106页。参见斯诺《红色中国随笔》，第1~14页；查理斯·麦克莱（Charles B. McClane）：《苏俄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第79~90页，纽约，1957；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72~79页，纽约，1957；克拉本前揭书，第202~210页。

- (3)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 (4) 不再继续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段纲领。^①

作为这些让步的回报，共产党推出了他们的条件：停止内战；保障民主权利；召集所有党派军队代表大会，团结救亡；立即准备抗日；改善人民生计。还未等到国民党方面接受这些要求或表明已收到了这些要求，1937年初共产党就单方面实施他们的统一战线建议。虽然土地分配实际上1936年下半年就已停止，1937年3月还是发出正式保证不会恢复。更进一步，共产党鼓动舆论，宣传以国民政府陕甘宁特区取代苏维埃，宣称特区是统一战线模范政府，由所有“爱国分子”全民选举产生，不论阶级^②。

1935年和1936年，偏远西北的一个小规模游击区变成了全国发动革命的中心。随着1937年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发展，特别是其后在整个华北建立根据地网，以抗日民族热情为基础，共产党赢得了所有阶级的支持。

约翰逊认为共产党在农村的成功，应归因于日本进攻造成的苦难和由此产生的农民民族主义。按此一观点，共产党仅仅是填补了国民党和军阀队伍及所支持的地主势力逃跑后的真空。日本侵略产生的意外政治收获使共产党站到联合所有抗日阶级的大规模民族运动的前列^③。

这种解释正确地将共产主义运动与农民的关系视为人民战

① 电报全文收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2~333页和蒋介石，第79~80页，比较由国民党新闻公布的最后协议。

② “特区”一词于1939年初由更广为人知的“边区”一词取代。

③ 参阅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一书。

争的关键。然而，将两者的纽带完全归结为民族主义，则忽视了战时抵抗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二次统一战线是赢得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大部分地主——商人支持，或至少是容忍的关键一环。但是，要确保农民的支持则只有联系到农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共产党使农村革命的实践适应统一战线的战时迫切需要，同时领导民众大胆地、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在多重压迫下解体的问题，正是延安时期的重要标志。在抗战中，一场农民战争转变成民族革命，人民战争的矛头同时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农村社会的痼疾。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在 1937~ 1941 年的陕甘宁边区

随着“西安事变”和内战的停止，边区以崭新的方法发动群众参与、建立当地领导和行政机构，从而形成新民主主义政治。最初是巩固边区的体制，然后逐渐将边区转变成为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中国共产党以江西和其他苏区的行政经验为基础，参照早先的经验教训及战争形势的迫切需要，设计了新的方案，并宣布陕甘宁为模范区，将其经验推向全国，一年之内就在全华北建立起不断增长的根据地体系。但是，我们目前关心的是最初形态的发展，特别是陕甘宁推行的行政和社会经济实验。

陕甘宁不是中国农村的缩影，甚至也不是抗日期间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缩影。它几乎是 20 世纪中国农村的一幅漫画，在许多方面体现着生机勃勃而且居于主导地位的都会文化和陷于长期压迫和无望的偏远农村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最差地区转变和发展的可能性。其他地方通过与西方经济和思想的接触而日新月异，这一地区的偏僻乡村则长期以来死水一潭。晚清和民国农民经久的贫困与绝望，在边区光秃秃的黄土高原上变得更甚。这里受到周期性饥馑的蹂躏，并不停遭到土匪和小军阀的洗劫。

另一方面，陕甘宁的经历在战时根据地里也是别具一格的。它享有相对稳定的局面，敌后根据地则战斗频繁。从 1937 年起，陕甘宁共产党行政领导获得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默认，也未遭到日本的挑战，只经历了一些轰炸和不时的小规模边界冲突。不同于前线游击根据地，陕甘宁未处在优势的敌军压境之下。这里有可能进行各项政治经济计划，不担心被持久的战斗所打乱。

毛泽东将根据地党的战时纲领命名为新民主主义，它是全神贯注于统一战线时形成的。当 1936 年春夏战斗和土地革命在边区渐趋沉静时，苏区政治上的巩固成为党的领导最关心的事。这主要意味着形成稳固机构，以便整治长期军阀统治的分裂和专制。稳定加强了共产党对边区统治的合法性，加强控制战争需要的基本资源，提供有效途径，使新领导可以巩固土地革命成果，并且开始从土地革命到统一战线的转变。

稳定问题是成功的起义者长期要解决的问题。如同早先中国任何政治运动在立稳脚跟后的巩固阶段一样，共产党也寻求建立一个精心设计的行政系统。考虑到边区内的战争和农民革命状况，行政人员和技术专家的能力很受重视，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以革命热情为领导的特点。然而，比较以前的中国反叛运动，中共并未在巩固政权阶段完全放弃平均主义和大众参与等目标。

江西时期土地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特色。中日战争期间，政治动员继续与农村生活具体问题密切相关，包括日本为粉碎根据地抵抗推行“绥靖”政策造成的问题。结果，战时动员经常强调爱国主义和为国牺牲而不是阶级问题，自我奉献精神 and 党公开表示不论阶级，愿与任何抵抗支持者合作，被概括在毛提出的口号里，其后又以许多形式重申，即“有钱出钱，有枪出

枪，有知识出知识”^①。从1937年开始，动员方法和政府及其他组织行政措施在民族战争及陕甘宁脆弱的和平条件下在发展着，其形式适应了从苏区到国民政府特区的转变。

经历10年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此后3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抗日头几年里，共产党武装扩充，人员增加，根据地迅速扩大。

1937年以后陕甘宁的领导和行政方式，也表现在其他根据地里。不同于敌后根据地有激烈的战斗，陕甘宁实际上是整个战争期间免于日本进攻的避难所，因此动员算不上是政治上的中心任务。况且，陕甘宁是共产党的首都，是共产党控制最严密的地区和高层领导所在地。而其他根据地统一战线领导包括许多重要的非党人物，他们拥有实际权力。在游击战争条件下，各抗日根据地与延安只有落后的通讯联系，享有高度自治。尽管有这些巨大差别，一个有特色的领导方式和相同的处理战争与农村生活问题的方法，使所有根据地具有某种统一性。整个战争期间，延安成为通讯中枢以及共产党的模范区，向其他根据地发出一般指示。特别是1942年整风以后，基于陕甘宁经验的延安模式推广开来，日益成为其他地方的榜样。

1937年春苏区开始转成中华民国特区时，共产党在陕北和陕甘边界大约25个县是活跃的，对其他几个县的控制则有争议。土地革命在中心区15个县已经完成，另外10个县部分实施。最近才由红军控制的地区，大多无机会进行土地革命。普遍实行军事统治，特别革命委员会与军事单位共享行政和政

^① 毛泽东：《为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页。参见1930年2月7日毛关于土地的口号：“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约翰·鲁：《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第300～304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

治权力。

西北办事处是一个精心设置的行政机构，从江西苏区照搬过来，监督边区的行政。至 1937 年秋它被边区政府取代时，已发展成为有效的行政网络，渗透到县级或以下。一些学校开办起来，一些政府资助的简陋工厂和合作化活动也开始出现，但发展规模很小并且是尝试性的。

土地革命标志农民被革命思想唤醒，以及新领导出现的阶段，但是革命的关键考验，即永久取代旧上层人物的能力和建立可行的政治经济结构的能力还有待分晓。当地上层分子为起义者的治理理想感化，他们返回村子，在土地分配未进行的地区，又获得了左右当地事务的权力。

如果说毛泽东是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最著名的建筑师，那么留给他湖南同乡林伯渠的是具体工作，指导初期阶段陕甘宁苏区向模范抗日根据地转变。林伯渠最有威望肩此重任。他的革命历史上溯到 1905 年成为同盟会会员，并且长期与国民党共事。由他主持其事标志着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并使他与国民政府进行高效的协调。他在党内是位长者（1937 年他 52 岁），以前在日本和苏联受过良好教育，加上行政经验，更增加了他的处世威望。最后，他作为中央委员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在党内享有崇高地位，并且他还是毛泽东的紧密伙伴，1926 年在国民党农民部他是毛的上司^①。

1937 年 5 月 24 日，在解放周刊社出版的《解放》中，

^① 林伯渠传记，见赫华德·波尔曼（Howard Boorman）编《中华民国传记》（*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纽约，1968，第 2 卷，第 377~379 页。

林提出了指导陕甘宁新特区政府的基本原则^①。为响应5月初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声明，林强调，中国人民面对的主要是中日冲突。其结果，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变成次要的问题，这表现在新口号里：“一切服从战争。”这就需要基本转变，从土地革命围绕阶级斗争的苏维埃原则转到抗日统一战线，造成阶级团结和基于普选的共和政府。这样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为敌视共产党的人也受到日本威胁，准备团结反对共同敌人。新的措词突出体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同1924年联结为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高潮时的宣传一样。民族、民主和民生是共产党战时的宣传中心^②。在许多党内文件里，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阶级斗争。例如，在讨论1937年选举中，一份官方资料称，“阶级斗争继续存在，但武器现在是笔和剑，不是枪；以前阶级斗争限于苏区，现在则是全国”^③。不管怎样，特别是在第二次统一战线合作最好的1937年和1938年，全国的团结和抵抗使共产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共产党强调和谐和自我牺牲精神，试图压过国民党，获得全国支持，体现他们才是真正的共和者和孙中山的继承人。

1937年5月共产党行动起来，开始建立政府的“新民主

① 林伯渠：《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国之途》《解放》第5卷，第11-14页，1937年5月24日。

② 共产党称赞三民主义的其他例子，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267页和第2卷，第83-85页。1993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以三民主义为行政原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第39-41页。

③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选举》（延安），第47页，1937。

制度”^①。为确保群众广泛参与，边区各级政府的普选是新政府努力的主要事情，与此同时，主要负责边区社会经济改革的职能机构也按照国民政府省政府模式得到改造。共产党在将孙中山的大部分理论变成自己的口号，更重要的是在国民党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实行改革计划。共产党先是含蓄地，而后来便是公开地对蒋介石声称继承孙中山为中国杰出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1937 年选举和第二次统一战线

陕甘宁 1937 年春实行的选举和行政机构改革不仅对根据地内部具有重要意义，还含有全国和国际意义。普选迎合了国民党内外共和政府支持者的意愿。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具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人就开始把强国地位和民主政府联系在一起，其后国民党不停地口头承诺民主，而忽视其本质。结

^① 1940 年 1 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小册子发表后，“新民主主义”一词变成整个战时纲领的标志。这是毛泽东论解放，陈述党的统一战线和改革政策的最重要的文章。“新民主主义”一词 1937 年春开始广泛使用。1937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曾设计了“新的民主共和国”作为战时政府的适当形式。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67 页。很快，林伯渠就在他的文章《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国之途》中，勾画了“新民主主义制度”之型，见第 11 页。共产党偶尔将新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等同，见于陕甘宁边区选举法解释部分，见林伯渠《陕甘宁边区选举》，第 26 页。文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指西方民主，所有阶级享有平等政治权力。与此形成对照的一个是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政体。另外，共产党鼓励在“封建”的根据地里发展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以便获得适当的经济基础，为其后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新民主通常比西方民主优越，后者的选举据称是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合法外衣。参见 1940 年 1 月 10 日子鸣《陕甘宁边区怎样实现了民主制度》，《群众》第 4 卷，第 1 期，第 29 页。

果，1937年陕甘宁选举增加了对国民政府的压力。国民党曾允诺在其控制区选举和解除对政治活动的限制^①。共产党通过归还所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给从前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富农，同时也开始利用这些人的行政和领导技巧，向全国显示和解和团结精神。外国人，特别是不久与日作战并提供援助抗日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对边区民主发展印象深刻。如埃德加·斯诺曾颇为惊奇地写道：“甚至从前只看到红军的邪恶而看不到其他事情的传教士，现在也从短暂参观前苏区的印象中转变过来，赞颂延安的‘自由主义者’，一夜之间‘放弃共产主义而倾心民主’”^②。

陕甘宁第二次大动员，是和平的动员，即在激烈的土地革命之后的1937年的选举运动。如果说土地革命大大地破坏了旧制度，那么选举运动就是迈向完整新体制和新社区的一步。共产党在选举中寻求包括前上层的广泛和谐和建立合法权力新渠道，以确保经济和政治革命成果。虽然选举思想在此后10年才发展并完善起来，但其基本特征是在此时出现的。以前江西苏区和其他地方的选举，是受到阶级和其他标准限制的。现在，也许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一个政府由普选产生。这次选举变成其后数百次战时选举的样板。

1937年5月12日的选举法是最早的立法，体现了“新民

① 精辟讨论中国环境下的民主，特别是辛亥革命选举政治的反复无常。见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中央顶不住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议会民主在中国的失败》（*The Center Cannot Hold: The Failure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in China From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to the World War in 1914*），哈佛博士论文，1968。

② 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317页，纽约，1941。倾心社会改革的一些美国传教士原先就认同共产党在华北农村的平均主义纲领。见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一个传教士看中共》，载刘广京编《美国（*Fox Butterfield*），传教士在中国》，第249～301页，哈佛，1966。

主义”精神。像第二次统一战线时期稍后起草的法律一样，它有西方自由民主的味道，不带有阶级斗争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色彩。这一法律建立的民主原则也许适用于全国，而陕甘宁则作为立即贯彻的一个模范区。这样的立法是典型的模范法律，用精确的语言起草而成，国民党的政策制定者自孙中山时代以来从未实行过。

新政府的最高权力正式定为四级直选出来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主要立法机构，选举各处各自的行政官员，范围从乡长直到边区政府主席。四级选举将产生乡、区、县和边区的代表。

“直接无记名平等普选制”赋予每个人投票和当选为官员的权力，这个人至少“年满 16 周岁，不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① 法律规定，所有政治党派和群众组织有权提名候选人并为他们助选。特别条款允许军事单位选举较高层委员会，会期和被选官员任期如下：

	参议会开会	参议会议长和最高执行官员任期
乡	每两个月一次	6 个月
区	每两个月一次	9 个月
县	每 6 个月一次	10 个月
边区	每 12 个月一次	两 年

第一个选举法于 1937 年 5 月生效，在苏维埃转变成新政权之前，由苏维埃政府司法内务部主持的选举对那一转变起着

^① 《陕甘宁边区选举法》，1937 年 5 月 12 日，第 19 页。最初乡政府机构称“代表会”，上都称为议会。不久各级都改称“参议会”，投票年龄提高到 18 岁，与国民政府实行方法相同。

重要的作用^①。如林伯渠后来观察到的，“选举运动在投票和被选举方面是重要一课”^②。不仅选举宣传有助于人们熟悉一种陌生的政治现象，它还重申全国抵抗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选举还增强了政府目标的不同的计划，从动员农民形成当地自卫组织到互助组。简言之，选举中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激发人们对新的社会、经济、军事机构的兴趣和参与。选举运动提供了有效手段来传播信息，保证对官方政策的支持。在土地革命中止时，许多政策出了问题。

有许多最近才由苏维埃控制的地区，特别是土地革命未发生的地方，其选举标志着第一次大规模努力，以打破地主阶层固有的势力。在土地已重新分配的地方，则以号召农民放弃激烈斗争的方法，代之以阶级共处，稳定和非军事统治政策，但也要求农民参与制度化和保卫革命的成果。领导做出实际努力，确保土地斗争中新“积极分子”当选，形成革命干部核心，并防止以前的上层人物重新统治。不管怎样，只要第二次统一战线有效存在，共产党以建设基础广泛的全国抗日运动为工作重心，便鼓励地主和富农参与边区政策。

整个边区统一战线变成现实以前，必须克服当地民众甚至许多党支部的反对。在土地革命最成功的地方，对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害怕甚至敌对也最为强烈，因为以前的上层人物的返回威胁到新经济政治制度，而这里的农民已经接受革命的政策观点。共产党号召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主要是贫农和雇工接受让步，服从抗日民族团结利益，将其作为可使中国其他地方工人农民赢得自由的代价，其中包括选举权。这些相当抽象的主张灌输给了农民，他们本身未经受过日本进攻的苦难，却知道

^① 研究选举运动的基本材料是边区政府出版的《陕甘宁边区选举》。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第1页。

土地革命前地主和军阀的压迫^①。

为平息农民担心土地革命成果得而复失，共产党坚称，不会归还已没收的地主财产，旧上层人物不会再统治农村生活。然而，后来的情况显示出，边区孤立的村子里阻止地主统驾十分困难。1937年的选举运动说明共产党领导面临进退两难，这不仅在延安，也在战时根据地的其他地方，1949年以后也是一样。希望利用特权人物的技能和影响，主要是地主和富农的，和希望限制其力量以阻止其可能夺回公众利益和党的权力的人之间，有一种紧张的关系。

1937年春夏选举委员会发起了群众教育运动，意在激发农民政治热情。最终目的是全民参与一项政治计划，使其渗透到每一区党、政府和群众组织中，以及当地的军事单位里。选举经由农民参加并选出一个负责的政府，克服他们对政治进程的恐惧。这是大多数农民头一次选举，许多传达也许以前从未

^① 1937年8月8日与尼姆·威尔斯(Nym Wales)面谈中，陕甘宁政府临时主席董必武说出了确保农民认可上所遇到的问题：

人们都比较喜欢苏维埃，是因为打交道简单而容易，地主也许比较喜欢新民主，但这里却没什么人喜欢它。解释选举的意义很困难……。我们发现让地主有权投票很困难，人们不理解为什么。农民说，土地也许重新分回给地主。在陕北甘洛县两个地方，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人们不让地主投票。大体上，人们很快顺从苏维埃。他们相信共产党做得对，他们没看到做复杂改变的必要性。一些人看不到自己如何能受益。

参见《我的延安笔记》，第158页。

听说过^①。

共产党长期巩固的保安县的选举是经过精心准备和协调的，保证了公众的利益，在6个多月中，四级议会被选举出来（各级政府均有议会）。选举工作由领导会议开始，人员包括村长和农民协会主席。传达县选举委员会的报告后，便讨论选举的意义和方法，并选出5人委员会指导选举。每一个村庄群众都被召集开会，聆听关于选举和第二次统一战线的计划，接下来在个别人家里聚集讨论。最后，大张旗鼓的第一次选举来到，合格选民召集起来，从当地党机关和农民协会提名的候选人名册里选择中意人选。

村庄就是选举单位，所有候选人选民都熟悉，因此，乡级选举比县和区选举更具意义。在县和边区选举中，公众既不私下认识候选人，在许多情况下也不熟悉姓名或威望。讨论有关候选人、当地问题，对新政府的建议和评价旧政府常常是熟门话题。农民或商人协会等组织提出各自的建议，要求投票批准。在保安县，80%以上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村选举。这一数字高于声称的边区各地至少50%的数字，但低于几个杰出县份据报的90%。

2/3新选的代表参加了第一次选举委员会会议，选举村长并对当地行政机关提出批评和建议。在职的村长常常受到严厉批评，在接下来的选举中，34位连选者有13人落败。大多数

① 主持1937年选举的内政部长蔡树藩告诉尼姆·斯尔斯，西北第一次选举1935年2月举行，苏维埃代表从15万名选民中选出。如果较早的选举真有的话，他们也许和1935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陕北苏维埃大会有关。在那时持续频繁的战斗中，选举无疑仅限于少数相对安全的地方，限于军事单位代表的选举。见威尔斯《我的延安笔记》，第89页。参见李志《边区各乡各区人民政府选举运动的总结》，杨实编《陕北的群众动员》，第25页，1938。

新领导都是共产党人被提名为候选人而产生的^①。

表 4-1 延长、安定、固临和曲子县选举委员会阶级成分（百分比）

阶 级	县选举 委员会	区选举 委员会	乡选举 委员会	阶 级	县选举 委员会	区选举 委员会	乡选举 委员会
工 人	4	4	6	商 人	1	1	2
贫 农	65	67	71	知识分子	2	2	1
中 农	25	22	17	地 主	2	2	1
富 农	1	2	2				

资料来源：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第 17 页。

注：“工人”也许指雇农。

1937 年县级选举仅见的记述是延长县的。该县土地革命过程前章已述。报告反映出选举的隆重场面，让人想起农村的节日。县城的 4 天选举大会达到高潮。头一天开幕仪式，儿童和群众组织做了多彩多姿的表演。第二天和第三天是报告和讨论，以及批评政府和个别官员，最后一天进行选举。据报农民热情很高，许多人带来米、肉、瓜作为礼物^②。

一份报告提供了延长、安定、固临和曲子县议会的阶级分析（见表 4-1）。这几个县都经历了土地革命。分析中的百分比说明共产党努力保证政治进程中贫农和中农的领导。所有各级议会里 90% 以上的席位由贫农、中农和工人掌握。传统上

① 鲁芒：《陕甘宁边区的群众运动》，第 49~51 页，汉口，1938；楚云：《陕行志实》，第 24~25 页，1938；徐永英描述的保安县乡选举基于楚云的记述，见《陕甘宁边区概述》（*A Survey of the Shan - Kan - Ning Border Region*）第 1 卷，第 60~61 页，纽约，1945；于鸣《陕甘宁边区怎样实现民主》，《群众》第 4 卷，第 1 册，第 30 页。1940 年 1 月 10 日。

② 鲁芒：《陕甘宁边区的群众运动》，第 53~54 页。

层的富农、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允许并受到鼓励参政，但努力限制他们的权力。

在选举县长这个颇有权力的职位中，零散的报道证实“工人——农民分子”的成功，说明了苏维埃时期革命领导的延续性。许多县长没有文化和行政经验，但他们在土地革命中的勇敢和致力领导，表现有能力和忠于革命，现在又承担了民选政府里的领导职位^①。

有关选举的文字资料说明了运动的广阔范围和宏大计划。选举是一种手段，发动起分散在山区从未参加政治活动的民众。以前这里简陋的行政归属当地军事力量。实际选举时，选举法的许多条款被忽略或修改了。起草模范立法方面，一向强调的共产党领导和高度灵活性及实际处理政府问题结合起来。例如，尽管制定出秘密投票法，但90%以上的选民不识字，因此选举经常公开由举手决定^②。结果，其他投票方法也即时应用，以解决文盲问题和保证秘密投票，如在候选人背后的坛子放进豆子。

1937年选举运动在大约10个县里广泛进行。然而，精心策划的四级选举过程从未完成过。1937年夏日本人侵开始威胁到整个华北，官方的注意力很快从当地选举转到军事动员。选举运动达到最高层的边区参议会选举便中断了，直到1939年第一次边区参议会才召集^③。投入选举运动的大量组织工作和中途停止都成为这次群众运动的特色，把规定程序和法律精髓撇在一边，集中应付眼下的紧迫问题。

① 国民政府调查局，杨宗周编《调查综述：陕甘宁边区现状》，第43页；《新中华报》1937年10月24日，11月9日。

② 鲁芒：《陕甘宁边区的群众运动》，第52页。

③ 徐永英的描述，见《陕甘宁边区概述》第1卷，第6、63页；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全貌》，第16页。

第一次选举运动开创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治，成为其他根据地的榜样。鼓励农民参与一项政治计划，选出的政府就是一个重要标志。选举还使政府合法化，经历时间的考验，也没有绅士和帝王统治的传统标记。选举提供了党的目标的广泛教育机会，提供了定期评审、批评、更新政府的机会。选出的参议会，特别是乡一级，其成员为人熟知，便让人时时想到地主有钱人的专横势力受到抑制。茶馆曾是地主聚集并处理当地问题的地方，现在成为参议会和公众议事之地。参议会是新制度最突出的标志，其解决农村生活迫切问题的能力在每一个孤立村庄都受到考验。第一次选举开始恢复非军事秩序，一些地方军事和非正式的共产党统治仅仅是暂时存在，以应付战争带来的无政府混乱状态。

很明显的事实是，这次选举与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和现实都相去很远。选举运动强调公众教育与参与，而不是独立党派和政治计划之间的竞争。我们不应假设开明的或甚至有文化的全体选民，实际上，广泛的政治舆论仍缺少，政府系统仍不稳定。选举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开始创造一个有见识的、政治活跃的人民群体。没有操纵政治经济利益，来达到私人目的，也是边区选举的特点。

法律虽然规定所有抗日党派都有权参选，但此时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举行选举的目的。至1941年以后，选举程序大为改进，非党人士更受鼓励出任公职。这并没有消除争论，讨论或批评，也没有保证当选人都是共产党员。的确，党支部还没有在边区很多地方都建立起来。但是，选举讨论有其重点，常常集中在政策落实上，而不是政策指导方式上，更集中在官员的个人表现上和当地问题是否按新政策来办。最后一点，当选的政府绝非有最高权威，它是“新民主主义”政策多面体的一面。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下，

党与职能机构、军队、群众组织分享权力。

共产党在政策事务上拥有至高权力。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自由民主的理论相似，那么实际情况是不同的。这里是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从中国政治过渡的角度看，“新民主主义”代表着意义非凡的一步，即迈向产生一个负责的、不贪污的和基础广泛的政府，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或当时整个第三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①。

战争动员和第二次统一战线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数星期，中日之战已是严酷现实。由于与日本达成可接受的和平希望破灭和民族主义热情高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持久的谈判终于产生了一项协议。

抗日统一战线最早的实际成果显示出与1924~1927年联盟的基本不同，最重要的是共产党有较大的独立性，突出表现在控制自己的军队。8月20日日本进犯上海后，国民政府正式将西北红军命名为第八路军，人数限在4万5千^②。八路军名义上归中央政府控制，实际上采用国民党的盟友方式独立行动。

就在18个月以前，共产党军队东征进入山西，还遇到阎锡山和国民党军队的一致反对。到1937年9月初，日军进犯，不仅阎面对管辖地的丢失，国民党也面临全部沿海要地失陷的可能。在此情况下，陕甘宁共产党军队再次跨过黄河进入山西，骚扰和打击日本人侵者，这次是在阎锡山急切要求之下并

① 选举的进一步发展作为政治过程要素，下面会讨论到。

② 1年后八路军被改称第八集团军。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223~234页；斯拉姆：《毛泽东》，第204页。

有中央政府的批准。此举是统一战线第一个也是最坚实的成果之一，它标志着共产党开始在华北敌后发展，后来又变成摩擦升高的根源^①。

八路军开赴前线，当地军队立即招募人员以保卫边区。每县的分配额说明，目标是村里每一位 18 岁至 40 岁的健康男子都参加军事服务，一些妇女也组成单独团队。整个边区大约 12 万人编入自卫军队，5 万人接受训练以编入精锐部队^②。动员伴随着对青年人的爱国呼吁，加上实际利益，包括免税、帮助耕种、子女入学免费和额外救济困难家庭。

也许最雄心勃勃的帮助计划是代耕。据称 1938 年边区有 46358 个队组织起来，1939 年增加到 63797 个。1942 年延川县 8000 多亩地是代耕的，属于 2742 个军人家庭^③。

与此同时，收集“救国公粮”标志着首次大规模收税。在战争最初几年里，行政机构很简单，收集公粮在群众大会上举行，要求自愿爱国捐献。最初征税是相当温和的，很多农民，大约 60% 完全免除。1937 年收上来不到 3000 吨，值 42 万元，不到边区总产量的 2%。此时仅有的其他税收是盐和出口物品，征了 591000 元。1937 年政府来自内部的全部收入是

① 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第 95 页；吉麟：《军阀阎锡山》，第 257—271 页。

② 延安县本地民兵自卫军据称有 7125 人，另外 2638 人接受特殊训练，还有 6000 人在青年军团。《特区的抵抗动员工作：介绍工作经验》，《解放》第 26 卷，第 21—30 页（1937 年 12 月）；杨实前揭文，第 30 页；楚云前揭文，第 120 页；都立：《陕甘宁边区实志》，第 14 页；鲁芒前揭书，第 29—34 页。

③ 许涤新：《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第 8 页，1941；楚云前揭文，第 86—88 页；徐永英，第 2 卷，第 33 页，根据《新华日报》1942 年 10 月 6 日的一项报告。

1191000元^①。此时确保群众普遍支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极轻的赋税，此种现象由于接受边区以外补充资金而成为可能，包括中央政府的补贴。

战场上的统一战线并行，这由国民党实际上承认陕甘宁根据地特别区的地位体现出来。尽管从未正式予以确认，从苏区转变为特区或边区也许是在9月22日。这一天国民党正式发表的文件未品评共产党7月15日统一战线建议^②。

统一战线对陕甘宁的基本条款于7月在庐山秘密谈判，12月汉口一次会议上证实。边区边界范围包括23个县，其中几个1937年夏共产党还未完全控制^③。特别是在陕西东北相对富裕人口多的绥德周围数县和陕甘交界的陇东部分地区争执尚未解除。1937年两套行政机构在这些争议县份建立。中央政府和共产党指派的人同时充任县长，每一方主持一个单独的行政机构。国民党守望相助和控制的保甲制度与共产党负责的县和乡级政府并立有效。后来，紧张增温，不时的冲突就出现

① 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所载，1937年粮食征集是13859担。《征收条例》，1937年10月，《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474-484页，免除收入人均少于400担的农户的税收。

② 7月15日的建议原文由伯兰特翻译，见《历史文献》，第245-247页。参见何干之，第320-321页。《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在乡的具体实施》，《解放》第104期，第6页，1940年4月20日。按林伯渠的说法，将9月6日说成由苏维埃正式转变为边区政府的日期。自那天起，边区由中央政府行政院管辖。林文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第6页。

③ 由于缺少共产党的记述，下面是根据国民党情报部门的资料。包括在边区的县是：延安、甘泉、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旬邑、洛川、清涧、绥德、米脂、正宁、宁县、鹿阳、合水、环县、盐池、镇原及（神府）的一部分。前揭第134页；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全貌》，第27-30页。

了^①。

使边区完整的一个步骤，是其行政机构紧紧按照中央政府以省的模式建立，包括一名行政长官，主管执行委员会和民事部、财政部、教育部、建设部以及保安部。这种结构和国民党陕西省行政机构一样^②。

一项留面子的条款使双方同意新政府里最高层人士安排。这项关键条款安排国民党官员丁惟汾任政府首脑，林伯渠被任命为他的助手，当丁有“要务”不能履行职务时，林承担最高职务。用此方法，林领导了边区政府，就像他早先领导苏区和临时边区政府一样。指定的 7 人执行委员会是政府最高机关，包括已在过渡政府中的其他重要官员徐特立、高自立、高岗、成仿吾和刘景范。由于红军被授予第八路军的番号，共产党得以自由处理其内部事务。协议的其他条款则产生了更实际的结果。

中央政府同意每月供给 10 万元用于边区教育和重建，另外 50 万用于维持八路军。考虑到共产党此时财源紧张，这些钱是相当多的。边区年度行政费是 15 万元，2/3 靠内部征集，除去此数，国民党政府补贴的大部分可以从行政转到军事目的，特别是扩大和供给八路军^③。在中日战争头几年里，中央政府提供的资金可以使共产党迅速动员，保持低税收以便巩固

① 楚云前揭书，第 134 页。

②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选举》，第 5 页；徐永英前揭书，第 1 卷，第 5 页。

③ 补贴的数量说法不一，我认为每月 10 万元之数较为可靠，见国民政府调查局《全面调整报告》第 5 卷，第 28 页。此数之外，还有财政支持八路军，1937 年每月 50 万元，后来是 60 万元。另一个情报指出，中央政府每月提供八路军 15 万元，包括共产党用于陕甘宁政府和党的机构的资金。国民政府调查局，徐永英前揭书，第 21 页。这后一个较低的数目也许仅代表给陕甘宁的，不包括给其他地方的补贴。

边区并制度化。

连环的权力：边区的党、 政府、军队和群众组织

随着国共战斗停止，陕甘宁政治和行政任务分由四类组织承担。它们是政府、共产党、军队和群众组织。每一组织都建立了独立的贯穿渠道并要求从乡上达边区，再至全国。它们的作用是经由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达到协调，包括联合会议，互助流动和共同领导。1937年后，由于军事的独立角色受到限制，党和政府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并且这些组织在边区政治上发挥作用，权力日增。受过高等训练和教育的专职干部在政府里承担了全部行政责任。诸如教育、税收和经济重建这类的功能都归政府承担。政府的组成一方面是由普选的参议会，再由参议会选出每一级的主要官员，另一方面是精心建立的职能机构或上级指定的民事机关。

党制定总体政策方针并保证政府、群众组织和军队执行，其方法是确保这些组织的关键职位，并非正式利用党的威信与权力。党像群众组织一样，负责动员公众支持政府推行的计划。它还可能为政府和群众组织提供领导，同时避免独裁和权力垄断^①。

边区最高党组织叫陕甘宁党委员会。从1938年开始任党委会书记的高岗，变成了根据地首席负责官员。1942年以前党的西北局创立时，高岗变成了西北局书记，增加了在全国的

^① 李富春：《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解放》第90期，第9-12页，1939年11月20日。

知名度^①。

在党委会指导下，下至乡的每一级行政机构部门的系统建立起来。1940年，地区一级主要部门是秘书处、组织处、宣传处、军事处、统战处、防奸处、青年处和妇女处。大多数部门组建起来是为了动员各类群众支持党的计划；它们的存在与政府特别职能部门如税收和教育处形成明显对比。较低层通常部门较少。例如关中分区县党组织只有三个处，即组织、宣传和统战处，但是党组织也像政府组织一样，分工趋细^②。

党员身份反映了较早时革命运动和边区本身复杂的社会成分。领导继续面对复杂的且常常是恼人的建立统一党的问题，如对上级指示的责任问题，和致力边区社会和经济转变问题，改变大多数农民党员只受到很少教育和训练的情况。许多党员仍旧与哥老会和佛教有关，怀疑政府和外来组织形式的权威^③。1937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生、前官员和支持统一战线的地主给党带来许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包括新党员和大多数当地农民干部的冲突，前者许多人新到边区、受良好教育，后者则在土地革命中就入了党。这些问题妨碍着边区所有组织正常运作，克服这些困难仍是党和政府的主要问题^④。

日常行政、政府责任，特别是官僚主义，不断在运动中被

① 高岗传记，见波尔曼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第2卷，第233~235页。

② 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区政府以上行政组织之各级主管姓名表》；《关于乡村各种组织的规定》，载于国民政府调查局《共匪党务决定》。

③ 白向银：《在转变中的安塞工作》，《团结》第1卷，第9期，第9-11页，1938年9月20日。

④ 《关于审查党的成分的决议》，《解放》第95期，第42-43页。1939年12月30日；李富春：《关于新老干部的问题》，1939年10月20日，载于国防部新闻局编《共匪反动文献汇编》（台北，无日期）第1卷，第238页。

点出来，以配合迫切问题的解决，或激发群众的行动和支持。在这样的时刻，正规官僚渠道中止或重组，党和群众组织享有较大权力。

党是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精英小群体。与此不同，群众组织是迎合全民的机构。1938年初，边区主要群众组织有：工人组织45000人；青年救国会168000人；妇女协会173000人；农民协会421000人^①。从1938年初，20多个群众组织，包括农民、青年和妇女协会合并为“抗敌后援会”，群众组织工作集中在统一战线和群众动员上^②。然而，有关1938年后群众组织工作的材料很少。有人怀疑，这些组织大多呆滞，其作用主要由政府和党取代。在土地革命和1942年开始的又一次减租期间，群众组织在动员大众方面的确很重要。在两次运动高潮中间，其成员及组织大体仅存在于纸面上。

军队由本地、地区和全国三级构成：包括自卫军、保安队和八路军，负责保卫根据地。自卫军或本地民兵是苏维埃时期，赤卫队的继续，主要由农民组成，闲时在村里训练，紧急时可以动员起来保卫地方、维护治安或支持正规军。到1941年，据说有224355人定期参加自卫军工作。保安队最初形成时混合了刘志丹领导下的游击队和其他早先带领搞土地革命的游击队组织。这些地区武装由边区居民组成，最终变成正规军队，构成保卫边区的骨干。边区各地方都注重保安队工作。另外，每一县有一保安编制150~200人。到1941年，8万最初在自卫军或青年卫队受训的人动员归并成正规军。许多人上了华北前线与日作战。最后，八路军在边区各地轮驻，靠近游击

^① 国民政府调查局：《中共现状总报告》，1938。

^② 林伯渠：《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解放》第95期，第42~43页，1938年10月31日，第1卷，第238页。

区，随时进出。例如，贺龙 3000 人的一二〇师，1940 年秋从山西跨过黄河，为了增援陕甘宁的共产党部队，也让士兵们离开战区稍事休息^①。

国民党情报估计 1939 年末 1940 年初，共产党的边区力量如下：正规八路军 18000 人，保安队 15000 人，合共 33000 人。情报认为，自卫军不能打仗，因为缺少武器和训练^②。然而，自卫方面，民兵是正规军的重要补充，使较多的军队派往华北。它还使税收负担比驻扎正规军减轻许多。通过政府每一级的保安部，和借助官员同时任军队和政府职位，保安队和自卫军与政府整合为一。县长指挥县自卫军，区级保安队首脑常常也由党的书记兼任^③。

1937 年后几年里，共产党建立了复杂的军事和政治统一组织网络，负责边区行政。在金字塔顶端站着的是威严的高岗。作为西北党的书记，保安队首脑和边区议会主席，高岗集党政军职位于一身。可惜，有关党和军队实际工作情况的资料缺乏。另一方面，边区政府作为统一战线的样板，当时文字分析却过多。因为这种材料太多，更重要的是建设行政机构在边区发展和转变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将详细一些叙述政府的工作。

1937~1941 年的边区政府

1937~1941 年间，政府主要目标包括不分阶级与所有个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第 33~36 页；国民政府调查局：《党派调查周报》，第 41 页，1941 年 11 月 7~13 日。

② 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中共概况调查》，第 2~3 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第 37~38 页；左建之前撰文，第 9 页；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以上行政组织之各级主管姓名表》。

人公开合作，来增强统一战线民族意识；军事和政治上动员民众，保证边区财源不断，维护治安，准备战争来临；巩固行政系统和发起改革项目，如重建教育和经济等。

1937年下半年选举运动和军事动员是努力的重点，以实现前两个目标。同时，在没有大事渲染的选举过程中，建设细密的职能网，以贯彻党和政府的计划，正在平静却是有条不紊地进行。

让我们来考虑共产党领导面临的问题。现实的矛盾是形成适应其目标的行政和政治结构，与边区有限的人力和资源问题。党坚定地致力统一战线方针，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模范。为此目的，它邀请原上层人士支持抵抗运动，帮助管理地方。此外，共产党还指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和从全国各地涌向延安的学生支持，准备对日作战。南方来的干部大多是有相当行政经验的人，且忠于党。然而，这些行政人员的大多数在战争中被派到游击区，在陕甘宁行政中不起重要作用。

当地游击队最初的领导核心多是受过中学或更高教育的人，有丰富的革命和军事经历，并熟悉当地情况。但是他们不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由于陕西运动发展在1935年以前远离共产党活动中心，因此他们在党内地位不高。然而，游击队的上层领导相当顺利地进入边区党和政府的最高层职位，与一些全国知名的党的领袖同掌权力。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土地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和士兵，他们的勇敢和献身精神经受过风雨考验，但不懂革命理论和日常工作。他们曾大胆有效地行动，摧毁了地主势力，他们能够领导新民主建设之路和巩固政权重建，转变农村生活吗？

最后还有全国各地来的学生，他们被吸引到爱国圣地延安，贡献才干与生命以抗击日本。早在1936年2月，共产党就号召全国爱国青年奔赴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在抵抗斗争中训

练成为干部，后来这所学校以“抗大”闻名^①。这些高中和大学青年一般来自社会上层家庭。数千名长途跋涉到延安的人从未经历过艰难，不知道以前的土地革命，完全不熟悉边区问题，并且党员寥寥无几。但他们的教育和献身精神证明是无价之宝。来领导和行政人员的群体因此由背景极不同的人组成，包括阶级、教育、地域和革命经验。1937年后所有人都加入了政府，尽管摩擦难免。

两类截然不同的干部此时开始在政府内形成，延安边区级的职能体制保持正常渠道下达县里，如同清朝和国民党的地方统治。政府职位由受教育者占据，他们能够处理大量文书和报告。另一方面普选政府和当地官员，包括县和县以下党政干部，主要由当地积极分子组成，他们在土地革命或之后的动员抗战中显露头角。1943年一份政府决议分析了行政成分如下：

90%的区乡干部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他们是紧密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但总的来说他们文化太低，因此独立工作能力有限。况且乡村和家庭观念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进取心。

县级干部多数情况下同样具有工人和农民背景（特别是农民）。40%受过中小学教育；80%拥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由此而成为边区政府干部，但他们理论水平低，文化不高，不可避免思想狭窄，经常不能适应新的复杂情况（即统一战线）。

在边区级，70%的干部自战争以来参加过青年知识分子活动。他们有学习的动力与愿望，但缺少工作和实践经

^① 斯拉姆：《毛泽东》，第207页。

验。^①

职能渠道在边区和县级起作用。在较低层很难有正规行政，它们远离县府，主要由农民革命分子主事并缺少正式的政府传统。

如果边区和乡级分别代表了行政风格和动员风格，那么二者在县级交叉。当政策着重其中的某一种政治形态时，转换就最为明显，矛盾就最尖锐地显露。一个中心政治问题是控制和协调县级这一基本工作级别的行政机关。民选的县长和边区政府都有权指导县机关。战争环境要求当地利益服从全国和边区利益，行政的专业化要求有专长的行政官员制约那些本地选出的革命积极分子干部，也使行政集权制约分权化的动员。权力职权的界线当然处在变动之中，1937年到1941年重点放在团结和稳定时，基本权威和责任授予官僚机构，从延安发出的指示，无暇顾及民选的当地官员和动员政策^②。由此造成的必然后果是当地革命者地位下降，相对上升的是较有经验的行政官员，他们的技巧在正式职能机构中备受重视。

这种趋势与土地革命和1937年以前的军事统治形成尖锐对比，与1942年后重现的动员政策也形成尖锐对比。有一点应明确，边区纯朴条件下行政正规化的程度不应该夸大。

①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延安，1943，第16~17页。这个分析说明了“红与专”的问题。1949年以来党的领导高度关注的这个问题在延安时期就已感觉到。参见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组织与意识形态》，第8页，第163~167、170~172页。

② 林伯渠的文章和讲话最好地代表了努力提出正规行政和健全财政计划的意义。1937年边区政府形成时，他规定了如下原则：（1）集体办公；（2）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3）检查和工作报告；（4）按工作计划预算。林伯渠：《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国之途》，第11~14页。

1937~1941 年，政府发展极为迅速，乃至灵活性被放在首位，甚至职能机构内部也是如此：动员继续在生产、选举、税收等活动中发挥作用；缺乏技巧、通讯原始、无适当的程序和供应不足，都妨碍了正规行政。最后，习惯于直接行动和本地军事自治制约着绝对的行政控制。不管怎么说，1937~1941 年政府的主要发展是越来越强有力，职能机构独立和行政功能更趋集中化。

选举产生的参议会

根据边区法律，边区、县和乡级选出的参议会拥有政府之最高权威。实际上，起草和执行法律，参议会都被都较小而更有效率的政府委员会和职能机构所遮掩。参议会，特别是较高层参议会不常开会。除了形式上支持统一战线和共产党统治以外，参议会还有批准作用，在较低层上批评行政，向选民解释新政策，提出建议。例如边区参议会，1939 年 1 月首次开会，已是边区政府形式组成一年多了。此后到 1941 年 11 月又召开，相隔几乎 3 年，而法律要求是一年两次。1941 年全边区选举后，所有或大多数县参议会都开了会，但大多数较低层参议会在此前 4 年里很少开会^①。

1938 年边区要员高自立抱怨，尽管有进展，参议会没能

^① 1937 年 5 月选举法的最初条款称，边区议会每年开会一次。林伯渠：《陕甘宁边区选举》，第 22 页。1939 年 1 月第一次参议会修改了这一条款，以致理论上边区参议会每年召集二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第 57、119 页。1939 年边区参议会还增加了较低层参议会开会次数。县参议会每 3 个月开会一次，乡参议会每月 1 次，以前的选举法则分别是 1 年 2 次和 6 次。1941 年参议会又回到 1937 年的最初办法，减少了会议次数，尽管参议会开会继续明显的比法律所载少得多。

行使全部权力。问题不是“人民一方文化太低”或“对民主缺乏兴趣”。而是“一些工作人员代替了参议会制民主的行政会议和联席会议”^①。高的简短评论说明，在当时边区的条件下，试图赋予参议会实质权力的确很困难。行政或联席会议，尤其在县级，取代赋予参议会的某些作用，并且不受复杂程序的阻碍。特别是汇集党政军负责人方面，他们帮助协调政府机关各部门与党、军队合作，可以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待县里问题，参议会未能经常举行会议，也是认识到此事花费多，需要相当的组织 and 动员工作，包括给许多人提供交通和食物。况且，以小组高层干部开会，免于公众注视，避开参议会的烦琐程序，代表着原来政治模式的延续，其领导方法已在游击条件下成熟起来。由于这些原因，关键决定大多在联席会议上或部门内做出，而不是在参议会全体会议上做出^②。

边区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膨胀

边区行政设计得和中央政府之一个省一模一样，初始时在边区政府主席领导下由下列部门组成：

1. 办公厅
2. 民政厅

① 高自立：《完成陕甘宁边区地方民主政治的建设》，《解放》第52期，第6页，1938年9月8日。参议会未能做到按照法律要求按时开会和选举，林伯渠也同样表示了失望。《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第25页。参见县政府的例子，责备未能按期召开参议会会议，载于《解放日报》1941年9月7日。

② 1942年职能部门受到尖锐攻击时，这类联席委员会的特权进一步扩大。政府的这些和其他变化将在第六章讨论。

3. 财政厅
4. 教育厅
5. 建设厅（经济发展）
6. 保安司令部（军队）
7. 保安处（警察和情报）
8. 审计处^①

此外，边区政府还管各种辅助机构，其数目最后增加到 35 个。这些主要是有关税务、健康和教育的机构，包括边区银行、医院、医校和盐局。简言之，复杂的职能系统集中在边区和县级，结构和实际管理与国统区极为相似^②。

最高层边区的人事安排，很注意保持政府里当地干部和外来者平衡。整个 1937~1946 年间，政府里两个最有威望的职位由林伯渠（政府主席）和高岗（参议会会议长）充任。林是南方人，江西苏维埃政府时政绩卓著，1937 年后成为边区政府最高官员，任主席职务直到 1945 年以后，是延安时期早期边区最有影响的行政人员。高是陕西游击领袖，刘志丹 1936 年死后，他迅速上升到当地革命者首席代表的地位。虽然 1941 年前林看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作为边区政策中心人物在全国更知名，但在协调党政军工作上，高上升为关键人物。从 1942 年始，他在边区政策上的权力戏剧性地增长到使林和所有其他人黯然失色。仅有另一个高层政府职位一直由南方人周兴掌握。整个抗战期间，他一直是保安处的首脑，控制警察和安全事务。从 30 年代初江西苏维埃时起，周就是安全工作专

^①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第 49~66 页。所列部门的前 6 个形成了中央政府省级机构的基础，参见《解放日报》1941 年 12 月 12 日。

^② 《解放日报》1944 年 2 月 8 日。

家。因此，党和政府最高层以及军队和安全部门，有明显的人事连续性，当地游击领袖和外来者中有明确的责任分工。与此对照的是，边区政府主要部门首脑高度流动，下面所列是1938年至1941年变动情况（*代表陕西当地游击队人物，斜体表示边区党委员会1939~1940年知名成员）：

办公厅	曹力如*	谢觉哉	王子宜*	周文* (?)
民政厅	马明芳	高自立	霍维德*	刘景范*
财政厅	曹力如*	张慕尧*(?)	南汉宸	
教育厅	徐特立	周扬		
建设厅	刘景范*	高自立 ^①		

这些人里，高自立、刘景范，特别是曹力如，先后任一些关键机关的首脑。他们因此广泛熟悉职能机构的工作，而不固定主持单一方面的工作。轮流任职的一个目的是增强最高层部门之间的协调，防止单一部门过分独立。

职能机构中实际作用较大的是办公厅和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和建设厅，每一厅都形成一个部门，纵向延伸于边区、分区和县级政府。低一级机关直接向本部门里的上级负责。行政任命由边区级民政部门分别会同各厅人事官员做出^②。结果是集权且自成体系的职能机构渗透到县级。相当程度上不受党

^① 这一部门首脑名单是根据所有可见到的情报资料和发表的共产党记录而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第74页；国民政府调查局、杨宗周编《调查综述·陕甘宁边区现状》，第25页；《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0日；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实况》，第25页。

^② 《陕甘宁边区干部规则》，1943年4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编续集》，第102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第50页；国民政府调查局，《中共之简政与乡选》，第12~15页，1942。

或民选政府官员诸如县长等人的控制^①。

到1941年12月，职能体系发展到最高峰。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包括了29个县，拥有人口近140万^②。此时估计有7900名全薪水政府官员，其中1000多人是在边区级，4021人在分区、县和镇级，其余是在乡政府。这些数字包括所有部门里行政任命的官员和当选的官员，如县长和乡长，但不包括半职人员，如选入议会或较低层政府委员会的人^③。

官僚行政实行的一个指标是按级别的薪水差别。林伯渠1937年5月指出，政府不能供给干部口粮补助以外的薪水。

-
- ① 集中的职能机构产生的政治问题和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紧张关系，1942年以后受到重视。第五章里将讨论。
- ② 这29个县是1937年9月协议中划给边区的。然而，共产党已将最初23个县中的几个县重订了边界，并且开创了几个新的县，加起来共29个。封锁的国民党军队仍掌握着几个县的部分地区。《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第7~11页。
- ③ 《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徐永英前揭书，第1卷，第69~70页。职能部门人员总数已不可统计，但边区级“1000多人”看来有道理，因为有一些主要部门的资料：办公厅（105），民政厅（91），建设厅（335），财政厅（96）。那时干部最多，责任最大的是建设厅，负责边区经济的转型。

主要政府部门

办公厅	民政厅	财政厅	教育厅	建设厅
1. 总务处	1. 秘书办公室	1. 秘书办公室	1. 秘书办公室	1. 秘书办公室
2. 文件处	2. 行政处	3. 税务处	2. 行政处	2. 农林灌溉处
3. 收发	3. 社会福利处	3. 会计处	3. 学校教育处	3. 协调处
4. 接待处	4. 医务处	4. 财务处	4. 社会教育处	4. 工矿处
		5. 统计处	5. 编辑处	5. 通讯处
		6. 边区银行		6. 公路管理局

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全貌》，第19~20页；杨宗周前揭书，第15~18页；《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6日、20、24、25日。

他还建立了铁的平等原则，将来干部和军人薪水决不超过边区政府普通工作人员^①。

虽然所有薪水都以战时经济和牺牲精神严格限于基本需求，但党的指导原则不是完全一致。至1937年下半年，薪水和补贴基本差别出现，党政军干部有各类分别。干部收入主要部分是食物配给，通常直接供给粮食。所有政府干部不论级别还有政府资助的学生，每日粮食津贴都是7/4磅小米或等同之物。所有士兵不论级别，每人7/4磅粮食，战场上配给两磅。加上衣服和买菜、油的一点现金津贴就是干部的全部收入了，政府承担额外负担，供应衣食给干部和士兵家属^②。

政府工厂干部及工人接受略少的薪水。1937和1938年，除基本需要外，政府付给边区部门首脑最高薪水每月5元，县长2元5角^③。按1937年延安的物价，每月最高的5元补助薪水可购买90磅小米^④。由于大多数薪水付食物而不是钱，因

①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选举》，第17页。

② 1941年9月，政府的一项法令使我们可以比较工人的工资，主要是政府企业里的雇员。每月基本粮食供给量是60磅小米，与战士相同。另外，工人还有1.3磅盐，1.3磅肉，0.75斤油，80斤木头和蔬菜津贴9元。1年供给3套衣服。支付视当地情况而定，付边区现金或实物。技术劳工有特别的增加。非技术工人除去上面提到的津贴外，每月接受15~30元，技术工人挣30~100元。《陕甘宁边区关于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之决定》，《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653页。决议日期是1941年9月。有关1937~1941年干部粮食供给，一些材料大体提供了一致的补充材料。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全貌》，第61页；杨宗周前揭书，第21~22页；许涤新，第18页；陕甘宁边区财政部：《边区财政实行统筹统计办法》，手稿，1941年2~6月（国民政府调查局）。

③ 许涤新：第18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第19页；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全貌》，第61页；杨前揭书，第22页。

④ 罗琼：《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第1页，1946。这些薪水大体与前面提到的政府工厂工人1941年通货膨胀后的工资相当。到1941年后期，1元钱的购买力已下降到不足1/10。

此较少受战时通货膨胀的影响。战时通货膨胀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区的购买力，毁灭了官兵的士气。

否定工作性质或人员地位一切差别的“绝对平均主义”原则未被采用。实行的制度是提供政府人员每人基本口粮，加上干部艰苦工作或危险任务递增补充，和按官阶少量补充薪水。官员的薪水，即使较高层，也一直限定在与工厂工人差不多的水平上，传统上成为官吏主要收入的贪污看来有效地遏制了。

共产党领导地区的简朴和国民党官员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曾记述，“从一位国民党将军处到另一位将军处，我感到羞愧，吃着饭桌上精心摆设的特别精美的食物，而农民正在衙门外田野里寻找菜根和野草充饥。但更甚于羞愧的是，我得知，就是这些将军和国民党官员正在用拖欠的税款从饥饿农民手中大肆购买土地”^①。美国记者详细描述战时国统区农民生活的可怕情形，使人想到中国农民的悲惨和对比之下共产党根据地展现的希望。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r）记录了 1944 年河南饥荒所见：

农民，如我之所见，正在死去。他们正死在路上，死在山里，死在火车站，死在他们的土屋里，死在田野里。当他们死时，政府仍从他们身上榨取可能的最后一分税钱……。一个又一个县政府要求农民缴出粮食实物税，超过他们田里所得，从不宽贷，吃榆树皮和干叶子的农民要拖着最后一袋种子交给税收处。农民虚弱得难以行走，还得去收集军马饲料。饲料比乱七八糟的东西更有营养，他

^①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 83~84 页，纽约，1949。

们塞进自己嘴里。付不出税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卖掉牲口、家具甚至土地，凑钱买粮交税。所有事情中最气人最可怕的是土地投机风。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官吏、军官和仍有粮食的富裕地主从事收购农民的祖传土地，价格极低。土地集中和出售接踵转手而成，导向更严重的饥饿……。我们心情沉重地返回重庆。首都平静无动于衷……。死尸躺着，狗从黄土中挖死尸，此情景在我们的头脑中忽隐忽现。^①

国民党和共产党农村计划的对比突显了前者的失败，他们未能从外国入侵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激情中得到利益。国民党作为中央政府权力的发挥者，的确在抗战初期获得上层人物的民族主义支持。然而，同一个国民党呼吁团结反日，对农民却不发生作用。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应该看成是第三世界的普遍性问题，以实例显示由“军事现代化人员”或其他上层人物团体转变农民社会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受到训练、经验和人们视野的影响。这种失败来自基本结构障碍，即其固有的社会构成和政治权力基础。因为坚定地认可地主霸权，国民党证明不能领导一个广泛的运动抵挡日本的进攻，不能提供抵抗的基地。国民党没有什么东西给农民。

与国民党官员形成极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一个共产党干部的生活接近舒适，甚至是边远地区的舒适，富裕程度差得多；战争的艰苦和贫困共同落在干部和战士以及农民身上。对于给共产党当官的小小特权不断进行批评，实际上突显了运动最迎

^① 怀特等·《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第174~175页，纽约，1946。

合中国大众的特质之一，即延安时代的俭朴和平等精神^①。

分区、县和乡政府

至 1941 年，边区行政上划分为绥德、关中、陇东和三边 4 个分区，每一分区有 2~6 个县，其余 11 个县直属延安。每一分区有核心干部 26~31 人，协调其所属县的行政^②。与边区和县级不同，分区从未变成重要的一级政府，不需要大量工作人员和分工。八路军主力和保安队按分区驻扎，领导干部负责的数个部门也主要在这一级^③。

1941 年县政府包括秘书、民政、财政、教育和公安等部门，以及一个公安队和裁判员（法官）^④。每县有 25~35 名干部，这意味着边区有 900 多名县级官员^⑤。1937~1941 年以行

① 工资不平等受攻击，在 1942 年整风运动中达到高潮。如，王实味讽刺挖苦有关衣服“衣分三色”和粮食补贴“食分五等”。王本人很快被攻击为托洛茨基主义。《解放日报》1942 年 3 月 23 日，引自莫雷·吉尔德曼 (Merle Goldman) 《共产主义中国文学界的异议》(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第 25~27 页，哈佛大学，1967。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编《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延安 1941)，陕甘宁边区参政员无记名人数分区表。

③ 例如习仲勋 1938~1941 年就在关中分区任最高党政军职位。王震和王维舟也都在别的分区同时担任政府首脑和军事指挥。国民政府调查局：《关中姓名表》。

④ 例如习仲勋 1938~1941 年就在关中分区任最高党政军职位。王震和王维舟也都在别的分区同时担任政府首脑和军事指挥。国民政府调查局：《关中姓名表》。

⑤ 《解放日报》1941 年 12 月 13 日。县分三等是基于人口从 1 万~14 万不等，大多数县人口在 2 万~5 万。29 县（市）(延安)组成了 1941 年时的边区，包括 8 个头等县，干部名额 35~37 个，15 个二等县干部名额 29~33 个，7 个三等县干部名额 25~26 个。这里的名额也并非固定不变。1941 年延安有 40 名干部，而名额是 37 个。《解放日报》1942 年 6 月 20 日。

政稳定为政策要务，边区和县职能机构处理主要政务。

最初，区被设想为县以下的正式基本行政级别。但 1937 年选举出的区参政会，不久便被废除，区的功能很快受到限制。区作为一个联络环节，协调县和乡政府，颇似边分区那样，介于边区和县政府之间。每一县分成 4—8 个区，全边区大约有 150 个区。一般区政府干部为数不多，包括区长，都由县长委派^①。

乡是边区最低级正式行政单位，政府权力赋予选出的乡参议会。与传统行政办法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乡长是全职全薪官员。据称 1941 年，1549 个乡选出约 3 万名参议员进入乡参议会^②。

乡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是乡长，由人民参议会成员中选出。实际上，由于党政工作常常难以划分，乡党领导也许承担领导的主要重任^③。乡一级政府几乎全部依靠熟人关系，依靠劝告和协调的技巧。党和政府的关键问题是有效地打破乡和村的孤立，以便较高层制定的政策可以有效地贯彻。致力解决本地问题的基层领导也许首应其任。困难是，许多乡长是不识字的农民积极分子，他们的世界观、经验和个人关系都建立在当地社区之上，其革命眼光所及仅限于较早时期的土地革命。1940 年关于乡政府的一份报告引述了环县的例子：37 位乡长中，

① 1940 年在行政最完善的延安县有 8—11 名区下部，包括那些党、群众组织和政府干部。文化教育研究会编《学习生活》，第 48 页，（延安？），1941。

② 《解放日报》1941 年 6 月 18 日；10 月 14 日。

③ 参见左建之对乡政府工作的描述，特别见 9—10 页。特别设想的乡委员会系统用来辅助乡长的工作，但如林伯渠后来所承认，乡委员会从未起作用。乡委员会是早期雄心勃勃建立的下层分级组织，它在 1943 年正式废除。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第 17 页，（延安？），1944。

21 人不识字，14 人可读一点儿（但估计不能写报告），只有两人比较有文化，因此可以持续保持与较高层的沟通。1941 年 9 月延安县一份报告指出，实际上所有乡长都不识字^①。特别为低层官员设的扫盲计划起了一些作用，但考虑到官员责任的压力和缺少教师，这一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为克服文化困难，召开全县乡长会议讨论和传达政策是有效的，但会议次数受到限制，因为来往县城困难并且花费高，往来县城常常需要几天时间。1937~1941 年，政府主要注意力放在稳固行政时，乡仍然相对与外界影响隔绝。由于专业行政人员和有文化的干部集中在边区和县行政机构，没怎么努力从外部介绍领导到乡里。况且，1942 年前，很少注意转变乡里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一任务以及旧上层优势重新成为主要问题。

也许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最敏感的就是税收问题了，1937~1941 年是由乡政府执行。分析这些年的税收政策，可以看出动员和行政处理方法之间的变化关系，特别是前者让位于正常行政程序的倾向。1937 年第一次全边区努力收集粮食支援战争，村级群众大会上恳请“自愿”捐献。党员积极分子起了关键作用，激发起群众的热情，确保当地指标完成。由于目标仅是一万担粮食，第一次征税全免了大多数农民家庭，只将极轻微的负担落在每人小米年产超过 400 磅的家庭上，征 1~5%^②。

这些最初的定额很像边区的立法，常常是表面性大于实质

^① 左建之前揭文，第 13 页；《解放日报》1941 年 9 月 11 日；9 月 12 日；1942 年 6 月 20 日。

^② 左建之前揭文，第 14 页；《救国公粮征集法》，1937 年 10 月，《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 2 卷，第 22 页。

性或仅作为大体指针。税务征收常常不怎么参照法律要求，而更多地基于干部的责任，层层转下，填满定额。一旦边区政府确定定额，就分到县里，再进一步分到村里。党的刊物批评的一些滥用职权的方法。有些村里，税额平分到所有家庭，违反了“多者多献”原则。更多的村子，实行与清朝和军阀时期截然相反的方法，全部税收由少数相对富裕家庭承担。一份内部报告指出，1939年盐池县全部税收仅仅来自16%的家庭，在甘泉仅12.8%的家庭缴税。况且由于未能实行统一的标准，一个有200磅粮食的家庭在这个县纳7.5%的税，在其他地方就是20%^①。

在税收一类事务上，当地党政干部表示坚决维护贫农的福利，尽管土地革命早已过去。革命钟摆晃到这边，意味着旧时被税官榨干的穷人现在大多免了税。但朴素的革命公正有时会造成意外的严重损失，党内报告观察到，有些地方过重的负担落在富农身上，造成故意破坏生产，影响了总产量^②。

1937~1941年，粮食税收是主要的方法之一，行政借此渗透到基层。此事和其他责任上，政府一直正式负责行政的方方面面。然而，基层效率不依靠公事公办，而是靠熟人关系和动员农民，党员积极分子以此完成任务再合适不过，由于党试验行政和动员方式的各种组合来解决财政问题，在选举政策方

① 谢觉哉：《征收救国公粮的研究与商榷》，《团结》第1卷，第26期，第7-10页（1940年8月1日），载于陕甘宁边区政治局编《开展边区经济》，第22页。讨论税收系统的滥片，包括缺少规定程序，压榨以前的地主和阶级敌人，等等，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第102-103页，《税收问题的决议》1941年12月通过。

② 依平：《今年征收救国公粮运动的初步总结》，《团结》第1卷，第11期，第9-16页。（1938年12月25日）；参见徐永英前揭书，第2卷，第23页，根据《新华日报》1935年10月30日的一篇社论。

面新方法也发展起来。

“三三制”和统一战线政策

战争初期统一战线的真诚合作，在 1938 年变成与日俱增的国共剧烈冲突。到 1940 年，正当所有合作的可能性看来要被日增的军事冲突永久破坏之际，共产党宣布了大胆的政治计划，标志着他们坚持统一战线^①。共产党正式限制自己在根据地政府和参议会里最多占 1/3 的职位。所有根据地无一例外实行“三三制”和大张旗鼓宣传，共产党实现了三项主要目标：^②他们向全国表明，坚定不移忠于所有阶级和党派抗击共同敌人日本的合作原则。^③他们减少了资产阶级的恐惧，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支持的政府里出色服务。^④在争执地区，他们把内部矛盾降到最低限度，由此增强抗击日本和国民党敌军的斗争^⑤。

“三三制”合作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 1939 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

① 范力沛：《敌与友》，第 92~96 页。

② 讨论“三三制”，英文里最好的是范力沛《敌与友》，第 142~153 页。参见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第 13~14 页；徐水英揭书，第 1 卷，第 74~78 页。最全面分析陕甘宁三三制的是林伯渠的《陕甘宁“三三制”》。参见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和实践》，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第 198~205 页；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89~192 页；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93~203 页。“三三制”一词使人联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蒋介石 1926 年决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任何重要部门的人数在 1/3，当时第一次统一战线正在分裂。这迫使一些著名共产党人辞职，包括国民党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和宣传部部长毛泽东。斯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89 页。

明确。他写道：“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①

然而直到毛起草的中央委员会 1940 年 3 月 6 日内部指示中，“三三制”原则才明确制定，宣传为共产党战时政策的支柱之一。指示称：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党公开宣布并多次强调愿意与所有爱国人士合作。另一方面，党内讨论常常集中在确保和加强共产党在联合政府内的领

^① 斯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62 页。参见六大修订版本。《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7 页。

导。同一个指示坚持“必须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①。

陕甘宁的“三三制”必须从经济和政治发展背景上去理解。其最早的实验于 1940 年出现在绥德和陇东，这两地刚转到共产党手中，取得地主上层的支持变得很重要^②。与边区已巩固地区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地方有很强的地主和商人阶层势力，共产党组织则软弱。当党开始建立稳固行政时，就运用了“三三制”，减少当地上层的疑虑，把许多准备合作的人溶进行政机构里。1940 年，因为共产党还不能在新区搞正规选举，便指定了一个临时参议会，包括按“三三制”标准容纳的当地上层有名人物，以便使新政府带有合法味道。

其他方法也实行，以获得当地有力上层的支持。最困难的任务是保证他们的财产不被没收。1941 年 5~6 月间，《解放日报》刊登了许多绥德当地名人的报告。这些人被汽车送到延安去考察边区政府的成就^③。

1941 年“三三制”扩大并在第一次全边区选举中朝其他目标发展。1941 年选举由边区政府主持，花了更大精力，也

①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90 页。这项指示仅见于《毛泽东选集》，也许已经作了重要修改。

② 林伯渠：《陕甘宁三三制》，第 1~3 页。“三三制”1940 年也在晋察冀根据地实行。徐永英前揭书，第 1 卷，第 74 页。

③ 《解放日报》1941 年 5 月 25 日；6 月 2 日，6 日，21 日。他们持续参观整一个月，给予特殊规格的接待，这是政治讨价还价必需的。盛宴款待他们的边区最高层党政官员包括毛泽东、朱德、林伯渠、高岗和王明。

更复杂，我们可以更有兴趣地观察到新民主的演进和选举政策的角色。最鲜明的特色包括最高层行政组织都有学生和妇女参加，和每一村都动员了农民。一次边区选举，108位工作人员工作了9个月，派小队逐县指导选举并训练较低层选举干部^①。

如果说“三三制”主要是为了拉笼旧上层，那么选举运动高潮的群众教育则是用来动员全民广泛参与。在一个县的乡选举中，115个宣传队和881个工农小组把党的声音直接带给人民。年青人到处积极活动，把选举运动推向农村。也许最有效的工作是秧歌表演队干的，他们由歌唱和表演人员组成，来自青少年组织和小学。以动人的歌声和舞蹈，秧歌队激发起人们的兴趣，对确保80%以上的选民参选起了重要作用^②。

1941年选举运动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与女权运动并进。1941年6月20日，《解放日报》头版社论敦促妇女在选举运动中起积极作用，争当候选人和投票人。社论引述了妇女在政府中和作为当选官员的例子。郭清华最近被任命为第一位女县长，以实例表明妇女可以企望的高度。1941年妇女当选占了乡参议会8%的席位，在两个县里其席位还超过了20%^③。

妇女权力的敏感问题以后数年不时变成一个主要的争论

① 在边区一级，专职核心人员由27个县的民政厅厅长组成，由来自中国女子学院、行政学校和陕北公学的81名学生辅助。准备工作依赖当地情况大不相同。在清涧有217名干部，包括党、军、群众组织领导人，接受1个月的选举运动训练。陇东六县较不安静，这样的密集训练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有1512人的216个委员会形成了，指导乡选举。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编《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第7~19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编《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第24~25页。

③ 《解放日报》1941年6月21日。应该指出，郭清华被边区政府指派取代安塞县长职位，原县长安排到别处。在陕甘宁，她和其他妇女都不是由选民选为县长的。《陕甘宁乡选总结》，最后未标页数的边区乡参议会统计表。

点。解放了的妇女知识分子在延安常常恼怒，不满于男女平等的进展太慢。也许最尖锐的批评者是共产党作家丁玲，其文章《三八节有感》反映出她个人的失望：“如果女人不结婚就要被嘲笑；如果结婚有了孩子，她们就没有政治地位，而是呆在家里；如果她们在家里呆了几年，就被认为是落后。在旧社会，人们可怜她们，在新社会人们指责她们不上进。”^① 像大多数女权主义者一样，丁玲从一位有知识的中上层开明人士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虽然她们真的失望，但正是这群人为妇女的独立和解放取得了最大的进步。在边区远乡村里，只要社会和经济地位实际上没变化，妇女解放就是一个远为困难的难题。虽然 1941 年选举标志着妇女政治解放一大迈进，但是直到党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革命时，妇女权力才能在村庄里取得实质进展^②。

努力达到“三三制”目标增加了选举运动的复杂性。就像早先转向统一战线政策遇到土地革命受益者和游击队的反对和不信任一样，1941 年可听到类似的反对声音。这些反对不是没有基础的。推翻地主统治和奠定坚实基础的斗争使致力维护土地革命所得的新一代领导一直需要警惕。现在统一战线政策由“三三制”支撑，便重新出现对第 5 纵队的担忧，担心有人利用开放气氛破坏前期成果。“三三制”难道不是标志退却，便利原先地主制度恢复吗？对惟恐失去新获特权的农民积极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

致力于第二次统一战线导致了认识到潜在的目标冲突。一

① 丁玲文章的总结，见古尔德曼书，第 23 页。

② 妇女解放在战斗地区进展更大，在那些地方，妇女迅速承担了重要的军政和经济责任，多于像陕甘宁这样的后方地区。妇女解放的难题在迈德爾在柳林的采访者身上生动地表现出来，那里 20 年后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仍不能遮掩持续的问题，第 203-239 页。

方面共产党寻求旧上层的政治参与，寻求温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成果；另一方面他们同时试图加强党对整个边区的控制，建立坚强的基础，这就需要照顾到其忠实的盟友贫农和其他土地革命受益者。通过鼓励“进步人士和走中间道路者”更多地参与政治进程，特别是进入议会，共产党推出“三三制”使统一战线正式化和扩大化。在绥德和陇东，“三三制”促使动荡地区稳定下来，但在政治上已经巩固的地方，“三三制”产生了与“左派”的摩擦，主要是农民革命者不愿与以前的阶级敌人合作。每一处，特别是选出的议会，还有政府，各个阶级的非共产党人士的参与都增加了。

非共产党人士在每一级参议会，都有显著收获，从前这些地方共产党的地位都是无法挑战的^①。况且在共产党组织仍很简陋的其他许多地方，党甚至不能保证1/3的席位，实际上在新区，共产党对“三三制”的兴趣最强烈，其目标也几乎全部实现。因此谢觉哉观察到，总括起来：新的区域，三三制做得好一些，甚至不仅共产党员只够1/3，有的国民党员当选人数比共产党员还多。……人员要多选举你几个是没有法子的。老区党员数量多，过去做政府工作的又多是党员^②。

在边区一级，共产党保持多数席位，216席位中占123席。国民党员占14席，62人为无党派，10人代表少数民族^③。

① 评价“三三制”是复杂的，官方对“三三制”的解释无连贯性，并且选举结果不完全。分析“三三制”时，毛泽东和刘伯承坚持分为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中间道路者”。然而他们的命令却相反，所见到的选举结果一律都表现为取得共产党、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平衡，这样的划分当然较易弄清。林还未指姓名地严责了一位干部，这位干部把政治大饼平均划分为共产党、国民党和哥老会。林伯渠：《陕甘宁三三制》，第4、9页。

② 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转引自范力沛《敌与友》，第149页。

③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4日。

1941 年选举可见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资料提供了边区 29 个县中 14 个县里，乡议会一万多位代表阶级和党派的情况。在最基层的乡参议会，10926 位代表中共产党占 2801 席，刚刚超过 25%。各县情况大不相同，8 个县里，共产党席位不到 1/3，6 个县里超过 1/3。没有所占席位超过 55% 和少于 15% 的例子。参议会成员阶级资料表明，贫农中农占压倒优势，占 60%，中农占 20%^①。此种情景出现是努力扩大支持基础成功的结果，其方法是增加非共产党的参与，包括地主、商人、富农进入参议会。如果说各县差别很大，有时违背了“三三制”配额，那么共产党就可以声称，它表明愿与其他人合作的努力大体成功了。然而，联合政策下的选举实验自然生出的利益，仅仅接受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为了强调一贯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整体优于派别利益，1942 年 4 月，100 多位刚选进参议会，常务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的共产党人辞职，让给党外士。有些例子显示出，政府直接指定“有能力者”进入参议会而取得了满意的平衡。1942 年下半年，共产党代表超过 1/3 的 8 个县里，特别举行县和乡级重新选举^②。

“三三制”不仅用于选举参议会成员，也用于选举参议会领导。在边区一级，更小心注意遵守“三三制”原则，1941 年初，地主和商人利益的代表承担了边区政府要职。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是绥德地区有名的绅

① 工人代表 (394 人) 超过地主 (134 人) 和商人 (177 人)，但少于富农数 (686 人)。林伯渠：《陕甘宁三三制》，第 6 页。完整的材料依县有别，见范力沛《敌与友》，第 148 页。这些结果由一项独立报道证实。这项报道涉及 8 个县的乡选，包括新区的 6 个县。共产党的力量是 20%，国民党则是 5%，无党派成员是 75%。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编《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第 65 页。

② 《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9 日；4 月 12 日。

士。李鼎铭以及后来担任边区教育部副主任的贺连城被国民党米脂县支部提名为边区参议会候选人。然而他们也包括在共产党的米脂候选人名单里。共产党米脂候选名单有10人，只有4人是共产党人。此时政府里另一位惹人注目的地主是马国臣，他是米脂马氏家族的首领人物，也是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在边区参议会里代表米脂县。1941年他是10位边区参议会议长和副议长竞选人之一，但失败了^①。

共产党非常注意在边区常务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中溶合非共产党知名人士，准确依照“三三制”的比例。在绥德这样绅士集中的商业重镇，新参议会的组成反映了得到当地上层的支持以保证经济政治稳定的愿望。绥德市参议会仅有12名共产党人，却有15名国民党人和62名非党派人士。参议员当中32人是商人，5人属地主绅士阶层，只有15人被描述为工农分子^②。同时共产党对政府中的党员加强纪律和领导，确保在政府中最大限度地负责，每一级都贯彻党的政策。

陕甘宁“三三制”的范围，常常比统一战线华丽辞藻所言受到更多的限制。虽然官方文件反复申明“三三制”不仅适用于参议会，也适用于所有各级政府。实际上非共产党人很少握有县长这样的实权职位，特别是在共产党权力已经巩固的地方^③。偶见的材料说明，“三三制”运用于所有职能部门。例如1942年3月，据称“三三制”在延安县政府里所有部门实施。然而此种实施从未系统推行过^④。不管怎样，职能部门从

① 《解放日报》1941年8月24日；11月8日。

② 《解放日报》1941年7月12日。

③ 林伯渠：《陕甘宁三三制》，第7页。林伯渠在一次党内讨论会上指出，共产党应保有大多数乡长职务，剩下的由一些无党派进步人士和少数愿意服从党领导的中间道路者掌握。

④ 《解放日报》1942年3月31日。

未排他性地限于共产党人，尽管他们掌握着领导职位。

陕甘宁“三三制”既不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消退，也不代表背离过去。它代表最重要的一步是扩大各界的支持和利用他们的行政和领导技巧。与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照，共产党通过“三三制”表明他们有能力与无党派人士分享权力和共同有效地工作。陕甘宁和其他根据地“三三制”有助于统一和加强行政，并使共产党声称代表全国有法律依据。

“三三制”和其他形式合作的重要意义，在敌后根据地比在陕甘宁大得多。在敌后根据地，决定权常常由所有群体共同作出，共产党和其他人士联合起来抗日，创造抵抗的新局面。面对优势敌人兵力的不停攻击，政治及军事合作是游击战的一个基本特征。陕甘宁“三三制”则明显不同，它被引进已经有效运作的行政网络里，在这个行政网络里，没有人直接向共产党挑战。在陕甘宁，“三三制”的影响在绥德和陇东最大，这是新区，共产党组织最弱小。通过向所有阶层呼吁，包括最有钱的人，“三三制”帮助建立了稳定的政府^①。“三三制”代表共产党试图团结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其背景是为已有的统一战线和谐而委曲求全。

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

第二次统一战线最早的迹象之一是陕甘宁被规划为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别区。然而 1937 年后边区仍受抢匪的蹂躏，有些

^① 陕甘宁和敌后根据地的比较，见麦科尔·林塞（Michael Lindsay）《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变化》，载爱德华·塞普尼科（Edward Szczepanik）编《远东社会经济问题论集》（*Symposiu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第 221~223 页，香港，1962。“三三制”在其他根据地的实行，范力沛在《敌与友》一书中有所论列，见第 150~151 页。

带有政治动机，许多是本地长久以来的产物。1938年夏秋的报告描述了剿匪战役，这些土匪三五成群到200人一伙。一些土匪看来与秘密会社有关，另一些则是反叛的共产党武装。还有一些土匪获有“友军”（即国民党）的帮助。“友军”是第二次统一战线初期的礼貌用语。1937年下半年，主要土匪武装被平息。1938年春日本进攻矛头第一次指向边区。1938年11月，日本人最后一次直接进攻边区，空袭延安两天。此后，日本人狡猾地撤走，让国共在这块缺乏战略和经济价值的遥远地区互相争斗^①。

对抗升级的基本原因是1937年后半期共产党支持的政府在敌后急剧成长，同时国民党遭到大规模军事挫败。1938年秋汉口陷落后，国民党被驱离沿海地区，从长久以来的势力大本营撤到边远的四川。国民党军队全面撤退时，共产党军队则在全华北开展游击抵抗运动。到1939年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担心达到最高点。共产党利用外来入侵，大大地扩展了地盘，尽管日本军事力量在华北也迅速增长。

根据共产党估计，日本兵力从1937年后半期的30万增加到1939年的44万。1940年又增添了14万傀儡军队，由日本武装，为日本打仗^②。日本正面攻击目标也从国民党和军阀军队转向华北战线后方的共产党军队。然而，共产党骚扰日本和管理大片游击区的能力已超乎想像。1937和1938年，四大根据地建立起来，它们是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和山东半岛。1939年8月日本情报估计，共产

① 杨丰：《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告民众书》、《边区一年来的剿匪工作》，《团结》第1卷第9期，第5-11页（1938年9月20日）；《解放》第34期，第26页，1938年4月5日。

②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60、61页，北京，1953。

党控制的县有 130 个。次年共产党正规部队约 40 万，华北敌后根据地里有 5000 万人民。另外，共产党力量在华中增加，很快那里就发生了与国民党最严重的战时冲突。1940 年共产党发出命令，扩大新四军至 10 万人。新四军是华中主要共产党武装^①。

国共营垒间的摩擦于 1938 年后迅速增长，导致“盟军”间的战斗，同时双方又公开呼吁团结。此时国民党领导人考虑与日单独构和，形成反共联盟的可能性。1941 年皖南事变以前很长时间，很多地方都有敌对冲突，皖南事变是最重的军事冲突，意图在完全结束统一战线。

在陕甘宁，摩擦集中在国共兵力争夺的地方。边区政府 1937 年 9 月产生时，正式包括在边区里的有 23 个县，共产党获得完全军事和行政控制的约 15 个。大部分地区在延安周围，是最贫穷和人口最少的地区。另一方面绥德和陇东边分区，分别形成边区的东北翼和西南翼，在国共军队和行政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处在“非对抗”或非军事竞争状态下^②。当摩擦增加时，这些地方特别是边区最富裕、人口最多的绥德，变成武力冲突的焦点。

1938 年上半年，一些小冲突平和化解了，双方看来愿意保持和睦。但到 1939 年初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冲突。长征以来

① 约翰逊提供了共产党在这些年里迅速成长的详细记录。《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第 92~122，193~194 页。日本情报估计，1940 年共产党在华北力量是 14 万正规军和 16 万游击队。法国情报估计 1940 年正规共产党军队是 50 万，包括华中的 10 万。约翰逊前揭书，第 74、215 页。一份共产党情况估计，1940 年共产党力量是 40 万，根据地人口是一亿。何十之前揭书，第 345、375 页。

② 1939 年下半年国民党情报报告，共产党仅控制全部陇东和绥德中的几个区。国民政府调查局：《陕北各县地方特殊情形调查表》，1939。

头一次的共产党第6次中央全体会议，于1938年10月至11月在延安举行。现今官方对此次会议的解释是：“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又有斗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对于中国情况是不合适的，这样就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的错误。”^①对国民党要求迁就的错误后来都归咎于毛泽东的主要对手王明。六中全会上王明开始失势。虽然王明直到1941年仍然是统一战线的首要象征和发言人，但他的党内影响自六中全会后大大缩小。1940年以他的名字发表的连珠炮般的文章突然中止。从这次会议后，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官方态度变硬，特别是由于共产党在华北地位的加强和与国民党军事对抗的升级^②。

1939年1月国民党第5次中央全会上，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标志着开始了共产党所称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按照这些“办法”采取步骤，严格限制国民党区内所有政治活动，与共产党的屡屡军事冲突于1939年12月以封锁陕甘宁边区达到高峰^③。双方在争议地区寻求发动和组织民众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先是1939年5月在陇东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的官方介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44页。

② 六中全会上王、毛冲突最全面的阐述见胡华编《中国革命史讲义》，第378~389页，北京，1962。参见麦克莱《苏俄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第118~123页；范力沛《敌与友》，第106~10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44页。参见范力沛《敌与友》，第95~97页；胡华前揭书，第394~395页。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冲突，胡华书里做了概要叙述。1941年一份国民党综合情报报告，出人意外坦率并全面地讨论了封锁边区，见国民政府调查局《对陇东之阴谋及我方对策之概述》，第149~151页，1941。

地区，后于 1940 年春在绥德^①。

显然仅仅在文件上，国民党采取了与共产党动员计划极为相似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群众政治军事组织扩展至乡村，在农民中强调教育和灌输新思想，军事和政治活动互相结合。保甲制度的实行标志着国民党最优先考虑的程序和控制，在绥德为了赢得农民，宣布租子最高为收获的 1/3，但没有迹象表明曾实行过。另外，在从共产党手中恢复的地区，他们迅速将重分的土地和财产奉还原主。到 1940 年共产党牢牢控制了绥德和陇东，但国民党持续的封锁使边区经济艰难^②。

1937 到 1941 年，共产党在边区承担了创建机构的问题与责任，以管理全民，而不是一个阶级。在陕甘宁和敌后根据地，它推行“新民主主义”。这是统一战线概念，结合行政与有限动员技能，创造稳定负责的组织并发起改革。1941 年共产党已经可以骄傲地指出自己的成绩，在增长的华北根据地提供了领导，这些地方有群众基础的政府是从战争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中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改革开始成形。可是新民主赖以建立的许多基础已经开始遭到侵蚀。特别是与国民党的工作联盟被敌视，军事冲突和封锁取代。更甚者，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行政上的基本问题日益变得令人恼火。在陕甘宁这些问题是多组矛盾的结果：如有效渗透到县级的职能机构和边远村

① 这些冲突之频繁也由国民党方面印证。来自国民党的情报称，单在陇东就有 15378 起伤亡事件，其中 4639 起是致命的。据说近半数伤亡者是行政官员。国民政府调查局：《陇东之阴谋》，第 80~81 页；国民政府调查局：《调查全报》第 21 卷，第 138~148 页（1940 年 1 月）；国民政府调查局：《党派调查周报》（1940 年 3 月，1940 年 4 月），第 4~6，10 页。

② 国民党的计划和全力与共产党争夺的最全面叙述见国民政府调查局《对陇东之阴谋》，特别见 2~45 页。《解放日报》1942 年 5 月 15 日讨论了国民党绥德农村政策。

庄（包括重分土地的村子）普遍的“封建”相矛盾；稳定目标和致力推行社会革命任务的矛盾；发起统一战线的干部和当地干部的矛盾，前者许多是外来者，教育程度较高、行政经验丰富，后者致力于土地革命并在土地革命中崛起。

自1937年起政府职能的增长日益走上正轨，取代发动式的革命政策，带来了根据地的稳定治理。1937至1941年两次选举之间，没有出现大的运动而中断稳固的行政程序。重视正规行政本领和发起统一战线减少了农民活动分子在新秩序中的作用。陕甘宁共产党领袖面对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与正规行政是否可以根本解决贫穷与压迫问题。在敌后根据地这种困境又联系到一个更关键的因素：面对日本的强大压力，新民主政策能有效支撑和增强抵抗运动吗？从1942年起，共产党的回答是采取激进方针治理根据地，这种激进方针大体上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程序。

第五章 危机与对新秩序的探索

中共曾经经历三次灭顶之灾。而每一次大灾难都促使它改弦更张、东山再起。也是在这三次大灾难之中，毛泽东身历残酷的党内斗争而逐步成为新的舵手。1927年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并摧毁了第一次统一战线，中共走上了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的道路；1934年江西及其他根据地的丧失使中共放弃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的政策，转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实行新民主主义改革；最后，面对1941~1942年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所带来的巨大困难，中共制定了包括“群众路线”在内的新政策，采用新的方法来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延安道路”正是在战时形成并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定型的。“延安道路”体现着中国革命对人民战争、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做出的最突出、最富有特色的贡献。我们将探讨它在陕甘宁边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中共的根据地中有典型意义。

促使中共变换手法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华北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危机。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对日军发起了最大规模的进攻，在华北五个省内出击日军，史称“百团大战”。这一大战役出奇制胜，歼灭了大批日军、破坏了大量的铁路和公路、扩大了八路军的根据地。由于中共军队日益增大的威胁，加上

日军妄图在中国大陆迅速取胜并腾出手来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一决雌雄，日军于1941—1942年间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性进攻。日军的总体战略是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辅以“治安肃正”运动，包括将游击区的民众迁到“模范治安区”的集中营中去。由于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日军不断地采用灭绝人性的战术，将一个又一个村庄付之一炬。在这样一种战术中首先丧生的不是武装的游击队，而是妇女儿童、老弱病残^①。詹姆斯·约翰逊描述了日本实行三光政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

三光政策的基本做法是将某一地区包围起来，将其中的所有人都杀光，将其中的所有东西都毁灭掉，以使该地区将来不能住人。推行这一政策的例子俯拾即是：1942年冀东滦县潘家峪1280人被杀，全村房子被烧光；最大规模的破坏发生于晋察冀的北岳区（21个县），1941年8—10月间共有10000日军在该地实行三光政策。结果是4500人被杀。15万间房子被烧，大约有17000人被迁到

^① 大概是因为日本在中国战败的缘故，日本在中国镇压人民反抗的战略和行动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美国在印度支那所采用的战略战术自称是仿效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杰作。但是，那种修建岗楼据点的战略战术，几十年前日本人在中国就广泛使用了。一些人列举使用燃烧弹和毒气等例子来指责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残忍行为举世无双。但是，历史事实表明日本人早就不择手段地采用各种杀人技术了。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举例说，日军用毒气一次就全部杀死800名藏在地洞里的村民。（《农民民族主义》，第73页。）苏联的战犯法庭以大量的事实证明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并运用于战争。（参阅《关于原日本军人制造细菌武器的材料》，特别是第23—25页，莫斯科，1950。）关于美国与日本镇压占领区人民反抗的战略战术，参阅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第54—70页。

满洲里。^①

到 1942 年底，中共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中遭受到战争以来最惨重的损失。华北的日本特务机构估计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大约减少了一半，从 4400 万减少到 2500 万，八路军从 40 万减少到 30 万^②。在日军的进攻不断加剧的时候，中共的“盟友”也加强了压力。国民党在 1941 年 1 月制造了消灭新四军总部的皖南事变，实际上消灭了中共在华中的主力。随后，国民党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③。国民党的封锁始于 1939 年，但 1942 年大大加强了。而且，就在中共遭受军事上的失败和封锁所带来的困难的时候，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又取消了对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津贴^④。军事上的失败和封锁使那些被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所掩盖的一些弱点暴露无余。

通货膨胀

1941 年，国民党加强封锁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边区的通货膨胀。1937 年以来延安的物价就在不断上升，但通货

① 《农民民族主义》（*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第 56 页。

② 同上，第 56~60 页。何干之指出，1941 年全国根据地人口从 1 亿减少到 5 千万，八路军从 40 万人减少到 30.3 万人。同著，第 373~374 页。

③ 关于新四军事件所引起的争议及其政治意义，参阅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第 136~140 页。

④ 朱理治：《关于边币的基本问题》，《解放日报》1942 年 5 月 28 日。朱理治是当时边区银行的行长。他指出，国民政府的津贴是新四军事件之后终止的。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第 94 页，则说国民政府的津贴 1939 年就终止了。朱理治显然是正确的，国民党的各种津贴是到 1941 年才完全终止的。

膨胀率比西安等相邻的国统区要低得多。但是到了1940年，由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中共发行自己的货币（边币）并禁用国民政府的货币（法币），国民党的一份资料显示，中共本身计划发行10万元，但实际在1941年发行200万元^①。因为贸易的中断和边区大量发行纸币，根据地中的物价猛涨。在一年时间内，边币贬值的速度是法币的两倍。如表5-1所示，边区主食小米价格直线上升体现着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在1942年的危机高峰期，米价比1941年增加了14倍。在严密的封锁之下，极难从外地买进布匹和棉花或卖出边区的食盐。棉花是边区从外地买进的主要商品，食盐贸易则居原先对外贸易总收入的90%。从1940到1943年，布价的增长是粮价的两倍^②。而且，边区完全丧失了“外援”（主要是国民政府的津贴，1940年达1040万元）^③。

表5-1 1937~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

年份	延安小米价格 (元法币\袋)	指数	年份	延安小米价格 (元法币\袋)	指数
1937	2.5	100	1941	8.5~15.7	290
1938	2.5~3.8	132	1942	63~145	4038.3
1939	3~4.2	143	1943	150~2200	30683.1
1940	4.2~7	214			

资料来源：乐炯《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第1页。

在整个经济受到封锁的严重打击之际，边区政府在1941年将税收提高到历史最高位，达到20万担小米，相当于上年

① 国民政府调查局：《中共的经济政策》，第107页，1941。

② 罗雄：《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第1~3页。

③ 《解放日报》1942年5月28日。

的两倍。这对当地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①。提高税收表明华北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面临重大危机。在进入西北以来，中共还是第一次感到除了增税之外无计可施，包括第一次对贫苦农民征收重税。

税收政策

边区政府的财政政策几经变化，中共经过多种试验才在抗战后期形成比较成熟的政策。中共的税收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正好与边区政府处理社会经济的思路相对应。1937~1938年间税收很轻，中共在这时主要依赖中央政府的津贴和土地革命时期所没收的粮食与财产。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富饶的绥德地区并入根据地，1939~1941年间中共大幅度调高税率。这既是为了应付边区政府庞大的行政开支和政府各类项目的开支，也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封锁所造成的困难。此外，国民政府停止了津贴，军事上又面临日军的凌厉攻势，中共不得不竭泽而鱼。在最后阶段，也就是在1942年之后，边区的危机开始缓解，中共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来解决军费及财政问题，税收稳中有降。

基本的税是“救国公粮”。直到1940年这项税收约为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80%。表5-2表明，1937年还只是象征性的1万担，到1941年便增加到20万担，随后又降了下来。在1941年之前，税制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贫农家庭交税微乎其微。由于国民政府实行封锁并终止津贴，边区政府采取竭泽

^①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确切的定额是203400担粮食和25948200斤饲料，见《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0日。

而鱼的应急措施，情形就大不相同了^①。

表 5-2 1937~1945 年陕甘宁边区的粮食产量与“救国公粮”

年 份	小米产量 (担)	税 粮	税粮与 收成之比	年 份	小米产量 (担)	税 粮	税粮与 收成之比
1937	1260000	10000	0.79	1942	1500000	150000	10.59
1938	1270000	10000	0.78	1943	1600000	180000	11.25
1939	1370000	50000	3.63	1944	1750000	160000	9.00
1940	1430000	90000	6.29	1945	1600000	125000	7.80
1941	1470000	200000	13.33				

资料来源：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革命根据地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经济研究》第二卷，第 108 期，1956。

注释：和当时的其他资料比较可知，李成瑞提供的数据是计划指标。实际征收数额要比计划指标高，1937~1938 年间高出 30%~50%，1939~1940 年间因为程序的逐步正规化，高出 4%~8%。因此，李成瑞所提供的数字低估了边区在早期的实际税额。不过，因为总量不大，他所估算的税粮与总收成之间的比例只是稍微低于当时政府的估算。我们最关心的是 1941 年以后的数字，在这方面他的数字倒是与其他资料的数据大体一致。有关其他资料，可参阅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第 44 页；谢觉哉《征收救国公粮的研究与商榷》，《团结》第 1 卷，第 26 期，第 8 页，1940 年 8 月 1 日；《解放日报》1942 年 12 月 12 日；《新华日报》1942 年 10 月 27 日。

如上文所述，1941 年救国公粮的数额定为 20 万担小米，大约是总产量的 13%。为了完成这个高指标，边区政府依靠那些派到各县去协助党、政、军干部的工作队，既力求增加纳税户、也增加每户的税额。依这种方法，很多经验丰富的干部被派到基层去，而且广泛利用外来干部，因为本地干部碍于人事关系可能心慈手软。按 1941 年的目标，很多地方的纳税户从总户数的 20% 增加到 80%，仅有那些赤贫者和新移民可得

^① 毛泽东在《经济与财政问题》一书中对 1941~1942 年间的财政危机和应急措施有很直率的论述。

到免税^①。

本来，1940年已将免征点从400磅提高到533磅。1941年又大幅度降低。现在每人年收成达到200磅就得交税，这在边区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原来累进比例的起点是1%，现在改为10%，这对收成仅够裹腹的农户来说可不是小的数目。税率原来是1~5%，现在提高到起征点以上每40磅征税1%，最高可达每1200磅征收30%。30%的税率是针对那些收成达到每人1200磅的农户。按照官方原来的税率，这些农户本来只需交3%的税^②。

此外，政府又在粮税之外头次征收饲料税。1941年这项税达2600万斤干草。更有甚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还搞了很多名目的杂捐与集资活动。尽管税务负担并未达到军阀时代“苛捐杂税”的水平，但边区各阶级都感受到了重税的苦痛，到1942年后才有所减轻。

这里只附带提及一些新税种，1941年边区政府发动了爱国公债运动，原定500万元，结果卖出了600多万元^③。新的羊毛捐、牲口税和货物税共定为35万元，还有指标定为128万元的商业销售税^④。政府甚至还发售彩票，仅1942年1月

① 《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3~25日发表了一组长文，分析1941年征税所采用的组织手段与动员办法，参阅《税粮征收工作队的工作总结》，《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458~460页。关于动用军队协助税收，见《解放日报》1941年12月30日。《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0、22日分别报道了扩大征税的情况。

②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2日，《新华日报》1942年8月30日，《新中华报》，1942年12月10日。转引自徐永英《陕甘宁边区概述》第2卷，第26~27页。对地主还另外征收50%。

③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7日，7月2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第479页。据说售出了价值6180000元的债券。

④ 《解放日报》1941年8月23日、9月24日。

就有400人中奖，头奖为1万元^①。在采取了这么多应急措施之后，政府还是要印大量纸币，并在1941年借粮66000磅^②。

很多乱摊派更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中共的报纸报道了1941年后纠正乱摊派的情况，指出下层干部为了完成各项任务而将原来的一些税收规定及程序置之不理。在某乡，一年内向民众要粮要劳力就达31次。劳役包括给军属耕田和运粮等。特别集资的项目包括给本地教师提供食物与工资、提供乡民大会的费用等。^③

国民党军队获取的陇东分区政府1942年的一份文件，还揭示了当时税收那一复杂画面的另一个角落。该区居民大都是新移民，当时只有不足10%的农户免税。表5-3显示的是镇原县新治区的税收细目。1942年第五乡上缴的税粮是收成的13%，这是整个边区的标准，基本税收是贫农佃户交10%~11%，富农地主交21%。中共政府对最贫的阶层也课以重税，相对说来，他们对地主富农所征的税算是宽宏大量的了。他们还不是边区或陇东最富的人家。据记载，陇东合水县一个地主交税62.9担，是第三乡地主平均税粮的15倍^④。我所见到的最重的税是米脂县地主马维新，他1940年交税粮121.79担，为收入的57%。相比之下，1912年民国建立以来马家地主通常交税不超过收入的10%^⑤。地方政治、军事势力保护大户，

① 《解放日报》，1942年1月2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2日还报道，5月12日又将有一次开奖，总额为100万元，首奖为3万元。奖金增加部分地是因为通货膨胀。

② 徐永英：《陕甘宁边区概述》第2卷，第20页；《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调查局：《中共的经济政策》，第107页。

③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4日。与正面的模范一样，报纸上对这些反面材料的报道也往往夸大其词，以提高教育效果。

④ 陇东边区政府：《征粮征草工作总结报告》，第9页，1942年(?)。

⑤ 延安农村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140页。

使他们少交税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表 5-3 镇原县新治区第五乡税收情况

单位：担

阶级	户数	口数	总收成	每户收成	每口收成	税	每户税	每口税	比例
地主	2	18	42.44	21.22	2.36	8.93	4.27	0.50	21
富农	6	96	176.39	29.40	1.84	37.81	6.30	0.39	21
中农	16	187	225.22	14.07	1.21	27.11	1.69	0.15	12
贫农	68	491	482.03	7.09	0.98	53.58	0.79	0.11	11
佃户	90	540	286.85	3.19	0.53	31.08	0.32	0.06	10
移民	9	46	17.73	1.97	0.38	0	0	0	0
合计	191	1378	1230.66			158.51			

资料来源：陇东区政府《征粮征草工作总结报告》，手抄稿，1942（?），第9页。

1941年之后，税粮负担落到以前免税或轻税的贫农和中农身上。在镇原县的第五乡和第二乡，贫农和中农交税约是总量的75%，地主和富农交的税则仅是总量的1/5^①。在整个边区，只要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贫农和中农交的税都要比地主和富农的负担重。

到1943年，穷人的税务负担降了下来。纳税户平均交税仍为收成的14%，但最低税额从10%减到了5%，而且起征点也相应提高了。最高税额被定为35%，但对地主还有别种杂捐，对他们合法的税收可达48.75%^②。李成瑞提供了各阶级交税与收入的比例，见表5-4。他的资料来源于从4个县各抽出一个区来统计，证实了贫农受益于1943年的减税政策。这时中共的政策已经向穷人的利益倾斜。减税之前，这些地方

① 陇东边区政府：《征粮征草工作总结报告》，第9页，1942（?）。

② 徐永英前揭书，第28页、第32页。

的贫农要交 10% 的税，1943 年则只需交 3~7%。而且，1942 年起征的很多杂捐都废除了。随着政府财政危机的减轻和生产运动初见成效，税收总量降了下来。

表 5-4 四个县各阶级纳税与收入的比例

阶 级	延 安	靖 边	庆 阳	绥 德
地 主	-	-	41.5	36.5
富 农	22.17	14.69	30.8	18.94
上中农	21.38	11.67	25.3	13.59
中 农	16.01	8.71	19.09	9.25
贫 农	7.78	3.83	8.05	4.85

资料来源：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革命根据地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经济研究》第二卷，第 112 期，1956。

注：延安和靖边经历过土地革命；庆阳和绥德则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

我们最关心的是 1941 和 1942 年这两年。当时扶摇直上的税收使热心支持中共的中农和贫农的负担急剧加重。随着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形势的恶化，新民主主义政府及统一战线战略的一些理论依据在党内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的第二次革命呼之欲出。

1942~1944 年的整风运动

1942 年春天，中共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干部轮训和整风运动^①。整风运动是中共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西方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很重视整风运动，在很多人那里，整风运动与延安

^① “整风”一词看来是毛泽东在 1942 年 2 月 1 日的演讲中首次使用。参阅波依德·康普逊 (Boyd Compton) 《毛氏中国的整党文件，1942-1944》，西雅图，1966。

时期是同义语^①。但是，如果我们将延安整风放到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和新民主主义政治所隐含的矛盾等背景中去考察，它的意义就更加深远。

延安整风的近因，是由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所引发的危机。陕甘宁边区税务的加重和通货膨胀使中共内部关于政府及领导方式的不同意见表面化。我们已提及，边区1937年以来在政治与领导方式方面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革命倾向，强调斗争及大众参与。另一种是官僚倾向，强调政治的稳定性和统一战线。第二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从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以及本地的地主和旧官僚。他们的政治观点与作风差别很大，但他们同属于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学生们接受了新思想和外来思想，富于统一战线精神，而且在最初正是统一战线精神将他们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本地的精英阶层是在军阀时代学到政治与行政本领的。他们依照统一战线的原则与中共合作，力图保住他们原先享有的政治、经济权益。在陕甘宁边区，这个阶层构成了县及边区政府官员的堡垒，他们的权力在1937~1941年日益上升。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县长及区、乡一级政府的干部都是在本地的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村青年。他们的首要愿望是投身于社会革命、消除压迫和剥削，给边区的偏僻乡村带来公平与希望。

干部们的背景差异很大，他们在反日民族主义和建立自由强大的中国这两点上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但各自的思想信仰则

^① 康普通那部书1950年初版时部头很小，但在许多年内仍然是依据文献资料研究延安时期的惟一著作。康普通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特别是他关于整风运动不是一场清洗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常常为那些借助于苏联的极权主义模式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所忽视。

千差万别。除了最上层的干部之外，绝大部分干部都没读过有关马列主义的著作，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那些外来干部和知识分子具有现代的改良思想，这些思想是五四时期和后来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这对中国来说是个例外。那些本地干部，熟悉边区农民的疾苦，投身于土地革命，却又被当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包围。在1941年那个日军加紧进攻、国民党加紧封锁的年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信仰不同的干部之间的关系都紧张起来，这对中共的政治纲领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是否仅仅将传统的精英阶层取而代之，但不触及农村的贫穷与压迫剥削等基本问题？当地干部是否有能力对农村进行彻底的改造、从而结束地主精英控制农村生活的局面？边区党和政府的政策能否落实到那些偏僻的乡村？那种铺张浪费、远离民众并由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垄断的官僚政治是否是领导边区社会改造运动的最有效途径？这些都不是新问题。自从1937年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很多并不支持农村革命的人们涌入中共的队伍以来，这些问题便一直困扰着边区。但是，从1941~1942年开始，这些问题成为整风运动中争论的焦点。

整风运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在思想、方法和方向等方面都一致的统一政党。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强调的重点是创造性地适应人民战争的独特环境。由于党、政、军在1937年的迅速壮大，涌进了各种成分，而且强敌压境，因而有必要通过一场教育运动来确立全部党员对党的忠诚。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1937年以后的三年间中，共党员增加了20倍，从4万人发展到80万人。游击战争所要求的是最大限度的独立自主、因地制宜和最小限度的中央控制。在这种条件下，各军事、行政单位，特别是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和目标方面保持一致。正像斯图亚特·斯拉姆（Stuart Schram）所贴切地指出的那样，整风运动旨在“协调个人的

‘自觉行动’和完美的社会纪律之间的冲突”^①。为了实现这种目标，中共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干部教育运动。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环境的马列主义理论，为解决党和干部在过去和目前所碰到的问题提供了准则。

在深入讨论整风运动本身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中共党史上的两个先例。约翰·鲁（John Rue）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对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坚持用组织的和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分歧。原来解决党内分歧的方法是开除出党、逮捕或刑罚。至迟到1929年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毛泽东便确立了新的方法^②。

在发起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重提古田会议以及他在党内斗争中幸存下来的历史。1942年1月23日，他下令重印古田会议决议并发给连以上干部学习^③。1929年的这一决议表明毛泽东特别注意纪律、组织和克服“极端民主”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中心问题。但是，采取强化教育、小组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思想改造等方法，则是1942年才发明并广泛采用的办法。

其实，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取得胜利之后，1939年初便在延安掀起了一场学习运动，这可算是整风运动的预

① 斯拉姆：《毛泽东》，第269页。中共关于这个双重目标的详细观点，参阅《中央委员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领导工作的决议》，1942年9月1日，转见康普通前揭书，第161-175页，特别是162页。高岗：《整顿党政军民各组织间关系问题》，对两者的平衡也有所讨论，延安，1943，第7页。

② 约翰·鲁（John Rue）：《失势时的毛泽东，1927-1935》，第171-198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康普通前揭书，第239-251页节译了延安1942年以《论整顿党内错误思想》为题发表的古田会议决议。

③ 斯拉姆：《毛泽东》，第233页。

演。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延安整风中所强调的正是这样的主题：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强调中国经验并要求结合中国的具体问题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说：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1939~1940年的学习运动鲜为人知，参加者是延安周围30英里以内的干部与学生。基本目标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基本学习材料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很多干部是第一次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还同时学习阅读、写作、算账等基本技能，这对担任领导角色至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转载斯拉姆《毛泽东思想》，第113~114页。毛泽东攻击形式主义的炮火是对准在六中全会上失势的留苏派。

关重要^①。

学习运动在 1940 年告一段落。但是在 1941 年春夏之间当边区的战时危机正处于高峰之时，延安吹响了整风运动的号角。1942 年 5 月，毛泽东发出了第一枚重炮《改造我们的学习》。接着又在 7 月和 8 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两个中央决议：《增强党性决定》和《调查研究决定》。此外，刘少奇于 1941 年 7 月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论党内斗争》的报告。这四个文件都被当做整风运动的基本文件^②。

1942 年 2 月，整风运动正式铺开，毛泽东作了两场演讲，给今后两年的运动提供指针。演讲的主题是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学习时事、学习历史和应用马列主义方面的作用^③。受毛泽东攻击的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等错误倾向，但受毛泽东攻击最厉害的还是那些“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的理论家^④。毛泽东是位讽刺大师，他挖苦说：

① 文化教育委员会 1941 年编辑发行的《学习生活》。（延安？）对学习运动有详尽的评价。《解放》1939 年和 1940 年各期也载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② 康普通前揭书载有这些整风文件。新岛颀良将整风和 40 年代初的军事危机联系起来考察，探讨整风与根据地各项政策之间的关系，见《现代中国的革命观念：中苏冲突初探》，东京，1964。戈尔德曼（Goldman）探讨了整风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见《共产主义中国文学界的异议》（*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第 18～50 页。

③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转自康普通前揭书，第 62 页。

④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转自康普通前揭书，第 64 页。关于具体实践的重要性的争论，主要战场看来是在中央党校。毛泽东是该校的哲学教员之一。《解放日报》1942 年 1 月 28 日、2 月 5 日和 4 月 1 日分别报道，为更多地强调现实问题而进行的一系列课程变动。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因为它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象巫师登茅山去学驱邪术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不美，也不神秘，只不过是极有用罢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讲，“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或者更不客气地说，“你的教条比屎还没用”。我们知道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而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①

整风运动有选择地传播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毛泽东所作的解释。那些原则可以统一党政干部的思想，可以直接而又灵便地应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整风运动不是一场清洗运动，尽管它为争夺运动的思想 and 政治领导权提供了舞台^②。所有干部，特别是那些被指责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都要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经受“斗争”。但是，运动的目的显然是要改造和重新接纳他们，而不是要通过流放、送进集中营、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等方式清除他们。毛泽东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治病救人。他说：

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

^① 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转见康普通前揭书，第21-22页。

^② 关于整风的评价问题，在本书及后记中还将详谈。

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①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将矛头对准党内洋八股和教条主义并指出超出教育范围之外的心理治疗方法。毛泽东指出：“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讲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②。毛泽东认定真理和理性最后必将胜利，但是，要使理性发挥作用，每个人首先必须根除原来根深蒂固的一些态度、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需要强烈的刺激。

近来对小组内部互动作用的研究表明，小组能对其成员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当某个人被全体成员认为是“有病”的时候。这些人只能证明他们已完全接受大家的观点与规范，才能够恢复自己的自尊并为小组重新接纳。在整风运动中，这种小组的威力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小组学习和讨论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转自康普通前揭书，第31~32页。

② 《反对党八股》，转见康普通前揭书，第37页。

中，每个干部都要接受大家的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①。这些小组往往以党支部、同一科室和同一学校为单位，要求大家就革命与战争中的种种问题进行自我检讨。在整风过程中，学习小组不仅检查每个人的思想信仰，而且还检查每个人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并根据运动的需要提出新问题。结果是在思想信仰和日常工作两方面都达到高度的一致，加强上下层干部之间、干部与民众的联系，并使干部认清他们的工作在整个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毛泽东革命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个人可以超越阶级出身的局限。在干革命的过程中，各种阶级出身的人都可以变成革命者。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将大量学生和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是对这种假设的一场检验。整风运动雄心勃勃，要给每个人提供教育和改造的机会。当时的外部压力助长彷徨、投降的倾向，整风则增强革命队伍的向心力。而且，整风运动还使干部们的视野从单纯抗日扩大到社会改造方面。党在1942年以后就采取激进手段改变农村生活，正是整风运动使中共在施行这种新政策时仍能保持团结。正是整风运动的成功，使中共在推进农村革命时仍然获得那些为抗日而投身革命的、出身于精英集团的大批干部的支持。在抗战初期，革命理想让位于统一战线，整风运动则强化了中共的革命理想。

虽然整风带来了领导层的人事变动，但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清洗。广为人知的“病人”如王明等，本是毛泽东的政敌，整风时期正在莫斯科，仍然保留着中央委员的地位，虽然他再也

^① 关于小组对个体的压力及个体在小组压力下改变自身角色与行为模式的可能性，参阅韩丁（William Hinton）《翻身》（*Fanshen*），特别是第4章，还可参阅罗伯特·李普顿（Robert Lifton）《思想改造与整体主义：对中国“洗脑运动”的研究》（*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纽约，1961。

不是主要领导成员。王实味是当时受到最严厉的批判并拒绝承认错误的作家，他被开除出党^①。但这只是个别例子。报纸上对某些人的公开批评，旨在为干部改正缺点提供范例。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学生积极投身于整风运动，重点是改进工作，迎接新的挑战，而不是针对个人。

整风找到了解决个人冲突、矛盾、政策上的争论以及党与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的方法。在15年以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中，毛泽东这样回顾延安整风所采用的方法：“在1942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1942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②因为采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延安整风向废除以往党内斗争中那种开除、监禁、甚至于处死的方法迈出了一大步，而且确立了小组批评的准则。全国和边区的整风是分别由毛泽东和高岗负责的，他们都是以往党内斗争中采取逮捕和清洗方法的受害者。

整风运动必须放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中去考察。这种传统所强调的是个人关系、对个人权威的无条件服从，以及使当权者免于受批评或困扰的、保全面子的精巧技巧。这样一种传统不利于培养对党的忠诚和不讲情面的运动。考虑到中共

^① 关于王实味及其他共产党作家在整风运动中的命运，参见戈尔德曼前揭书，第18-50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行将在农村进行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这一问题便显得更为严重。整风运动使这种农村大变动不至于影响党内的团结以及同党外同盟者的团结，也不至于造成那些过高重视统战政策的干部们的不满。

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旨在打破传统的领导观念、克服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分歧。在小组学习与批评的过程中，学到了党的政策和思想方法、增强了对党及党的宗旨的忠诚。在整风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干部能够在小组学习与批评中将大家动员起来，地位与面子在这种小组活动中都不再重要了。将个人置于小组之上或摆资格讲地位，就意味着拒绝小组评估每个个人的权利。当权者要保持其权威，就被迫不断地解释各项政策及其实施情况^①。

与此同时，又产生了别具一格的领导现象。到了1942年，也就是遵义会议七年之后，毛泽东牢牢掌握了中共的领导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他的著作及领袖风范被第一次当作党的政策以及精神的化身。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相继成功地设计了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的战略；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的造反运动中人们有意识地树立领袖的个人形象以号召国人。在国共两党的冲突愈演愈烈、两党都在为战后作准备的时候，第二个方面便更显得重要。在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之后，国共两党都激烈争夺民心，中共更进一步树立毛泽东的抗日民族英雄形

^① 理查·左罗门 (Richard Solomon) 将传统的领导方式归结为僵硬的等级关系，对个人权威的依赖、对冲突的恐惧，以及由此造成上、下级的隔阂。见《冲突、权威和毛泽东试图使中国政治一体化的努力》，载多克·巴内特 (Doak Barnett) 编《行动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西雅图，1969。整风运动开启了对这种领导方式的一系列攻击。

象。在整风运动中，领导层的某些方面受到冲击，但由于树立起一个所有人都效忠的领袖，中共的内聚力反而加强了^①。

中共中央 1942 年 4 月 3 日发出指示，整个边区的全体干部都开始进行系统的学习并对每个单位及个人的工作进行彻底的检查。党、政、军各级机关都成立了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学习运动^②。整个边区的干部每天都花两小时来学习，包括小组讨论、小组批评、写学习笔记并按指定的课文进行考试。首先是花三个月时间学习整风文件，然后检查每个单位的工作，而且这种检查采用新的标准来衡量每个干部的具体工作^③。

在实际的整风过程中，人们发现 3 个月的学习时间不够用，一再延长。西北局 1942 年 5 月 30 日的一个指示要求分区及县级所有干部从 7 月 1 日起将学习时间延长 6 个月。一些单位将每天的学习时间延长到 3~4 个小时。学校也往往取消正规的课程安排来集中时间学习整风文件。几乎在整个 1942 年，整风是陕甘宁边区各党政机关的首要工作，在这一边区的某些地方及其他根据地，整风延续到 1944 年^④。

其最初选定的 18 个整风文件表明毛泽东的支配地位（整风文件后来增加到 22 个，加进 4 个苏联文件）。7 个文件是由毛泽东署名的，还有其他 6 个文件很可能也是他写的，其余的

① 参阅《解放日报》1943 年 7 月 17 日，8 月 7 日。张如新在《解放日报》1942 年 2 月 18、19 日上发表的长文，是最早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雄文之一。

② 《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16、19 日。林伯渠是边区政府学习委员会的主席。康生和李富春是“中央系统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人，这个委员会包括中共的最高层领导和中央党校的学生。

③ 《中央宣传部关于改造运动的报告》，转见康普通前揭书，第 3~8 页。该报告 1942 年 4 月 7 日作为《解放日报》的社论发表。关于干部每天学习两小时的通告见《解放日报》1942 年 2 月 4 日。

④ 《解放日报》1942 年 5 月 16 日、6 月 16 日、8 月 5 日。

基本上是反映毛泽东观点的中央决议。刘少奇、康生和陈云的著作也各选一篇。中共的领袖们对苏联在思想及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兴味甚浓，但整风运动并无意树立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最初的18个文件中只有两篇来自苏联、其中一篇是斯大林的手笔。中共在意识形态的训练方面确立其自身的独立性。从此以后，中共在党的教育工作中所强调的是中国革命的现实，特别是领导问题、组织问题、干部培训问题、以及对过去和当前具体工作的调查研究^①。

1942~1944年，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及游击队员在紧张的学习及自我批评环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著作的洗礼。在这一过程中，所强调的是将思想理论与革命和战争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一些不协调的因素溶化到团结、高效的组织中去。最后，整风运动使中共有机会全面考察党的历史及当前危机，从而形成新的政策及群众路线这一新的领导观念。

高干会议

西北局1942年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所举行的高干会议，体现了党、政、军最高层的整风过程。这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会议所制定的群众路线，先是在陕甘宁边区实施，1942年后在全国范围推广，开头三个月，来自各个单位的267名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学习文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检查党的纲领在边区实施的情况。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两篇很长的报告。第一篇是分析斯大林的“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此文从未公开发表。第二篇是讨论“经济

^① 最初18个文件的目录和1942年4月追补的4个苏联文件的目录，见康普通前揭书，第67页。

问题与财政问题”，这在下文还将提及。刘少奇和任弼时各作了三天报告，林伯渠、贺龙、朱德、康生、陈云和叶剑英也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实际上，除了留苏派外，所有主要领导干部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不过，在会议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除了毛泽东便要数高岗。高岗过去和当前在发展边区方面所推行的政策都受到赞扬，他在党中央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也明显上升^①。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历史、分析边区的现实问题并为制定新政策解决方向问题。西北局在1942年间在边区各地大兴实地调查，这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具有典型意义。那些调查报告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材料^②。会议的重点是对党、政府、军队、民众、组织关系、财政和教育进行整顿。在全体会议之后安排分组讨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认清工作中的种种问题。批评有时也在大会上进行，至少有70名干部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与会者都要写日记或笔记，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在小组会上进一步讨论。

1943年1月31日，《解放日报》用整个第一版来报道刚刚结束的高干会议所采取的方法及其成就。报道认为会议解决了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边区党史问题，统一领导问题和边区当前的任务。

会议对边区早期的党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显示了在路线和人事这两个紧密相关问题上的激烈斗争，也使会议解决历史遗留的一些主要问题找到了焦点。先是由陈正人在关于整党

① 关于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参阅《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页。参阅史景堂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第152、211页。《解放日报》1943年1月31日，很多演讲都印发给上层干部。关于会议的进程可参阅西北局的总结报告《关于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经过及经验的总结》，延安，1943。

② 《关于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经过及经验的总结》，第5~6页。《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关于米脂马家的材料就是这时收集的。

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史中的问题，接着是围绕对党的忠诚和正确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几周的讨论，然后由高岗在1942年11月17和18日作了两场带有总结性的报告。根据整党过程中的会议记录，边区党“最老资格、最忠诚的干部”要求犯有错误的干部作检讨并改正错误。“忠诚分子”指的是1935年前团结在刘志丹周围从事游击战争的核心领导层，包括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王世泰和刘景范^①。

会议期间关于边区早期党史所作的结论正是肯定高岗等本地干部的领导与战略。但是，受到攻击的是哪些人和政策呢？高岗的报告严厉指责党中央的代表郭洪涛和朱理治的左倾错误。1935年曾发生逮捕当地干部的事件，此事在1942年受到责难。虽然毛泽东等人到了陕北之后就迅速对在1935年被捕的本地干部进行平反，但郭洪涛和朱理治等人则仍身居高位。只是在7年之后的整风运动中，高岗等人才得到完全的肯定，原来压制他们的那些领导人受到了批判。不过，这两个被批判的领导人当时都没有被免去职务^②。

高岗对郭洪涛和朱理治的批判与毛泽东对留苏派在井冈山时期所作所为的批判如出一辙。在高干会议的总结发言中，高岗引述毛泽东的观点指出，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从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高岗批评郭洪涛1935年以前犯了左倾错误，统一战线成立之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郭洪涛直到1938年5月一直担任边区党的书记，高岗指责他在这段时间

① 《解放日报》1943年1月31日。陈正人10月21日的报告没有找到。参阅《关于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经过及经验的总结》，第4页。

② 他们实际上是缺席受批判。他们两个人都已被调到其他根据地担任重要职务。参阅《高岗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的结论》，第8~17页，延安，1943。

内没有抵制国民党的进攻，丧失了边区的大片领土。而且，高岗还指责郭洪涛允许地主回乡去夺回土地，并像革命以前那样统治农民。比如，安塞县的一个地主要回了以前被没收的2000亩土地^①。

与会的其他干部也大赞特赞高岗的领导作用。实际上，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提高了高岗的地位，使他成为地方问题方面公认的权威。高岗获得这种重要地位，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掌握了更多的马列主义理论（从当时中共的出版物来看，高岗所发表的东西没有任何理论色彩），也不是因为他是统一战线方面的典范（如林伯渠）。高岗的重要地位在于他与刘志丹的亲密关系，他在领导土地革命和创建陕北根据地方面的贡献，以及他在本地交际甚广、熟悉情况。随着党的工作重点从统一战线转向农村基层的斗争以及再度依靠贫苦农民的革命作用，高岗的这些禀赋正好大有用武之地。

《解放日报》的报道以缓和但非常坚定的笔调写道：“1938年5月以来，边区在高岗同志的领导下克服了抗战开始以后统一战线工作中所存在的右倾错误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执行了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② 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为发动整风运动而发表的演讲中也特别从本地干部中挑出高岗来赞扬一番：“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如高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③

① 参阅《高岗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的结论》第12~14页。毛泽东关于王明及留苏派的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批判，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71~218页。还可参阅《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62~266页。

② 《解放日报》1943年1月31日；12月6日。

③ 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与文风》。

如果说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支持高岗，那么，在当地的干部和农民中威望很高的高岗则是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因而在击败留苏派的挑战中获得胜利。连结这两个人的纽带是在党中央不信任的条件下坚持独立的游击战争的共同经历、他们对农民潜在的革命性的信念、他们那种带有传奇色彩的民间英雄风格，以及他们对抽象理论的不耐烦。

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高岗都大大地加强了他们在党中的地位。他们两人互相帮助，分别成为全国和地区的最主要领导人^①。毛、高两人在前一时期分别在江西和陕甘根据地受到排斥、被解除职务，高岗甚至还遭到逮捕，在整风运动中，那些使他们两人受难的政策遭到了清算。应该说，毛、高两人都最坚决地推行群众路线，包括更加鲜明的阶级路线、更强烈的民粹主义冲动、对官僚主义疑虑、强调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

会议的报告不厌其烦地歌颂高岗并要求党、政、军干部必须执行以他为首的西北局的指示。这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高岗的个人领导权。但更重要的一面是强调农民的参与并削弱政府官僚机器的独立性和权力。

强调党的首要地位、特别是西北局在边区事务中的首要地位，是涉及方向性问题的重大事。我们曾经指出，1937年之边区政府的官僚机构取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权力。1942年下半年重新强调党的领导，是克服“官僚主义”（制定和实施脱离群众的政策）整体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在农村实施的

^① 高岗在1943年的劳模表彰会上对毛泽东大加颂扬：“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她的领袖是毛主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工人和农民的明灯、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旗帜。”载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编《组织起来》，第8页，1944。他们两人当时互相颂扬以提高双方的地位。

政策超出了政府官僚的范围。政府官员只能有效地控制到县一级。在基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组织。下文还将详谈反对官僚主义和培植新的权力中心这一问题。这里只需要指出，那种将人才集中于县级以上政府机关的“头重脚轻”的行政结构受到了调整。外来干部、学生和行政人员被重新安排到农村去。在那里，他们将同农民积极分子一起奉行一种新的领导方法、依新的方法去解决农村问题。

官僚机关是“知识分子干部”的堡垒，集中着外来的学生和为了抗日而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其他精英分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北局及下级党组织（包括公安机关）的人员则主要来自本地的游击队。他们中的多数人都经历过土地革命、没读过几年书。他们是因为向往社会公正和革命的种种诺言而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只要工作的重点是维护统一战线及行政的稳定性，外来干部及精英分子的行政技能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整风运动和群众路线所要求的是一种新的领导方法。正像在土地革命中一样，新的领导要将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不过，这一次不是人们以往所熟悉的重分土地，而是增加生产并改变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

当中共着手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时，也开始注意从本地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中发现人才。但是，他们也和外来干部及知识分子一样，也要经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检验。例如，农民革命常常受到的批评包括因袭适用于土地革命而不适用于统一战线的“老一套”领导方法。还有更重要的错误是“命令主义”和过分强调“动员”工作。如在征粮征兵等工作中不是帮助人民而是增加穷人的负担。这样的批评意味着这一时期政策的重大转变。1941～1942年间，党与政府的领导人关注的是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与军事问题，要求最大限度地征税征粮，地方干部的工作也以这两件事为中心。当然，也必须承认，受到重

大压力的地方干部在这些艰难的岁月中往往忽略通过细致的教育工作来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是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无论如何，整风运动之后延安的领导正是依靠这些地方干部的首创精神与技能来大胆进行新的实验^①。

从1937年起，林伯渠便是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精神的代言人。新民主主义包括第二次统一战线、合理化的行政、普选和三三制。随着整风运动的铺开，人们更多地听到的是广大农民所熟悉的粗犷、简朴的声音，也越来越强调中共在统一战线的独立性。高岗最具有代表性。“什么是民主？首要的条件是农民有很多小米，也就是人民有吃有穿。”高岗这样自问自答^②。中共在延安时期推行的具有新民主主义特色的政治，但他们越来越关注更根本的问题：消除剥削、重建农村经济、并扶植村民们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

高干会议为分析和辩论各种问题提供了论坛，并为1943年即将拉开帷幕的激进政策培训了骨干人员。新的政策将重心放在斗争这一端，而不是团结与稳定那一端；放在大众参与这一端，而不是干部与精英分子的合理指导那一端。结果是一种新的政治局面出现在地平线上，原先在土地革命中产生的一些风格与技巧在这时大行其道，被人们用来改造自然、解决由穷山恶水和地主专权所造成的社会问题 and 经济问题，并努力创造新型的农村。1942年的整风运动使党、政、军干部都作好了准备，到广大农村去完成这些任务。

① 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载《整顿三风参考材料》，第84页，1943(?)。他尖锐批评“老一套”的领导有使党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毛泽东也尖锐抨击一些干部和政策不是帮助群众而是“剥削”群众，见《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3~8页；又见《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154页。

② 《解放日报》1943年1月31日。

第六章 延安道路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水岭。1936年，中共为了全国性的抗日事业而终止了根据地中的土地革命，代之以比较温和的改革。如果说，针对地主阶级的激烈斗争由于民族团结的需要而受到了遏制，那么，中共的改革对已被战争冲垮了的农村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依然是很深刻的。在游击区，地主垄断政治权力的格局被打破了。在当时那种日军横行的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共所建立的制度能够顺利实施，是因为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根据地政府满足了那些饱受战祸的农民大众的要求：军事方面的安全保障、降低地主和高利贷主的租息、建立公平合理的税制等。生活于新的政治制度中的农民大众，破天荒第一次自豪地谈论“我们的政府”，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将政府视为与自己无关或令人恐怖的东西。与此同时，通过高举抗日民族主义大旗和政治经济方面的妥协政策，中共也使精英阶层参加根据地政府。

在1937~1940年间，这些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收到了显著成效。到30年代末，中共的根据地已遍布华北，成为日本吞并东亚的主要障碍。但是，也正是这种成功削弱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的迅猛发展造成了与国民党的冲突，国民党实际上已放弃合作。而且，在1941年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

锁的时候，日军也转而将中共军队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这样，边区和游击区在军事、经济和财政等方面都陷入险境。

当共产主义运动在40年代初遇到麻烦时，“新民主主义”的局限性也显露出来。如果说旧社会最明显的剥削方式已被消灭，那么，边区内偏僻乡村中的生活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在陕甘宁边区，1937年前的土地革命曾经改变了穷人的命运。但是，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新的挑战：它能否建立起新的制度，来一劳永逸地打破产生新的压迫与停滞的循环。何况，很多地方并未开展过土地革命。

在整风运动中，一些新的政策就是为了针对这些挑战而制定的。这些政策的核心是动员起来，进行经济建设与改造。发展农业经济是实现其他目标、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从1940年起，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每个村庄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紧接着运动在华北和华中的所有根据地全面铺开。

各根据地所实施的这些政策，其目标和范围都由党和政府以运动的方式公之于众。作为一个整体纲领，“延安道路”是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别具一格的方式。其特色包括民众参与、简政放权、社区自治等。它基于这样一种人性观念：人们可以超越阶级、经验、意识形态的局限，创造一个新中国。在对整风运动进行全面、详尽的论述之前，我们可以将其主要方面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精兵简政减少了军队和政府的机构和人员。政府行政机构的独立权力受到限制。政府工作的重心从县区转到基层乡镇。简政的目标是要减少行政开支、将权力从远离现实的官僚手中转到地方社区，并提倡适合于人民战争的大众化领导风格。

第二，“下乡”运动将很多外来干部或“知识分子”干部

送到乡村，使数以百计的偏僻乡村有了新干部，也使广大干部第一次亲自到工厂、田间参加劳动。这一运动旨在填平受教育的精英阶层与大多数穷苦民众，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鸿沟。

第三，减租减息运动使那些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地区的农民欢欣鼓舞。在反对地主的权势与压迫的斗争中，农民积极分子进入领导阶层，改变了农村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

第四，基于传统的互助方式的合作化运动，是中共重新组织农村经济的重大举措。基于农村经济生活的合作原则，不仅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农村的社会政治关系、对农村生活的基本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生产运动对边区经济的发展采取了很多新办法。其中之一是“机关经济”，每一机关、每一干部都要完成具体的劳动任务，其劳动范围很广，从工厂管理工作到拾粪种菜，无所不包。干部参加劳动，目的是要增加生产、减少税赋负担，并积累管理经验。培养对体力劳动的积极态度，也有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劳动英雄运动”则是要消除长期以来对体力劳动的鄙视，奖励工厂、田间那些被人遗忘的男男女女，鼓舞他们去发挥创造性。劳动英雄不仅是当地社区的典范，而且还接受特别的训练，以便领导民众开展农业经济合作和其他集体行动。

第六，大众教育运动不仅扩大了教育的范围，而且改变了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使穷乡僻壤的民众得以告别文盲、接受新观念。新教育成为转变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纲领有一部分在江西时期或抗战初期就实行过，很多则是新的。而这些纲领的最高表现形式可以归结于中共新的领导观念，也就是在战争、革命、政治和经济各方面都将群众参

与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在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斗争中，人们意识到即使是由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和技术级精英所组成的理性化官僚阶层，也不足以打破乡村穷困与压迫的循环圈。自上而下的革命永远也不能使农民进入现代世界。乡村社会的根本性转变的动力，必须来自乡村内部。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内在驱力：一是精英主义倾向，指向理性化的等级秩序或集权化的组织体制；一是民粹主义倾向，强调依靠觉悟的农民大众。我们已经看到了动员工作在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中的中心地位。动员工作在1942年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也成为关键的一环。毛泽东在1943年的一次劳动英雄大会上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

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陕甘宁边区过去是存在过这种方针的，经过历年的指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今年的群众运动，大概现在还作这样错误想法的人是少了。^①

在陕甘宁和后方其他根据地，整风时期的政策为中国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鸣锣开道。1943年，战争和革命过程中的动

^① 《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4页，1969。

员型领导方式被归结为群众路线。我们从考察 1942 年的新政策为起点来了解群众路线的起源、发展与意义。

精兵简政运动

随着国民党取消对边区的津贴并对边区实行封锁，中共在 1941 年遇到了财政和经济危机。正是这种危机引发了精兵简政运动。边区的庞大行政机关在供给和资金等方面空前困难，不得不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在当时受到日军进攻的敌后根据地，情况更为严重^①。

运动在最初很温和，是由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研究如何提高行政效率。这个委员会在后来三年中成为领导全面的政府机构调整的领导机关^②。在第一阶段，行政机构的调整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缩小规模、减少开支并提高行政效率，特别是精简区和边区的政府机构、减少干部人数。第二个目标是通过“下乡”运动，下放干部（主要是外来知识分子）到基层，增强下级政府、特别是乡和分区政府。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第二个目标跃居中心地位，而且增加了一个新目标：通过增强党、县长和各委员会对各部门行政机关的控制权来削弱官僚权力的独立性。简言之，简政是要削弱官僚权

① 《解放日报》1942 年 10 月 7 日的社论讨论了财政及其他方面的困难。该社论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将题目定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36～839 页。如下文所述，这一运动基本上局限于政府，军队实际上没有削减。

② 李鼎铭的名字在党的文献中出现频繁，是中共用来说明非党人士参与边区政府的范例。见《解放日报》1941 年 12 月 7 日；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05 页。

力、增强基层的领导和民众的参与。1941年12月的计划是将对政府、党、自卫武装和群众组织的人员精简20%，从7900人减少为6300人^①。边区政府首当其冲，其一千多名干部要精简1/3。分区、县和区各级政府的4021名干部减少为3396人，军队也有少量压缩。警卫队削减500人，下厂劳动。1000自卫队干部虽然职务依旧但不再领工资。他们必须重新务农来养活自己。最后，1100名群众组织的干部削减为600人，减幅接近一半。那些被精简的人员先被安排到学校培训，然后另行安排，到工厂或农村去工作。

起初，已精简干部是为了改变上层政府的臃肿状态，提高工作效率。边区和县级政府的许多部门被合并，剩余人员安排到基层去充实区和乡政府。结果，干部们更加熟悉了农村的具体情况，基层政府的领导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每个乡长都会有上面派来的秘书（通常是学生、但有时也有行政人员）协助工作。对于那些文化水平和工作效率较低的县、区政府，也会派秘书去协助^②。

乡长、区长等乡村干部往往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投身革命的农民，多是文盲或半文盲。因而，秘书们在与上级联络和训练干部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外来干部将新思想带到农村，特别是整风运动中所提倡的那些新思想。而且，这些新干部献身于党的革命事业、又不受当地人事关系的拖累。原来的

① 《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的一篇文章对最初的计划进行了描述。参阅林伯渠《简政问题》，延安，1943。这些文献对党、本地军队和群众组织干部的数字往往会含糊其词。7900名干部显然是指上面这些组织的所有干部，但没有将驻在当地的八路军包括在内。

② 林伯渠的《简政问题》论述了派知识分子担任乡和区干部的目标，见该书第17-19页。

行政人员被召唤去充当他们所在社区的领袖^①。

这些就是1942年初第一期精兵简政运动的目标。该年4月，又开展了更为深化的第二期运动。在整个1942年5月间，边区政府将200名干部下放到区和乡，其中80%在区一级工作，20%在乡一级工作。在运动过程中，很多训练有素的干部被派去充实基层政府。随着乡村生活的革命化成为头等大事，边区政府在行政管理方面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很多地方干部从县和乡里回到村里去担任一些非正式的职务。例如，在延川的五个分区，干部减少了17名，只剩下38名。被精简的17名干部中，11名回家种地，4名改任乡长，另外2名被送到延安去学习^②。到1942年夏为止，每乡配一名秘书的工作在一些区已基本完成，另一些区仍在继续^③。这些变动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些“外来人”在当地的人事关系方面很生疏，而且他们学非所用，何况他们的到来使当地一名干部失去工作。“下乡”运动的问题将在下文详谈。

1942年12月第二期运动结束时，很多干部和学生都已下放了。但减少政府行政开支的目标仍无着落。在1943年初发起第三期运动的时候，林伯渠报告说，边区各级政府共有8200名干部，这比1941年12月运动开始时所估计的7900名干部还要多！此外，政府还要资助3300名接受中等教育的学生。连同八路军的家属在内，共有2250人靠政府津贴。林伯渠再次号召政府裁员，并将中学入学人数削减1/3，从11500减为7500人。与此同时，他强调提高领导质量，特别是将知

① 《解放日报》1942年5月20日，25日；6月4日，9日。

② 《解放日报》1942年6月20日。

③ 《解放日报》1942年7月11，12，15日分别报道了这项任务在延安、绥德、安塞等县完成的情况。

识分子干部下放到基层。到1944年1月精兵简政运动结束时止，边区政府津贴的机关单位从35个减少到22个。边区一级政府的部门减少了四分之一，分区和县级政府的部门从8~9个减为4~5个^①。

行政改革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开支的削减和“冗员”的裁撤。这一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政府的结构、构成和观念方面的变化。下层政府、尤其是乡政府得到了增强。由于外来干部的增加，下层政府也更加服从上级政府的领导。这些外来干部不属于地方关系网，而是立意要转变农村社会。一些在土地革命就显露出领导才能但缺乏行政经验与技能的地方干部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其中很多人在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这些举措是由党和政府发起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群众的积极参加，从而为解决农村问题铺平了道路。

纵向的双重领导

在精兵简政的过程中对权力关系作了新的安排，以削弱政府各部门的独立性。这一改革加强了县长及各委员会对各个部门的控制权，也增强了党对政府的领导权。其目标是使政府更接近人民，更能满足当地的需要。

自从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在一段相对安定的环境下，政府的决策被高度集中到边区政府。这些主要是由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掌权的政府部门，通过纵向的权力网自上而下地延伸其权力。简言之，中国官僚政治的传统结构被移植到根据地中来。1942年之前，财政、教育、建设、民政等各部

^① 林伯渠：《简政问题》，第13页，第18~19页；《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载有李鼎铭关于运动的总结报告。

门都实际上各自为政。这是一种纵向的统治。例如，关于教育的政策是由边区政府的教育厅制定的，下达到下级政府的教育部门来执行。在这种纵向组织结构中，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很少协调和协作。特别是，县、区长或同级政府的党组织对政府各部门都没有什么权力，因为这些部门都直接听命于上级政府的同一部门。这种制度使各部门块垒分明并使权力都集中于延安。

这种边区政府的高度集权使县、区以下的政府很难在政府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管理、对付当地的具体问题或危机。稳定统一行政系统是以僵硬刻板为代价的，这恰恰是与平均思想及群众动员不相容的。政府的工作由一些专门人员负责，这更像是封建王朝的方式，而不像是土地革命、人民战争所要求的方式。这种制度的一个必然后果是将教育、工业等资源都统统集中到边区、分区和县政府等行政效率与行政控制都高度强化的地方。结果，大多数的乡镇和村庄都与政府资助的工厂、学校无缘。

这种状况在精兵简政运动中受到了批评和改正。双重领导取代原来的纵向领导而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行政风格。党的领导与政府之间的协调功能得到增强^①。毛泽东在1943年为中共中央所写的一个决议中对双层领导作了经典性的说明：

① 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组织与意识形态》（*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一书中讨论了“垂直”领导与“双重”领导的概念，见该书88～99页，102页，188～210页。舒尔曼精辟地论述了1958年大跃进中的垂直领导转向双重领导的政治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中再现了1943年运动的一些突出特色。关于文化大革命中通过简政的方式来解决行政中的官僚主义，参阅徐永英《县革委会走“精兵简政”之路》，《北京周报》第38期，1968年8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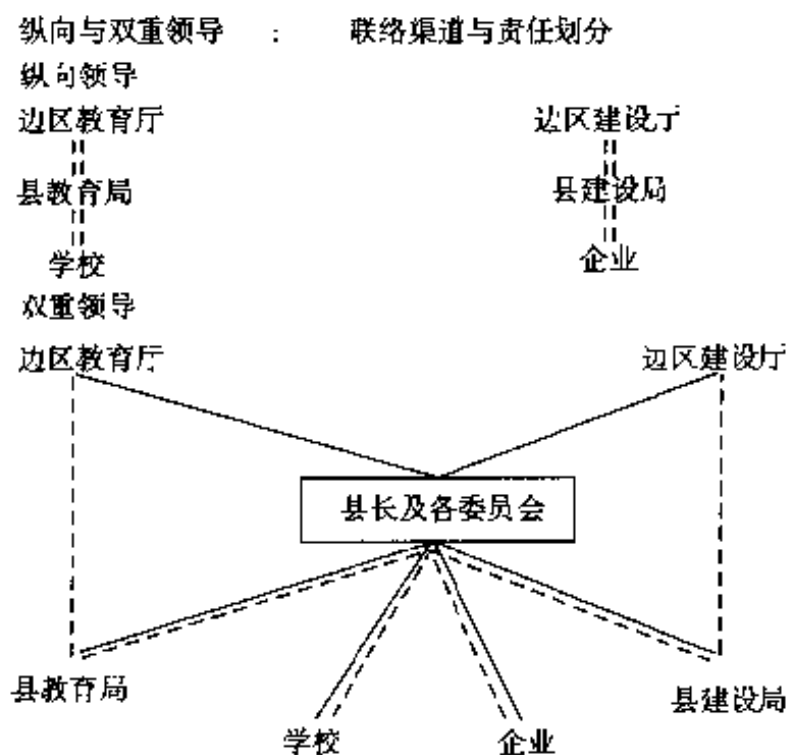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①

对动员政治的活力所作的这种概括，是对行政机关的凝固化和官僚化倾向的直接挑战。毛泽东所向往的是一种运动型的政治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在这种运动型的政治中，群众和干部集中力量来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旗帜鲜明地反对行政精英对权力的垄断以及狭隘的专业化。在那些不断受到日军侵扰的根据地，这种政治风格对于快速地进行军事和政治动员的游击战略至关重要。对于尽管被封锁但没有受到日军直接攻击的陕甘宁边区，也运用同样的原则来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革命化。

这种新政治在边区的县、区政府立即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政府各部门与上级政府的对口部门，以及根在农村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856页。

的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从1942年起，在双重领导的制度安排中，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不再仅仅是对上级对口部门负责，这种责任甚至被降到了次要位置。他必须定期向县、区长及同级政府的委员会汇报并接受指导。而且，上级指示的传达渠道也发生了改变。例如，县、区政府的教育部门不再直接从上级政府的教育部门得到指示。这些指示先下达到由县、区领导的有关委员会，然后才转给教育部门。同样，教育部门给上级政府部门的请示或对下属政府部门和学校的指示，也通过相关的委员会来转达。纵向领导与双重领导的区别，正如下图所示：



注：实线表示联络渠道，虚线表示责任。比较弗朗兹·舒尔曼 (Franz Schurmann) 《共产主义中国的组织和意识形态》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一书对大跃进时期双重领导的概括，见该书第194页。

县长总是试图控制本县各政府部门，但是，由于各部门

的官员是由延安任命的、并对延安负责，县长的权力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双重领导改变了这种状况，很多权力从边区下放到地方，边区制定方针政策，由地方政府来执行。县长及各个委员会在新的双重领导体制中居于中心地位。各政府部门上传下达的文件都要经过县长或各委员会的批准。这是使县长成为该县政府的真正领导人的第一步。其结果是增强了地方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双重领导增强了地方干部的权力，这些干部在土地革命中就很活跃，但在1937年以后受到外来干部的排挤。

另外一些举措也加强了这种倾向。县长的人事权加强了。政治秘书、各局局长和自卫队队长的任免权仍在边区政府，但他们的下属此后由县长来任免^①。增加两位或更多的知识分子去担任县长的秘书，也是加强县长权力的步骤。在地方官员权力加强的同时，他们同上级政府的联系也得到了增强^②。

巩固双重领导体制的另外一个步骤是设立边区和县的各种委员会来协调各级政府的行政工作。在理想情况下，县务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由县长主持，讨论政府的各项政策，其成员包括各个局的局长、法院院长，有时还包括党和军队的代表。这些委员会熟悉当地的情形及各项工作的缓急轻重，合理地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工作^③。

① 《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14日，7月9日；林伯渠：《简政问题》，第2、3、14~16页；《修改陕甘宁边区政府暂行组织条例》，1943年4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集续编》，第85~88页。

② 《关于延安边区简政工作的总结》，《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集续编》，第9页。

③ 在边区一级称为政务会议。《陕甘宁边区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对县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作了规定，该条例于1942年6月30日由边区政务会议通过。《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59~62页。

县长权力的增强和政务会议的正常化，扭转了政府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而且，以前权力集中于边区的政府各部门，现在下放到了县。随着县一级协调工作的加强，延安再也不能垄断政府各部门的决策权。越来越多的决定是在政府各部门的联席会议上当场作出的。政府各部门相对于上级对口部门而言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但同时却受到当地政府更多的控制。在双重领导体制下，政府各部门的干部不再只是简单地执行上级下达的指示，他们必须因地制宜地执行这些指示，特别是在政务会议上说服别人接受其做法。整风运动中的小组讨论和批评，正是为了鼓励这种公开的讨论和小组内部的一致性。既全面地熟悉当地情况而又有能力从总体上把握各种政策的分寸，这样的干部是非常难得的，但同时又是作为一名县长所必需的。在县长的权限扩大以后，他动员广大人民和各政府部门的干部来投身于改造社会的种种运动。这与原先那种强调集中与专业化的体制有所不同。县长权力的增强是强调政治动员的直接结果。

随着从纵向领导到双重领导体制的转变，党的权力也增强了、特别是县和县级以下的党组织。1942年高于会议所提出的重要要求之一便是加强“统一领导”，也就是党的调控权力。在削弱政府部门的独立性的同时，党对政府的领导也增强了^①。

1942年，在党、政、军以及群众组织中的党员干部及普

^① 增强政府部门的党的领导权的一个做法，是在该行政部门中成立党团。陕甘宁边区的党团即使在党的内部指示中也很少提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陇中分区党委宣传部颁发的一份秘密文件《政权中的“党团”讲授大纲》，1942，国民政府调查局。

通党员都被赋予在政府、军队和各种活动中纵览全局的权力^①：

战时根据地的统一和集中领导应该介绍到各个战时根据地去，使党中央和各级领导统一起来（中央委员会各局；区委会；地方委员会）。因此决定，代表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各局、各分局）和各级党委会（区和地方委员会）的机构是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由他们统一该区的党政军和群众工作的各级领导……

各级党委会的性质和组成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会不应仅仅是引导地方工作的委员会，而且应该成为该区党政军和群众领导的统一机构（当然，它们不应成为联合政府）。为此，它们必须包括党的主要负责成员和党务、政府和军队干部。

在政治与行政方面，双重领导制所强调的是政策的协调。党与各个委员会一起对1942年此后所发起的运动中的所有干部和群众进行协调领导。在深入讨论这些运动及其领导方式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边区新的领导方式对乡村政治产生的影响。

“下乡”运动

在边区和县政府按照双重领导的原则进行机构调整时，乡

^① 1942年9月1日由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统一领导的决议》，见波依德·康普顿（Boyd Compton）：《毛氏中国的整党文件，1942～1944》（*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1944*），第162～163页。这种变动对党在双重领导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至关重要。

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理解 1941 年后乡村的变化，我们有必要首先谈谈 1935~1936 年在边区所实行的土地革命所留下的烙印。那一革命大大地削弱、以至消灭了地主的势力，并建立了以青年农民为主的新领导。在结束土地革命、建立统一战线政府之后，这些农民干部继续掌权。但是，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建立也确实允许或鼓励一些在革命期间逃亡的上层人物返回故乡。1937 年以后，很多地主到政府中任职，其中一部分甚至加入了共产党。特别是在那些党组织比较薄弱或没有发生过土地革命的地方，地主精英分子往往保持或恢复了他们对乡村政治、经济生活的控制。

到 1941 年，无论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县还是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新区，地方政权往往是农民革命者和传统精英共同掌握的。虽然动员农民的浪潮不断，但 1937 年后对统一与稳定的强调使一些偏僻农村的社会生活重返革命前的模式。上面派的工作队偶尔也到乡下来，但是，他们来去匆匆，并未造成重大的影响。更何况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征税和征兵。自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农业生产、行政管理和备战之后，并没有采取过切实的措施来巩固农民组织的权力。但是，在 1941 年的危机中，党的领袖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改变农村的停滞状况是一种失败，失败的最主要的表现是革命之后的农村经济根本上没有改变。在 1937 年以后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原封不动，在那些没有发生过土地革命的地方，地主的压迫也依旧存在。尽管建立了新的民选的乡镇政权，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组织和地方党支部，农民生活的很多基本方面依然如故。这些变革所缺少的一环是超越平均主义的土地革命、实现农村经济

与农村社区的发展^①。

对乡村政治的改造，旨在建设一种新的有效率的领导，以实现乡村生产与社区的发展。“乡村”运动既是延安时期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共重新努力变革乡村政治的最早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下乡”运动开始的时候是静悄悄的。据一些报告说，1941年7月，大批干部和学生下到农村帮助秋收。干部在农忙时节下乡帮忙一事，本来平常得很，但是，新的内容很快就成为主流。利用“脱产”干部在农忙时节帮忙，这只是暂时的应急措施，而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与当地干部及民众之间发展起来的新关系，则是另一回事^②。

这种新意义上的下乡运动是在1942年春的整风运动中发起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们在延安学习之后被派到农村去。他们在协助农业生产的同时，主要精力是用来协助基层政府党组织的工作。一个典型例子是178名中学生离开延安到边远的农村去从事冬学教育^③。其目标是要消灭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知识分子在很原始的生产条件

① 1942年夏天整风运动高潮中，《解放日报》载有很多讨论乡村组织的优点与弱点的来信与文章。例如洪元林征引在延长进行的一次调查时指出，8人中就有1人在政府部门任职，这相当于每户1人。在清涧县，乡政府有7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5人，再加上乡长及他的助理，共有37人。如果再加上自卫队队长、秘书及群众组织领导人，总数达57人。而且，因为5个行政村的村政府均有12名领导，这个只有819人的乡便有321名干部。次日发表的报告指出，经过第二期精简之后，干部人数已降到198人。9月25日发表的署名宦南的信，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个有1200人的乡只有72名干部，县只有12名是脱产干部。与县或县级以上政府的脱产专业干部不同的是绝大部分的乡干部是不脱产、没有薪水的。关于乡政府的详细讨论，见《解放日报》1942年4月29日、5月15日。

② 《解放日报》1941年7月3日、15日；1944年6月24日；1945年3月31日。

③ 关于下乡的例子参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5日，10月7日、25日。

下参加农村的体力劳动，既让他们亲身体会农村生活的艰辛与问题所在，也帮助他们认识改造农村的出路所在。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新观念、新技术带到农村中去。“下乡”运动也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如何创造条件让大多数知识青年为改变落后的农村贡献他们的才干与青春？

此外，运动的组织者们也希望画家、作家、音乐家能利用他们在农村所获得的灵感与素材来创作一种新艺术，以利于抗战与农村生活的改善^①。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对中共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下乡的目的是为了让知识分子去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去反映他们的工作与生活^②。

知识分子的本领是以新的方式到广大农村去施展，而不是在知识分子所集中的边区或县政府所在地。20年前的五四时期，中国革命青年的民粹主义冲动就已体现在他们到民间去的行动中。现在，延安的新的一场运动，使直接接触农村生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不但去教育农民，而且还向农民学习^③。

“下乡”同时也是行政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艺术家、作家和学生们下乡，边区和县政府的干部们也被派下乡去充实

① 参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4～835页。

② 《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

③ 新岛顺良（Nijima Junryo）：《现代中国的革命观念》，第124—143页。该书对陕甘宁知识分子下乡的经历与成就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任斯莱尔·李（Rensselaer W Lee）在《下放制度：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一文中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论述1949年以后的“下乡”，见《中国季刊》第40卷，第62期，1966年10—12月。巴勒特（A. Doak Barrett）则用批判的眼光考察了1957年以后的“下放”，见《十部、官僚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权力》（*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第51、60—61、174—176页，纽约，1967。

基层。干部的下放有助于改善农村的孤立状况，有助于加强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的联系，有助于引进整风运动中所创造的新的领导方式。此外，“下乡”运动对扫除文盲也有好处，而且还有助于培养干部与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①。

那么，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的下乡对于他们的自我教育以及克服乡村生活中的“封建残余”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一些人，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而且对官僚程序耳熟能详的老练干部看来，这一新的举措是一种降级处罚、是对行政效率的打击。但是，在年轻一代看来，这是一次很感人的经历，符合他们服务于救国事业、服务于社会的爱国信念。下乡运动不仅引导战时中国青年将社会发展与社会改造的信息带到农村，而且使他们与广大人民打成一片。

干部和学生们的要在改造农村生活的同时，与农民大众打成一片，这两个目标很快就发生了冲突。变化在很多地方受到了抵制。“下乡”往往意味着权力斗争，因为乡村中原来的当权派感到新来的干部是对他们的威胁。党的领袖们被迫一再指出，外来干部是来协助当地干部工作，而不是取而代之；他们是助手、而不是地方政府的头^②。观念上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外来干部很多是在延安以外的地区接受教育的，他们所带来的关于革命与社会的新观念是对农村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的挑战。不过，尽管有这么多的问题，下乡运动有助于解决根据地农村生活的种种问题。

① 林伯梁：《简政问题》，第17页；《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5月20日、6月9日、6月20日。

② 参阅《解放日报》1942年7月9日社论。

减租运动

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政策包括终止中共的重分土地政策。按照“十大纲领”，战时的政策是“减租减息”^①。但是，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及那些新建的根据地并不努力去实行减租减息。除了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保护个人的土地所有权以外，可以说中共并没有土地政策。绝大部分的边区都认为地主的剥削已基本上消灭了，租佃问题很少被提及。第一次边区参议会通过的法律和其他文件，以及党和政府在1937~1939年间发布的大量文件都没有谈及减租问题。如同在其他根据地一样，在统一战线的高峰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农民的经济问题和农村的政治关系很少注意。

1938年下半年，由于统一战线开始走下坡路，这种形势才开始变化。1939~1940年间国共之间的冲突使中共有效地控制了地主势力盘根错节的绥德和陇中地区。这时也正是中共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中共的势力已遍及全国，并开始执行更加强硬的统战和阶级路线的时期。但是，直到1940年和1941年，由于皖南事变及日军的进攻所引发的危机，中共才改变关于农民和农村的政策，大刀阔斧地进行减租^②。

1942年1月28日，也就是整风运动开始的3天之前，中

①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于1937年8月15日颁布。下面的一节只讨论减租问题。虽然高利贷和债务问题也是长期以来的难题，但1937年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很少见。官方的条例规定月利息不得超过1.5%，但未见有围绕减息问题的运动。《处理土地押金及旧债疑难问题的原则》，《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集续编》，第134~136页。

② 齐武所编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116~131页，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减租运动作了绝妙的分析，北京，1958。

共政治局发布了 1937 年抗战爆发以来第一份关于土地政策的文件。这份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议》所确定的基本方针，直到 1946 年才改变^①。通过回顾统一战线与农村革命的关系，这一文件不仅确定了减租的方针，而且确定了根据地的基本经济政策，它主要强调的是：

(1) 承认农民（包括雇农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

(2) 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士绅且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为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士绅。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证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

(3) 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改善工人生活的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

^① 该文件在《中国近代讲义》中被编入毛泽东的名下，见该书第 460 页。该书的英文翻译见劳伦·伯兰特（Loren Brandt）《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 276-285 页。

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①

1942年1月的土地决议，并没有明确否定战争初期所制定的统一战线和土地政策。但是，它在如下两个方面与以往的官方立场有所不同。第一，它将“生产仗”提到与抗战同等重要的地位。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被封锁的根据地，生产很快就成为党与政府的头等大事。从1942年起，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成为党与政府的主要工作，农村生活的问题也因此而引起关注。大生产成为抗日战争和农村改革的结合点。第二，中共连续5年来一直崇奉民族统一的观念，现在转而重提阶级斗争和“封建剥削”，并且强调党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代表。表面看来，党的指示要求党“不要对地主或农民采取片面的立场”。但是，随着农民积极分子们重新开展对地主的斗争，党关于“削弱而不要消灭封建剥削”的界线便常常被弃置一旁了。减租运动加上其他的税收政策，有时将地主的大量地产化为乌有^②。这样说来，土地决议引发了一场火药味很浓的斗争，通过有组织的农民扫除地主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控制。

1942年“关于土地政策的决议”常常被引述来说明，与1946年统一战线破裂之后的政策相比，中共的战时政策是多么温和^③。但是，从政策演变的角度来说，这个土地决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引发了减租和打击地主的群众运动，改变了先前五年对统一战线的强调。在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共采取激进的

① 伯兰特：《历史文献》，第278～279页。

② 生动的例子见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127页。

③ 参阅赵国钧《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第38～44页，纽约，1960；伯兰特（Brandt）《历史文献》，第275～276页。

阶级立场的一个重要步骤，而后终于在 1946 年演化为全面的土地革命。

将以减租为特定形式的土地革命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表明中共对解决农民和经济问题有了新的、更为成熟的思路。江西时期的土地革命是为了均分财产以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但是，土地易手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经济的大破坏，因为伴随着土地革命的是战争的破坏、对工商企业的剥夺、没收财产所造成的恐慌、以及农民与商人们的茫然不知所措。无论如何，建立大致上普遍均等的小农业生产减轻了那些赤贫者的困难，却无助于经济的发展。1942 年的综合政策的显著成果之一，是将以减租为外衣的土地革命与发展农村经济、转变农村社会结合起来了。

在 1942 年整个边区对租地状况作了一次调整之后，中共当局对所有土地的所有权、面积、产量和租佃关系都进行了登记或重新登记^①。这不是简单的簿记活动，而是重点清查逃税或违反新土地法的行为。例如，调查表明 1937 年重返边区的许多地主，都用非法手段夺回以前被没收分配了的土地或霸占公地。因为土地革命是在混乱、恐怖的气氛中进行的，土地的新主人往往并没有合理地登记他们的土地^②。

1940~1941 年在绥德进行试点之后，中共于 1942 年在 10

① 西北局率先对租地方式、耕作方法和村子里的政治关系进行了实地调查，1942 年 2 月西北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土地关系委员会，由高岗带队到绥德去调查。经过 2 个月的调查，关于租地期限、地租、三三制政府及经济建设的报告分别发表于《解放日报》1942 年 2 月 19 日，3 月 23、24、26 日，关于其他地方的调查报告见《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15 日，7 月 25 日，10 月 15、21 日。

② 关于租佃关系中的违例行为及解决方法，《解放日报》有详细的报道，见该报 1942 年 4 月 15 日，5 月 12、15 日，6 月 6 日，7 月 25 日。

个县内推广减租减息，大部分县份是绥德和陇东的新区，那里的地主比较厉害。公开的目标是减租 25%，使租额不超过总收成的 37.5%。像战时的许多纲领一样，中共故意采纳国民党写在纸上但从未实行的许多法规^①。1942 年的减租运动是按温和的、阶级合作的调子来进行的。然而，当在 1942 年达到高潮及 1943 年的秋收时节，出现了暴烈的阶级斗争。起初，中共花大气力争取地主的主动合作，使他们将减租视为对抗战事业的支持。绥德大地主、边区副议长安文钦关于减租的口号被广为宣传。著名的米脂县杨家沟的马氏地主被安排到减租委员会中任职^②。但是，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对地主的压力越来越大，原先那些关于地主合作态度的赞誉也被关于斗争地主的报道所取代。拒不服从的地主，包括两位在米脂县当区长的地主，被揪出来，当众批斗他们抗拒减租的行为^③。

1942 年下半年，减租运动达到高潮，重点是动员农会及其他团体来强制推行减租。在持续四年一直强调团结与稳定之后，现在转而号召农民积极分子去将群众鼓动起来。如果说其目标与手段都比较温和（例如，实际上并没有关于使用暴力的报道），这种新秩序所要求的平等可以说是早期土地革命的回声。

正像在土地革命中一样，减租中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克服农

① 毛泽东在 1944 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想提醒你注意，1930 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土地法限制地租不超过收成的 37.5%，第二茬收成则不收租。但国民党政府实际上不愿依法而行。”甘德·斯坦（Gunter Stein）：《红色中国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第 113 页，纽约，1945。1942 年中共颁布的一项关于保护佃农权利的法案，据说就是以国民政府 1932 年颁布的训令为基础的。

② 《解放日报》1942 年 11 月 9、25 日，12 月 6 日。

③ 《解放日报》1942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8、23、27 日。

民对地主的报复所持有的恐惧。在那些实行减租的地方，农民都是在地主的压迫下生活的，地主与农民之间原有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共产党根据地政权的建立而改变。他们怎么能够违抗那些有权有势的地主？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组织农民协会来领导农民并与地主势力抗衡。小组会议使农民的恐惧心理一扫而光，并激发起他们的斗争精神。一个关键的步骤是农会和政府不许地主退佃，保证农民的承租权。

农民有理由恐惧。例如，马家地主就曾经驱逐要求减租的农民。1940年，马瑞堂的佃户要求将地租减到30%，但在退佃的威胁下，他们还是被迫交50%的租。但是，在1942～1944年的减租运动中，更富有战斗性的农民组织则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43年，马维新在佃农们的强烈要求下同意减租。但是，需要一再对马家地主进行斗争才能减租这一事实也表明，不完全消灭地主赖以存在的剥削制度，便不能彻底解决问题^①。那些公开热烈地支持农会的农民要补缴地租，农民的恐惧与不安感在这种情形下是难以根绝的。

减租协议所造成的心理作用是很大的，但这不能与土地革命时期地主的被侮辱、被处决或被迫逃亡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同日而语。正像韩丁（William Hinton）和弗朗兹·凡农（Frantz Fanon）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从被压迫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喜悦与积极参与消灭被压迫者的暴力斗争紧密相连^②。40年代初

① 《解放日报》1943年10月30日，1944年12月20日。看来在1940年发起减租运动之前，中共当局就已与马家地主达成了某种妥协。马家地主有几位继续在政府任较高的职务并留有大片土地，尽管政府通过重税来削弱他们的权力。他们中间最大的地主马维新在1942年仍然有121家佃农。延安农村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86页。

② 韩丁前揭书；弗朗兹·范农（Frantz Fanon）：《地球的苦恼》（*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纽约，1965。

期陕甘宁边区很少有这种情形。这时农民的义愤被疏导于减租的温和要求之中，减租只是限制而不是摧毁地主的权力。的确，在减租过程中很多地主仍然利用边区复杂的租佃安排，来保持其原有的收入水平^①。

减租是解放农民发展经济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们认为投身于减租会激发出“生产热情”，在地租分成中收获更多的农民，将更加努力实现增产增收。而且，更多的收入将使他们能购买更好的农具、种子、肥料甚至于牲畜，从而增加产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农民大众在减租的群众运动中受到鼓舞，为随之而来的合作运动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②。

只要地主以及对地主的恐惧依然存在，减租就会继续遇到麻烦。但是，1942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逐步消除了地主的权力，而且并没有像暴烈的土地革命那样带来不良的后果。此外，减租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为发展社区组织创造了条

① 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法规对不同形式租地方式都规定了减租的幅度及最高租额。按照这些法规，最高租额为30~45%，视地主是否提供食宿、农具而定。必须指出，30%这一限额作为一个标准，大概反映边区的贫困状况，比中央地方法所规定的37.5%更为激进。见《陕甘宁边区地租法补充说明》，1942年12月9日，载《解放日报》，1943年1月23日《边区的土地租佃形式》。又见《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集续编》，第120~128页。边区基本的地租形式是“定租”和“活租”两种。定租要求佃农以谷物形式交租，这一形式对在外地的地主最普遍。在绥德，因为该地比较肥沃但人多地少，租额较高，定租通常定为35~40%。在其他地方，地主的租额可低于20%。在那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山地，地租还要更低。活租则是按当年收成分成，减租前通常是40~50%归地主。活租的灵活性主要是当地主提供食宿、农具时，租额就要高些。活租对边区新来的移民特别普遍。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263页。

② 参阅《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2页；第4卷，第129页。《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3日，1943年10月1日，11月14日。

件。在减租运动中扩展开来的农民协会组织在后来的大生产和合作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合作运动

1942年的高干会议决定，对农村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生活实行大变革。核心的一条是对农业生产这一农村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采取新的办法。原先激进的土地革命并没有改变小农生产制度。其实，陕甘宁边区土地革命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后果是强化了小农生产、削弱了传统的劳动互助。例如，延安和安塞两县参加互助的人数1940年才恢复到土地革命前的水平^①。

1942年的行政改革和减租为组织互助组铺平了道路。互助的目标是改变生产过程、发展农村经济并使之成为社区发展的焦点。毛泽东在1943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在过去束缚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边区的封建剥削关系。一半地区经过土地革命，把这种封建束缚打破了，一半地区经过减租减息之后，封建束缚减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边区就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

但是，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

^① 《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①

中共对生产的关心以及组织生产的努力都远在1943年合作运动之前。不同形式的合作社、特别是消费和交通合作社，中共十年前在江西就组织过。在刚完成长征、到达陕北的头几个周就组织了类似的合作社^②。但是，1943年以前组织的合作社几乎全都是自上而下来组织的，并由党和政府的干部来领导。农民在其中没有多少权力和主动性，因而，在农民们看来，那些都不是他们的合作社，而不过是政府的机关。毛泽东在1942年底，将以前组织合作社的方法做了这样的描述：

1939年以前，各地的合作社以公家的股金为基础，再加上向群众摊派所得的股金，这时候是带有国营性质的，多成为县、政府的公营商店。合作社的事业不是面向群众，而主要地是面向政府，替政府解决经费，一切问题由政府解决。这是第一阶段。1939年后，提出了“合作社群众化”的口号，但各地仍多用旧方式在群众中去扩大摊派的股金，来推行其所谓“群众化”。因此，合作社仍被群众认为是摊派负担，而不认为是群众自己的。合作社的成员，仍然是和公务人员一样，要群众优工代耕，群众看不到合作社对自己有多大利益，反而增加了群众的劳力负担。^③

① 毛泽东：《论合作社》，《毛泽东选集》，第185页，1944。在毛泽东看来，合作社是走向集体化的一种过渡形式。参阅《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5页。

② 本书第3章论述早期的合作试验。

③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59～60页。

除了个别地方，这些早期的合作社对该地区的经济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这些合作社主要是在商业领域，对农业风马牛不相及。到1940年，中共意识到这一运动的失败，并实际上废除了少数成功的运输和消费合作社之外的所有合作社^①。不过，延安南部的南区合作社是一个模范合作社，它一直办下来并在1943年以后的合作运动中一再作为典型来推广。

南区合作社的起源和曲折的发展道路体现了合作运动的主要方向。这一合作社虽被树为榜样，它的发展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南区合作社是一个“综合合作社”，也就是说，它兼有运输、消费，以及工、农业等方面的复合功能。它迅速壮大是因为它不断扩展到新的经济领域。到1943年，南区合作社有4000户入股，共有资金6百万元，此外，它还有“1800万元投资于运输”，垄断了盐与政府供应物资的运输，支配了延安县的经济，对发展延安县的工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广泛的业务范围包括消费品供应、粮食储存、餐馆、纺织厂和信用社^②。

有几个特色可以解释南区合作社为什么成了合作运动中的典范。其在柳林的中心站处于连结绥德、延安和西安的公路交接点。因为靠近延安和柳林，具有政治上的优势，也便于官方的观察。这一地区在当初是安置绥德及其他外地移民的地方。合作社对这些移民大有帮助，移民们也为合作社的扩展提

^① 《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② 《1943年的经验》，第1~64页；何钧：《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组织起来》，第249~253页；白森：《南区合作社是怎样组织的》，《组织起来》，第254~258页；参阅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56~81页。

供了丰富的劳动力^①。

南区合作社的迅速扩大，以及它抓住时机向全新的领域伸展、将很多分支及团体包含到合作社中来，这些都是中国现代企业发展常见的特色。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将中国这种企业的特色比之为“通用汽车”模式，也就是将很多独立性很强的多种多样的企业组成一个整体。这与“福特”模式（也是苏联模式）形成对照，那种模式是以技术上的高度一体化及高度的中央控制为特征的^②。不过，与“通用汽车”公司不同的是，南区合作社不是合并本来存在的那些公司而组成的，而是按社区或行政上的需要不断创办新的企业。

尽管南区合作社后来被称为“民办”企业，但其初期的“官办”色彩很浓。其目标很难与政府目标区别开来，最初的资金和管理是由县、区和乡政府提供的。

南区合作社的“三十里铺”是区政府于1938年冬以2000元资金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与从事一乡到七乡之间贸易的贪婪的商人竞争。但是，在9个月内它就被迫关门了。官方的解释是它的负责人没有搞好与群众的关系。1939年11月，区长重新开办这个分社，这次搞了个新花样，要求民众投资。关于这一新办法的简单描述也很有趣：“首先，他利用个人关系让本地商人温漂流负责筹办个人资金。”结果是政府与商人合股办起了一个企业：区政府投资100元，区合作社投资200元，7个商人各投资100元。如果第一步是对商人的挑战，第二步则是基于商人的支持。100元当然不是一笔小钱，没多少人能付得起。因而个人股东全都是富人，都必须投资100元以上。

① 一些在30年代的成功做法，在60年代又重新被推广。迈德尔《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一书所描述的就是南区合作社发起地的柳林。

② 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组织与意识形态》，第298～308页。

后来，由于县政府以及县建设局的要求，这一规定改变了。“三十里铺”迅速兴旺起来。据说其资本发展到14万元，股东超过300人^①。

这一分社的历史揭示了合作社组织者左右为难的困境：和商人合作或者消灭他们。农民对合作社兴趣不大，没有资金、没有经验、对商务及合作社的旨趣也所知甚少；而商人的参与则可能违背合作社服务民众的目标。究竟是应该依靠商人还是农民大众？如果两者都欢迎，那么是否应该限制个人的股金以防止商人对合作社的控制？决策权应该倾斜给投资多的商人和地主股东还是投资小的农民股东？与此相关的是合作社的根本目标问题：合作社的目标是否就是为了通过减低物价或分红来服务于它的成员，还是要服务于当地的全体民众、将廉价商品和低息贷款提供给所有的人？最后，合作社应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助手？经过在南区和其他地方7年的实践，中共情愿放弃政府的控制，增强社区自身的自主权。当然，民众管理的理想依然是打了折扣的，与之并存的是政府监督的倾向和政府给合作社在扶贫和税收方面派任务的倾向。但经验表明，合作社要能够生存下去、要成为独立的社区组织，就必须扎根于农村并为其成员服务^②。

到1943年，所有困扰南区合作社的难题都解决了。由于垄断了盐业贸易以及整个延安县的政府订货，这个合作社在抗战后期对边区内部贸易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随着政府投资的减少和合作集中力量来为其成员服务，它越来越成为连结政府与社会的纽带。但是，南区这种综合性的合作社在1943年

^① 白森：《南区合作社是怎样组织的》，《组织起来》，第256～257页。

^② 刘建章（南区合作社主任）：《合作社管理的一些经验》，《组织起来》，第264～269页。

的合作化运动中并没有直接成为被效法的对象。就整个边区而言，南区合作社的规模太大，程度太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合作社的重点不是解决农业生产这一边区经济最基本的问题。而且，由于1941年边区各级政府的财政普遍困难，南区合作社在最初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资这一条也使之难以被效仿。但是，中共总结了南区合作社的成效，决定通过互助的方法来转变边区的农业经济。

互助与农业发展

尽管合作的实验可以上溯到江西时期，但中共在抗战初期的文献几乎没有提及合作社。到了1942年，中共对新的和传统的互助方法都进行了实验。毛泽东在1942年12月的高干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是毛泽东分析变革农村社会所遇到的问题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他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最完整的论述。通过论述传统的互助方法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方面的适用性与局限性，这份报告为合作运动这一中共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会议结束之后，组织互助组立即成为转变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战略措施。

陕北农民素来从事两种形式（以及种种变体）的互助：变工和扎工。变工是那些自耕农之间的劳动协作，扎工是雇工组共同劳动的一种形式。变工通常是两户农家之间在春耕、秋收等农忙季节的协作，有时变工的内容也包括牲畜和农具。因为这种协作需要互相信任，所以变工素来大多局限于亲戚朋友之间。而且，当变工包括牲畜时，往往只局限于富裕的农民家庭。实际上，贫农之间的变工成功例子很少。

以扎工为形式的集体劳动，通常是十余雇工共同组成一个扎工队来受雇。这些扎工队通常会为一名“工主”服务，“工

主”则为本地富农或地主所充当。扎工队还有自己的工头，充当扎工队与“工主”之间的中间人，使双方成交。扎工队实际上遵从的不是合作原则，它组织得很严密、有严明的规矩，并不具备变工协作中的那种互助合作精神。而且，就扎工队与“工主”及“工头”之间的关系而言，明显存在着剥削因素^①。

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和《解放日报》1943年1月25日的社论等，是中共发起合作运动的文献。这些文献表明，中共当时对边区的经济问题有透彻的分析，也看到了互助协作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威力。这些文献也体现着那些找到了新的社会蓝图，而且对实现这种蓝图充满信心的人们的兴奋心情。而且，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变工和扎工所带有的剥削特性以及它们对个人关系的依赖。传统的协作方法所带有的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是要努力克服的，人们将通过成立新型的互助组来提高工作效率与产量。这种新的合作经济有赖于全体民众的积极参与，男女老幼都参加进来，取长补短。更大的目标是通过经济的发展来促进救国事业。但这种经济的发展与农民的个人的利益紧密相连，合作事业成功的话，每个参加者的生活都可以得到改善。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的原则：“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这样，才能做到不违农时，才能做到及时翻地，及时下种，及时锄草和及时收割。”^②

在边区发起合作运动的时候，中共投身于前所未有的组织

① 西北局所编著的《陕甘宁边区农村农业互助的种种旧形式》，对传统方式的变工和扎工有详尽的介绍，见《中国农业合作运动史料》，第3~14页。

② 《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解放日报》1943年1月25日。这篇社论重印于《中国农业合作运动史料》，第145~149页。其行文风格很像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工作。在土地革命中，个人的风险大、但革命的成果也显而易见。中共当时那种建立千年王国的口号，立即得到那些富有造反传统的贫苦农民的热烈响应。中共在1943年再次将焦点放在农村，但这次的目标是要带领农民改造乡村经济。共产党人意识到互助的最初的动力必须来自乡村之外，要靠外来干部的组织与教育工作。但是，从长远观点来看，合作运动的成功有赖于农民的支持和当地热心干部的成长。总而言之，除非互助合作在短期内能够在提高劳动效率和增强社区协作等方面带来看得见的效果，农民的疑虑与抵制便无法消除。当合作运动在1943年兴起的时候，官方文件表明他们对这些问题很清楚：

但是，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劳动互助组织必须以群众的自愿为基础，以防止任何形式的形式主义，如发号施令或“编花名册”等。如果我们将那些对互助认识不清的人硬拉到变工队或扎工队中来，编制花名册，以为这样就可以“万事大吉”，那么，生产效率和积极性不但不会提高，反而还会下降。此外，组织劳动互助时我们必须记住，它是积极的和固有的；我们必须绝对注意有关地区的固有条件，并把它们区别对待。这样，如果我们今天在人民群众中努力发展一种互助劳动组织，贫困队编组就一定不能过大。城镇和行政村都不能作为生产单位。因为如果组织过大，就要浪费大量劳动力和大量时间。最好以自然村为单位……

至于劳动互助的领导，必须通过群众，挑选和提拔那些受群众尊重、生产积极、有能力的人担任。^①

^① 《解放日报》1943年1月25日社论。

因地制宜、不强求扩大规模等原则表明，中共很关心民众的支持与积极性。大的互助单位，特别是那些横跨几个村的互助单位，在联络、协调方面会遇到很多问题，增加行政管理的负担，特别是超越了农民群众的关系圈。合作运动的远期目标确实是要使农民的视野及社会联系超出三家村的范围，但是，这种社会改造及建设新国家的任务绝不是一夜之间就可轻而易举地实现的。成立互助组，建立超出一家一姓的社会经济网络，是引导农民建设新的社会与国家的关键的一步。在整风运动中，这种思想被贯彻给各级干部。在精兵简政、下乡、减租减息等各种互助联系的运动的基础上，中共对传统的互助协作方式进行改造并发展出新型的农业互助。

1943年春耕之前，中共号召将互助作为农村经济的基本方式。据官方的报导，边区30万劳动力中的15%在当时参加了互助组织。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参加互助组的劳力增加到25~40%，也就是说，至少有75000人参加了互助组。夏季的除草工作素来就是通过互助完成的，这件工作安排互助很方便，因为不需要交换牲畜等。根据报告，1944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民增加到总劳力的50~70%，但在1945年的调整、巩固阶段又退回到28~45%。起初，互助组往往徒有其名。据一份调查报告，1943年春耕中，县正式报名参加变工的有6794人，但实际参加变工的只有2700人^①。尽管具体数字可能有出入，但毫无疑问，1943~1945年间边区成千上万的农民沿互助合作的方向重新安排他们的经济活动。

对于形式多样的合作劳动、集体劳动、领导技巧、经济刺激、精神刺激等社会经济改造过程中的复杂情况，我们难以都

^① 《中国农业合作运动史料》，第244页。《解放日报》1944年4月24日和1945年12月21日载有统计数字。

究其原委。我们将集中精力探讨两个核心问题，分析合作运动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努力。第一个问题是自愿原则与独立性问题，这是相对于政府的控制和来自上面的压力而言；第二个问题是互助合作运动在目标方面的二重性，它既要增加生产、使其成员受益，同时又要服务于整个社区或政府。

在运动刚发起的时候，中共决定利用带有明显局限性的传统协作方式。正如舒尔曼所说：

在现存乡村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合作社，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传统的劳动协作是靠亲戚朋友关系来维持的，外来者（党的干部）很难置身其间。而且传统的劳动协作往往由富农和中农说了算。……

中国共产党人一再遇到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利用传统的劳动协作方式看来是明智的，但以血缘为纽带的劳动协作具有极大的排他性。而当党员干部加入到这种组织中去，它的排他性消失了，但它的内聚力也同时消失了……必须在自发生长的组织与人为创造的组织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①

组织纪律性与自发热情两者，都体现在传统的互助协作的优点与局限之中：扎工以前者见长，变工则以后者见长。最后所采纳的变工和扎工形式是一种妥协方案，既尽量发挥合作的那一面，同时也尊重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及个人的主动积极性。虽然多达25人或全村的变工组也在尝试之列，但最佳效果一般是10人左右的变工组。为了克服以往的变工素无定制的弱

^① 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组织与意识形态》，第423～425页。

点，新组建的变工组要求推定一位长者为领导，成员须超出亲戚朋友的范围，特别是要包括贫农。变工组越来越长年协作，而不是在春耕或秋收之后解散。

扎工的方式在经过一定改造之后，有利于安置那些没有土地、也没钱买地的新移民。新组织的扎工革除了以往的工头、工主的剥削性。政府帮助那些新的扎工共同开荒，并共同耕种这些属于他们自己的田地，而不是受雇于富农。此外，一些贫农得到政府或合作社的贷款，也可以雇请扎工队^①。

合作运动的关键问题是分配的标准如何确定。特别是人工与资金、畜工之间如何换算。这一问题与中共对富农的矛盾态度紧密相关。一方面，富农的土地、牲口和技能被认为是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又担心富农对贫农的控制、并将劳力视为分配的最主要依据。直到1943年，中共鼓励富农参加互助组、并认为互助组的成功必须以维护私有制为前提。在双重地对待资金、牲畜、农具和劳力进行分配时，对于提高生产的效果最显著，因为贫、富双方都有利可图。工钱通常是按劳动日计的，而不考虑技能与体力。来自社区或领导层的压力是要发展互助组的新成员、提高互助组的产量。但是，因为家庭耕作制度并未废除，互助组的成员依旧耕种自家的土地，互助组必须在竞争中显示出优势来，否则就难逃组员退组以至互助组最后散伙的命运^②。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合作社是农户与国家之间的中介。合

① 《中国农业合作运动史料》，第25、84、217~260页。

② 为更高层次的合作而进行试验往往以失败告终。在延安县，新垦的荒地归全队所有，其收成起初按各家各户的劳力和畜力来分配，而不是按实际工作大数来计算。这一情况被发现后，立即被改了过来。因为那样一来农民都会将更多精力投到自家的田地中去。《中国农业合作运动史料》，第237~238页。

作社将逐步对其成员的税额作出评估，而不需要政府直接向农民收税；由于本地举办学校和民兵等所需的款项可用合作社的利润来支付，政府也就不必向群众集资了。合作社将在安排本地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生活等方面大显神通。农村发展的关键将不再是农户和政府机关、而是合作社^①。

互助组是农民大众们所熟悉的一种合作方式，是对土生土长的传统的一种创造性的利用。它们不是政府的机关，尽管它们受到政府的鼓励，有时是由政府派专门干部下来组建的。互助组的成立不仅对农村的经济模式带来了基本的变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可能性，而且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合作原则在1943年有利于克服农民的狭隘性并为农村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

为了全面加强根据地建设，中共在1943年将主要精力从政治、军事战线转到经济战线。新的目标是要在合作、群众动员与参与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与繁荣。这是一场生产仗，它从陕甘宁开始，迅速发展到其他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在1943年也得到大规模的推广与改进。其中最重要的发明创造是“机关团体生产”，和以向劳动英雄学习为中心的新的物质和精神刺激。

机关团体的生产是对党政机关、学校、尤其是军队的号召。从1943年开始，所有的机关团体都投身于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活动。利用军队与文职干部并非新鲜事。1936年埃德加·斯诺就对“星期六大队”进行了报道：“苏维埃官员、赤卫队、

^①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59页。

游击队、妇女组织及邻近的红军都动员去务农至少一天。”^①不过，“星期六大队”很快就消失了，至少，不再看到对它的报导。不久，一些军队被专门抽调去搞农业生产。

毛泽东对初期实验性的机关组织的生产有过论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开始只是应付危机的紧急措施，后来如何引起中共领导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红军在江西时期不事生产，因为当时粮食充足。在陕北，军队于1938年开始种粮食，养家禽家畜并自作军鞋，目标是改善那些驻守边远地区的军队的生活并提高他们的士气。整个区在1939年发起生产运动，以便克服国民党封锁所带来的困难^②。在这个时候，中共意识到了“脱产”的队伍和机关在生产方面的巨大潜力。这些强壮的劳动力在尽他们作为士兵、党政干部和学生的责任之余，为什么不可以自力更生来养活自己呢？这样，军队参加生产劳动的实验便开展起来了^③。在改善军队生活的同时，处于贫困地区的民众的负担也相应减轻了。但是，只是在1941年的经济财政危机和整风运动之后，机关团体的生产运动才在边区全面铺开。1943年的目标不仅是实现边区的自给自足，而且是每个机关和军队单位都要实现自给自足。

1943年的生产运动是要将机关团体的全部潜能都发挥出来。自那以后，所有的干部都要参加大量的劳动和经济管理工作。包括毛泽东在内，党、政、军领导人都要参加某种形式的生产劳动。这不是孤立的举措，而是一种新的领导方式的有机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241页。

② 李富春：《加紧生产、支持抗战》，《解放》第65卷第8期，1938年12月28日；易平：《陕甘宁边区各县的生产运动》，《解放》第81卷，第24期，1939年8月20日；李富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解放》第81卷，第7~9期合刊，1939年9月30日。

③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93~98页。

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干部既是领导者、又是参加者。正像整风运动中在小组会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领导干部不再高高在上而是直接面对不同的意见与行动一样，生产运动也旨在通过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相结合来增强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干部与人民之间的团结。

我们可以简单地考察军队在机关经济中的作用。尽管军队在生产运动中起先锋作用，但它在机关团体中具有代表性。到1943年，军队的所有单位都投身于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但也兼及商业和小规模的工业。实际上，军队在1943年的预算是以军队半自给、减少政府津贴为基础的。突出的单位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自1938年以来就在南泥湾从事生产。

南泥湾实验在最初是模仿两千年前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屯田制”。三五九旅被派到因为100年前的回民起义而弃荒的地带。开荒出来的土地归三五九旅集体所有，生产的成果、包括商业和小规模的工业收入都归该部所有^①。

下而所引述的是王震关于他的军队从事生产的最初情形的描述：

当我四年前带领部队来这里从事第一项军事生产时，我们没有窑洞或屋子住，没有工具，买不到食物，要找农民来为我们干活也找不到。为了有东西交换最紧缺的物资，我们砍伐硬松卖给村民，相邻地区的人喜欢用它来做棺材。由此，这些地区的地方官员协助我们从那些愿意尽其所能帮我们的农民那里借到一些老式的工具。

直到年轻的刘连长在山顶的一座废庙里发现一个很旧

^① 毛泽东将历史上的屯田视为三五九旅的样本，《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44、145、156页。南泥湾地处延安、延长、延川三县交界。

的大铁钟，我们的工具问题才得到最后解决。钟太重，搬不下来，也不知当初是咋样搬上去的。刘连长就地挖洞造炉，将它熔化了，加上从附近拣来的废铁，共有2000磅，请来一些铁匠，帮我们造成工具。^①

延安传奇正是由这样的业绩构成的。南泥湾战士们的创举被添油加醋、广为宣传。宣传的方式有故事、歌曲、舞蹈、特别是戏剧。这些艺术作品将边区军人从事生产斗争的历史戏剧化^②。

王震的描述集中体现了军队中大生产运动的两大主题。其一是用自己的双手征服自然、实现自给自足。三五九旅没有农具、没有资金、也没有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它必须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源以及在当地能够得到的帮助。第二个相关的主题是发明创造，也就是创造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新的生产技术。熔掉铁钟来炼新钢，就是这种技术之一。南泥湾很快就成为榜样，边区及全国都派人到该处取经，军队的生产在1943年已经成为根据地军队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泥湾成为艰苦奋斗及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③。

1943年三五九旅的预算自给率达82%。毛泽东1943年要求军队各单位都实现80%的自给。虽然这是一个没法实现的

① 斯坦，第67~68页。对三五九旅生产活动的详细报告，见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23~144页。

② 如谢光智的《南泥湾开荒》，载《抗日传奇》，第157~167页，北京，1959。其传奇故事已接近文学创作。

③ 延安时期的“南泥湾精神”及60年代对这一精神的提倡，参阅约翰逊《中共的领导和民众的回应》，第423~425、435~437页。大跃进时期所提出的打生产仗及文化大革命中将军队作为革命精神的象征，都可以从延安时期找到先例。

目标，军队各单位确实增加了他们的自给程度（到1944年大概1/3~1/2）并减轻本就贫困的边区的经济负担^①。

军队在经济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正好典型地体现了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不同。其他军队都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共的军队则通过共同抵抗日军的侵略和共同战天斗地、改善生活来建立军民鱼水情。在陕甘宁边区，军队为自给自足所进行的努力，大大减轻了维持庞大军队的负担。而且，军队中那些技术与经验对发展边区的中、小型工业很有帮助。

工业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中，虽然有组织的生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毕竟处于从属的地位，因为居主导的仍然是私人的生产。然而，在工业生产中，便是有组织的生产和政府经营的企业居主要地位了。商业的情形也与此相近。在根据地建立之前，这些地区几乎没有工业或手工业，商业也只限于买进棉纱、布匹，卖出食盐。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大量需要印刷设备、纸张、军需品、农业生产资料。在统一战线的高峰时期，这些商品的一部分是利用国民政府的津贴来购买的。但是，从1939年开始，国民政府对边区的封锁迫使中共领导人自力更生，自己生产这些必需品。因为缺乏土生土长的工业基础，中共只好依赖官办工业来解决问题。尽管中共的官方政策是鼓励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疑惧根深蒂固，政府也深感有必要

^① 据报道，当时延安边区的5万军队生产了31000担粮食，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实现了79.5%的自给。毛泽东在1945年1月一次劳动英雄大会上说，1944年边区各军队和各机关的总开支相当于26万担小米，其中16万担是人民交的税，其余40%是自己生产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23、155~156页。

控制战略物资。这样一来，依赖官办工业的决定便更加显得理直气壮了。

公营与私营工业在这一地区都相当有限。表 6-1 是边区政府 1942 年下半年所作的统计，从这一统计也可看到边区政府为发展工业所作的努力。表中几乎所有工厂都是 1939 年后才建立的，而且绝大多数建于 1941 年。当时国民政府加强对边区的封锁，中共只好加倍努力实现自力更生^①。1941 年底，边区当时有 140 万人口，而工人还不足 4000，每个工厂雇工不足 50 人，边区工业发展水平之低，于此可见一斑。

表 6-1 1942 年 12 月陕甘宁边区的工业

工厂门类	工厂数	工人数	资本(元)	工厂门类	工厂数	工人数	资本(元)
布匹	18	1427	26900000	化工(油、肥皂等)	12	674	17030000
毯子、鞋	8	405	11001100	工具	9	237	3662792
造纸	12	437	4100000	石灰	12	432	1777070
印刷	3	379	5200000	总计	84	3991	69670965

资料来源：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 104 页。这一统计显然不包括军工工业。原表的会计数字与上表不同，原表的工厂总数为 62 间，资本总额为 59670963 元。这可能是印刷错误，也可能是一些厂同时生产几种产品。

纺织工业在陕甘宁和其他根据地都是最重要的工业。考察这一工业的发展（见表 6-2），对揭示边区工业的迅速发展与曲折道路具有典型意义。在 1938 年，边区自己生产的布匹在供应总量中所占比重不足 5%，而且绝大部分是家庭手工业的

^① 官方的资料记载，边区产业工人的数量 1938 年为 270 人，1939 年为 700 人，1942 年为 3991 人。陕甘宁边区办公厅：《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第 42 页，1944。

产品。1939年，政府和合作企业开始小规模生产。但是，国民党的封锁不仅使边区当局加强了扩大棉布生产规模的决心，而且还决定自种棉花来纺纱。三年之后毛泽东便能宣布，边区所需棉花几乎一半是自己生产的，总产量约为180万磅^①。

表 6-2 1938~1943 年间陕甘宁边区的棉布生产

类别	年份	工厂数	工人数	产量(匹)
公营工厂	1938	1	96	125
	1939	1	210	1429
	1940	11	850	14740
	1941	29	1845	18750
	1942	16	1083	14565
	1943	23	1357	32968
合作工厂	1938	-	-	-
	1939	2	25	400
	1940	4	82	850
	1941	22	352	4600
	1942	27	385	4500
	1943	38	374	6000
私营工厂	1938	5	34	1620
	1939	16	154	5690
	1940	20	185	4500
	1941	40	205	8460
	1942	50	310	12000
	1943	-	702	19630

^①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1页。边区全民用布约需棉花400万磅。

续表 6-2

类别	年份	工厂数	工人数	产量(匹)
家庭生产	1938		5000	5625
	1939		8000	8750
	1940		10000	12500
	1941		13000	14500
	1942		13500	14158
	1943		41540	45700
合计	1938		5130	7370
	1939		8369	16266
	1940		11117	32590
	1941		15402	46310
	1942		15278	45223
	1943		43973	104302

资料来源：据徐永英《陕甘宁边区》第二卷，第93页数据编制。这些数据最初载《新华日报》1944年5月29日。

封锁的加强使边区政府增加了对工业建设的投资。1941年这种增加棉花生产的努力就初见成效。1941年以来，已有29家公营工厂制造棉布，雇工超过1800人。但是，1942年情况发生逆转。纺织业及其他工业都经历了一个紧缩时期。政府加强了控制，并在这种控制之下紧缩开支、提高质量与效率。其实，这是当时精兵简政政策在工业战线的体现。1942年底，公营纺织厂的数量减少到16间，工人也相应降为1083人。由于工业向少而精的方向发展，那些非骨干的工人和管理人员都被裁减了。棉布生产从1938年到1942年间年增长30~60%，而1942年比1941年的产量还要少一些。纺织业只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工业总产值虽然相对稳定，政府的工厂总数却从97家降为62家。但是，1943年又掀起了工业生产发展的新浪

潮。公营的纺织业及其他工厂都猛增，而增长最快的不是公营工厂，而是家庭纺织业。

在1938年政府介入纺织业的扩展之前，估计有5000名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所织布匹相当于边区总产量的76%。随着大批纺织业的建立，家庭纺织曾一度滑坡。在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中，政府第一次将动员、培训和组织家庭纺织工人，特别是女工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从事家庭纺织的女工从年初的13500人激增到年底的41540人，产布45000匹，远远超过了纺织厂的产量。

纺织业的发展对1943年的革新而言具有典型的意义。当时中共形成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基本原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方针意味着由延安制定总体规划，具体的经营权则下放到边区各地。实际上，边区经济的重点虽然经由边区政府来公布，但实现这些目标所依赖的不是集权的政府当局，而是合作社、公营工厂、私营工厂和边区的千家万户。这也是部分地“解决生产与分配矛盾”的一种努力。由于这一地区原始的交通的条件和分散的人口，将工业集中起来，就意味着在原材料运输和分配产品等方面都要大量增加交通成本。例如，1941年之后，棉花大都是种植在一些边远地区。分散经营意味着纺纱织布都可以就地取材。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农民们普遍学会了基本的纺织技术，就连那些边远落后地区的农民也能分享这种成果。1943年，中共当局放弃了过分集权的做法，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减少了交通成本。这一政策增强了对家庭和民营工业的依赖^①。

农户生产的发展是经济分权的组成部分。由于资源有限，经济计划人员在1942年意识到缺乏劳力严重阻碍着边区的经

^①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07~108页。

济发展。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将所有潜在的劳力都动员起来。我们已经提及鼓励军队、干部和学生参加生产的措施。而就纺织业而言，中共利用了家庭纺织业的传统，通过组织互助组，他们充分利用现成的传统工艺来发展纺织工业。1943年及以后的几年内，成千上万的农妇被动员起来，利用家庭的简陋纺织机从事纺织生产。

就每部纺织机的单产而言，家庭纺织业当然不能与纺织厂同日而言。公营纺织厂每部织机年产量为73匹布，私营工厂和合作社的产量分别为80匹和33匹。家庭纺织机平均年产量只有一匹。但是，家庭纺织业所利用的是原来的“闲人”和农闲时间，而且还免除运输和工厂的其他费用。在推行自力更生方针4年之后，到1943年，地方纺织业就已生产了104000匹布，居边区总需求量的32%，而纺织品增长的相当部分来源于家庭纺织业。^①

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促进中共推行工业分散经营的做法。一个是战术上的考虑，也就是分散的工业更易于对付敌人的攻击。下面还将谈到的另一个考虑是要借此来传播政治和经济上的新观念，并打破社区发展与行业等方面的一些顽固传统。以家庭生产的方式将工业传播到偏远农村就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这是“下乡”运动在工业战线的表现。家庭手工业与合作农业相辅相成，推进农民大众实现农村生活的大变革。

纺织工业的发展体现着抗战时期工业发展的轨迹。其初，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工业发展是由政府和军队这种行政技能

^① 关于棉花和棉布产量的数据源于高子力1944年5月24日的报告，载陕甘宁边区办公厅《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第42～52页，1944；徐永英前揭书，第87～109页；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48～54、93～108页。

最发达的机构来推动的。这种方法反映了强烈的发展愿望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工业发展特征是在膨胀与紧缩之间来回摇摆，但整体上还是发展了。1943年以后，发展与分权逐渐挂上了钩，而且广大妇女投身于大规模的生产及家庭生产，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敌后根据地中，妇女通过参加合作运动、生产运动和游击战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时期对于使妇女走出家门、投身社会生活的洪流具有关键的意义，它标志着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权利诸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边区工业成就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土法制造各种武器。边区以前并不造铁，军事和工业上所需要的铁都靠从外地买进。但是，1941年边区首次用当地的煤与铁矿石炼出了铸铁。在缺乏现代设备及技术人员的条件下，“小高炉”炼出了边区制造武器和工具所需的一些铸铁。据说到1943年，边区用铁的1/3是自己炼出来的。甘德·斯坦生动地描述了边区简陋的兵工厂：

一个兵工厂的厂长在带我们参观时说：我们还不能炼钢。我们尽可能利用我们的军队在敌占区日军铁路上拔下来的钢轨。但是，从敌后运钢轨到延安是很困难的，我们通常只能用本地炼的铁。我们甚至用这些铁来造出很好的迫击炮。

这个兵工厂共有330工人，大约有6间低矮的厂房。工厂中的机器奇形怪状，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那些古式车床、刨床、轧机和压印机，有些是中国造的，有些是美国、英国或德国造的，都是国民党实行封锁之前从西安买来的二手、三手或十手货。还有一些简陋的新机器是边区的兵工厂自制的。这些机器都得到精心护理，而且都能

运转。发动机则是从汽车上拆下来的机头，配上一个自制的锅炉。

这个兵工厂的不同车间分别生产铸铁、迫击炮、炮弹、子弹、刺刀、手枪和钢制注射器（用于兽医方面，防治牲口的瘟疫）。^①

这类工厂是边区的骄傲。从1943年开始，人们兴奋地利用现有的人才与自然资源进行实验。这些工厂所产的生铁，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们为制造某些武器和工具提供便于得到的原材料，也不在于自力更生比越过封锁去获得它们更为合算，而在于这意味人对自然的征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信心。面对日本优越得多的武器和边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人的潜能的发挥是不能用平常的尺度去估量的。

我们已经看到，从1943年起中共将财力和人力都集中于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将每个人经济上的贡献发挥到极限，特别是那些原来的“非生产人员”，包括党政干部、学生、妇女、新移民和二流子。在有组织的经济中，在“下乡”运动和合作运动中，以及在下放工业的运动中，人们创造了新的形式以使这些人都参加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变革。

劳动英雄

如果说长期的发展有赖于农民的主动积极性和社区的共同

^① 甘德·斯坦前揭书，第174～175页。关于铁的生产，参阅《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第55页。这种土法上马炼钢铁的做法，无疑是后来大跃进时期“后院小高炉”大炼钢铁的起源。

行动，那么，必须给以实际的鼓励与刺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利用劳动英雄来充当带头人和模范。中国古代的孝道有学习榜样的传统，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学习英雄人物的方式来展开。中共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在边区掀起了学习劳动英雄的运动。这一运动在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高潮中应运而生。在每个村庄、乡镇、区和县，都推举出劳动英雄，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这一运动的高潮是边区各地180名劳动英雄汇集到延安，开了两个周的表彰会。这些劳动英雄有男有女，也包括突出的党、政、军干部，他们的业绩被广为宣传。

毛泽东在1943年11月29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体现了当时的喜悦气氛，也概括地指出了大生产运动的方向。在表彰了一年来的有组织经济活力所取得的成就之后，毛泽东转而赞誉那些促进边区生产革命化的劳动合作：

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①

中共在1943年找到了许多新方法来深入民众、领导群众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86～887页。

发展经济。当时的种种运动都强调对当地传统的创造性改造，就像互助组和家庭纺织所体现的那样。劳动英雄正是自然成长起来的领袖，他们对当地农村生活的亲身体会使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有效办法。毛泽东将劳动英雄比喻为传奇中的历史人物诸葛亮，表明了他对生产及农民的重视。学习劳动英雄运动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正如《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所指出的那样，“从来只有战争中或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而现在劳动者也可以成为英雄了”^①。

学习劳动英雄运动提供机会来让中共发现、训练和鼓励那些乡镇和县里选出的劳动英雄，以及那些有幸参加延安劳动英雄大会的劳动英雄们，都情愿带着新观念回到他们的工厂或村子里去，以新的姿态促进生产运动的发展。在当时个人与个人之间、工厂之间、军队单位之间、合作社之间和县之间开展的竞赛中，劳动英雄们也起先锋模范作用，这些竞赛也正是1943年边区经济生活的一大特色^②。

以前在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运动已涌现出一批民众领袖，现在涌现为一批劳动英雄，因而形成对传统乡村上层人物的又一次有力冲击。劳动英雄和其他积极分子、以及下乡的干部一起，领导村民们去改造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与经济。

经济发展的延安模式

中共1943年组织发动的生产战并不仅仅是应急之举：从

^① 《解放日报》1943年4月8日。

^② 关于劳动英雄运动的记述很多。参阅赵元明《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1946年版。《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4月30日、9月13日；1943年2月3日、7月5日、11月25日；1944年7月12日，都载有关于劳动英雄的重要文章。

整体上看，它开辟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新路子。在1942年的高干会议上，毛泽东通过比较几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突出中共那些新政策的历史意义：“过去五年的公营经济事业，有了非常巨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民族，都是值得宝贵的，这就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这种模型之所以为新式，就是说，它不是俾上麦式的旧型的国家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最新型的国家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家经济。……人民的需要，还只能由党政予以组织推动，由人民自己动手去解决。”^①

在几乎没有资金的条件下，他提议在乡村一级动员民众来走一条劳动密集型发展的道路。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充分利用起来，包括原来不事生产的党、政、军干部，以及学生、妇女等。大生产运动的最初动力和方向都来自党和政府，但是，因地制宜地实施具体方案、具体的财政安排，都是依靠地方资源、特别是主体民众的积极参与来完成的。延安的领导层可以对转变农村的社会经济提出大政方针，但是，正像在游击战争中的情形一样，种种举措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基层的主动性、奉献精神 and 技能。这是一场生产仗，是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敌后根据地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来的经济发展的游击模式。这是延安道路。

在为这一发展道路辩护的时候，毛泽东驳斥了那种认为在落后的边区无法发展经济的失败主义观点，和认为经济发展与抗战大业无关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反驳纯粹从外国引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毛泽东再次站到民族英雄孙中山一边，将他所设想的发展道路称为三民主义或新民主主义。不过，就事实而言，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及

^①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04页。

毛泽东 1939 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都没有给 1943 年的生产运动提供灵感。《新民主主义论》只是抽象地对经济发展问题一笔带过，对三年后实施的经济改革没什么相干^①。经济发展的延安道路是在战争造成的严峻危机中形成，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定型的。

我们现在必须来评价这些发展模式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来我们要估价的这一时期很短（中共于 1947 年被赶出陕甘宁），二来是实证资料奇缺。如果说早期的一些生产统计只不过是一些粗略估计，1942 年后的那些统计在准确性方面更成问题。政府与经济的地方分权是 1943 年经济发展方案的一大特色，这也必然带来统计方面的问题。但是，尽管缺乏关于整个边区的统计资料，就主要方面而言一些结论还是不难得出的。首先应指出的一点是，动员成千上万的脱产劳力和以互助合作为核心来重塑农村经济，并没有在社会经济方面造成大规模的混乱。互助合作运动在初期进行得很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共利用乡村现成的传统协作方式的技能。家庭所有制没有改变，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单位的角色也没有改变，而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导农民参加劳动互助。

作为边区基本经济指标的粮食生产，在这一时期持续增长，但增幅不大^②。据报告称，作为边区主要工业的纺织业 1943 年获得大幅度增长，但我们没有 1944 年以后的数据。机关团体的生产，尤其是 5 万正规军所做的贡献，在那种经济危机的条件下是值得书写的。军人及一些政府干部所贡献的不仅是人力，而且是边区所缺乏的工业、商业和管理技能。这些技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23-670 页。

② 粮食产量的数据见本书第五章。

能从1943年起在生产运动中大派用场。对动员技巧、传统劳动协作方式和家庭纺织等的利用，意味着人们有志于发掘潜力来发展村一级的经济。而且，这些经济方面的变革对农村的社会政治生活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中国革命进程的角度看，中共在后来显然将1943年的生产运动视为回味无穷的成功范例。

教育与社会方面的变化

1942~1943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创新是农村社会发展宏伟蓝图的主要特色。正如我们在合作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基本的观念是要创造民办的机构。民办这一范畴所指的是将原先由官僚、专家及地主上层分子所垄断的一些活动改由广大民众来自办，由整个社区来掌握。当时在教育方面的新进展、特别是那些激进的教育方针，对农村生活的转变是中心的一环。

1944年民办学校遍布整个边区，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农村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在成千上万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建立学校的村庄，当地干部、劳动英雄和村领导担负起了建立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学校的责任。与此同时，社区责任的扩展也涵盖了边远乡村中的清洁卫生问题。最后，文化运动别开生面。从1942年开始，秧歌成为边区民间文化的标志，这一民间传统歌舞经过改造之后被用来鞭挞社会的弊病、歌颂新社会的道德风尚。这些秧歌剧生动地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政府的政策展示给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大众。从1942年开始，秧歌剧团深入到边区的边远地区巡回演出，将新文化直接传播给成千上万的农民。这些秧歌剧团的目标是通过发掘一些民间传统题材将新文化与农村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然后到农村去演出，使人民得

到享受与教育^①。

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边区政府在医疗卫生、教育和民间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够感人的了。考虑到陕北是一块特别封闭、贫穷和被人遗忘的地方，考虑到当时的战争环境所带来的财政压力，边区政府的这些成就实在了不起。取得这些成就，部分地是通过大规模地增加教育机会，通过普及基本的医疗卫生设施，通过传统革命的、给人带来希望的民间文化。但是到了1942年，早斯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主要是没有触及很多边远地区的民众。而且，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人们往往是生搬硬套沿海地区或西方的经验，而不是来自边区的具体需要。

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详述当时那些社会文化运动。但是，关于教育实践与理论方面的改进，对乡村改造的意义是如此之大，我们有必要简单考察它的一些重要特色。整风运动期间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也波及教育界。虽然边区的教育发展很快，但到1942年边区仍旧是文盲充斥的地方。中共不断地扩大办学规模，并热情地鼓励农民上学。但是，学校仍然是集中于县城，只有极少数家庭能够送他们的孩子到那里去上学，绝大部分的农村都没有学校。小学生的数量在1937年是5600人，到1939年下半年猛增到22000人，1944年上半年又增加到29500人。但是，适龄少年估计有165000人，仅仅1/6能够接受最起码的教育^②。教学内容也成问题。批评者在1944年

① 关于民办医疗卫生，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0日；关于秧歌和文化，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4月11日，5月27日。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第63页；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十一次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联席会议，决定有关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提案》，第41~43页，延安，1944。

初指出，修改后的课程仍然与农民生活无关。学生们并未都成为他们所在村庄的从事农村革命的领导人，上学之后都厌恶、漠视生产劳动。这样，在他们毕业回家之后，常常与家庭不和。

从1943年开始，因为生产及农村的其他问题受到重视，教育制度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学校教育旨在强化延安式的经济发展与社区改革，那么，它就必须与农村生活统一起来，真正办在农村并解决本地的各种问题。但是，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扩大办学的教师和经费从何而来？而且，这不是意味着那些反动的村庄可以在本地有效地抵制教育改革与实验吗？最终的结果会不会是进一步降低本就不高的教育质量？群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社区治校还是专家治校，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教育的政治、技术环境等问题，正是1944年关于教育问题论争的中心。

大众教育运动所强调的是扫除文盲和传播经济生活的一些基本技能，以便在短时间收到看得见的成效。1944年的口号为“发展生产、扩大办学”，正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愿望。教育与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紧密联系起来。那些办在县城由政府或县教育局主管的学校往往分给区、乡甚至于村一级政府。那些原来的教师仍然留校任教，但在同时增加了很多新教师，他们大都是那些没有正规教师文凭或经验的青年男女，在那些日益扩大的学校网络中任教。

新的学校是为工农大众的半工半读而设计的，包括夜校、半日学校、冬学与扫盲班，而且往往与工作单位直接挂钩。在管理上这些学校遵循“民办公助”的原则。这意味着教育部门的官员继续在确定教育方针、延聘教师方面发挥作用，而具体的财政安排、师资安排和课程安排都不再由教育部门或专业教师负责，而是将责任下放到基层。在很多情形下，校长或负责

教师是由著名的劳动英雄或地方干部担任的，说不准他们本身就是文盲。那些被派到乡村去培训教师的干部及学生常常与当地教师共创大业。他们常常是到各个村庄巡回授课。就像在整风运动和“下乡运动”中试图缩小干部精英与普通民众的鸿沟一样，他们在大众教育运动中也试图确定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了，两者中间都有老人与少年、农民和干部、识字者与文盲。这样一来，新的学校在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缩短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距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民办学校是大众教育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学校的学生都住在家里，教师与学生共同参加农家或村子里的农业劳动。甚至在城里的正规学校和干部学校也对课程作了很大改动，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新的大众教育运动将知与行结合起来、使教育被视为教师、学生和社区共同负责的事业。例如，新的中学教学大纲指出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入学以养成为边区人民服务的观念始，以掌握为边区人民服务的技术终”^①。教育所强调的是实际的知识、对现实与历史条件的认识，特别是服务民众的本领。

1944年边区的教育，体现着其他大众运动的共同特色：将权力从上层的专业人士手中下放到工作、生活在农村的干部与劳动英雄手中；强调大众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教育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统一。中共并没有完全放弃或有意降低原有的质量标准，只不过是尽可能挖掘一切资源、重新确定轻重缓急、并

^① 《解放日报》，1944年5月27日。关于边区教育及1944年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大部头资料有抗敌教育社编《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1946；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四个民办小学》，1944；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陕甘宁边区教育方针》，1944。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3月11、22日，4月17日，5月27日，8月5日。

适当将教育中心分散，以照顾大众的利益而已。这一运动第一次使无数偏远的农村尝到了教育的甜头。在那种年头，新的观念和技能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成效。

1944年的大众教育运动，是继合作运动之后展开的，使得集体行动可以改变现状这种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农民们本是宿命论者，他们的很多旧观念是合作化等种种变革的阻力。任何一种运动要在这种环境中取得成功都需要创新。不过，中共当局并不是对所有的传统都开火，而是有选择地利用农民的传统来达到目的。正如毛泽东在1944年10月30日的一篇演讲中所说：

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有100多万文盲，2000名术士，广大的群众还在受迷信的影响……。我们必须告诉群众，他们应该针对自己的文化、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发起一场斗争。为完成这样一场斗争，必须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像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缺乏通讯工具、文化落后又受战争波及的地区，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广泛的。这样，在我们的教育中，就必须不仅有大的，正规的小学和中学，而且要有小的，非正规的村级校，以及读报小组和文化班。我们必须不仅有现代模式的学校，而且要在村里利用和改造旧式学校。在艺术方面，我们必须不仅有现代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在医疗方面，这个道理甚至更加重要。

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①

^①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2～913页。

毛泽东所追求的是对立面的统一，或者是置新与旧于一炉的“统一战线”。党与政府可以提供领导以及发展的总方针，但最终的成败取决于民众的创造性。1944～1945年间边区的教育运动应用了这些原则，在整个边区初步扫除了文盲，传播了合作劳动的思想，改善了医疗卫生环境，并推广了一些新的艺术形式。

群众路线

整风运动中的政策大调整，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领域，而涉及到人与社会的革命变革。当时，群众路线臻于成熟，对根据地新社会中的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做了新的界定。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1943年6月1日通过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议，是对群众路线最早的、也是经典性的表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①群众路线强调领袖与民众的密切联系，这是从游击战争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在抗日战争后期，这些原则指导着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造与发展。杰克·葛雷（Jack Gray）动情地指出，

^①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855页。关于群众路线在中共的思想与实践中的地位，参阅约翰·路易斯《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第70～100页，纽约，1963；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第57、72～74、94～95、101～102页，柏克莱，1967。

群众路线对当今的发展中社会仍有借鉴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政治觉悟的领导层与当地社区中那些目不识丁、远离政治的大众保持着直接的联系，直接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见识和他们的疑难；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地的经验及相应的理论，将大众的意见进行归纳总结。接着，又将这些总结出来的意见拿回到大众中去进行实践和检验，及时发现新问题。最后取得多数人的同意，作出决议，指导实践。这种政治方法的优点是可以防止命令主义和上层分子的虚饰主义倾向，使全体民众都积极投身政策的决定与执行。这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过程，广大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克服他们的政治沉默、对变革的疑虑、对现代技术及组织效能的无知、对外界的无知、对政府的恐惧，以及他们狭隘的家庭宗族观念和短视的经济观点。^①

群众路线是针对农民社会的问题与缺陷而提出的。但是，它也同时考虑到了农民积极分子潜在的创造性和社区基层的创造性等因素。这些潜在的创造性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在1943年的社会运动过程中都发挥出来了。

在1942年和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中，形成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新观念。这种理想中的人超越了专业与地位的界限，集劳动者、领袖、战士和学生于一身。这些品质体现在地

① 杰克·葛雷（Jack Gray）和柏智克·加文底斯：《危机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与文化大革命》（*Chinese Communism in Crisis: Mao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第49～50页，纽约，1968。葛雷还指出，这种方法也用于民族团结和劳动纪律的加强以及对官僚腐败与僵化的防范。

方积极分子身上。他们不仅在本村或本厂创造和传播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而且在抗战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还在“业余时间”从事自学和教育别人。领导与被领导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就这样被缩小了。在战争和生产中，共同的斗争使整个社区拧成一股绳，那些劳动英雄或杰出积极分子成为连结乡村和上层领导的纽带，在促进社区团结的同时也改造着乡村生活。

延安时期的一大创造，是发现了将广大民众参与的抗战活动与广泛的乡村改造运动紧密连结起来的具体方法。在人民战争中，社区的集体行动深入每个村庄，以至于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这样的运动呼唤新的领导方法，这体现在群众路线的理论中。在抗战的后期，群众路线在全国根据地都扎下了根。

结 论

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为枢纽的抗战，深刻地影响了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掀起的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以抗日根据地为核心的抗战挫败了日本以闪电战征服中国的企图。这种抗战不仅使日本侵略者在自己的后方不得安宁，还迫使国民党坚持抗战而不投降。那些在战时建立、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后来成为统一的新中国的基石。如果说美国的海军、空军和原子弹的威力连同苏联的宣战是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中国的抗战在 15 年内将大约 200 万日军困于中国战场并予以重创，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最后失败贡献非凡^①。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打断了日本这一工业强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殖民主义冒险征程，击碎了它的帝国之梦。而且，在战争的废墟中崛起的那个农业大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构成了“延安道路”那些富有特色的精神和社会经济制度，对于战争与革命的一般理论与实践也是特别的贡

① 西方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著作很少提及中国对打败日本的重大贡献。恰当估量这种贡献的著作还有威尔莫特 (H. P. Wilmot) 的《大征战》(The Great Crusade) 和史蒂文·列文 (Steven Levine) 为《中国的苦胜：1937~1945 的对日战争》(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一书所作的序。

献，而且这种贡献是超越战争时代的。

这部著作表明，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对因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作出有效的、创造性的回应，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成功地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抵抗日军的侵略，原因在于他们有效地将行政措施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与农村根据地中激荡的新爱国主义紧紧相连的是，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获得了新的活力，新的社会阶级勃然兴起，特别是自耕农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并且日益兴盛。在当地上层向外地逃亡及当地上层与共产党政权合作的地方，地主对政权的垄断都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被削弱了，而自耕农的人数、财富和势力都在上升。

动员民众是抗战的中心环节，也是解决战时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新方法的中心环节。然而，中共的战时动员是多种多样的，甚而是相互矛盾的政策的综合物。本书强调动员纲领中那些平均主义和鼓励民众参与的因素。中共对在政治上毫无权力的乡村民众进行教育，扶助自耕农势力，动员最贫困的社会阶层。通过对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通过新的教育政策，他们使贫困的阶层获得利益与权力。

中共的战时改革纲领包含税制改革、减租和鼓励互助等方面。这些改革其实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增强了自耕农的地位，削弱了富人的势力，同时又在混合经济的格局中维护家庭农场与市场的主导地位。政治方面的改革，包括统一战线和差额选举，将党外人士吸收到政权中来（虽然从未对党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而且拓宽了抗战的民众基础。这些由不同层而共同构成的过程使穷人获得权力，同时也使中共的势力深入到农村。在后记中我将根据革命之后的历史发展、我近年来的研究以及对革命性变革的不同理解，来重新考察中共的群众路线和民众动员。

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之后，其领导人大多来自监狱，来自殖民统治时期的政府职员，或是从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回到本国的首都。中国则与此相反，其领导阶层从乡村干部到中央领导，是从长期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获得权力的。他们先是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继而又赢得了内战。既然中共在战争条件下积累了解决农村问题的 20 年的经验，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后，战时的经验将深刻地影响他们的建国方略以及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方针。

后 记

基本的事实一清二楚，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夕，经历了两次惨败的中国共产党，被敌人从他们惨淡经营了10年之久的革命根据地中赶了出来，险些在长征中被全部消灭，带着所剩无几的军队，困守在贫瘠的西北边疆^①。此后不出10年，侵华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毛泽东的党军已经在华北、东北、华中等地控制着一亿人口。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中国辽阔的内地建立根据地并大显身手。这些根据地也成为后来中共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的跳板。事实是清楚的，但是，人们的解释与评价却很不一致。中共取胜的原因、中国抗战的特点、中国抗战

① 班国瑞 (Gregor Benton) 对“三年战争”所作的寻隐探微式的研究，将几乎被人遗忘的红军余部在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在南方继续战斗的历史重新展现出来。尽管有这些力量的存在（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步与党重新取得了联系），中共抗战重心显然已转到西北部和北部。参阅《山火：1934-1938年间红军在中国南部的三年战争》，柏克莱，1992。中国人民进行的顽强抵抗与珍珠港事件及日军征服东南亚地区的情形比较起来更显得格外突出。在几个月时间内，日军将英军逐出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和香港，将美军逐出了菲律宾，将荷军逐出了印度及西亚。在1944年美军开始反攻之前，所有这些地方的当地人没有组织足以对日本构成威胁的抗战。

的国际意义、延安时期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后来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等，都是迄今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一章中，我将考察40年代以来解释中国抗战的主要观点，并就“延安道路”作为分析革命运动的一种框架作出一些结论。

在我着手写作《延安道路》的60年代，中国的档案尚未向国际学者开放，中国的大批文献资料尚未出版，到根据地从事实地研究与访问的机会也尚未出现。然而，当时对研究者来说仍不失为一种有利时机，因为那是台湾、香港、日本和美国利用档案和文献资料从事对根据地的主题研究的开端阶段。下面我将讨论60年代以来包括我在内的学术界利用档案、文献和访问等方式对中国农村的研究。

《延安道路》是在中美敌对关系的高峰期写成的，那时美国正深深地卷入印度支那战争，而那场战争被广泛认为是中美两国的战争。必须指出，美国在那个时期也形成了两股健康思潮：反战运动和人们对冷战观念的反省。回顾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战争史和革命史所作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看到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伴随着全球冲突、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而变化。

《革命的中国：延安道路》所研究的是一个根据地的起源以及它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在于探讨一些对全国以至于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倒不是因为陕甘宁根据地在所有根据地中有代表性。陕甘宁在如下四个方面来说是别具一格的：

——它是最穷的根据地；

——它的大部分地区在建立统一战线以前已经完成了土地的再分配；

——它虽然曾经遭受日军的轰炸并发生同国民党军队的冲突，但它幸免于日军的侵略，因而这里的游击战争远不如敌后根据地中那样重要；

——最后，它是党和军队的总部，也是数以万计知识分子投奔的圣地。

在承认它们之间的区别的同时，我还要指出，在动员民众和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陕甘宁根据地与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等最发达的根据地大同小异。而在这些根据地所出现的一切，既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从这种意义上说，陕甘宁既是中国革命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中心环节。要全面地评价中国的抗战，我们就必须对每个根据地都进行深入的研究，包括它们自力更生的特色、它们在以延安为司令部的整个抵抗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与国统区、沦陷区之间的关系。

《延安道路》将当时的民族运动放在人民战争和社会革命的大框架中来理解。关于中日战争的很多著作都探寻中共胜利的原因，《延安道路》也试图探寻根据地内的革命运动所带来的后果。也就是说，《延安道路》将革命过程视为转变根据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过程^①。“延安道路”是一个松散的概念，指的是使党、农民和地方精英形成新的关系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它既指民族解放战争的道路，也指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并不是局限于战时根据地的暂时现象，而是涉及到全世界边缘地区的发展和农业社会的转变等一

^① 在这一意义上说，《延安道路》探讨了关于社会革命的主题。这也是如下这些重要著作所共同探讨的主题：白灵顿·莫尔（Barrington Moore）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波士顿，1966；德达·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的《社会革命与国家：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研究》，英国剑桥，1979；舒尔曼（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思想与组织》，柏克莱，1966。不过，上面这些著作都属于宏观研究，莫尔和斯科波尔所探讨的甚至是宏观比较研究的框架，而我的焦点却只是一个小小的陕甘宁根据地。

系列问题。

首先，我将回顾同时代的记者、作家和学者们根据亲历亲闻对那场抗战与革命所作的记录。他们的记录和见解对后来的分析与研究影响非常之大。接着，我将检阅学者们、包括作者本人对中国革命的研究以及对革命变革和农业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所形成的主要观点^①。最后，我将对《延安道路》的原著进行评判。

第一代解释：同时代人的观察

30~40年代的记者、作家和政府观察家在中国农民支持中共这一问题上提供了一些最重要的理论，后来的人们只不过是政治上和学术上进一步深化这些理论而已^②。1936年，美国

① 我受惠于三篇关于中日战争的综述：卡德林·哈特福特（Kathleen Hartford）和史蒂芬·哥尔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的《序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透视》，载他们所编的《星星之火：中国的农村革命》，第3~33页，阿芒克，1989；范力沛（Lyman Van Slyke）：《1937~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载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富尔威克尔（Albert Feuerwerker）主编《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609~722页；陈永发：《干革命：1937~1945年间华东与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其“结论”，第499~523页，柏克莱，1986。

② 记述中国战时历史的主要作者有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安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约翰·谢伟思（John Service）、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安那里·雅各比（Annalee Jacoby）、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加里森·弗曼（Harrison Forman）、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伊文斯·哈尔逊（Evans Carlson）、甘得·斯坦（Gunther Stein）和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say）。尽管欧洲和日本在当时及后来也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有所记述，但最有影响的还是美国人的记述。这一现象也与美国当时上升为该地区的主导国家的现实相吻合。从这种意义上说，重视美国人的记述并不是偏见。

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成为越过国民党的封锁，到西北的中共根据地进行较长时间访问的第一人。他第二年依据观察和访问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这使他成为当时记述中国战时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权威。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国际的舆论。

将中共社会经济纲领视为使中共和因为极度贫穷而渴求土地、食物和安全的农民团结起来的关键因素，斯诺是第一人。在《红星》及以后的其他著述中，斯诺强调中共再分配纲领的关键作用。斯诺指出，“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活动主要是解决农民的迫切问题：土地和税收。”^①他有时是通过转述中共领袖的话来表达他的见解。例如，通过转述彭德怀的话，他将动员农民的问题归结为阶级斗争，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在历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地主的剥削、苛捐杂税、失业等导致“经济破产”的原因之后，彭德怀说：“因为群众感兴趣的是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只有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才能发动他们投身于游击战争。这意味着必须立即解除剥削阶级的武装”^②。

随着1936~1937年间中共的纲领和优先考虑从土地改革和打击地主向统一战线和服务于抗战的渐进改革的转变，阶级斗争在公开的记录中消失了，但在中共的内部文件及具体实践中并没有消失。中共自始至终将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视为安身立命的重心所在^③。

斯诺也许比当时其他人更能为中国和西方的读者捕捉那场

①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修订本，纽约，1968。

②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修订本，第274页，纽约，1968，参阅第445页。

③ 例如，斯诺的《焦土》，第310-316、320~321页，伦敦，1941。

革命运动的特色，以及它在广大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造成的反响。但是，与当时其他记者一样，斯诺更加熟悉国统区的社会与政治。而且，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报道过多依赖于对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原话的转述，来补充他本人的亲身观察。阅读斯诺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作品，对于我们把握知识分子、青年以及乡村其他民众对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独特而富有理想色彩的反应，特别有帮助^①。

早在40年代初，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就已依据他个人对华北根据地的观察指出，共产党人利用由日本侵略者所激发起来的民族感情，领导乡村的抵抗运动，这才是中共成功的秘密所在。斯诺认为，中共的土地纲领是最重要的。泰勒则指出，日本人的“残暴行为当然地为游击队做了最好的宣传”，只要“这些游击队已经在某一地方呆得够长一段时间，就会在农民中间树立起一种新的精神和政治信念”^②。简言之，泰勒认为日本人的入侵为中共在农村组织发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黄金机会。这样，将随战争而兴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经济纲领视为使中共与农民团结起来的关键，泰勒是最早的人物之一。

斯诺、哈里森·弗曼（Harrison Forman）、甘得·斯坦（Gunther Stein）、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和安那里·雅各比（Annalee Jacoby）等人在

① 在这一方面，斯诺凭着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最充分地体现了美国新闻界的传统。他的这种方法的局限在于很少注意到文献资料，如政府与党的文件、中文报刊和书籍等。中文本身是一个重要的障碍。战时去中国的西方记者大概没有一人懂中文。但是，问题还不止于语言障碍。美国新闻界素来珍视采访与亲见亲闻，而对于文献与历史资料则不屑一顾。

② 泰勒，第10页。该论点哈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在一年前就简略地提到。参阅《“人道的努力”：中国战争的故事》，纽约，1939。

抗日战争后期和内战时期是怀着对腐败、残忍和胡作非为的国民党的失望和厌恶来记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他们争辩说，农民大众在政治上被国民党及军阀忽略了，甚至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共产党则在农民中推行民主，因而中共能够成功地动员农民。

共产党所作的全部文章可以简写为如下一个段落：农民们终日被人诈骗，被人辱骂，被人拳打脚踢，而且其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都是一肚子苦水，如果你将这样的农民当人看，询问他的意见、让他选举地方政府、让他自己组织警察和宪兵、让他决定自己的税率、让他投票来减租减息，如果你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农民便有了奋斗的目标，而且将会为了维护这些权益而去与任何敌人战斗，无论这敌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①

西奥多·怀特和安那里·雅各比的这段话正是战时动员所造成的亢奋情绪的写照，是他们对根据地中所实行的选举的作用的反应，也反映了当时盛行的民粹主义情怀。与此同时，他们夸大了知识分子、地方精英和农民们在根据地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低估了中共在建立一种政治秩序上的能力，这些秩序直接影响农民的生活。在我看来，他们准确地看到了中共善于满足那些长期生活于苦难与混乱之中的民众的要求与愿望，中共能够运用带有民粹主义、甚至于民主色彩的方法去动员和组织群

^① 怀特和雅各比，第201~202页。这里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使人联想到当时出版的著作将农村问题视为男性村民的问题。《延安道路》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后来研究者所出版的著作都没有认真探讨性别及家庭问题。迄今人们对这些问题依然语焉不详，部分地是因为党与政府很少系统地论述这些问题。

众。他们的著述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他们对亲地主的、独裁主义的国民党、军阀和日本侵华势力的抗议。

怀特和雅各比等人将民主政治同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在上述关于减租减息的引文中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提出了我将在下面讨论的问题：同时代的中国和西方观察家们是否夸大了当时那场运动的民主因素？他们那种将根据地中的动员与群众参与视为民主政治之先导的观点是否存心骗人？如果他们不是故意误导，那么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时代的政治以及对1978~1979年间和1989年以及以后的民主运动又如何解释？对于《延安道路》一书，也应提出同样的问题。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曾经到延安作较长时间的访问，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行过长谈，他也提请人们注意根据地政治的民主特色。在1944年9月的一份电报文稿中，谢伟思解释说，中共军队迅速壮大“只有在获得根据地民众支持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中共所获得的广泛支持，实际上意味着中共的政策和方法具有民主的特色”^①。谢伟思将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和民主政治作为中共获得农民支持的基础，还有下面完整的论述：

农民们支持共产党，参加共产党并与中共的军队并肩战斗，因为他们深信共产党人是为他们而战斗的。而他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信念是因为共产党人给他们带来了看得见、摸得到的实惠。

这些实惠必须是对农民的社会、政治或经济条件的改

^①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编《中国机会的丧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谢伟思的电稿》，第217页。

善。无论这种改善的实质如何，它必定具有民主倾向——如果我们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将民主理解为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①

这一意义上的民主不在于多党选举、不在于议会制度，也不在于权力的制衡及民主自由主义的其他特色。实际上，它将改善赤贫的村民物质生活条件视为民主政治的前提。

对党与农民关系的这种视角贬低了中共努力扩大选举范围、有条件地同统一战线中的盟友分享权力等方面的努力。应该说，当时全中国范围内惟有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才推行制度化的选举，扩大乡村民众的参政权和其他政治权力。

谢伟思的上面那段话虽然是谈论民主政治的，但他的观点与那些强调党改善广大农民生活条件的纲领的见解很接近。谢伟思等人暗示着这样一种观点，是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选举程序，才是在原先由地主和富农控制的中国农村实现民主的关键所在（不过，就我所知，他们从未充分论述过这种观点）。可以说，中共以减租减息为内容的改革，一方面提高了自耕农的地位，同时又削减了乡村中那些有势力的富裕家庭的权力。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实行民主政治，比起在财富与权力分

①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编《中国机会的丧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谢伟思的电稿》，第219页。谢伟思及很多别的官员后来都被指控对国家不忠诚并被清洗出外交界。虽然谢伟思在1946、1947、1949、1950和1951年的听证会上推翻了对他的指控，国务卿迪恩·阿塞森（Dean Acheson）还是将他撤职了。有趣的是，谢伟思曾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控制着一切宣传和思想灌输的事宜，而且没有制止农民将他们当做恩人”。1944年9月10日电稿，同上，第230页。

配极不平衡的情形要容易得多^①。与40年代中、后期的许多观察家一样，谢伟思等人看到了乡村民众对共产党人的热心拥护，因而便断言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民主特色^②。

第四种观点认为，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不足以解释中共的成功，中共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组织上的优越性，共产党正是凭着优越的组织能力在由战争、国民党撤退、中国农村群龙无首等因素构成的政治真空中获得发展。1945年6月美国作战部的一份报告简明扼要地陈述了这种观点：

中国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中国最有效地组织起来的集团。中共所施行的“民主”是依据苏联模式的“苏维埃民主”，而不是英美式的民主。中共对这种“民主”的严格控制比起国民党对重庆政府“一党专政”的控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③

① 莫尔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深刻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在我的《延安道路》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国家》两书中，也主要是从这一思路去理解社会经济改革对政治民主化的意义。我对中国抗战的研究使我在这方面所得出的结论比莫尔要乐观得多。

② 一些人在战时严厉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但对颂扬根据地的民主则持谨慎的态度。例如，贝尔登写道：“中共率领民众造反，将农民从封建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将国家从西方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但是，如果说中共将人民从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那就很值得怀疑了。人民也许比在蒋介石统治下所受政府的虐待要少一些，但也许在政府面前显得更缺乏独立性。”《中国机会的丧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谢伟思的电稿》，第503页。

③ 范力沛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45年7月美国作战部的一份报告》，第1页，斯坦福，1968。这里所引述的序言中的一段文字，特别是军事情报头目保罗·皮柏迪（Paul Peabody）将军所写的总结，代表着从组织武器的角度来看中共的思路。该报告参考了包括约翰·谢伟思、埃德加·斯诺等人在内在当时所写的东西。

这样一种“现实主义”观点，开了后来盛极一时的冷战观念之先河。这种观点从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操纵民众的能力方面去评判中共的力量，强调中共对苏联的“党的路线”的遵从，而倾向于贬低弥漫于中共社会经济纲领和中共与农民关系中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因素。

上面引述的四种观点，都被包括我在内的不同学者们采纳。从土地革命到集体化，从大跃进到大跃进，从80年代的经济改革到民主运动的起落，上述各种观点也随着中国革命历程的变幻而依次跃居上风。

当然，上述四种观点分别强调社会经济纲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组织、操纵手段，它们是能够互相补充的。这些观点是第一代西方观察家，包括记者、作家、外交官和军事官员在40年代对战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威力及中共与农民获得紧密团结这一事实所作的解释。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孤立地看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将其视为包罗万象的一场运动。以斯诺为例，他强调包括土地改革、税制改革、合作社等物质经济因素的感召力，但他同时也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利用农村青年的爱国激情而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带到家乡之外的世界^①。怀特和雅各比强调边区的民主，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共产党人通过对日作战而赢得民心。日本人征服中国的暴行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共同敌人，无论是中国的穷人还是富人，也无无论是中国饱学之士还是目不识丁之徒”^②。而谢伟思指出了民主举措与社会经济纲领的共通之处。

这一代的作者们与许许多多的同时代人一样，都正确地看

^① 斯诺：《红星》，第244页；《焦土》第347页。

^② 怀特和雅各比，第205页。

到了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爱国热情和高尚品格。随着他们对日本得寸进尺的侵华行为日益感到愤怒，随着他们日益感觉到国民党腐败无能、互相倾轧、根本无力解决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赞赏也与日俱增。他们的著作是根据他们的亲身经验和观察写成的，而且大量利用了他们访问根据地及其他地方官员、农民和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材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依赖翻译和向导来获得第一手材料，但是约翰·谢伟思、乔治·泰勒等外交官、军官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家庭中长大的，他们能够说中国话和阅读中文资料。他们在多年时间中一直依靠亲身体验和观察来了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并报告给美国政府。

第一代观察家们主要依赖的是他们在当时当地的亲见亲闻。继之而起的下一代就不同了。他们是受过大学或政府训练的中国专家或专门研究共产主义事务的专家，他们能收到的原始材料范围更为广泛，包括中共的文献以及美国、台湾、香港和日本所藏战时情报部门所收集的资料。但是，他们不能到中国去从事研究，甚至从未访问过中国。第一代观察家可以到除了沦陷区之外的所有地方，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相比之下，70~80年代重返中国的记者们则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所见所闻相当有限。顺便补充一句，由于当年的观察家无法进入沦陷区，沦陷区的社会生活在过了半个世纪之后依旧鲜为人知。

40年代中后期记述中共经历的绝大多数西方人，特别是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及其他美国军官，都批评蒋介石国民党的冥顽不灵，批评他们在对日作战中的腐败无能，他们对穷人疾苦的麻木不仁，以及他们发战争财的卑劣行径。实际上，尽管美国政府将蒋介石国民党作为关键的盟友及中国惟一的援助对象，所有独立的和外国的观察家都像史迪威那样

批评蒋介石国民党。例如，杰克·贝尔登一方面赞赏中共晋冀鲁豫边区的社会与经济，另一方面则悲叹 1941 年河南国统区中的“田园荒芜，十室九空”。他写道：“当时农民告诉我，他们之所以逃离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是因为国民党的税吏所摊派的税额超过了田地的生产能力。”^① 贝尔登连同怀特、雅各比等人，指斥国民党和地主狼狈为奸，利用战争造成的饥荒迫使农民将土地卖给他们。像许许多多的同时代观察家一样，他们将国民党、军阀和地主的贪婪来反补中共的公正与清廉。

我们所谈论的第一代美国观察家的著作都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或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问世的。当时，法西斯主义的肆虐使民主价值弥足珍贵。当时美国正与中国联手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扩张，中国的经验成为在美国盛行的平等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激素。正因为如此，人们当时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②。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获得广大知识分子及根据地群众的支持这一事实备加赞赏。在当时，美国与苏联正在欧洲联盟作战，福特公

① 贝尔登，第 97 页。怀特在报告 1941—1943 年河南地区的饥荒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们见到农民在死亡。他们在路边、在山上、在火车站、在茅屋中、在田野中死亡。在他们死去的时候，政府还要从他们那里征收最后一点税……从不宽待。农民吃着树皮、树叶，却要将最后一包种子拿到征税办公室去。……政府的小官员、军官和那些富有的地主以接近于犯罪的低价买下农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么点土地。”怀特和雅各比，第 174 页。

② 这些著作尖锐地批判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支配地位的上升、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在亚洲和其他地方殖民主义统治的本质却视而不见。也就是说，关中的抗日联盟意味着用民粹主义的热情支持中国的独立战争，与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实现地区或全球目标这两者可以相安无事。

司、克里斯特公司对苏联红军的捐赠源源不断。只是在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苏联日益增长的敌意才使美国公众形成共产主义阴谋的观念。毕竟，正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及随后中美两国在该战争中兵戎相见，使先前公众讨论得很为激烈的中国革命诸问题成为禁区。

中美冲突时期的中国革命： 从极权主义模式到农民民族主义

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人不再努力去寻求关于中国的民族运动、社会革命及中共与农民关系的答案，而是致力于挖掘来自上层的阴谋家。“谁断送了中国”成为主要的政治问题。在50年代初期的麦卡锡（McCarthy）时代，谢伟思和戴维斯（Davies）等外交官备受攻击，直到将那些熟知中国的所有外交官都进行清洗。约翰·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在战时曾担任政府顾问，后来在大学中担任重要教职的学者也成为替罪羊而受到迫害。麦卡锡主义对中国学研究以及对中国的看法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政治论争中，都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对于中国革命、帝国主义侵华以及美国在亚洲的所作所为，都不能各抒己见，深入讨论。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美苏及美中之间的敌意正处于高峰状态，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共与农民的关系、帝国主义和抗日战争等问题的兴趣急转直下。当时人们讨论和关注的是两个问

题。首先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阴谋^①。其次，研究的重心从抗日战争时期转到1920~1935年，从中国革命自身的特色转到苏俄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和操纵。当时出版的著作大都着眼于共产国际的阴谋，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苏俄

① 对于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摩斯（H. B. Morse）等人所开创的“外部”视角，到由费正清为代表的现代化学派所体现的“内部”视角，到苏联研究专家50年代的外部视角，再到别树一帜的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之影响的外部视角。（他们中的部分人与由越战所引发的反思有关，也与60~70年代的“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有联系。）对这些问题最激烈的争论始于吉姆·佩克（Jim Peck）在《关心亚洲学者通讯》上发表的《美国中国观察家们的辞藻与意识形态》，1969年第2卷，第1期，第59~69页；哈佛大学研究生佩克与他的老师、美国中国研究专家的元老费正清之间“交换意见”，同上刊，1970年第2卷，第3期，第51~70页。参阅爱德华·弗里德曼和马克·塞尔登编《美国的亚洲：关于美国与亚洲关系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论文》，纽约，1971。这场争论在70年代和80年代持续不断，很多人起来反驳费正清等人的观点。参阅拉曼·迈耶斯（Ramon Myers）和托马斯·麦茨格尔（Thomas Metzger）《中国学的阴影：美国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澳中杂志》1983年第4期，第1~34页；西蒙·雷斯（Simon Leys）《中国的阴影》，纽约，1977；史蒂芬·莫舍尔（Stephen Mosher）《被误解的中国：美国的幻想与中国的现实》，纽约，1990。（从该书的口气中可以感触到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只不过是沒有明确的政治靶子。）由于19世纪以来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泾渭分明的内部/外部视角已经无济于事，在一定意义上《延安道路》是要跨越这种内部/外部视角的界限而进行一项多视角的微观研究。它同时注意包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内的外来因素和社会经济的解体、政治的解体、由建国运动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等内部因素。对美国中国学，特别是外部视角的批评，参阅科文（Paul Cohen）《发现中国的历史：美国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著作》，纽约，1984。

的模仿，而置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于不顾^①。与美国政府对铁板一块的、由莫斯科操纵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谴责相呼应，美国学术界在当时也将重心放在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操纵上面^②。这种观点因为 50 年代初的中苏联盟以及中国对苏联的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所强化。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学者们的兴趣回到了抗日战争问题上。因为学者们无法得到中国的档案材料或到中国去进行访问研究，他们便只好利用日本的军事和外交档案、台湾调查局收集的中共文献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战时资料。

查尔摩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提出这样的观点：由日本的侵略、奴役和迫害所引发的农民民族主义，才是中共获胜的关键所在。他的观点引起了一场争论。约翰逊抛弃了阴谋论。他批评“组织武器

① 《中国季刊》的最早两期载有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和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等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共历史的争论》，《中国季刊》1960 年第 1 期，第 72～86 页；第 2 期，第 16～42 页。史华慈对毛泽东主义的分析，特别是他在《毛泽东的高升与中国共产主义》一书中，将毛泽东主义视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标志着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延安道路》在研究抗战时期的历史时，同样反对那种中国革命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说法，承认中国革命的创造性与本土性。在我看来，以这样一种视角来考察抗战时期的历史显得特别有说服力，当时中共取得了高度的独立性，而俄国人正在为抵抗德国入侵苦苦挣扎。50 年代的代表作将重心放在江西时期苏俄对中共的操纵，而且这些著作，包括肖作良、马可雷恩（McLane）、诺思（North）、韦森廷（Wilber）和豪（How）等人的著作，都深受冷战观念的影响。

②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美国其他决策者在 50 年代很快就觉察到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竭力利用这种矛盾。然而，在整个 60 年代，美国公众，包括美国的中国学界继续强调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敌人。参阅戈登·张（Gordon Chang）《敌与友：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与苏联》，斯坦福，1990。

论”以及从苏联研究中移植过来的极权主义论，而将战争作为影响战时中国政治、特别是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他看来，既然中共在前一阶段通过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来建立根据地的企图已告破产，那么，中共在战时实施的社会经济纲领，就像乔治·泰勒等人早些时候所说，是无关宏旨的^①。战争引发的民族主义才是中共获胜的决定性因素^②。

《农民民族主义》不仅成为中国专家们解释该时期历史的权威著作，而且在社会主义运动及共产主义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很有影响。约翰逊的著作为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跳板，激发我去写作《延安道路》一书。而且它对比较研究迄今仍有影响。因此，我将比较详细地介绍他的观点。这是广泛利用日本情报资料的第一部著作，对中日战争的军事史叙述甚详，特别是促使人们广泛注意由于所引发的民族主义这一促使民族团结，从而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因素。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城市、铁路干线和沿海地区，迫使被大大地削弱了的国民党从沿海工业发达的地区撤退到中国的大西南。这样一种格局不仅使国民党未能利用中共的历史性失败来巩固其统治地位，而且在日军占领区形成了可供中共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中共正是在这样的广阔天地中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了乡村根据地。

然而，《农民民族主义》将重点放在日军的侵略及扫荡，实际上忽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特别是农民与地主、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忽略了根源于这种冲突的富有特色的

① 参阅他 1940 年出版的《为华北而斗争》。

② 就作者对社会史研究的贡献以及对阶级冲突的关注而言，农民民族主义观点产生影响的一个有趣例子是莫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第 223 页。莫尔得出结论说：“中共获胜的决定性因素是日本的征服以及外来征服者的侵略政策。”

农民骚动，以及制约社会解体过程中中国农村环境的其他因素。总之。这部著作忽略了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种种敌对的社会政治势力，以及这些不同势力对中国农村截然不同的态度。当约翰逊假定日军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激发民族主义，他甚至于无暇顾及日军进攻中国各地乡村的不同遭遇。而约翰逊关于战时普遍的民族主义激情的假设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特别是他跟随卡尔·杜舒（Karl Deutsch）将民族主义定义为社会动员。1942~1943年间，日军的进攻使根据地的人口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八路军从40万减少到30万，90%的平原根据地沦入日军的铁蹄之下^①。日军的进攻远没有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而是使广大民众脱离抗战队伍，使抗战濒于崩溃。无论我们是用民族主义还是与民族主义相混合的其他因素来解释抗战，抗战力量和抗日根据地都不是必定能渡过劫难，更不用说是稳操胜券了。

很多学者都对以农民民族主义为中心的解釋提出质疑。通过考察华北地区在日军侵略下的不同情形，卡得林·哈特福特（Kathleen Hartford）指出：“地方抗战势力并不是自发地组织的，……而那些自发地组成的势力并不是为了抗战”^②。哈特福特和范力沛（Van Slyke）利用文献资料说明抗战势力是在日军进攻以外的地区组成的。而且，当1939年广大乡村民众感触到日军的锋芒时，各主要根据地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罗得·伊斯托曼（Lloyd Eastman）在研究国民党和军阀统治区域时也发现，民族主义并不是“随处可见”的。他还指

^① 范力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680页。

^② 参阅卡得林·哈特福特（Kathleen Hartford）《步步为营：晋察冀边区的抗战与革命》，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80，转引自范力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631页。

出，“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大众——并非都憎恨”日本人。实际上，在50万~100万由日本人组织的中国军队中，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军队的逃兵^①。

哈特福特的研究表明，日军的扫荡远没有激发民族主义激情，从而增强根据地及抗战力量；而往往是窒息民众的抗日活动，迫使游击力量从其已经立稳脚跟的地区撤离，缩小或消灭整块根据地^②。范力沛、伊斯特曼、哈特福特等人的主要观点是，针对日本野蛮征服而相应形成的自主自动的农民民族主义并不存在。当日军在某个地方获得军事上的成功时，那个地方至多只会有微弱的抗战和民族主义。为了理解民众对抗战与革命的反应，为了理解乡村民众、地方精英、以及不同的政党及军队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探讨错综复杂的乡村社会，探讨日本、国民党、军阀和国民党所实施的不同纲领，探讨不同地方、不同日期内各种势力的不同地位。

如果农民民族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什么是反叛的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政府成为主要的“受益者”？毕竟，在1937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巩固了它的权力。它是在国际上受到承认的政府。到1935年，它已经将主要的军阀及共产党打败了。而且，它也到乡村地区组织抗战。简言之，像美国、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的统治集团一样，国民党也处于从战时民族主义中受益的优越地位。相比之下，战争爆发时的中国共产党则没有优势可言，它正在贫瘠的西北边疆为生存而挣扎。离开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来谈论农民

① 《毁灭的根源：1937~1945年间处于战争与革命之中的中华民国》，第141页，斯坦福，1984。

② 《约束与共产党人的成功：1938~1943年的晋察冀》，载哈特福特（Hartford）和古尔德斯坦（Goldstein），第94页。

民族主义，到头来一点也无助于解释何以共产党人比他们的政治对手更成功地建立敌后根据地，何以共产党与国民党一盛一衰恰成对照。

《农民民族主义》和《延安道路》都没有充分注意中共和国民党在敌后的竞争。在克服日军造成的经济、财政困难方面，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要比国民党的根据地成功得多。这一事实也表明，国共两党不同的社会经济纲领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大卫·保尔森（David Paulson）在解释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无法抵抗日军扫荡的原因时指出：“广泛的群众组织和社会改革都不是国民党的政策。”^① 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在经济生活很为困难的中共根据地老区，民众对中共政权的支持仍特别积极。要理解此中缘由，我们必须弄清中共在战时那些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投身抗战的社会经济纲领，是如何为民族主义打下坚实基础的。

战争的结局，特别是国民党政权的衰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长壮大，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政治势力，实行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纲领的结果。然而，《农民民族主义》提到共产党的战时土地政策，是为了贬低这一政策。该书正确地指出中共抛弃了江西时期激进的重分土地政策，代之以经济改革。它却进一步据此得出结论说，“共产党获得农民的支持，不能归因于实施，土地革命”。但是，问题不在于中共的战时社会经济纲领能否称得上“土地革命”，而是在于减租减息、税制改革和互助合作等有利于促进农民利益的政策是否在增进党与农民的联盟，在维持和促进共产主义运动方面起

① 《中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游击队：山东省的死硬派》，同上书，第145～146页。

到了关键作用^①。正如陈永发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中共能够发动农民投身抗战，首先应归功于再分配政策”^②。

侵略、战斗和恐怖并不一定激发民族主义激情。众所周知，对侵略战争的反应还有恐惧、逃亡、逆来顺受，甚至于还有迁怒于抵抗运动、指斥抗战激怒了敌人等等，这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对与日本交战区域的研究表明，民众在生死存亡关头作出的反应五花八门。我们只有弄明白国家与社会的多重关系，包括抗战卫国、社会经济政策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等，才能理解各种希图控制农村的政治力量所得到的不同结局。

从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越南、柬埔寨之间的战争，到9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民族主义的恶性冲突此起彼伏，研究民族主义的论著在80年代以来与日俱增。这使得我们重新思量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了理论与历史的依据。贝内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敏锐地指出：民族主义“被想象为一种共同体。尽管在每一民族内存在着实际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想象为一种水平的、感情深厚的同志关系。归根到底，正是这种兄弟情谊使得人们为那种狭隘的想象去献身与厮杀。”^③ 在《延安道路》中我曾经提到，中国的抗战在

① 在《农民民族主义》出版6年之后，约翰逊不经意地放弃了单一原因说，承认减租在根据地中的作用。参阅他的《中共的领导与群众的响应：延安时期与社会主义教育时期》，载何炳棣和邹谠编《危机中的中国》，第397~437页，芝加哥，1968，第1卷；又见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的反思：关于一本书的传记》，《中国季刊》1977年第72期，第775页。

② 陈永发：《干革命》，第99页。陈永发争辩说，只有将农民动员起来并使党扎下根来之后，共产党人才能够利用民众的反日情绪。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暂时的动员，而在于党的社会经济纲领在民众饱受战争祸害的环境中发挥了作用。

③ 《想像中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传播的思考》，第16页，伦敦，1983。

想像的共同体方面提供了不同于安德森所描述的模式。抗战在两层意义上创造了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与制度基础：首先，这一共同体正是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团结起来的；其次，这一共同体的形成，部分地取决于那些针对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与剥削”而实施的改革。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构成了“延安道路”的核心。

当然，这里所说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抗战民族运动的所有成员都发生直接的联系。我使用这一概念是为了凸显构成安德森所定义的共同目标的那些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战时民族主义也给共同体这一范畴造成一些困难：它假定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表明，这种假定并不是无可非议的。也就是说，战时与战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假定汉族与少数民族利益的同一性，避而不谈古来存在的压迫与不平等。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是战时以抗战为核心，是解除压迫的力量。但是，它也可以变成神化党、国家、领袖和干部的一种工具，从而强化原先存在的不平等。

《农民民族主义》的贡献在于破除了冷战时代的迷信，驳斥了共产国际阴谋论，重新认识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抗战运动的爱国意义，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开始恢复农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农民民族主义》表明，农民的目标是不可忽视的。在另一方面，约翰逊否定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社会经济纲领的意义，则是忽视了战时乡村经验最主要的因素和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关键^①。（否定社会经济纲领的意义，也是强调“组织武器”的人们的通

^① 菲利普·塞尔尼克 (Phillip Selnick): 《组织武器: 对布尔什维克战略战术的研究》, 纽约, 1952; 片冈哲也 (Tetsuya Kataoka): 《中国的革命与抗战: 第二次统一战线中的共产党人》, 柏克莱, 1974; 罗义·胡飞恩 (Roy Hofhein): 《大波折: 1922~1928年间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 剑桥, 1977。

病。该种观点由菲利普·塞尔尼科（Philip Selnick）在研究苏联时首先提出，片冈哲也（Tetsuya Kataoka）和罗义·胡飞恩（Roy Hofhainz）运用于对中国的研究。）

如果将组织问题放到国家建设和社会变革的大框架中来考察，那无疑是评判抗战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20世纪的中国政治而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共两党将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和延伸。南京时期（1927～1937）国民党政权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国家政权的扩张，特别是国家剥削的加剧，招致了民众的强烈反抗^①。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则表现为抗日根据地中党、政府和民众组织的迅速扩大，特别是表现为将党与政府机关延伸到乡镇、甚至于自然村。而且，陕甘宁、晋察冀等根据地在40年代所实行的互助合作，使国家权力延伸到了生产和销售过程。国家政权的延伸使中共广泛地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网络，这也正是中共的抗战力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秘密所在。

在中共抗日根据地中出现的是广泛的社会改革，而30～40年代国民党政权向乡村的延伸则是以掠夺和加强控制为中心的。将这两者区别开来很重要。国共两党当时都在激烈地争夺对农村的控制，而且大部分地是为了解决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延安道路》的主题之一是，革命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战争动员又是至关重要的。严密的组织网络使中共在日本与国民党的夹击中得以生存发展。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组织本身，而在于组织与那些解决农村问题的社会经济纲领之间的紧密联系。不把握国共两党解决农村问题的不同

^① 杜赞奇（Prasenjit Duora）：《文化、权力和国家：1900～1942年的中国农村》，斯坦福，1988；弗里德曼、毕克伟和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纽哈文，1991。

方法，就无法最终解释两党何以一盛一衰。

这些问题也可以从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来考察。20世纪中国农村究竟是在发展，还是处于停滞不前、瓦解崩溃之中？学术界展开了多层次的争论。关于外邦侵入、战争连绵的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农村发展模式、乡村收入和分配，关于该时期的商业化与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素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一种意见认为，“外贸以及地区之间的贸易加速了华北地区的商业化，也使该地区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条件下人均收入维持不变”^①。这种观点近年来为拉曼·麦耶斯（Ramon Myers）、托马斯·拉斯基（Thomas Rawski）和罗伦·伯兰特（Loren Brandt）等人所力倡。他们的观点受到约翰·巴克（John Buck）的重大影响。这是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待中国农村的问题，将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归结为缺少现代投入，否认20世纪中国农村在社会经济或制度方面的危机，将全球一体化从整体上视为刺激农村发展的积极（如果说不是充分的）因素。

与此相反，中国和西方的很多学者则强调中国农村的长期停滞、多灾多难、阶级剥削，国家的沉重赋税，以及那种没有收入增长的强制型经济增长，也就是晚清和民国时期阻碍中国

① 拉曼·麦耶斯（Ramon Myers）：《中国现代经济是如何发展的？》，《亚洲研究》1991年第50卷，第3期，第604～628页；麦耶斯：《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年间河北与山东的农业发展》，剑桥，1970；托马斯·拉斯基（Thomas Rawski）：《战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柏克莱，1989；罗伦·伯兰特（Loren Brandt）：《1870～1937年间华中和华东的商业化和农业发展》，英国剑桥，1989。这段文字引自麦耶斯的文章《现代中国经济是如何发展的？》，参阅黄宗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农村发展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①。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黄宗智、赵康、卡尔·李斯金 (Carl Riskin)、维特·利比特 (Victor Lippit)、林达·阿利哥 (Linda Arrigo) 和卡德林·柏纳特 (Kathryn Bernhardt)。中国的大量著作，包括毛泽东、费孝通等人的著作，既是上述学者灵感的源泉，也是他们的后盾。这些人对农村剥削与苦难的性质、程度和根源，是从平均收入还是从社会阶级的角度来衡量商业化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都认为，农村的苦难、20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外来侵略等等，都是农村社会危机的表现。这一再分配学派强调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社会结构方面。

《延安道路》属于再分配学派的著作，它强调农村的苦难、社会的解体和农村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它也强调中国农村的多样性和区域研究的重要性。无论中国的中心地区受到现代化力量多大的冲击，在广大的农村腹地，实际上包括所有的根据地、绝大部分山区和北部中国的边疆地区，社会解体、两极分

^① 费孝通：《中国的农民生活：对长江流域乡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纽约1939；赵康：《中国历史上的人与地：经济上的分析》，斯坦福，1985；《1350～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农村发展》，斯坦福，1990；弗里德曼、毕克维和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维特·利比特 (Victor Lippit)：《中国的土改与经济发展》，1974；卡尔·李斯金 (Carl Riskin)：《中国的政治经济学：1949年以来对发展的追求》，牛津，1987；盖尔·阿利哥 (Gail Arrigo)：《中国的地权集中：对伯克调查的再思考》，《现代中国》1986年第12卷，第3期，第259～360页；卡德林·柏纳特 (Kathryn Bernhardt)：《租、税与农民的抵抗：1840～1950年的长江下游地区》，斯坦福，1992。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华民国》出了一个专号《1885～1935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论集》，《中华民国》1992年第18卷，第1期；《亚洲研究》1991年第50卷，第3期和1992年第51卷，第3期也集中发表了一些论文。

化和经济停滞是常见的现象^①。特别是，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冲击波并未影响到贫困的边缘地带，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那些远离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边远山区、那些土匪和军阀的老巢。商业的发展以及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都与这些地区无缘。根据地的形成，正是军阀统治、外来侵略、经济停滞和地主制度的共同产物。“延安道路”正是这类边缘乡村地区的人们在资源极端稀缺的条件下对因战争而加剧的压迫、剥削和停滞所作出的创造性回应^②。

现代学术透视：

根据地研究与重新评价中国革命

为了更好地把握变化中的中共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7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致力于探索战争的冲击以及不同政治势力的不同社会、政治和经济纲领。人们运用微观研究的方法研究某一地区或根据地，甚至于某一个县、或某一

① 这种将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建国过程区别开来的观点，最有说服力的论述见肯尼德·波默朗兹（Kenneth Pomeranz）：《内地的构成：1853～1937年间中国北部内陆的政府、社会和经济》，柏克莱，1993；区别评判国家建设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不同后果，见苏珊·曼恩（Susan Mann）《1750～1950年间的地方商人与中国经济》，斯坦福，1987；弗里德曼·皮克维和塞尔登前揭书。

② 《延安道路》及彼得·斯朗（Peter Schran）的《游击经济：1937～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的发展》（阿尔泊尼，1976）都指出，在资源极为贫乏的陕甘宁地区，军人、学生和官员大量涌入将生存压力发展到了极限，正是战时社会经济纲领使得人们能够生存下来。可悲的是，打败日本半个世纪之后，陕甘宁及许多别的根据地地区依然是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地区。实际上，党的投资和发展的重点在1949年以后已经转到城市和对经济发展更有利的乡村地区。从军事角度考虑所进行“三线建设”是个例外，但这类工程从60年代一直到毛泽东逝世之后损失惨重。

个村庄，取得了新的可喜成果。那些最成功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某一地方、某一地区的研究，揭示特定的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战争形势以及不同党派的不同社会经济纲领之间的关系，从而将某一时期内某一地方的历史与地区的、民族的、甚至于全球大环境联系起来。研究其他根据地所取得的成果，也提供了新视角，使我们能够将《延安道路》同时视为对陕甘宁边区的个案研究和对整个民族运动的一种解释来评判。

对根据地所实施的战时经济、政治和社会纲领的分析，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来评判中共对于战争结局、对于民众动员、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对于社会变革所起到的作用。战时社会经济纲领最著名的部分是减租减息，该政策替代了中共早些时候的没收与分配土地政策。然而，在包括部分陕甘宁边区在内的那些竞争最激烈的根据地，税制改革所实行的深度和广度都比减租减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中共大部分根据地所在的北部和中部地区田租本就较低，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佃户所交的不是租而是税，或者是以自耕农和佃农的双重身份交税。对于绝大部分农户来说，税赋问题要迫切得多。第二，正像毕仰高（Lucien Bianco）、普拉仁吉特·杜拉（Prasenjit Duara）和拉尔夫·撒克斯顿（Ralph Thaxton）所论述的那样，20世纪的农民起义，矛头主要指向国家而不是地主阶级^①。中共的战时统一战线甚至包括地主和富农，也使得中共能够利用这种反政府情绪来结成广泛的同盟，反对征收苛捐杂税的日本傀儡政权。

^① 毕仰高：《农民运动》，载费正清和高尔威克尔，第270—308页；多拉前揭书；拉尔夫·撒克斯顿：《中国向市场进军过程中国家的暴力和农民的复仇》，手稿。伊丽莎白·佩里开辟了新的视野。她写的关于淮北农村地区一个世纪内的斗争，揭示了造反对象的多样性。见《1845—1945年间华北的造反派与革命者》，斯坦福，1980。

第三，特别是在那些竞争激烈的根据地，抗战人员并没有力量或稳定的环境来推行减租。减租运动需要动员贫困阶层，强调阶级的分野，因而也就会冒削弱统一战线的险。相比之下，将负担转嫁给富人身上的税制改革则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推行，而不必进行公开的阶级斗争、削弱抗战统一战线。因而，税制改革的范围要广泛得多^①。推行这种改革的结果之一是，虽然财产关系变动较小，实际收人的差别则大大地缩小了^②。赤贫的农户的税赋被完全免除了，较贫的农户的赋税负担被大大减轻了，这样的税制改革当然强化了中共与农民的关系。赋税改革与减租减息一起，扶持、扩大了自耕农阶层，缩小了收人与财富的差别。在通常的情形下，税赋总额在改革中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使战争的庞大支出能够维持，正如陈永发针对华东和华中的情形所指出的那样，“中共对整个社区所征收的税赋并不比国统区轻，只不过是中共使穷人的日子比富人的日子更好过”^③。

减租减息、特别是税制改革，体现了中共通过“静悄悄的革命”来削弱乡村上层阶级的权力、均化收人与财产的方针。这种“静悄悄的革命”是逐步地将税赋负担转嫁到富者头上，并强化日益壮大的自耕农这一农村大多数的地位^④。陈永发的研究表明在华东和华中根据地中，特别是那些竞争激烈、中共

① 弗里德曼、毕克伟和赛尔登，第40~44页。卡尔·多利斯（Carl Dorris）：《华北的农民动员与延安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季刊》第68期，第704~709页，1976年12月。

② 范力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700页。

③ 陈永发：《干革命》，第265~267，365~375页。

④ 弗里德曼、毕克伟和赛尔登在他们合著的著作中通过对河北中部农村的考察，指出税赋改革、减租以及其他相关的政策共同构成了“静悄悄的革命”。见《中国乡村，社会主义革命》，第4章。

势力较弱的地带，减租减息和税制改革都遇到了地主的顽固抵抗^①。然而，在中国北部的老根据地中，如晋察冀、陕甘宁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有效地施行了减租减息和累进税。这两种政策产生了财产再分配的效果，使农村的贫穷阶层，特别是作为多数的自耕农阶层支持共产党^②。而且，在多数情形下，减租减息和税制改革并没有使统一战线破裂，没有将地方精英驱进日本侵略者的怀抱。简言之，这有限度的改革既没有消灭、也没有疏离地方精英，而且以农民家庭经济和市场的持续性与支配地位为基础，加强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我在下文还会谈到根据地领导人为加强抗战势力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中共的战时纲领包括税制改革、减租减息以及在比较稳定的根据地所实行的互助和初步的合作。这些措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变革，包括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逐步变化和阶级关系的逐步变化。富人逐步失去权力与财富，而穷人以及部分作为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则获得了不稳定的（因为游击战争的原故）而却是看得见、摸得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权益。由于农民为应付生存危机，在经济作物地区扩大种植粮食作物，而根据地政府则在动荡时期鼓励贸易^③，商品农业这种从整体上的衰落加剧了富人权力与地位的衰落。这样一来北部和中部中国的敌后根据地政权，在同一的社会基础上获得巩固。

① 陈永发：《干革命》，第420～421页。

② 哈特福特和歌尔德斯坦，第101页；片冈哲也：《抗战与革命》，第122～133页，第249～251；撒克斯顿：《中国翻正了身》，第103～109页；弗里德曼、毕克伟和赛尔登，第40～44页。

③ 拉曼·迈尔斯：《土地制度》，载费正清和富尔威克尔，第267页。与中共从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致力于消灭私商的作法相反，中共在战时面临日军与国民党封锁的时候，致力于发展官营和私营商业。参阅弗里德曼、毕克伟和赛尔登，第4～5章；撒克斯顿：《国家的暴力与农民的复仇》，手稿。

评判中共的战时纲领，还有一些问题不那么好下结论。这部分地是因为不同地区的情况并不一致。其中一个问题是抗战力量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在河北中部和整个晋察冀根据地，抗战势力同时赢得了穷人和爱国地方精英的支持。在团结一致的社区中，常常有一些富人及他们的子女被吸收到地方政府中去。在一些场合，中共通过共同抗战和实施使相当部分的地方精英可以接受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来弥合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① 这里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共同的爱国主义，在那些抗战势力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地方，富家子弟参军会使其家庭减免税赋并增强其家庭的政治地位。也就是说，在中共动员爱国农村青年（无论是富家子弟和自耕农的子弟）的过程中，多种因素都在发生作用。一些爱国农村青年在党政军各界都逐步得到提拔。

陈永发发现的却是另一种情形：“无论那些富者如何乐于为中共服务，中共总是依赖穷人来扩充其军队。实际上，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反对富人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共主张义务兵制。这样就可以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下，清一色吸收穷人人伍。”^② 穷人包括佃农、雇工和无业游民，历来都是中国军队的骨干，八路军也不例外。然而，在我所详细研究的陕甘宁和晋察冀根据地，当然还有别的根据地，中共通过爱国主义的呼吁，连同没收不抗日分子财产的威胁，有效地将乡村精英吸收进自己的队伍中来。中共的上层领导便是从那些受过教育的、来自精英家庭的青年中产生的。他们深知精英们出任军官和组织者所做的贡献，爱国青年在抗日运动中很快就得到提升，他们也帮助他们的家庭巩固其地位。当然，在那些阶级斗争激烈的地方，军事动员往往发展为孤立和控制富

① 弗里德曼、毕克伟和赛尔登，第2章。

② 陈永发：《下革命》，第405页。

人，就像陈永发对华东所作的描述那样。不过，我们的中心论点是，抗战势力的一个优越之处就在于它采取灵活的战略，将包括富人在内的社会各阶级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这一问题还与关于革命性变革的动力问题的争论有关连。现在，我们可以超越由哈姆萨·阿拉维（Hamza Alavi）、埃列克·沃尔夫（Eric Wolf）所提出的、强调自耕农作用的中农中心论，与由詹姆斯·皮特拉斯（James Petras）、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等人所提出的、强调无业游民作用的贫民中心论。如果说抗战势力大量地吸收穷人，但它绝不局限于赤贫者之流，无论赤贫者指的是游民还是包括了佃农和雇农。如上所述，很多自耕农以至更富裕的家庭都投身于中共所领导的抗战，并在党、政府、民众团体、民兵和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而且，中共的减租和累进税政策扩大并强化了自耕农阶层（对沃尔夫来说是中农）^①。我在下面将考察作为农民大

① 哈姆沙·阿拉维（Hamza Alavi）：《农民和革命》，载拉尔夫·朱里班得（Ralph Miliband）和约翰·沙维尔（John Saville）编《社会主义者的音域》，第241～277页，伦敦，1965。埃黎克·沃尔夫（Eric Wolf）：《20世纪的农民战争》，第241～277页，纽约，1969。参阅沃尔夫《农民的造反与革命》，载诺曼·米勒（Norman Miller）和洛得里克·艾耶（Roderick Aya）编《民族解放：第三世界的革命》，纽约，1971。沃尔夫关于“中农是最容易受商业化伤害”和“最容易受发展中的无产阶级的影响”等结论，在中国找不到什么根据。不过，沃尔夫承认，一支外来的军队和农民所处的边缘地区，造成“战术性的社会流动”，从而促使农民参加革命，这样的标准可以应用到中国战时的根据地。参阅詹姆斯·皮特拉斯（James Petras）《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思考》，载詹姆斯·皮特拉斯编《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第三世界的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第179～180页，纽约，1978。爱德华·弗里德曼在研究20世纪初的白朗起义时也强调革命军队招募那些赤贫的流民：“正是这些无地流民、而不是那些耕田的人构成所谓农军的中坚。”《后退到革命：中国的革命政党》，第124页，柏克莱，1974。

多的自耕农阶层的地位提高，对于中国农村民主化的意义。

由詹姆斯·斯葛特（James Scott）和沙米尔·帕麦金（Samuel Popkin）的著作引发的关于道德经济学与理性农民的争论，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农村的不同阶级何以会支持抗战^①。道德经济学强调以生存与安全为首要的动机，而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中共制定求生存的政策、村民们则对这些政策作出积极的反应。但是，我们的研究同时也表明，将生存与市场对立起来，便可能会误解根据地的实际情形，因为中共在努力保证生存的同时，也致力于促进市场活动。不仅仅是自耕农或更富裕的阶层，包括那些无地贫民，都对市场机会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在中国农村，公认的好生活包括合适的婚、丧礼仪和逢年过节可资炫耀的花销。这些活动都需要钱，这些钱又只能在市场上赚取。

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将上面所提及的婚丧和节日都视为封建迷信。中共不仅要灭绝民间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还要消灭给这些文化活动提供资金来源的市场。但是，在发展抗日力量的时候，中共及其军队一般说来是保护传统风俗和市场的，将其视为有利于根据地生存发展的有力武器。贺大卫（David Holm）描述了中共在陕甘宁和其他根据地如何采纳和利用民间文化。例如，他们派秧歌队到各地农村巡回演出，在春节期间挨家挨户去拜访，演唱那些庆祝新年吉祥的民歌，以及放炮竹、拜土地公、送红封子等。贺大卫也描述了文化领域如何成了战场。一些知识分子抵制党的通俗化政策，党为了配合生产运动、减租减息运动而改造那些侧重

^① 詹姆斯·斯葛特（James Scott）：《农民的道德经济学：东南亚的起义与生存》，纽哈文，1976；萨姆尔·波波金（Samuel Popkin）：《理性的农民：越南农村的政治经济学》，柏克莱，1979。

男女性爱的通俗文化^①。

与强调在市场上获取现金收入的理性农民理论相一致，对陕甘宁和晋察冀根据地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社会阶级都看重市场。不过，认为农民总是作出理性选择的理论家们完全排斥文化因素，将理性选择视为始终都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实际上，人们在市场上的活动从未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仅仅局限于赚取现金。的确，当时广大中国农村、特别是根据地地区都遭受战争的破坏，敌人的掠夺和封锁，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党与农民理性地将对生存的保障视为比现金收入更为重要的东西。而且，农村的危机使人们更加珍视家庭、宗族和村社等群体的功能，而不是独立个体的能力。了解中国农村的这种实际情形，非常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道理”和“理性”在农民意识中的联姻。这两者孰轻孰重，要看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有道德的好生活意味着从生育、婚配、到丧礼等一系列体面的排场，这当然是要以温饱为前提的，但除了温饱之外还必须有的收入。

市场为现金收入提供了机会，而现金收入对于举办各种礼仪是必不可少的。举办那些约定俗成的文化活动也离不开现金，如演戏、上庙拜神和婚配谈判等。抗日力量同时致力于保证温饱和现金收入，这意味着鼓励而又管制市场活动。简言之，关于农民价值观和农民革命问题上的种种对立观点，在根据地现实及中共与农民的亲密关系面前都变得可以互相融通了。

上文提到中共在主要的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税制改革和鼓励互助，成功地建立了穷人与更富裕阶层的广泛联盟。这些

^① 贺大卫 (David Holm): 《革命中国的艺术与意识形态》，第 160~162 页，牛津，1991。

政治的和经济的纲领使根据地各阶层能够团结起来，从而使中共能够在日本和国民党的封锁和攻击下得以生存发展。战时陕甘宁所实施的主要政策，如税制改革、互助合作、建立民众团体、举办地方和地区选举等，在那些较为稳定的根据地中都广为采用^①。这些纲领扩大了中共政权的社会基础，缓和了根据地内部的阶级矛盾。《延安道路》讨论了这些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则在这些问题上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后来的研究表明，《延安道路》所提出的模式适用于对其他根据地以及整个抗日运动的研究，尽管与此同时必须适当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延安道路》以1942~1943年作为分水岭来讨论制度、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发展，强调日本的凌厉攻势所引起的各种反应。这种分期法在今天不仅依然适用于陕甘宁，而且适用于全民族的抗战。《延安道路》将焦点放在党与农民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上面，这为对各根据地的比较研究，更深刻地理解抗战的力量源泉提供了依据。最后，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而且预演并影响了席卷亚、非、拉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从这些方面来看，《延安道路》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我们目睹了中共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之后，我们在90年代还能坚持对中共的抗战所作的如此积极的评价吗？我在下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并依据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材料重新检讨《延安道路》的基本观点。不过，我坚持撰写原著初版时的态度：我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对

^① 纪保宁 (Pauline Keating) 对陕甘宁两个分区不同的互助合作方式的细致考察表明，合作不仅是由于经济的中心政策，而且对基层政治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延安模式的合作化：1937~1945》，1993年洛杉矶亚洲研究协会年会论文；《从社会生态角度看延安道路的起源》，《澳中杂志》第32期，第123~153页，1994年7月。

晚清或民国时期的中国、亚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当时或今天的贫困、分裂的农民民族的比较研究。但是，对《延安道路》的评价必须依据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不是将历史与现实做随意的比附。下文实际上是对《延安道路》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所作出的回应。

对《延安道路》的自我检讨

问题的核心是民主与专制，包括原教旨主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政治动员的实质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关于延安共产主义的争论的焦点^①。

我首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这类例子在已发表的论著中极少提及，甚至在《延安道路》所依赖的情报档案中也难以找到。这是发生于河北平原地区的一个命令主义的事例，而命令主义的事例当时是很多的。1944年，外来干部迫使一个苦苦挣扎的合作社采用以劳力为主的分配方案，而置土地回报子不顾。干部们说，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剥削”^②。这一新政策使一半的农户，特别是那些土地较多的农户退出了合作社（当时入社是真正自愿的）。看到合作社而临崩溃，干部们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分配方案。但是，那些脱离了合作社的农户则不再回来了。

在没有受到制约的场合，命令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对地方风俗的麻木不仁有时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例如，外来干部

① 我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详见弗里德曼、毕克伟和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及赛尔登《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② 这个及随后的口述历史的例子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见该书第3章。

为了树立榜样，创办给已婚少妇提供学习机会的夜校。但是，按照当地人的观念，妇女是不应出门去做事的，教育对她们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外来干部们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工作，没有让当地人接受这种新鲜事便鲁莽行事。结果，一些女生的家族被她们的行为激怒了，活活将她们打死。在这类极端的例子中，不顾民意的蛮干会闹出人命来。问题在于，按照某一僵硬的公式强硬行事，不同于按照当地人的愿望与要求，为伸张正义而进行的动员。有效的、受民众支持的动员与强制的命令主义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当党不顾民意推行某项政策的时候，往往就要采取强制或暴力措施，结果是导致民众的消极抵制、不团结或者更糟糕的后果。当时处于战争环境，面临生死存亡的军事斗争，而党的干部对地方情形又所知甚少，命令主义问题就变得更为严峻了。

这些例子说明群众路线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延安道路》的初版没有充分注意这一问题。在最理想的情形下，以化解矛盾为目标的群众路线能够广泛地把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为抗战和社会经济改革而努力。《延安道路》强调了对民众的愿望与要求的引导。如果与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协调起来，这种政治行为就能够为社会经济平等做出贡献。但是，既然中共自称是道德与真理的化身，群众路线如果操作失当，便会流为原教旨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政治动员的阴暗面在毛泽东晚年、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清洗、个人崇拜、高压政策和操纵行为中暴露无余。但是，在早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生存有赖于民众的支持，因而一般说来，能够制止其命令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他们在与社会各阶级打交道时，在战略和战术方面都表现出灵活性。例如，在地方选举中，中共虽然从未允许它的支配地位受到挑战，却使非共产党人参加其地方政府。地方精

英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种向民主政治转变的进程^①。抗战时期的实践表明，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民主化的可能性，虽然绝不是惟一的可能性。这也是中共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我在90年代修订这部著作时，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主主义潜在因素的肯定便要谨慎得多了。

中共所实施的战时改革纲领，符合民众，特别是穷人的要求，创立了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前提，扩大了政治参与的社会层面。我们做出这样的评判依据的是何种标准？当然是与国统区、军阀统治区和日本占领区比较而言，也是与当前贫穷落后的国家比较而言。在陕甘宁及其他敌后根据地当时所实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纲领，是20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最富有创造性的纲领之一。其成就包括将那些被抛到社会底层的广大社会成员卷进政治过程中来，并扩大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延安道路》承认并强调这些向民主转变的基本因素。然而，当我们在90年代这段历史时期时，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抗战时期的民主基因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民主政治，反而在人民共和国时期受到挫折。原因之一是抗战运动本身也包含有党的专政、思想上的原教旨主义和领袖崇拜等因素。

当我们将眼光从抗战时期移向人民共和国时期，我们看到，当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而它雄心勃勃的发展和建国方案遇到国内外的阻力时，抗战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集中主义、原教旨主义和专制主义都肆虐起来了。“延安道路”中许多最迷人的因素都夭折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党对权力的垄断，扼杀了抗战时期有助于知识分子的流动、统一战线的改良

^① 这是弗里德曼主编的《民主化的政治：东亚的盛衰荣枯及其经验的普遍意义》一书的主题，布尔德，1994。

主义萌芽。党早先曾经在混合经济的大框架中鼓励农民的互助合作精神，由于党以苏联的集体农庄为榜样来建立庞大的集体，而相应的机械化却无影无踪，这种互助合作精神也被削弱了。1955年之后，由农户、合作社和市场共同构成的混合经济的可能性被反市场的集体经济所取代。

革命所带来的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使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远远超过处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甚至接近于发达国家。然而，50年代中期以后，重工业被当作增强国力的关键，农业被当作重工业发展最主要的原始积累，农民的利益便为实现国家的不现实的计划而被牺牲掉了。中共认为它是“延安道路”的继承人。但是，在毛泽东晚年时期，延安的精神遗产被理解为禁欲主义、艰苦奋斗、阶级斗争、自我牺牲，以及对领袖的无限忠诚等。这些准则在抗战时期是能够被接受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能万古长青。城乡之间及官员与农民之间的鸿沟出现了。绝大多数农民，特别是那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再也无钱可花，终日艰苦的劳作并未带来人均收入的增加。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党抛弃了早期运动中那些最有前途的方针与方法，为工业和城市而牺牲了农村的利益，而且进行没完没了的政治清洗^①。

通过反思1942年中共的整风运动，我们还能澄清一些别的重要问题。将延安整风看做是统一党内思想，看做是训练干部和知识分子来适应1942~1944年重要的政治和制度方面的变革，《延安道路》是英文世界中的第一部著作。这里所说的政治与制度方面的变革，也就是“延安道路”的核心内容：互

① 《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和即将出版的《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村》三部著作体现着我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延安道路的历史意义的评价。

助合作运动，税制改革，大生产运动，动员妇女参加经济建设，扩大有组织的经济、教育与医疗卫生方面的改革等。这些改革，连同面向农村的文化政策，要求将大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转到农村去工作。也就是说，整风运动为根据地深刻的制度变革提供了组织上的统一性。

整风运动同时又是一场调解冲突的运动。当然这是与早些时候以暗杀与枪决来解决党内冲突的做法相比较而言。《延安道路》的初版赞同贝德·康普通（Boyd Compton）的看法，延安整风并不是一场清洗运动，尽管它为严厉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提供了舞台^①。新发现的资料以及中国革命后来的实践都要求我们从压制不同意见和党内斗争等角度，去重新认识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不仅是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至尊地位、特别是理论上的霸权关键的一环，而且是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抑制知识分子及党内积极分子的思想独立性关键的一环。这些倾向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只是初见端倪，在人民共和国时期则发展到灾难性的顶峰。戴晴关于作家王实味的著作，让我们看到了也许是检测抗战时期思想钳制最重要的典型例子。我之所以举实味这个例子，既因为这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同时也因为我的《延安道路》的初版中对此事有所论列。如该书初版所叙，王实味的罪状是严厉批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贵族倾向，而这一运动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属于最符合平均主义标准的。在中共的领导人看来，一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竟然以自定的标准来责备党的领袖，简直太疯狂、太放肆了。王实味指出，党让它的干部在饮食、衣着和性生活等方面享受特权，这暴露了党的虚伪。他认为，当党要求所有人都为民族的独立

^① 康普通（Compton）：《毛氏中国的整党文件，1942～1944》。

解放做出牺牲的时候，“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是一种不道德的奢侈。当年36岁的王实味不愿接受领导人的批评，低头认错，于是便被关进了监狱。（丁玲等其他作家也受到批评，但他们至少装模作样地作了自我批评。）

戴晴在她的著作中透露，王实味以托派的罪名坐了5年牢，并惨遭杀害。大卫·阿普特（David Apter）和提摩泰·齐克（Timothy Cheek）正确地指出，王实味事件涉及制度上的问题，体现着“延安阴暗的一面，象征着延安内部情形的一部分。这与从外面看延安所见到的勤俭节约、自我牺牲、救国救民等形象同样真实”^①。

我认为，王实味事件应从几个层次去理解。最主要的是，这一事件以及整个整风运动本身是中共建立思想控制机制的重要步骤。当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这种机制得到强化，而且它的运行成为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王实味所代表的是当时一场文化争论中与毛泽东相反的立场，而这场争论是延安整风的前奏。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亟欲建立一种基于中国民间传统的新的文化艺术，并以此作为工具来缩小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差别；王实味则是“高等文化”或现代主义观点的主要代言人之一，这种观点认为民间文艺无助于新文艺。这种分歧在当时变得严酷起来，是因为毛泽东等人力图“约束知识分子，并将精力集中于在农民大众中扫除文盲、扫除愚昧、扫除迷信、扫除疾病。也就是说，为经

^① 戴晴：《王实味和“野百合花”：1942～1944年中共的内部整肃和清洗》，英文版由大卫·阿普特（David Apter）和提摩泰·齐克（Timothy Cheek）编辑，纽约，1993。参阅《恐怖与统一：1942～1943年的反奸细运动、整风运动和群众运动》，《现代中国》第12卷，第1期，第39～73页，1986年1月。

济增长和政治动员扫除障碍”^①。

这一事件也昭示了抗战时期持不同政见者有限的活动空间。王实味在整风运动初期并不乏支持者。他不仅成功地发表了两篇论文，而且在被捕前争取到不少支持者，并成功地对党进行了反击。对党的决议提出挑战的机会后来就不复存在了。8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新材料被公诸于众，王实味一案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广泛地引起重视，既是因为它的典型意义，也是因为它对边区政治的重大影响。

对王实味的处置暴露了延安共产主义体制不完善的一面。由于民粹主义、改良主义以及原始民主主义倾向在战时颇有势力，处置王实味所体现的不良倾向，在后来的人民共和国时期得以泛滥。

黄宗智在评价抗战时期时指出：“中共比国民党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但是他又进而指出：“尽管中共宣称走‘群众路线’，教条地运用列宁主义的心态与作风是不容置疑的。”^②后一种判断如果是指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我没有异议。

然而，作为对抗战时期中共所作所为的全面评价，黄宗智的观点在我看来是片面的。我担心这种观点来源于依据中国革命后来的现象去判断它的历史。在根据地的历史中，王实味事件毕竟是很个别的例子，特别是与日本侵略者或国民党捕杀政敌的情形相比较而言。如果说《延安道路》确实低估了延安共产主义的阴暗面，那么，我们也不应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开放、最富有创造性时期的一些特色视而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延安共产主义能吸引社会各阶层的爱

^① 贺大卫，第93页。

^②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现代中国》第17卷，第3期，第325页，1991年7月。

国者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中共内部包括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关于民主的呼声，以及他们在1949年以后的反专制主义斗争。

我当然不是主张宽恕中共在抗战时期开始显露的玩弄手腕、崇尚暴力或原教旨主义倾向，而只是想指出，这些倾向在当时受到了双重的制约。一方面是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共当时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民众的广泛支持才能够生存。另一方面，战时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的特性，既体现在杰出的知识分子身上，也体现在农民大众身上。

《延安道路》所遇到的另一个方面的重大挑战来自陈永发。他指出，1943~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政府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和经销“特殊产品”^①。陈永发的研究揭示了闭塞的陕甘宁边区农村生活的极度艰难，以及现代革命党人与传统的叛党之间的历史关联。这种历史关联，伊丽莎白·伯里（Elizabeth Perry）在关于淮北地区的研究中就已提出过^②。

由于战争与封锁使边区的贫穷更为恶化，由于国民党从1940年起完全中止财政补贴，抗战力量在财政经济方面可说是四面楚歌。即使没有战争造成的损失，大量的军队、行政人员和学生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同时蜂拥而来，这就足以使边区经济陷入困境。……陈永发的发现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边区为生存而斗争的政治与经济的本质，也提醒人们注意市场在帮助抗战势力渡过危机方面的作用^③。

① 陈永发：《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和延安模式》，载托尼·塞克（Tony Saich）和汉斯·范达文（Hans van de Ven）编《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新论》，纽约，1994。

② 《造反派与革命者》。

③ 这些问题，特别是市场的作用问题，参阅《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第3~5章。

令人惊奇的是，陈永发没有直接引述彼得·斯朗（Peter Schran）的《游击经济》，这是迄今为止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表现最为深入的研究成果^①。斯朗详尽地分析了边区政府为渡过40年代初的财政、经济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包括官营经济，在增税的同时进行调节负担的税制改革，印刷纸币，从事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以及动员妇女及其他劳力投身生产活动等等。斯朗的研究表明，1941～1945年间边区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逐年增加^②。

陈永发的新证据对评判边区的政治与经济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他对早期著作的诘难并未令人信服。无论是斯朗的《游击经济》还是我的《延安道路》，都没有宣称自力更生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的贫困、技术落后、政府财政赤字等问题。这两部著作，以及探讨根据地经济问题的其他著作，事实上都强调根据地政权严重的财政压力，都没有高估根据地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由于要养活庞大的军队和干部队伍，由于长期的战争与经济封锁，根据地没有、也不可能取得经济突破。我在《延安道路》中所得出的结论还要更低调一些，我只是指出，减租、税制改革、互助、市场和自力更生等共同支持了抗战。我也暗示这些措施对后来经济发展的潜在价值，但没有宣称经济突破。

战时共产主义运动与历史上由生态和文化决定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断裂，而是具有某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当然也包括利用市场机会（包括至少是1943～1945年间的鸦片贸易）这一战时经济的关键因素。鸦片贸易也从一个方面表明，陕甘

① 斯朗附带提及国民党关于鸦片贸易政策的变化。像所有研究根据地经济的早期著作一样，斯朗详细分析了边区的经济与财政而没有提及鸦片。

② 斯朗，第198～199页。

宁边区与国民党或军阀统治区的区别并不像我及其他研究者早先所想像的那么大。

……

近年的研究使我们能够重新认识“延安道路”的许多问题。在农民不仅构成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其道德观念深刻地影响了革命进程这种意义上，抗日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尊奉道德经济学的历史家提出了这种观点，最明显的例子有弗里德曼对民国早期历史的论述和撒克斯顿对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论述^①。在这里，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先锋队作用的理论被翻转过来了：党向群众学习并主要是依据民众的价值观来制定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纲领。这里所说的价值观特别指，在受帝国主义侵略者、军阀和地主所支配的世界里，农民大众受宗教和宗族观念影响的，关于正义与邪恶的观念。按照这种观点，党的成功在于它体现了农民的愿望与价值观。

用这种观点来研究抗日战争，优势在于它承认党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而又在农村渡过了20年岁月的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向农民学习，接受农民的价值观。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甚至在党认为是向受封建主义影响的农民灌输“正确思想”的时候，也常常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而修正其纲领与观念。它承认农民保持着原有的价值观与信仰，并将它们带进党内。它有助于人们了解由于党员和军人的绝大多数来源于农民，而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特色。这种观点有助于人们去把握将农民与党及领袖们连结起来的那些共同的价值观：从平均观念到家长观念，从市场观念到宗教观念。

但是，这种以农民为中心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毕仰高令人信服地指出：“没有农民大众的支持，共产党不会取胜。但

^①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翻正了身》。

是，没有共产党，农民们压根就不知革命为何物。”^① 在没有共产党或其他外来势力参与的情形下，20世纪的中国农民举行了成千上万次抗议或暴动来反对政府、地主、其他上层人物、以及别的社会阶层。恰恰是农民所赖以举行成千上万次暴动的一些关键因素，使农民暴动无法从地方性的骚乱发展为全国规模的运动^②。千百年来，大规模和成功的农民起义都是在以农民为基础的同时，由那些或者受过教育、或者来自精英阶层、或者走南闯北的、总之比农民具有更宽广的视野的人们来领导的。

中国农村生活中的贫穷、剥削与社会解体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是，正如毕仰高所说，农民自身并不能使革命从可能变成现实^③。共产党人正是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依靠他们那些都市的、面向世界的观念，以及他们实现民族独立并最终建立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决心，将包括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那些在绝望中挣扎的力量联合起来。这并不是要否认士兵及一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农村的军队所具有的农民特色，也不是要否认农民的价值观对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影响。这种观点的优势在于它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多种不同因素之间的结合与冲突：诸如沿海与内地的冲突、都市观念与乡村观念的冲突、军人与文职人员的冲突、党与社会的冲突，等等。同时也必须指出，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它关于党与农民的绝对的两分法，在于它忽视了党改造农民、农民也改造党的双向社会化过程。将几十年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必须在一个重

① 《农民运动》，费正清和富尔威克尔，第270页。

② 同上，第274页。伯里在《造反派与革命者》中也论述了这一观点。

③ 《农民运动》，第327页；范力沛从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方面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648页；参阅陈永发《干革命》，第101页。

要的层面上看到历史的连续性：农民们自下而上地要求恢复市场的地位，党在其初接受了这种要求、掌权后又致力于压制这种要求，最后还是恢复市场地位的要求占了上风^①。

这篇后记从几个角度探讨了根据地的民主与权力问题。《延安道路》强调抗战时期在平均、参与和合作等方面的成就。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中共在以农户和市场为基础的混合经济条件下，通过减租、税制改革和鼓励互助等方式向地主的权力挑战，并增强贫农、自耕农的地位。与此同时，抗战势力致力于提高民众的文化和教育水平，致力于动员包括乡村贫苦农民及妇女在内的民众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构成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因素，也正是这些因素增强了农民的地位，扩大了他们的权利。

在90年代修订此书时，我感觉上述观点还有不足之处。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既然当初有那么多有利于向民主转变的因素，特别是增强作为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的地位这一因素，后来民主政治的发展何以会如此步履维艰？中共“新民主主义”思想中那些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因素何以会在后来的岁月中灰飞烟灭？本书所叙述的那些成就为什么在中共垄断权力后会得而复失？农民构成战时革命势力的核心并在很多方面受惠于中共在战时所制定的纲领，为什么他们在毛泽东晚年依靠政治动员所开展的集体化运动中会备偿艰辛？部分、也仅仅是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抗战时期民主方面的进步是有限的。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党与军队所进行的政治动员中，民主倾向一直被压抑于次要的地位。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当民众在革命运动中获得一些权益的同时，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也与日俱增。我们从延安时期就已初见端倪的一些倾向中便可

① 这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村》的中心论题。

以发现后来党与人民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种种冲突的根源。

在《延安道路》中我正确地指出了民主主义的萌芽，如举行多种形式的选择、人口多数的自耕农阶层的成长、合作经济的出现等等。但是，我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些民主主义萌芽只不过是中共所支配的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的组成部分。而在后来的岁月中，正是这种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变成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变成广大农民获取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严重障碍。

当我在1990年代反思“延安道路”时，我所得出的结论是：

其一，作为对抗战时期中共革命实践的总结，“延安道路”所体现的是在世界边缘地带所发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革命变革的重要契机。与此同时，它对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也有重要意义，其贡献包括使占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获取更大权力的那些政策，如由减租和税制改革所构成的“静悄悄的革命”和互助合作及民主政治的初步发展。原著的中心论点依然是正确的。

其二，然而，由于我在早期研究工作中的疏忽，在我总结出来的“延安道路”中又掩盖了专横与倒退的倾向。当这些倾向在人民共和国时期，特别是1957年等年头被发展到极端时，其结果是令人悲痛的，同时也有违中国革命那些最美妙的诺言，包括实现民主、平等和使农村摆脱贫困。

从我所总结的“延安道路”中，我们可以追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迄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那些矛盾的起源。为了使“延安道路”中最富有人道的那些因素得到发扬光大，也为了辨清那些阻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阻碍人类解放的那些专横势力，用复杂的眼光去认识“延安道路”将大有裨益。

参 考 书 目

1. 中共出版物

赵元明：《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出版地不详，1946。

哲夫：《关于新区工作的几个问题》，《党的工作》第12期，1936年9月14日。

《真理》，西安，1931。

《整风文献》，广州，1950。

齐生：《解放区的工厂经营与管理》，出版地不详，1946。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1958。

教育镇敌社：《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1946。

《解放》，延安，1937~1941。

《解放日报》，延安，1941~1945。

解放社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出版地不详，1938~1940。

《斗争》，1932。

《群众》，汉口—重庆，1937~1945。

湖北大学编《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讲义》，北京，

1968。

《中国青年》，北京，1924~1927。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北京，1958。

中共中央组织处编《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编》，延安，1942。

《中国共产党第六中全会文件》，重庆，1939。

贺龙：《整军问题》，延安，1943。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农村调查》，上海，1934。

徐海东：《陕北会师》，载《红旗飘飘》第三辑。

许涤新：《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根据地之财政与经济》，出版地不详，1941。

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北京，1962。

华应申编《中国共产党烈士传》，北京，1951。

《红旗》，出版地不详，1929~1930。

《红旗周报》，上海，1931~1933。

《红旗飘飘》，北京，1957~1966。

《1943年生产运动中的经验》，延安，1944。

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载《整顿三风参考材料》，出版地不详，1943(?)。

《抗战报》，绥德，1944。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1953。

《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陕甘宁边区》，共三卷，延安，1942。

高岗：《整顿党政军民各组织间关系问题》，延安，1943。

高岗：《高岗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的结论》，延安，

1943。

高岗：《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延安，1943。

高岗：《关于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经过及经验的总结》，延安，1943。

关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失败的经验与教训》，载《斗争》1934年1月12日，第61卷，第41期。

关锋：《一九四五年边区的主要任务和作风问题》，延安，1945。

关锋：《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出版地及日期不详。

《共产党人》，延安，1939～1940。

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和农民负担》，《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选举》，延安，1937。

林伯渠：《简政问题》，延安，1943。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延安，1944。

林伯渠：《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解放》第95期。

林伯渠：《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国之途》，《解放》第5卷。

罗雄：《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6。

陇东边区政府：《征粮征草工作总结报告》，1942。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载《毛泽东选集》，晋察冀，1944，第4卷。

《毛泽东选集》，晋察冀，1944，共六卷。

《北方红旗》，北平，1929～1933。

《边区群众报》，延安，1944。

《布尔什维克》，1930～1932。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延安，1941。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延安，1941。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集续编》，延安，1944。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陕甘宁边区教育方针》，延安，1944。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务会第十一次政府委员会第五次连席会议关于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提案》，延安，1944。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几个民办小学》，延安，1944。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延安，1944。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延安，1943。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文教工作的新方向》，延安，1944。

《陕北共党发展的概况》，（疑是郭洪涛所著，出版地不详），1935。

史景堂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北京，1957。

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政治》，延安，1940。

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教育与文化》，延安，1940。

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延安，1940。

苏中区党委：《整顿三风参考材料》，1943。

《党的工作》，陕西，1936。

《斗争》，上海，1932~1934。

《斗争》，陕西，1936。

《斗争与学习》，西安，1936。

《组织起来》，1944。

《团结》，延安，1938~1941。

文化教育委员会：《学习生活》，延安，1941。

延安农村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北京，1957。

于奇：《时论选编》，上海，1937。

于鸣：《陕甘宁边区怎样实现民主》，《群众》第4卷，第1期。

2. 其他中文、日文书籍

亚洲经济研究所：《中国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东京，1961。

国民政府调查局：《奸党对陇东之阴谋》，甘肃，1941。

国民政府调查局：《中共之简政与乡选》，1942。

国民政府调查局：《中共概况调查》，1940。

国民政府调查局：《中共的经济政策》，1941。

国民政府调查局：《中共最近党内斗争内幕》，1944。

国民政府调查局：《24年全国保安总记载》，1935。

国民政府调查局：《中共在甘肃的组织与活动》，1941。

国民政府调查局：《各边区赤匪流串之概况》，1937。

国民政府调查局：《共匪党务决定》。

国民政府调查局：《两年来之中国共产党，1931～1933》。

国民政府调查局：《陕西共产党之纠纷》，1931。

国民政府调查局：《半年来陕甘宁及川康边境赤匪》，1937。

国民政府调查局：《三十年度伪陕甘宁边区中共活动实况》，1941。

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全貌》，1940。

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群众运动特辑》，1939。

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实况》，1939～1940。

国民政府调查局：《中共现状总报告》，1938。

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调查专报》。

国民政府调查局：《党派调查周报》，1940～1945。

国民政府调查局：《党的建设》，1951。

国民政府调查局：《陕甘宁边区调查专报》，1938～1941。

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1946。

陈言：《陕甘调查记》，北平，1936。

郝立：《陕甘宁边区实志》，1939。

楚云：《陕行志实》，1938。

福岛正夫：《中国的人民民主政府》，东京，1965。

泰野干一：《中国共产党史》，共七卷，东京，1962。

板垣定次：《个人反省》，《肃正月报》，满洲，第4卷，第4号，1939年4月。

国防部新闻局：《共匪反动文献汇编》，共五卷，台北。

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共十一卷，台北，

1962。

鲁芒：《陕甘宁边区的群众运动》，汉口，1938。

孟伯谦：《回向人道》，香港，1953。

新岛顺良：《现代中国的革命观念：对中苏冲突的探讨》，东京，1964。

《边区人民》，1942~1943。

《陕北见闻》，1944。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省农村调查》，上海，1934。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1965。

王中明编《陕北之行》，重庆，1945。

杨实：《陕北的群众动员》，1938。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作者 =

页数 = 3 1 7

S S 号 = 1 0 8 2 1 2 7 9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